

叶 骁 军

陕 西 人 民 出 版 社

1043220-201

中國

都城發展史



《中国都城历史图录》

统一书号，11402·1—4

估价（国内，140.00元）

内 容 简 介

该书收录自夏代至1949年历代各都城的有关线图和照片达2000幅，包括城市平面图，考古发掘实测图，国内外文献图，建筑复原图，都城内外重要出土文物照片，历代有关都城的名画及其他图片，所有图片均注明出处并附有简介文字，集中了有关都城研究方面的重要成果。

该书可供高校历史、地理、考古、建筑、城建规划及设计、管理部门和实际工作者参考。

出书时间，1987年2月

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

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中国都城发展史

叶 骁 军

陕 西 人 民 出 版 社

中国都城发展史

叶 骁 军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新华书店经销 陕建总公司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5印张 4插页 233千字

1988年5月第1版 1988年 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500

ISBN7-224-00252-6/K·42

定 价：3.30元

目 录

前 言	(1)
总 论 中国都城的规制	(4)
第一章 萌芽时期的都城 (夏以前)	(23)
第二章 雏形时期的都城 (夏—战国)	(26)
第一节 雏形时期都城的发展趋势和特点	(26)
第二节 扑朔迷离的“夏都”	(27)
第三节 迁徙不定的商都	(33)
第四节 周都岐邑和丰镐	(46)
第五节 洛水河畔寻周都	(52)
第六节 雨后春笋般的春秋都城和各自雄霸一方的 战国都城	(61)
第三章 发展时期的都城 (秦汉—隋唐)	(77)
第一节 发展时期都城的特点	(77)
第二节 秦都的逐步东移和横跨渭水两岸的咸阳	(78)
第三节 鸿篇巨制的斗城长安	(91)
第四节 铜墙铁壁的东汉雒阳和魏晋洛阳	(118)
第五节 宫室北移的先声——曹魏邺北城和东魏北 齐邺南城	(128)
第六节 群星拱月的建康	(132)
第七节 伽蓝林立的北魏洛阳 (洛京)	(144)
第八节 棋盘之城——隋唐长安与洛阳	(153)

第四章 成熟时期的都城（北宋—明清）	(184)
第一节 成熟时期都城的特点	(184)
第二节 繁华竞逐的北宋开封	(186)
第三节 钱塘形胜——南宋“行在”临安	(201)
第四节 开封的翻版——金中都大兴府城	(214)
第五节 汗八里——元大都	(219)
第六节 明代的中都和两京	(233)
第七节 清北京的三山五园	(264)
第八节 太平天国的天京	(271)
第五章 关于边疆民族政权的都城	(286)
第一节 茫茫大漠寻古都	(286)
第二节 边陲城制仿中原	(290)
第三节 兴王之地作陪都	(295)
第四节 关于西北民族政权的都城	(297)
第六章 辛亥革命以后的都城	(303)
附 录	
(一) 中国历代都城一览表	(309)
(二) 主要参考文献目录	(323)
(三) 古都景名	(329)
关中八景	(329)
洛阳八景	(329)
开封八景	(329)
西湖十景	(329)
燕京八景	(329)
金陵四十八景	(329)
后 记	(331)

前 言

中国都城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创举，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中国都城在世界历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仅《水经注》中记载的历代列国故都就约有一百八十处之多。加上北魏以后的历代都城，总数约在二百以上，这是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相比的。

在国内，对中国各个都城的研究，自古以来就比较活跃。近几年来，出版了不少论文和专著。但对中国都城的综合研究，从理论和学术的角度，研究中国都城的发展规律，做得还很不够。如历代国都位置的选择，城市布局和宫殿布局的规律等，只有一些杂志零星发表了一些文章。清初顾炎武、清末梁启超做过一些这方面的工作。但同我们伟大的都城相比，这方面的工作做得就很不够。

日本比较重视对中国都城的研究。日本所出《都城》、《日本的宫都》两书，把中国都城和日本都城逐一对比，研究中国都城的发展规律和对日本都城的影响；所出《汉长安城与阡陌、县乡亭里制度》一书，更是规模空前，为我们国内所不及。1982年5月，日本方面又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有关专家赴日，参加日本第六次古代史讨论会，主题是古代都城，由中日双方专家主讲。

美国方面，我们了解情况很少。已经知道出版了不少专著，如斯坦福大学施坚雅主编的《中国王朝时代晚期的城市》（又

译《中华帝国后期的城市》),收有研究中国城市的论文十六篇。

研究都城史,首先碰到的问题是:什么是城?城,当然是我们看到的城垣。但它的内在含义如何?苏联莫斯科大学考古学系主任A·B·阿尔茨霍夫斯基曾说:“对设防的居址,考古学上采用的术语是‘古城’,对不设防的居址,如果它们与古城同时代,则用‘古村’⁽¹⁾。”这个定义不很严密,因为设防不一定都用城垣。

《古今注》上说:“城,盛也,盛受国都也。”又说:“筑城以卫君,造廓以守民。”从这里我们看到,城的出现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恩格斯曾经说过:“在新的设防城市的周围屹立着高峻的城墙并非无故:它们的壕沟深陷为氏族制度的墓穴,而它们的城楼已经耸入文明时代了。⁽²⁾”在这里,恩格斯明确告诉我们,城的出现是氏族制度瓦解、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即奴隶社会的标志。

最早的城垣出现在什么时候?我国没有发现仰韶文化时代的城址。但在国外,如巴基斯坦的耶利哥城,是公元前七千年的;埃及发现了距今八千年前的古城。二十年代,在山东历城县城子崖龙山文化遗址,发现了我国新石器时代的第一座城垣。解放后,尤其是近几年来,在安阳后岗、河南登封王城岗、河南淮阳平粮台,陆续发现一些属于龙山文化时期的城垣。有人认为,有些城,如王城岗,也许就是夏都阳城。

但是,以上所说的这些城都是古代的军事、政治城堡,范围很小,城内居民可能都是王室贵族,不能同现代已形成大城市的都城相比。“城市”的概念比城的内涵深,“城”的外延却比城市大。城市包括在“城”之中,而“城”却不一定是城市。中国城市的形成大概在春秋战国时期,而城的起源却早得

多。关于城的起源，有不同的说法：

其一是防御说。城是统治阶级的工具，是为了防御和保护的目的而兴建起来的。

其二是集市说。交换的出现，集市贸易的经常化，于是在交换地点出现城垣等建筑。

其三是地利说。水陆交通的路口，居民的密集，到一定的时候，建筑城垣。

还有人说，最初的居民点建设在河川附近，为了防洪水而修建了城垣。上述诸说都不无道理。但从根本上说，乃是生产关系变革的结果。生产力的发展，有了私有财产，有了政权机构，才可能修筑城垣。

本书主要论述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些有代表性的都城（包括一些陪都和秦以前的诸侯列国都城）的择都经过，历史沿革、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以及城市布局，经济与文化概况，城市的毁灭与遗址现状。对于都城所在地整个城市的发展和沿革，我们一般不涉及。

在方法上，按照我国都城发展史的分期进行论述，而不是对各个现存所谓古都进行介绍，对于历史上为时很短的一些都城，不作介绍。

我们试图通过以上论述探索中国都城的发展规律。

-
- (1) A·B·阿尔茨霍夫斯基《考古学通论》，原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54年版，楼宇栋等译，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2页。
- (2)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62页。

总论 中国都城的规制

中国都城自有文字记载以来，有过各种名称。称京，称都，称国，称邑，称京师、京辇、京城、京华，又称京阙、京畿、国都等等。《诗·大雅·公刘》中有“京师之野，于时处处。”“京师”之名始于此。其后“京师”用于都城的称呼，从东周至于民国初年，沿用最久。

《释名》：“都者，国君所居，人所都会也；邑，犹偃，聚会之称也。”《左传》：“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甲骨文中，京字为一高台上的房屋（𠄎，𠄎）⁽¹⁾，且高台有方有圆。《尔雅·释丘》：“绝高为之京”，又说：“卓绝高大为丘，而人力为作之者名京。”⁽²⁾《太平御览》引《帝王世纪》：“天子畿方千里，曰甸服。甸服之内曰京师。”《公羊传》更加明确地解释说：“京师者何？大也。天子之居，必以众大之辞言之。”由此看来，对于“京师”之义，为天子所居，高大入众，解释是一致的。可是，到了清朝，顾炎武别立一说：“陕西凤翔有山曰京，有水曰师，周文武建都于此，统名之曰京师。”⁽³⁾此说能否成立，尚有待进一步考证和研究。

宋玉《对楚王问》：“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这儿的“国”，即指楚都“郢”。日本京都大学教授上田正昭先生在其所主编的《日本古代文化的探究——都城》一书中，曾具体地解剖过汉语的“国”字。认为：“‘國’字就是以‘戈’，亦即武器，守卫

一定的土地‘口’，它围绕以城墙‘口’，总之，是表示都城的意思。”⁽⁴⁾在周代早期的铭文中，这个“戈”是在城墙外面的，城墙里面只有个“口”字（阼）。到周代中期，这个“戈”也包在城内了（國）⁽⁵⁾。

至于都城的其它一些名称，或为代称，或为引申而来。皇帝之车称辇，故都城亦称京辇；宫城前有双阙，都城因之称京阙；都城人文荟萃，故称京华。《国语》韦昭注：“方千里曰畿”；《诗·毛传》认为畿是门内；《说文解字》段注也认为：“畿，门限也”，京畿之称，指京城及其附近地区。

中国古代都城发展的历史，根据城垣形制、城市布局和功能几方面考察，从远古至明清，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二里头文化以前，可称为“萌芽期”；从二里头文化至战国时期，是“雏形期”；秦汉至隋唐是“发展期”；宋、元、明、清是“成熟期”，至于辛亥革命以后，本书只作简略的介绍。

在萌芽期，都城宫室只有古文献记载的远古传说，尚未得到考古材料的证实。个别所谓远古“都城”，实地调查到一些蛛丝马迹，亦未有定论。

南宋郑樵对早期都城作过探索。他在《通志·总序》中说：“都邑之本，金汤之业，史氏不书，《黄图》难考”，于是他“上稽三皇五帝之形势，远探四夷八蛮之巢穴”，乃作《都邑略》。在《都邑略》中，郑樵载录三皇之都：“伏牺都陈，神农都鲁，或云始都陈，黄帝都有熊，又迁逐鹿。”五帝之都：“少昊都穷桑，颛帝都高阳，帝啻都亳，亦谓之高辛。尧始封于唐，后徙晋阳，即帝位都平阳。舜始封于虞，即帝位都蒲坂。”⁽⁶⁾

《周易》记载：“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

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7)”《孟子》一书，亦有关于尧舜宫室和朝见的记载：“舜南面而立，尧帅诸侯北面而朝之。(8)”“尧舜既没，圣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坏宫室以为污池，民无所安息。(9)”

清代顾祖禹在《读史方輿纪要》一书中考证：“尧舜禹之都，相去不过二百里，皆在冀州之内。(10)”

上述文献中关于古代传说的记载，可以推定当时已有城廓宫室，有朝见制度，或者说，有了国家政权的萌芽。

这一时期都城宫室是什么样子，无从确切知道。从某些文献记载（如《世本作篇》载“舜作陶”），可推测大概相当于新石器时代向有阶级的国家过渡的时期。有关民族史的一些材料，使我们对于朦胧的宫室制度，有一个大概的认识，如：

“女真之初无城廓。国主常浴于河，牧于野。屋舍、车马、衣服、饮食之类，与其下无异。国主所独享者，惟一殿，名曰乾元。所居四外栽柳，以作禁宫而已。其殿宇绕壁尽置火炕，平居无事则锁之，或时开锁，则与臣下坐炕，后妃躬侍饮食。(11)”

又说：“国初无城廓，星散而居，呼曰皇帝寨、国相寨、太子庄。后升皇帝寨曰会宁府，建为上京，城邑宫室无异于中原。州县解宇制度极草创，居民往来车马杂踏自前门直抵后朝门，尽为往来出入之路，略无禁制。每孟春击土牛，女老士庶无长幼皆聚观于殿侧。民有讼未决者，邀驾以诉，至熙宗始有内廷之禁。(12)”

这两段文字，极其生动明确地叙述了宫室城廓建始之初的发展过程。

在雏形期的初期，都城布局和构成还看不出一定的规律。

后期，即春秋战国时期，都城宫室布局已有一定的规律性。但总的看来，都城宫室还是处于初期阶段，同以后金碧辉煌、规制严整的宫室相比，它只是一个“雏形”。

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晚期的宫室遗址，是迄今所发掘的最早的宫室遗址。二里头文化一般被认为是夏文化或部分夏文化。夏代宫室的发现，证明《世本·作篇》关于“鲧作城廓”、“禹作宫室”的记载是可靠的。当然，二里头文化遗址未发现城垣。夏代城垣实例尚有待进一步的考古发掘。

二里头宫殿遗址略呈长方形⁽¹³⁾，是一个高出当时地面约0.8米的夯土台基。台基东西约长108米，南北宽约100米，方向基本上坐北朝南，夯土层最厚的地方达3米。台基上的建筑群是由堂、庑、门、庭等单体建筑所组成，布局严谨，主次分明，基本具备了宫殿建筑的特点和规律，开创了我国宫殿建筑的先河。殿堂位于台基中部偏北，基座高出周围台基面，东西36米，南北25米。从周围柱洞的排列，可以看出这是一座面阔八间、进深三开间的建筑。殿堂的屋顶，是四坡出檐式。宫殿四周，是一组完整的廊庑建筑。宫殿大门在正南，为面阔八间的牌坊式建筑。

商代都城，迁徙不定。史载至成汤已八迁，至盘庚又已五迁。目前，可以明确断定的商都遗址仅有安阳殷墟⁽¹⁴⁾。另外，在湖北黄陂发现一座商代某方国的都城——盘龙城⁽¹⁵⁾。郑州商城周6960米，近似正方形，城墙夯土版筑，宫殿遗址位于城内东北角，有人认为该城距今3500年，可能是成汤的亳都。但对它的断代有不同看法，我们暂按商都对待。殷墟未发现城墙，只在西南方向发现一条濠沟。宫殿遗址位于遗址的东北部（如果把陵墓区除外来看）。盘龙城虽仅周一公里多，宫殿区亦位

于城的东北部。

《史记》叙述古公亶父率周人迁于周原以后，“乃贬戎狄之俗，而营城廓室屋，而邑别居之⁽¹⁶⁾”。但周原至今只发现宫室遗址，而未见城垣遗址。位于泮河两岸的西周泮镐两京，确切位置至今不能确定。西周洛邑王城由于东周王城利用原址修筑，已不易辨认。西周成周城的位置，学术界意见不一。

春秋时代，国无论大小，普遍修筑城垣，真如“雨后春笋”。这些古城的形制，往往是大小两城相依。小城是宫殿区，大城是各级官吏和一般平民的居住区。到战国时期，出现了高台建筑，宫殿建筑在巨大的夯土台基上。战国都城还出现了集中的工商业区——市。

洛阳东周王城，齐都临淄，鲁都曲阜，邯郸赵故城，新郑郑韩故城，晋国侯马（牛村、平望）古城，河北易县燕下都，是春秋战国时代具有代表性的都城。不过，燕下都形制与其他都城有所不同。它分为东西两城，宫殿、手工业区及居民区主要集中在东城，西郭城北垣外还有巨大的宫殿台基“老姆台”。东西两城间有水道隔开⁽¹⁷⁾。

春秋以前的都城，自阶级社会形成以后，主要是统治阶级的政治中心。城市布局、设施，主要为统治阶级的官僚机构服务。从战国时期开始，都城的经济作用开始增长，集中的工商业区——市的出现，是很好的说明。诚然，古代的城市，还不能和现代意义的城市相比。古代城市居民中，有大量从事农业生产的。这个现象，大概一直延续到隋唐时期。

从秦统一中国，奠都咸阳，到隋唐长安、洛阳的建成，中国都城进入急剧发展的时期，我们称之为“发展期”。

“秦每破诸侯，彻其宫室，作之咸阳北坂上。南临渭，自

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诸庙及台苑，皆在渭南。(18)”

“咸阳北至九峻、甘泉，南至户、杜，东至河，西至汧渭之交，东西八百里，南北四百里，离宫别馆，相望连属。(19)”

后来修建的朝宫阿房，规模空前。朝宫周围，离宫别馆，遍布渭南。汉都长安即是在秦离宫别馆的基础上修建的。汉长安城垣形制曲折，城内主要宫殿及市的安排，符合《周礼·考工记》“面朝后市”的规制。

魏晋隋唐时期的都城，如汉魏洛阳⁽²⁰⁾，邺都南北城⁽²¹⁾，南朝建康城，隋唐长安城⁽²²⁾，城垣一律方整。在城门之数，礼制建筑方面，仍然附会《周礼·考工记》。汉长安、唐长安都是十二城门，且每边三门。但宫殿区的位置却一反“面朝后市”的传统规则，移置于都城的北偏，而把工商业区——市，移到南侧。

到成熟期的宋、元、明、清⁽²³⁾时代的都城，多数规制方整，布局严谨。这一时期，除个别例外，又将宫殿区置于都城的中心偏南。汉唐以来的封闭式里坊演变为开放式的街道。商店沿街开设，都城的经济作用更加重要。上述分期，是从都城本身的内在发展规律划分的。近来，一些研究文章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不同的分期法。如：谭其骧先生在《历史教学问题》(1982年第3期)发表的《中国历史上的七大首都》一文中，分为中原期和东移近海期。

中原期：殷（邺）、长安、洛阳、开封，都在中原地区，所以叫中原期。

东移近海期：杭州、南京、北京，在前期四大首都之东，距海不远，所以叫东移近海期。

刘武君先生在《城市问题》（1983年第4期）发表的《中国历代都址变迁与经济重心转移》一文中，分为四个时期。

关中时期 丰镐、咸阳、长安

关东时期 洛阳、开封

北方时期 北京

南方时期 南京和南京作为陪都的时期

这两种分期法实际上是一样的，后者分得更详细一些。关中、关东期就是中原期，北方、南方期就是东移近海期。

在探讨了中国都城历史的分期问题之后，我们再探讨一下有关都城位置的选择问题。

关于国都位置的选择，有政治、军事、经济、历史、地理诸方面的因素。

英国地理学家柯立希(Cornish)在《大国都》（《Great Capitals》）一书中曾经提出建都三条件：

1. 叉路口。意指交通便利之地；
2. 谷仓。意指都城附近地区粮食以及其它物资供应能满足都城平时和战时的需要；
3. 要塞。意指交通地理形势好，便于防守，以利安全。

谭其骧先生认为历代统治者主要是从经济、军事、地理位置几方面来考虑的。经济条件要求都城附近是一片富饶地区，足以在较大程度上解决统治集团的物质需要，无需或只需少量仰给于远处。军事条件要求都城所在地区既便于制内，即镇压国境以内的叛乱；又利于御外，即抗拒境外敌人的入侵。地理位置要求都城大致位于王朝全境的中心地区，或有便捷的交通线，便于同全国各地的联系，但并不完全要求是地理上的几何中心，只要是通达全国的交通比较方便的地方，便于统治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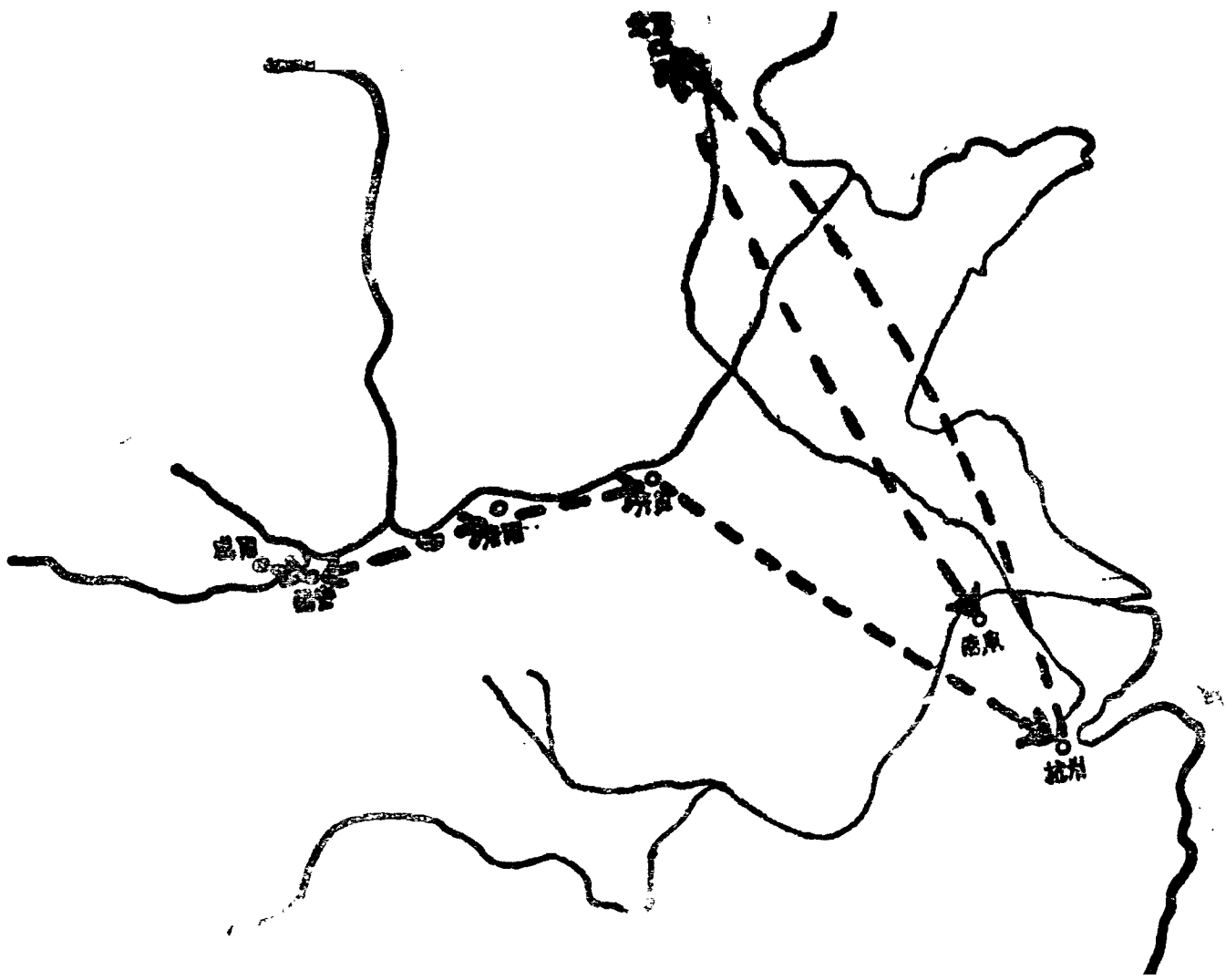
行。

但是，各个方面条件都十分优越、符合理想的首都，在我国历史上并不存在。所以每个王朝首都的选择，总是根据当时的主要矛盾，选择最有利的地点。首都的选定一般都反映了该时期总的形势，反过来，首都的位置也对此后历史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就不难理解，历代首都的迁移，是诸多因素综合的结果，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殷商以来，黄河中下游两岸的所谓中原地区，是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又接近于王朝版图的中心。掌握了这一片地区，就掌握了全国。这就是从殷周至于隋唐，长达两千二百余年，国都始终离不开中原地区的原因。

魏晋时期，东晋南渡，南方经济迅速发展，至隋唐时，南方已成为我国重要的经济中心。唐玄宗时，北运漕粮已达每年四百万石。五代至北宋二百年间，经济重心彻底南移，南重北轻的局面已经形成。但中原还可以通过水运（当时是最经济最方便的运输手段）通向四方，国都东移至开封，是水运的枢纽之地。宋室南渡，南北分裂，运河淤废，无论从政治、经济、军事、交通哪一方面看，中原都已处于不利地位，所以近八百年来，首都再也不能迁回中原地区。

自北宋以后，我国都城位置的变化，主要变成南北迁移，金人占领了北方，南宋迁到杭州（当时称临安）。元代统治者是来自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主要从政治军事上着眼，当然不愿离本民族的根据地太远，定都北京（即元大都）。但从都城位置与经济重心的关系上看，元大都的选址，无疑是个错误。明初朱元璋定都南京（应天府），反映了全国政治、经济发展的趋势。但在军事上，也有其弱点。主敌在漠北，在交通条件尚差



图一 中国历代都址变迁轨迹图

的时代，距离太远，因此重兵驻北平，造成以后成祖夺权，王室北迁，但定南京为留都，以为补充。清代情况同元代相似，仍定都北京。

明清中叶以后，东南地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萌芽，很快发展成为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孙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以后，正是考虑到这个趋势，在民国初年主张定都南京。定都南京，除了南京历来是南方中枢，还可以依靠南方强大的经济势力，并便于同国外的交流和来往。孙中山先生还考虑到北京是八百年封建势力的中心，而南京受近代国外资产阶级民主思想

的影响比较大，定都南京有利于避开北京的封建势力，加速国家的发展。

关于中国都城的类型问题，我们主要从都城布局着眼，将其分成两种类型。

一种是城垣依山傍水，自然弯曲，可称为自然型。另一种城垣方整，可称方正型。先说自然型，管子说：“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无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廓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²⁴⁾。

商代的盘龙城是这类都城的第一个标本。其后，汉长安，隋唐洛阳，南唐金陵府，南宋临安，明南京应天府，都属于这一类型。

盘龙城位于一小半岛上，三面环水，地势不平，是一小山丘，城垣即随地势起伏环岛而筑，成菱形⁽²⁵⁾。

汉长安城垣修筑时，因已有长乐、未央等宫，为了把这两组宫殿包进城内，故南垣曲折不齐，形似“南斗”；北垣受渭河制约，曲折东行，形似“北斗”，因而有人称之为“斗城”。城周25.1公里，内未央宫、长乐宫、桂宫、北宫、明光宫等宫殿区约占全城十分之九的地盘。“未央宫周回二十二里九十五步五尺，街道周回七十里，台殿四十三，其三十二在外，其十一在后宫；池一山二亦在后宫，门阙凡九十五。⁽²⁶⁾”城西垣外还有建章宫，号称“千门万户”。

南唐江宁府城不但城依秦淮河及其支流自然弯曲，连宫城方位也是北稍偏东。南宋“行在”临安是原临安府治，城垣亦依山傍水，南北狭长，宫城位于南端凤凰山下⁽²⁷⁾。

朱元璋定鼎金陵后历时21年建成的应天府城，向称世界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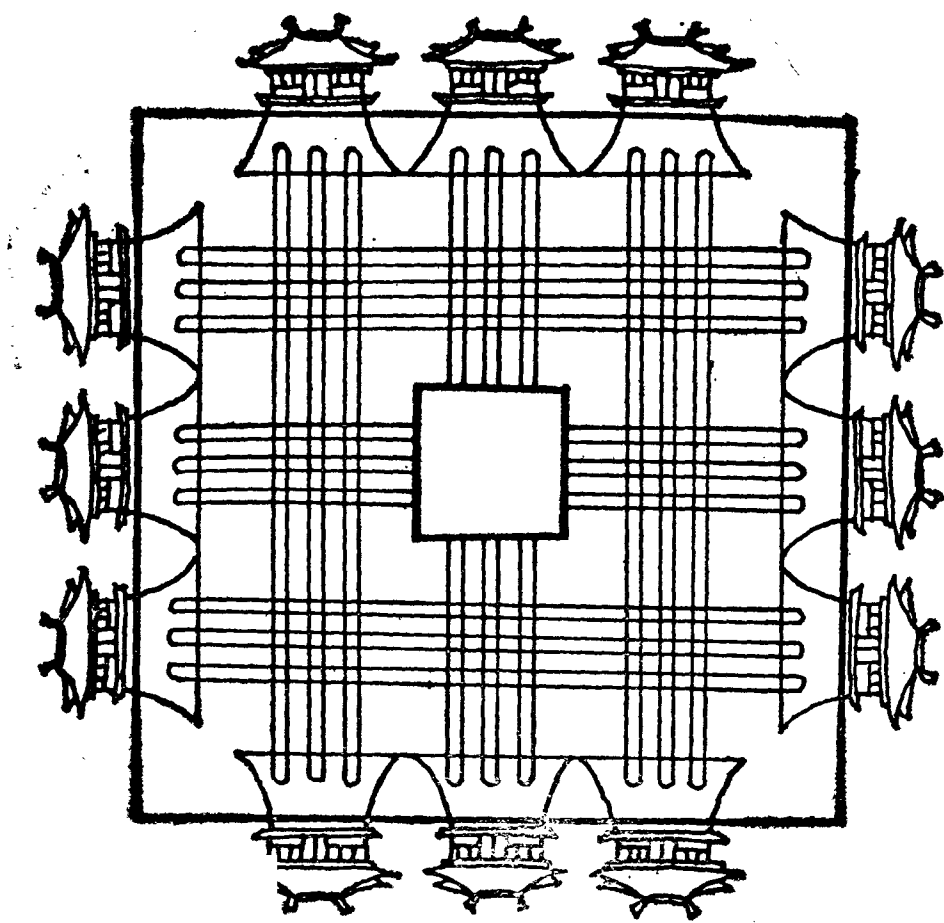
一大城⁽²⁸⁾。城垣四重：外廓城、内城、皇城、宫城，为我国建城史上的孤例。内城南、西两面紧贴秦淮河，东傍紫金山和玄武湖，城门十三；外城东包紫金山，南包雨花台，西北两面直抵长江，城门十八。《续通志》载，明“京城周九十六里，洪武二十三年建外城，周一百八十里。”据实测，内城74.3里（今存42.6里，其余已被拆毁），全部砖包墙；外廓180里⁽²⁹⁾，险隘处砖包，其余土筑，砖包部分总长约40里，均已坍塌。内城正门聚宝门（今称中华门）规模最大，占地16512平方米，瓮城三道，藏兵洞27个，最大者可藏兵一千。该门城楼清咸丰年间毁于兵火，下部城垣至今完好。

明南京应天府皇城位于东偏，皇城中又有宫城。宫城外朝三大殿是奉天殿、华盖殿和谨身殿，后廷有乾清宫、坤宁宫等。宫殿朴素无华。当时“典缮者以宫室图进，太祖见雕琢奇丽者，命去之，谓中书省臣曰，‘千古之上，茅茨而圣，雕峻而亡，吾节俭是宝，’⁽³⁰⁾”又有人建议“瑞州出文石，可甃地，太祖曰：‘敦崇俭朴，犹恐习于奢华。尔不能以节俭之道事予，乃道予侈丽’，言者惭而退。⁽³¹⁾”朱元璋还认为，宫中隙地不起亭台馆榭，是不忍伤民力。由此可见，南京明代宫殿，当时注重实用，少奢华装饰。

中国都城的另一种类型，即方正型，是附会《周礼·考工记》的规定：

“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三礼图》一书还根据文献想象，画出了周王城图。周以后的许多都城，或多或少都附会这个规则，但完全符合这个范本的都城却一个也没有。

北魏洛阳是在东汉洛阳、曹魏洛阳的基础上改建的。旧城



图二 《三礼图》中的周王城图

周长约14公里（因南垣被洛河冲毁，未能精确测定）。《洛阳伽蓝记》记载：“俗传东西六里，南北九里，亦曰九六城。”北魏改建，取消了东汉的南宫，扩建宫室集中于北部。正对宫城南门的大街铜驼街两侧，分布着官署和寺院。北魏又建外廓城，设置里坊。文献称：“京师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³²⁾。”为一东西长方形，唯南廓中部向外突出五里。

北魏洛阳许多方面附会《周礼·考工记》的规则，但宫城位置却一反“面朝后市”的传统，原因何在？历来研究者所举理由，不外是：参考了北魏平城和南朝建康的设计，西域城市的影响，因设计者或为少数民族，或来自西域，东汉南北宫位于全城南北中轴线上，妨碍东西交通等⁽³³⁾。

其实，曹魏建设的邺城，就已经把宫室置于北偏，在宫室大门前大道两侧置百官衙署。中央大道两旁置百官衙署，可能是仿照朝廷朝见时国君南面称孤、百官排列两旁的礼制，把它

加以扩大和固定化，将大殿上的百官排列位序，移置宫门之外。

邺都南城，为东魏、北齐所都。南城建设时，“其制度盖取诸洛阳，与北邺然。”⁽³⁴⁾南朝都城建康，宫城亦偏北，城垣方整。这几个都城，南北轴线相当明显。在宫殿的布局上，把前殿的东西厢扩展为东西堂。东魏又附会“三朝”制的思想，在东西横列三殿之外，又有正殿为主的纵列两组宫殿，并为以后的隋、唐、宋、明所沿用，发展为纵列的“三朝”制度。

隋大兴城经考古勘探，东西约长9721米，南北稍短，为8651.7米，北部正中建大兴宫，宫城之南建皇城，置百官衙署。唐改大兴城为长安城，改大兴宫为太极宫，后又在城外东北角建大明宫，称东内，太极宫称西内。唐玄宗时建兴庆宫，称南内。这样，唐长安城的宫室布局又独具一格，既不是“面朝后市”，又不同于魏晋时期几个都城仅北偏一组宫殿的形制⁽³⁵⁾。

北宋的都城东京，有三重城。“东都外城，方圆四十余里”，“旧京城（内城）方圆约二十里许”⁽³⁶⁾，内城之内又有宫城，称大内。三城均为南北略长的长方形。宫城基本位于中央，正殿大庆殿，面阔九间，为大朝之地。大庆殿后有紫宸殿等，为常朝之地。外朝诸殿之北是皇帝的寝宫与内苑。金中都系仿宋东京建造，形制基本相同，只是规模较小。

元大都接近方形，南北长7400米，东西宽6650米，城外绕以护城河。元大都一个明显的改变是皇城四面包围宫城，此制为后来明清所继承。宫城位中心偏南。后来明代改建时，都城北城垣南缩五里（今德胜门外俗称土城头的即元大都北垣遗迹），南垣南移二里，大内也向南移动。元大内正殿称大明

殿，布局亦仿宋、金。元大都布局是所有都城中最接近《周礼·考工记》的理想布局的⁽³⁷⁾。

元灭亡后，宫殿被拆毁。明代改建时，采用南京应天府的布局。凡宫殿、门阙规制，“悉如南京，壮丽过之。”皇城正门南京称洪武门，北京称大明门（清改大清门，民国改中华门，今已拆除）。

明北京顺天府内城东西6650米，南北5350米。嘉靖年间，“兵部尚书聂豹等相度京城四面，宜筑外城，约七十余里，后以工费重大，成功不易，先筑南面⁽³⁸⁾”。故使北京城形成独一无二的吕字形城。

对于“左祖右社”的位置，金中都是在宫城前千步廊的两侧，元大都在皇城之外、都城东西二垣内侧，明代建在宫城前的两侧。明又在内城四垣外设天、地、日、月四坛，作为祭天、地、日、月的场所。

除皇宫、衙署外，街道里坊和工商业是都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先说里坊制度。

春秋时代已有里坊制度。《三辅旧事》载：“长安城中，八街九陌”（纵为街，横为陌），《三辅黄图》说：“长安闾里一百六十，室居栉比，门巷修直。”

曹魏邺城南半部，主要是居民区。左太冲在《魏都赋》中说：“其闾阎则长寿、吉阳、永平、思忠四里。”

北魏洛阳在外廓城建里坊。《洛阳伽蓝记》记载：“庙社官室府曹以外，方三百步为一里，里开四门，门置里正二人，吏二人，门士八人，合有二百二十里”（另说三百二十里、三百二十三里，恐有误）。由此可见，北魏洛阳布满里坊，并明确记载，寿丘里“皇宗所居也”。

隋唐长安城和隋唐洛阳城里坊制度更为完备。唐长安城东、西、南、北各十四条街道，南北十一条街道，把长安城划为一百零八坊。皇城南面四列坊只开东西街，其余各坊开东、西、南、北四条街。城南各坊，久无定居之民。《长安志》卷七：“耕垦种植，阡陌相连”，说明唐长安城内仍有不少农民和耕地，并未完全改变农业城市的特点。

隋唐洛阳有坊一百零三，洛南各坊基本方形，洛北各坊因城东北角为86.5度的锐角，各坊形制略有变化。

北宋东京已取消用围墙包围的里坊和市场，但为了便于统治，城内划为8厢121坊，城外有9厢14坊，元大都分全城为50坊，这些都只是行政管理单位。

郑州商城已有手工业作坊遗址，战国时，一些城市出现了“市”。西汉长安明确记载有九市。《三辅黄图》说：“长安市有九，各方二百六十六步。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东。凡四里为一市。致九州之人在突门。夹横桥大道，市楼皆重屋。”

《汉书·食货志》记载，“王莽时……东市称京，西市称畿”。长安九市，在横门大道两旁，九市遗迹尚未完全探清。但据考古调查所见，汉长安城遗址内今六村堡、相家巷一带，有武帝及其以后的铸钱作坊遗址，地面五铢钱红陶范、陶俑残片等俯拾即是，恐为西市所在。传世又有“建平四年十一月长安市造”的宫廷铜钟，可见当时“市”内，不仅有商业，而且有手工业。工商结合，正是这一时期工商业的历史特点。当然，当时的商业活动并不全在这东西九市中进行，城外一些地方也立有市，如昆明池有柳市，安门之南有会市，手工业作坊则更多。如果把城外的市也列入九市之中是不妥当的。因为《三辅黄图》所引《汉旧仪》文，记载很明确：“长安城中，

经纬各长三十二里十八步，地九百七十三顷，八街九陌，三宫九府，三庙十二门，九市，十六桥”。所列各项，均为“城中”，可见九市在城内是没有问题的。

东汉洛阳城是否有市，尚无定论，一般趋向认为无市，或无重要市场，这恐同当时商品经济萧条有关。

北魏洛阳置大市于城西，小市于城东，四通市于城南。

大市周回八里，遗址在今白马寺西，地表之下，瓦砾堆积厚达3米以上。大市四周，还分布着十个里。《洛阳伽蓝记》卷四中说：“凡此十里，多诸工商货殖之民。”北魏洛阳建造了这样大规模的工商业区，反映了北魏迁洛之后，中原经济已迅速恢复和发展。

隋建大兴城，建有都会市、利人市，唐改称东、西市。两市各占两坊之地。西市经考古探测和部分发掘，南北长1031米，东西宽927米，周绕围墙，四向开门。市的中央是市署和平准局。西市设大衣行、秤行、绢行、当铺、饭店等。东市一次大火，烧毁“十二行四千余家”。

隋唐东都洛阳，洛水穿城而过，为利用洛水运输，南北二市均靠洛河两岸。西市位于城的西南部，有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货贿山积。

北宋中期以后，以及元、明、清各代，集中的“市”已经取消，店铺、作坊沿街开设，同隋唐以前街道只是大路，两侧只见围墙的状况迥然不同。

自东汉在洛阳城西建立白马寺以后，建寺之风渐盛。魏晋时期，寺院更是急剧发展。北魏洛阳“寺有一千三百六十七所，天平元年迁都邺城，洛阳余寺四百二十一所。⁽³⁹⁾”南朝都城建康，“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⁴⁰⁾”

唐代长安，“僧寺八十一，尼寺二十八，道士观三十，女观六，波斯寺二，胡袄祠四。”⁽⁴¹⁾可见寺院建筑之发达。

自秦汉以来，皇宫以外，大建离宫别馆和苑囿。汉、唐、宋、元、明、清各代，尤以清代为盛。

当然，都城规制的考证研究，还有许多问题有待深入探讨。如国都位置的选择，徐元文说：“自古帝王维系天下以人和不以地利，而卜都定鼎计及万世，必相天下之势而厚集之。”⁽⁴²⁾

《太平御览》卷156有：“王者受命创始建国，立都必居中土，所以控天下之和，据阴阳之正，均统四方，以制万国者也”等语。自尧舜以来，国都屡易，早期东、西转移，后期南北摆动。原因何在，就值得好好研究。对于中国古代城市的研究，特别是都城的研究，不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归根结蒂，对古代城市发展史的研究，是为今天的城市规划、城市建设服务的。对于任何历史问题的研究，都应该是如此。

(1) 高明《古文字类编》，中华书局1980年版，404页。

(2) 《尔雅注疏·释丘》卷七，中华书局《十三经注疏》本，273页。

(3) 顾炎武《肇域志》（转引自《辞源》1979年版，155页。《肇域志》一书仅有抄本，未印行）。

(4) 上田正昭《日本古代文化的探究——都城》（日文版）日本东京都社会思想社昭和51年（1976年）版，111页。

(5) 高明《古文字类编》，中华书局1980年版，417页。

(6) 郑樵《通志·都邑》卷四十一，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553页。

(7) 《周易郑注·系辞下》，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本，99页。

(8) 《孟子》中华书局四书集注本，卷五，214页。

- (9) 同上, 卷三, 148页。
- (10) 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卷一, 中华书局1955年版, 2页。
- (11、12) 顾炎武《历代帝王宅京记》卷二十, 槐庐丛书本。
- (13)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二里头早商宫殿遗址发掘简报》, 《考古》, 1974年第4期。
- (14) 河南省博物馆、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商代城址试掘简报》, 《文物》, 1977年第1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1958—1959年殷墟发掘简报》, 《考古》, 1961年第2期。
- (15) 湖北省博物馆等盘龙城发掘队《盘龙城1974年田野考古纪要》, 《文物》, 1976年第2期。
- (16) 司马迁《史记·周本纪》, 中华书局标点本, 114页。
- (17) 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组《燕下都城址调查报告》, 《考古》, 1962年第1期。
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易县燕下都故城勘查和试掘》, 《考古学报》, 1965年第1期。
- (18) 《三辅黄图校证》,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0年版, 6页。
- (19) 同上, 7页。
- (20) 中国科学院考古所洛阳工作队《汉魏洛阳城初步勘查》, 《考古》, 1973年4期。
宿白《北魏洛阳城与北邙陵墓》, 《文物》, 1978年7期。
- (21) 俞伟超《邙城调查记》, 《考古》, 1963年第1期。
- (22) 中国科学院考古所西安唐城发掘队《唐代长安城考古纪略》, 《考古》, 1963年11期。
陕西省文管会《唐长安城地基初步勘测》, 《考古学报》, 1958年3期。
宿白:《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 《考古》, 1978年第6期。
- (23) 刘敦桢《中国古代建筑史》, 中国建工出版社。
- (24) 赵守正《管子注译》,《乘马第五》, 广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39页。

(25) 《太平御览·州郡》，卷156，757页。

(26) 《西京杂记》，关中丛书本。

王仲殊《汉长安城考古工作的初步收获》，《汉长安城考古收获续记》，《考古通讯》，1957年5期，1958年4期。

(27) 中国科学院考古所洛阳发掘队《隋唐东都城的勘察和发掘》及《续记》，《考古》，1961年3期，1978年6期。

(28) 管玉春《现存世界第一大城——南京古城》，《文物天地》，1981年第2期。

(29) 如不算瓮城长度则67.3里。参阅蒋赞初《南京史话》，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朱偁《金陵古迹图考》，商务印书馆版。

(30)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14，中华书局，1977年版，190页。

(31) 《明史·舆服志》，中华书局标点本，1667页。

(32) 《洛阳伽蓝记校释》卷五，中华书局1963年版，227页。

(33)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商务印书馆1945年版。

宿白《北魏洛阳城与北邙陵墓》，《文物》，1978年7期。

刘敦桢《中国古代建筑史》，中国建工出版社，1980年版。

(34) 《嘉靖彰德府志》，卷8。

(35)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发掘队《唐长安城考古纪略》，《考古》1963年11期。

(36) 《东京梦华录》，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7页。

(37) 刘敦桢《中国古代建筑史》，中国建工出版社。

(38) 《续通志·都邑》卷110。

(39) 《洛阳伽蓝记校释》卷5，中华书局1963年版，228页。

(40) 《南史·郭祖深传》。

(41) 徐松《唐两京城坊考》。

(42) 顾炎武《历代帝王宅京记》序，槐庐丛书本。

第一章 萌芽时期的都城

(夏以前)

《周礼》、《尚书》、《左传》、《史记》等早期文献，都记载了关于中国最古老的都城宫室的传说。记载所言最古老的国都都是所谓三皇五帝之都。这些记载，当然有后人加工的成分，但它仍可说明，在中国远古土地上，都城已经开始萌芽。南宋郑樵《通志·都邑略》、宋代《册府元龟》、《太平御览》等书，对古代文献记载作了整理，系统地记载了三皇五帝之都的地点。

《通志·都邑略》录三皇之都：

“伏牺都陈（河南陈州）；神农都鲁（曲阜），或云始都陈；黄帝都有熊（河南新郑），又迁涿鹿。”⁽¹⁾”

五帝之都：

“少昊都穷桑（曲阜）；颛帝都高阳（河南濮阳）；帝喾都亳（偃师县），亦谓之高辛；尧始封于唐（河北唐县），后徙晋阳，即帝位都平阳（山西临汾）。舜始封于虞（河南虞城县），即帝位都蒲坂（山西蒲州）。”⁽²⁾”

夏禹之都，屡经迁徙。

《通志·都邑略》说：

“禹封于夏，受禅之后都平阳，又徙安邑。”⁽³⁾”

《册府元龟·都邑》说：

“夏禹初受封阳翟，后都平阳，或在安邑，或在晋阳。(4)”

当然，这些记载都不是信史，相互矛盾之处也很多。但文献记载的传说，也不完全是无的放矢。我们既不能用现代都城的眼光看待古代的都城，也不能完全否定这些记载。当然，远古都城不可能是繁华的大都市，只是一些政治、军事的堡垒。

关于远古都城的一些传说，由于一些人的附会，或本身即有一些踪迹，或多或少都留下了一些可供后人萍踪浪迹的东西。

传说尧都平阳。平阳地望即今山西省临汾市。《帝王世纪》(已佚)一书称：“尧都平阳，于诗为唐国。”《书经体注大全合参》注曰：“尧治平阳，舜都安邑，相去各二百余里，皆冀州之地。”平阳是帝尧之都，文献记载上没有分歧。今临汾市有尧都路、平阳广场，城南有尧庙，城东北有尧陵，这些虽都不是当时遗址，但都是同“尧”联系起来的。

据有人考察，推断尧都平阳当在临汾之西的平河之阳。《临汾县志·古迹·金城》条说：“金城为刘渊所筑，此为陶唐金城，今名金殿村。(5)”即是说，金殿村曾有唐尧的金城，即尧都之地。

在金殿村周围，还有一些地名也值得注意。如婆神、坛底，是否和当时的祭祀有关？还有席坊、窑坊村、马站、兰(拦)村、东麻(马)、西麻(马)等，这些地方，还不断发现古陶片等等，是否和当时的手工业、畜牧业有关？

这些蛛丝马迹应该引起我们研究者的注意(6)。

当然，也有人不同意上述看法，认为根本不存在什么尧都(7)。

(1、2、3)《通志·都邑略》。

- (4) 《册府元龟·都邑》。
- (5) 《临汾县志·古迹·金城》。
- (6) 卫文选《尧都考》，《山西师院学报》，1981年第3期。
- (7) 向炳彦《历史上有尧都吗？》，《山西师院学报》，1982年第4期。

第二章 雏形时期的都城

(夏—战国)

第一节 雏形时期都城的发展趋势和特点

这一时期，一般认为是我国的奴隶社会时期。但在都城的发展建设上，尤其是初期，仍旧表现出一定的原始性。同后代，尤其是隋唐以后成熟时期的都城相比，仍显得很落后。

这一时期的都城，文献记载上很多。“鲧作城郭”、“禹作宫室”之类的记载，说明已有城郭宫室。虽然考古发现了几座较早的古城址，但还不能完全肯定是夏都或是夏的哪一个都城。即文献材料还无法与考古材料相互印证。一部分都城处于文字上的地点考证之中，如夏商之都；一部分都城处于具体地望的考证与寻找之中，如周都丰镐。直至春秋战国时期的都城，仍有此种情况。如晋国六迁七都和楚都丹阳的沿革、地点争论都很大。

早期都城如周岐邑、丰镐、殷墟，都未发现城垣，同一些文献记载对不上号，整体布局也不清楚。《周礼·考工记》所描述的周代都城规划，尚未有周都证明。

至春秋时代，一百四十多个诸侯国家，都城真如雨后春笋。对诸侯“国”（都城）之大小，本有明确规定。但“礼崩乐坏”，各国据实力而为。尤其到战国时代，七国争雄，各自

雄霸一方，有的都城远远超过周的洛邑，成为一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作为工商业区的“市”，这时候急剧发展。如果说，春秋以前的都城，仅是统治阶级的军事、政治城堡的话，则战国时代，多数已经发展成为城市了。市场城内城外都有，有固定的，也有不固定的。

在城市布局上，春秋战国时期，许多城市是大小两城相依，大部分小城（即宫城）位于大城西南侧，占其一隅，如齐临淄等。当然，也有部分都城是两城并列，如燕下都（到西汉长安城，变为大小城相套）。高台建筑，台基高耸，宫殿建筑其上，形势巍峨，是全市的制高点。到东汉，高台建筑逐渐被淘汰。

战国时代的城市，包括都城在内，仍有许多居民是从事农业生产的，这是早期都城的特点之一。直至唐代长安，城南各坊有些还是菜园。

第二节 扑朔迷离的“夏都”

据文献记载，夏朝曾经修建了城廓沟池，《世本·作篇》曾有“鯀作城廓”的记载，还建立了军队等一系列国家机器。从1958年开始，考古工作者开始在夏活动的中心区域——河南西北部和山西西南部，寻找夏文化的踪迹。到目前为止，找到不少晚于河南龙山文化而早于商文化，即相当于夏的活动时期的文化遗址，这些遗址，有可能是夏文化遗址。特别是有一些遗址，据推测应该是文献记载中的“夏都”的遗址。如河南巩县西北的稍柴村遗址，可能是太康所建。遗址背靠嵩山面临两河，处于伊河与坞罗河交汇的三角洲地带，地势较高而平坦，

有山有水，适于发展生产。遗址内发现较大的房屋基址和窖穴，地面铺白灰面、红烧土面。

少康之子帝杼北渡黄河，都于“原”（今河南济源县）。

“原”遗址北距太行山约26里，距孔山约12里，南距潞河约2里，西临龙潭寺，东至珠河边，整个遗址坐落在太行山与潞河之间的广阔平原上。

目前，占有材料比较充分的是登封县王城岗遗址和偃师县二里头遗址。当然，这两个遗址同前面提到的遗址一样，仍不能确断是夏代遗址，但在时间上是相当于夏代的。所以“夏都”同“夏墟”一样，目前还处于“扑朔迷离”的状态，说无则有，说有则无。根据目前的材料，可以列出一个夏都简表：

夏禹	安邑	山西夏县
	阳城	河南登封县告城镇王城岗
	阳翟	河南禹县
夏启	安邑	山西夏县西北
太康仲康	斟鄩	河南巩县稍柴村 (后都山东濰县西南)
相	帝丘	河南濮阳县西南
少康	阳翟	河南禹县
帝杼	原	河南济源县四里原村
	老丘（又作邱）	河南陈留县
桀	斟鄩	

下面，我们就说说王城岗和二里头两处遗址。

〔王城岗〕

王城岗遗址位于河南省登封县告城镇西约一公里的谷地上，1956年文物普查时发现，定名为“八方村龙山文化遗址”

（其西南是八方村）。王城岗是告城镇和八方村一带农民群众对遗址所在地点传之已久的称呼，可能具有某种重要的历史含义。它南望箕山，北依嵩山，颍水从它的南面流过，五渡河从它的东面注入颍水，在告城镇的北面是战国古阳城遗址。

王城岗是一个中部略高于周围地平面的土岗，东、北两侧被五渡河及山洪冲毁，现存面积仅有一万多平方米。两座古城堡正分布在这个范围内。因多年人为的和自然的破坏，遗址的上部已经损毁，昔日的城墙今已不存。部分城墙的基础槽和槽内残留的夯土层，直接被压在耕土层的下面。城内的夯土建筑遗址和窖穴也多被削去大部

据文献记载，登封嵩山一带是夏王朝初期活动的中心区域。《国语·周语》记载：“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韦昭注：

“崇，崇高山也。夏居阳城，崇高所近。”《古本竹书纪年》：“夏后氏，禹居阳城。”《汉书·地理志》颍川郡阳翟条下臣瓚注引《世本》说：“禹都阳城。”《水经注》卷22谈到阳城地望时说：“颍水又东，五渡水注之……东南流入颍水。颍水迳其县故城南，昔舜禅禹，禹避商均，伯益避启，并于此也。……县南对箕山。”《左传》昭公四年说到：“四岳、三涂、阳城太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险也。”晋杜预注《左传》时说：“阳城山在阳城县东北”。《春秋传说汇纂》注云：“今登封县南三十八里，俗名东岭山是也。”按东岭山古称阳城山，位于告城镇的东北，战国阳城遗址的北部。从上述文献看，禹居和夏都的阳城，就在告城附近。这里有五渡河，南临颍水，隔颍水与箕山相望。王城岗二期的年代距传说中的鲧之时不远，所以王城岗古城可能是夏王朝初期城垣的遗址。战国阳城地望的确定，与上述文献的记载相互印证，为探索夏

代阳城提供了重要线索。

王城岗两座城堡遗址东西并列，我们暂时称它们为东城和西城。东城破坏严重，西城比较完整。东城南墙西段残长约30米，西墙南段残长约65米，两墙以90°的角度相交，内角略呈凹弧形，外墙呈凸弧形，向外鼓出约2.5米。据估计，原城可能是正方形。由于东城大部已被冲毁，所以在紧靠东城的西侧筑起了西城。故西城东墙就是东城的西墙。它的南墙、西墙和北墙是同时筑成的。北墙东段已被洪水冲毁。但南墙、西墙的基础槽及夯土层尚保存于地下。南墙长82.4米，西墙长92米，北墙西段残长28米。西墙走向北偏西5°，西南和西北城角基本是90°的直角，内为凹弧形，外为鼓出的凸弧形。南墙东部有一个长约10米的缺口，可能是西城的南门遗址。两城筑城方法相同，都是先挖基础槽，槽口大于底，逐层填土夯筑。T₂探方内基础槽口宽4.4米，底宽2.54米，深2.04米。夯层10—20厘米，也有6—8厘米的。夯层间填细砂层，厚一厘米，夯窝不规整，口径约4—10厘米，深1—2.5厘米。有些夯层上堆积有8—18厘米直径的河卵石，可见夯具就是河卵石，这是较原始的作法。夯土分成黄色和棕红色，夹杂零星的红烧土、碎骨片、石片、陶片及前面提到的河卵石。

在城堡内，发现了一些窖穴和灰坑（1—5期都有），以及与城墙同时期的一些断断续续的夯土遗存，可能是当时重要建筑遗迹。因损毁严重，已看不出原貌。部分圆形坑内，夯土层与夯土层之间还填埋一些成年人和儿童的骨架，一般2—7具，初步认为是当时的奠基坑。奠基坑内还有较多的碎陶片，都属于一、二期。

王城岗二期龙山文化城堡遗址，是我国首次发现的龙山文

化中晚期的城堡遗址。夯土城墙筑法较二里头三期宫殿遗址及郑州商城遗址更加原始。C₁₄测定年代为4000±65(2K-581)因而这座城堡遗址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最早的古城堡遗址之一，它的发现和发掘，对研究我国城垣建筑的起源，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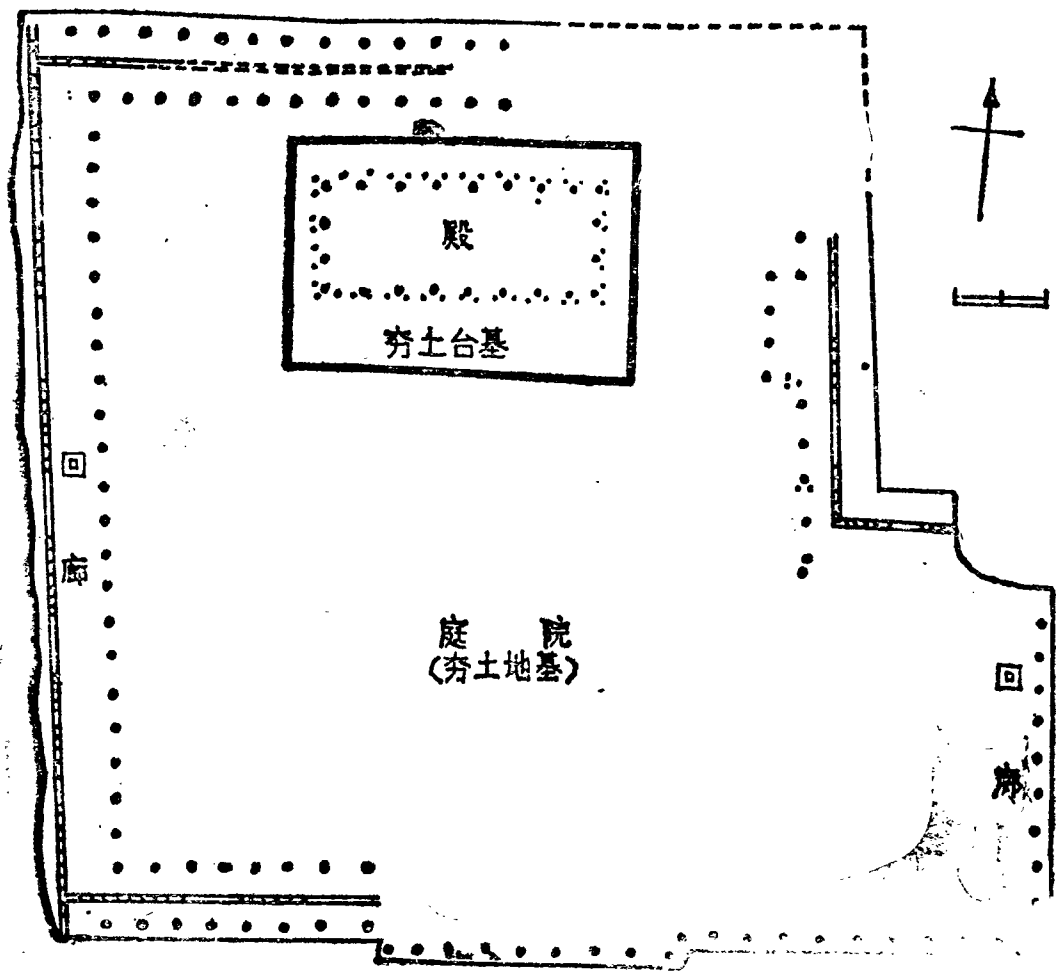
〔二里头〕

二里头宫殿遗址位于河南省偃师县城西南，是一略呈正方形的夯土台基。东西长约108米，南北宽约100米，总面积约1万平方米，基本是坐北朝南。现存台面平整，高出地面约0.8米。边缘呈缓坡状。斜面上有质地坚硬的料礓面或路土层。夯土厚薄不一，最厚者达五米。夯层较厚，夯窝直径3—5厘米。二里头文化分四期，这座宫殿遗址属于第三期，即晚期偏早一些。

遗址的中部偏北，是一座殿堂的遗址，其基座略高于周围的台基面，呈长方形，东西约36米，南北约25米，夯土厚约3.1米。殿堂位于基座之上，东西长30.4米，南北宽11.4米。四周是一圈柱洞或柱础石，南北各9个，东西各2个，间距约3.8米。大柱洞旁还附有小柱洞，可能是支撑殿堂出檐的挑檐柱洞。柱础石多是没有加工的大小不一的不规则的石块，每洞大则一块，小则3—5块。

从洞的排列可以看出，这是一座面阔十间、进深三间的建筑。挑檐的存在，说明屋顶可能是四坡出檐式。未发现墙和瓦，可能是木骨草泥为皮的四壁和茅草屋顶。

殿堂四周有一组完整的廊庑建筑。廊庑西面是一面坡形式，南北是两面坡形式。宫殿大门在殿堂正南，是一面阔八开间的牌坊式建筑，甲骨文中“门”字有作“𠂔”形的，即左右立柱，上加横梁、在立柱上安置门扇。这座大门可能也是这种形式。



图三 河南偃师二里头宫殿遗址

研究表明，这个廊庑形式的建筑群是由堂、庑、门、庭等单体建筑组成，布局严谨，层次分明，基本上具备了宫殿建筑的特点和规模，从而开创了我国宫殿建筑的先河，在中国都城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我国汉代以前的宫室制度，以往学者作过不少研究。清戴震的《考工记图》，根据文献的记载画出了宫室示意图。特别是其中的宗庙图，与二里头宫殿遗址极为相似。耐人寻味的是，二里头宫殿遗址廊庑东北有后门，而宗庙图的“闾门”也恰好在东北角。当然，《考工记图》主要是根据周代的制度，不可能与二里头宫殿建筑群完全相合；但两者存在的继承关系还是比较明显。戴震认为：“王者而后有明堂，其制盖起于古远。夏曰世室，殷曰重屋，周曰明堂，三代相同，异名同

实。(1)”看来，二里头宫殿遗址就是夏的“世室”（世，太古也。太，大是一个字，所以，世室即大室）。再结合前庭院中（相当于宗庙图中的“中庭”所在）有祭祀坑，说明这里是宗庙所在。《左传》庄公二十二年说“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所以二里头遗址当时应该是一座都城（有人认为是斟鄩）。当然，古代的宗庙不仅是祭祀之所，而且是重要的布政之所。除祭祀外，册命的典礼，每月的告朔听政，军事仪式，外交上的盟会，无不在宗庙里举行，所以，宗庙是古代政权的象征。“失守宗庙”实际上就是失去了政权，灭人之国，往往“毁其宗庙”。二里头遗址出现宗庙，说明国家政权已经产生。

第三节 迁徙不定的商都

商都迁徙不定，王国维在《观堂集林》一书中提出“前八而后五”，即：

前八迁：

契 蕃（契本帝啻之子，居亳）

昭明 砥石

昭明 商

相土 泰山下

相土 商丘

殷侯 殷邑

殷侯 商丘

汤 亳 1. 郑州商城

2. 谷孰为南亳（商丘东南）

蒙为北亳（商丘北，又称景亳，因景山为名）

偃师为西亳（二里头文化遗址）

后五迁：

河亶甲	相	河南内黄县南
祖乙	庇	} 河南温县东北 { 耿，见《尚书序》 { 邢，见《殷本纪》
南庚	奄	
盘庚	殷	河南安阳小屯（帝乙20年迁朝歌）

关于商都亳的地望，自司马迁以来，至唐提出过五说：

1. 关中杜亳说 司马迁《史记·六国表》 关中
许慎《说文》 杜陵亭
2. 偃师西亳说 班固《汉书·地理志》 尸乡
郑玄 汤亭
3. 济阳曹亳说 《汉志》注引臣瓚 山东曹县南

4. 谷孰南亳说和蒙城北亳说

《左传》杜预注	蒙县西北有亳城
《尚书正义》引杜预	蒙县西北有亳城 (即今商丘县北)
《史记集解》引皇甫谧	梁国谷孰为南亳
《史记正义》引《括地志》	谷孰为南亳 大蒙城为北亳 偃师为西亳 (帝誉及汤所都 盘庚亦徙都之)

张守节《史记正义》 汤由南亳徙西亳

近人岑仲勉 内黄县说

今人据考古材料提出两说：

1. 偃师西亳说⁽²⁾

2. 郑亳说⁽³⁾

盘庚迁殷之后，是否再迁的问题，文献记载不一。《古本竹书纪年》认为：“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七（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纣时稍大其邑，南距朝歌，北据邯鄲及沙丘，皆为离宫别馆⁽⁴⁾。”这里明确说明，盘庚以后，更不徙都。但是，从文献上，《帝王世纪》、《战国策》、《括地志》、《通志》等书的记载，都有帝乙徙“朝歌”之说。再从考古发现看，今传世卜辞，均为盘庚至帝乙二十年之物。帝乙在位三十七年，二十年以后及纣时的卜辞不见于殷墟。因此，郭沫若说：“帝乙末年，确迁朝歌”。其实，这个问题不难解决。帝乙及纣王居“离宫”——朝歌，殷在当时名存而实亡，已不是商王朝的政治中心。

殷都屡迁，前八迁乃商族建国前，氏族部落之流动迁移，后五迁才是商王都之迁徙。殷朝为什么这样频繁迁都？史家历来说法纷纭，概括起来，有五种说法：

1. “去奢行俭”，汉儒即已成此说。如东汉郑玄说：“祖乙居耿，后奢侈逾礼，土地迫近，山川尝圯焉。至阳甲立，盘庚为之臣，乃谋徙居汤旧都。⁽⁵⁾”

2. 水灾说。顾颉刚等主此说，认为殷人择河滨而居，为避水患而多次迁居。

3. 游牧、游农说。盘庚前为游牧，盘庚后才有农业。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提出此说。

游农说，傅筑夫主此说。原始农业，工具粗笨，地力耗尽，即迁他处⁽⁶⁾。

4. 阶级斗争说。郭沫若《中国史稿》第一册中说，“这样迁来迁去，一方面是由于阶级斗争的发展及统治阶级内部的纷

争，同时也由于自然灾害造成的威胁。”

5.比九世乱和“恪谨天命”说。黎虎在《殷都屡迁原因试探》⁽⁷⁾中提出此说。认为自仲丁至阳甲九王在位时，“比九世乱”。殷都频迁也在此时，五世十王，迁了五次。此时王祚年短，王位纷争。王祚最长14陟，最短4陟。《殷本纪》中不断有“殷衰”之字眼，说明处于动乱之世。这是殷都迁移的客观原因。《商书·盘庚（中）》记载了盘庚召集臣民动员迁都时说：“殷降大虐（人祸），先王不怀（安）厥攸作，视民利用迁。”

恪谨天命是殷都屡迁的主观原因。“先王有服，恪谨天命，兹扰不常宁。⁽⁸⁾”九世动乱，认为是上帝和祖先神降下的“大灾”。盘庚承认殷政治有失，把这一切归于神意和祖先，只有另择新邑，才能“天其永我命。”

盘庚迁殷后，王位趋于稳定。通过迁都，盘庚打击了贵族反对派的势力，镇压异己，除旧布新，消除对王权的威胁，同时提高了自己的政治威信，从而能“绍复先王之大业”而“永地于新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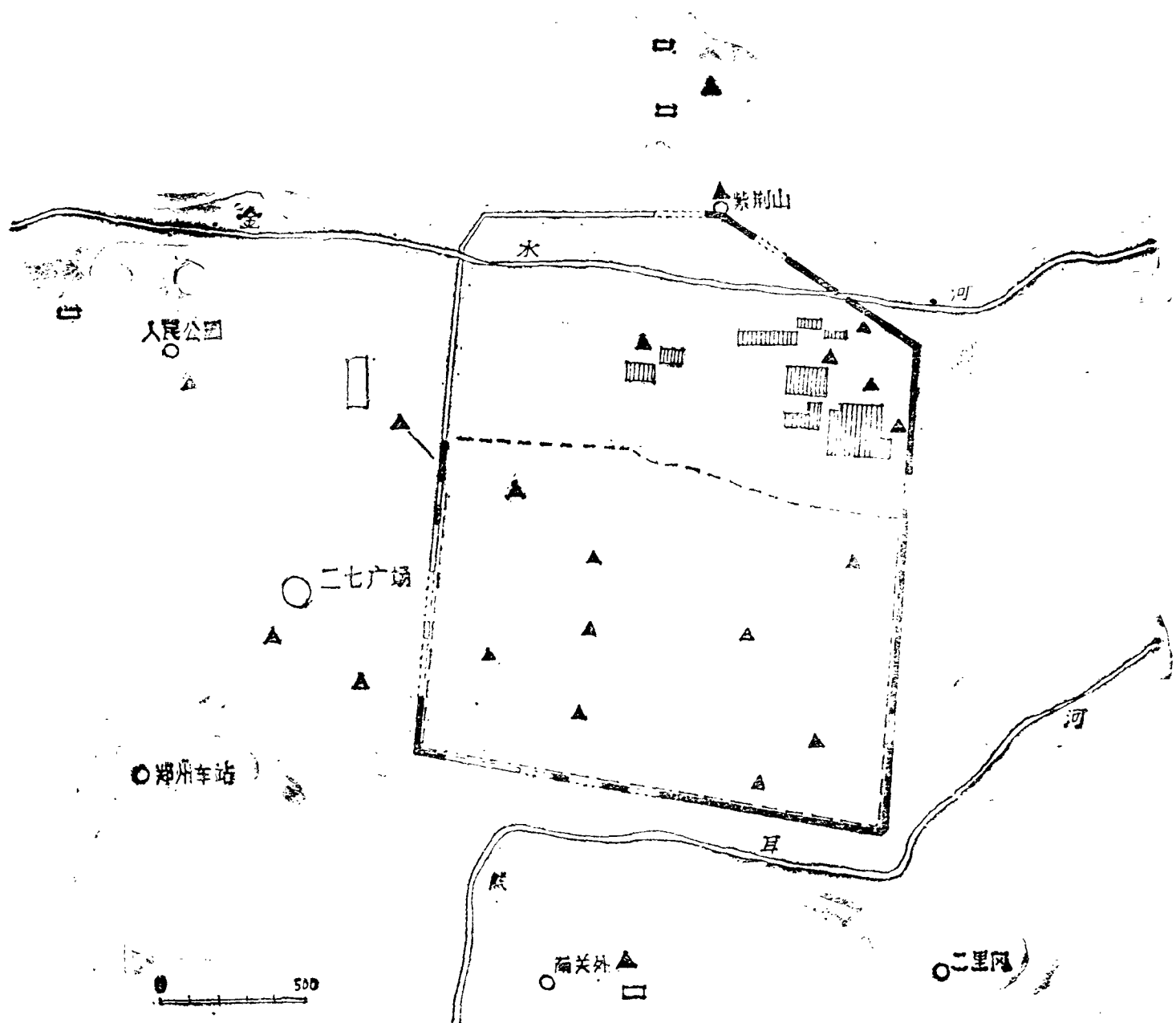
前面介绍了商都的沿革等，现在再具体地介绍几个商都。其中，郑州商城还有很大的争论，尚不能确证是商都，我们暂且把它作为商都看待。

〔郑州商城〕

据考证，郑州商城建于距今3500年前，有人认为是成汤所居的亳都，或至少在年代上是相差不远的。也有人认为是商王仲丁的都城——囂。

1972年对郑州商城钻探考查的结果，初步获知夯土城垣长6960米，其中东墙长约1700米，西墙长约1870米，北墙长约

1690米，南墙长约1700米。城墙上发现大小不同的缺口11个，有的是商代城门，有的是城废后损毁的。城的规模略小于东周齐都临淄，却大于山西侯马古城。这样一个巨大的建筑工程，出现在3500年前的早商时代，不能不说是人类早期历史的一个奇迹。



图四 河南郑州商代前期城址

全部城墙用夯土版筑而成，每段长约3.3米，一般夯土层厚为3—10或20厘米，每层夯土皆密布“夯窝”，其直径2—4厘米，深1—2厘米。城墙的横断面呈梯形。平均底宽约20米，顶宽约5米，高约10米。发现两种筑法：中部是层层平筑，内壁近于垂直，考古工作者称之为“主城墙”。可以看出版筑的木

板痕迹：每块木板长约3米左右，板宽约15—20厘米，梯形的两腰是倾斜夯筑的，称之为“护城坡”。护城坡显然是为了支撑“主城墙”而设。横堵的木板，步步加高墙身，表现了筑墙方法一定的原始性。

以全部城墙的长宽高计算，郑州商城共有夯土量约87万立方米，即相当于二里头宫殿的40多倍。在当时的劳动条件下，若按起土、运土夯筑1立方米需15个劳动日计算，修建如此巨大的工程，总共需要约1300万个劳动日。即使每天有上万的奴隶参加劳动，也需要四五年的时间才能完成。因此，郑州商城的出现，直接说明了当时奴隶制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城墙内外的灰层灰坑中，不断发现零碎的人骨，这大概都是惨死的奴隶被任意扬弃的遗骸。

商城之内，因为大多是现在郑州市的街道，考古发掘比较难以进行，关于城内的布局还不十分清楚。据初步探掘的结果，得知城内文化遗迹的分布是非常普遍的。从城墙内外开掘的22条探沟来看，其中有不少的小型房基、窖穴和少量的墓葬，反映了城内住户密集的情况。从遗迹遗物判明，城内的居民中，显然有一定数量的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人民和其他城市贫民等，但也包括有小奴隶主。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城内东北部一带，约6万多平方米的范围内，发现了几处大面积的夯土台基和大型房基，最长的有60余米。有的台基周围并发现了不少的玉簪、铜簪和玉器，这些器物在城外遗址中很不容易见到，显然，这里是商代早期的宫殿所在。近年来，在西城外的杜岭街发现了两件大型铜方鼎，按其时代大约相当于商代二里岗期上层。这显然不是一般小贵族所用之物，其为王室重器大体可定。通过这些发现可以

进一步证明，郑州商城不是一般都邑，而是商代早期的王都。郑州商城所以有如此规模，就是因为它是商代早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它高峻的城墙，就是用来保卫王室贵族，用来维护其统治的。

城外的布局比较更清楚一些。围绕着商城分布着非常密集的商代遗址，例如著名的二里岗遗址，就是在商城东南的郊区。这些居民区中，也发现了一些小型房基、窖穴和墓葬；从其出土物看，这些居民大半是农业人口，同村落遗址似乎没有太大的区别，这也正反映早期城市的某些特点。但是，与一般村落遗址又有所不同的是商城外围还有一批按照一定布局建立的手工业作坊遗址。铸铜作坊遗址分布在南城外约500米的南关外和北城外约200米的紫荆山附近。靠近紫荆山铸铜作坊遗址的北面，还有一处用人骨作原料的骨器作坊遗址。烧陶作坊遗址在西城外约1300米的铭功路一带。不难看出，这些手工业都脱离了农业而成为一个独立的部门，而且同一行业内部也有了一定的分工。

〔偃师商城〕

偃师商城位于河南省偃师县县城西缘大槐树村南、偃（洛阳）公路两侧，正在洛河北岸稍稍隆起的高地上，西距二里头文化遗址五、六公里，距汉魏古城遗址十公里。城垣略呈南北长方形，地上形貌已不可见，遗迹全部深埋于地面之下。这个古城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魏故城工作队1983年春天发现的。并进行了初步勘察和小型发掘。1983年秋天，又组成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河南第二工作队进行复查和试掘⁽⁹⁾。有关考古工作者初步判定它是汤都西亳。文献记载认为汤都西亳在偃师“尸乡”，而该城中部恰有一条名叫“尸乡”的长沟东

西横穿而过。有关考古工作者认为，这绝非偶然的巧合。当地广泛流传有关“尸乡”和“西亳”的传说，城郊各地还保留着多处与传说相关联的“遗迹”：城西吓田砦村以东有所谓伊尹墓、田横塚；城南高庄村边地势隆起，人云是汤都西亳的“亳地”等。

城为夯筑土墙，南北长1700余米，东西宽度不一，最北部1125米，中部1120米，南部740米，总面积约190万平方米。东、西、北三面城墙和东北、西北二城角已探清。南城墙和东南、西南二城角至今没有发现。

西城垣长1710米，从南至北基本为一直线，在地面以下1—4米。夯土厚度1.5米至3米。城墙宽度一般17—24米，南部穿过塔庄村的一段，宽达40米。

北城垣总长1240米，在地表以下3.2—3.6米，夯土厚度2米至3米，城墙宽度16—19米，最宽处28米。

东城墙从东北城角向南955米处折向西南，然后再折向南，终于塔庄村东，全长1640米，距地表深度1—2.8米，夯土厚度0.3米—2.5米，城墙宽度一般20—25米，部分破坏严重的地段宽仅存10米。

南城墙至今未找到，西城墙南抵洛河边，东城墙南端在塔庄村东，南距洛河堤尚有460米，其间均为淤土，可能由于洛河泛滥、改道，已尽毁无遗。

目前，已发现东西城门各三座，北城墙有缺口两处，城内有三处较大的建筑遗址。其中一号遗址位于城南中部，规模较大，四周有围墙。南墙长200米，东墙长180米，西墙长185米，北墙长190米。围墙内发现多处建筑夯土遗址，土质与外城墙夯土略同。

城内文化层分五层。第一层为农耕土，第二层为沉积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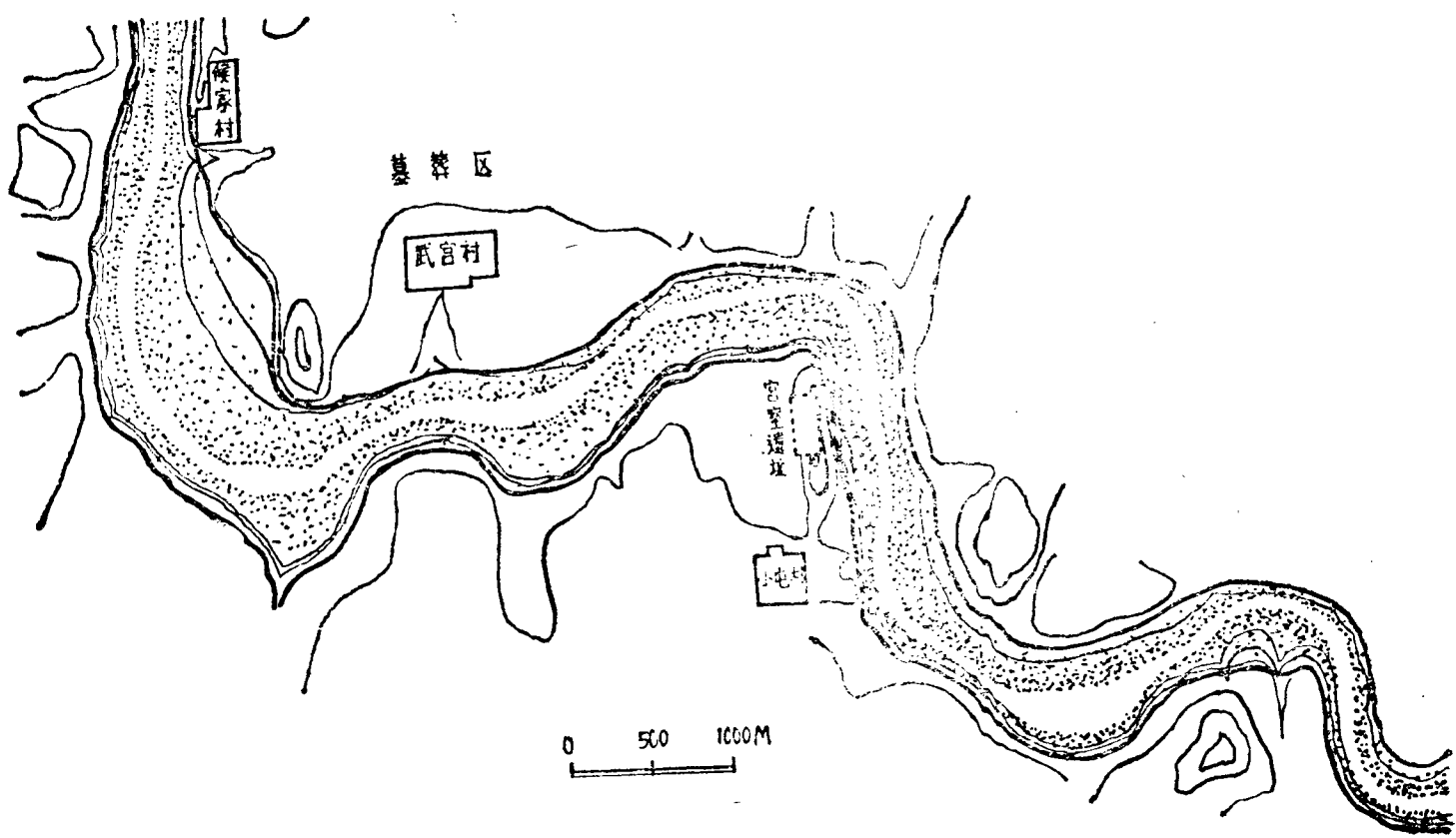
第五层为生土层。第三层是汉文化层，第四层是商文化层。在城的南部，商文化层土质甚脏，内含遗物甚多，主要是泥质灰陶和夹砂灰陶陶片，表面多饰绳纹，能看出器形的有大口尊、鬲、盆和夹砂陶缸等，多数属二里岗期的文化遗物。

〔殷墟〕

殷墟是商代后期的王都，是我国奴隶制发展到全盛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从盘庚到纣亡共273年。商时称商都为“大邑商”、“天邑商”、“商邑”。从1928年开始，南京中央研究院在这里进行过十九次发掘。解放后，从1950年开始，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在这儿作过多次调查和发掘，基本上搞清了殷墟的范围和布局。

殷墟位于今京广线上河南安阳市西小屯村及附近一带。范围约24平方公里以上。洹河南岸的小屯是殷朝王宫的中心，围绕王宫附近有一些居民点、手工业作坊和墓葬。主要陵墓远在洹河北岸。在苗圃北地和孝民村发现较大的铸铜遗址，在北辛庄和大司空村发现了制骨器作坊遗址。在王宫范围内发现陶范和骨料，说明手工业是在王室控制下进行生产的。在中小奴隶主和自由民的居住区内，到处可以看到建筑遗存和墓葬共存的现象。以洹河北岸的武宫村、侯家庄一带为中心，有殷王的陵墓、贵族墓和数以千计的祭祀坑，周围还有殷代的其他聚落和墓葬。1975年，在小屯北地清理了地穴和半地穴式的房子各一座，从发现一块白灰墙皮上绘有红色花纹和黑色圈点来看，证明殷代晚期建筑物上已出现壁画，它比咸阳发现的秦壁画提早了八百年。

作为晚商的王都，没有防御设施是不可想象的。可是迄今为止，还没有找到有关城墙的任何迹象。解放以后，在小屯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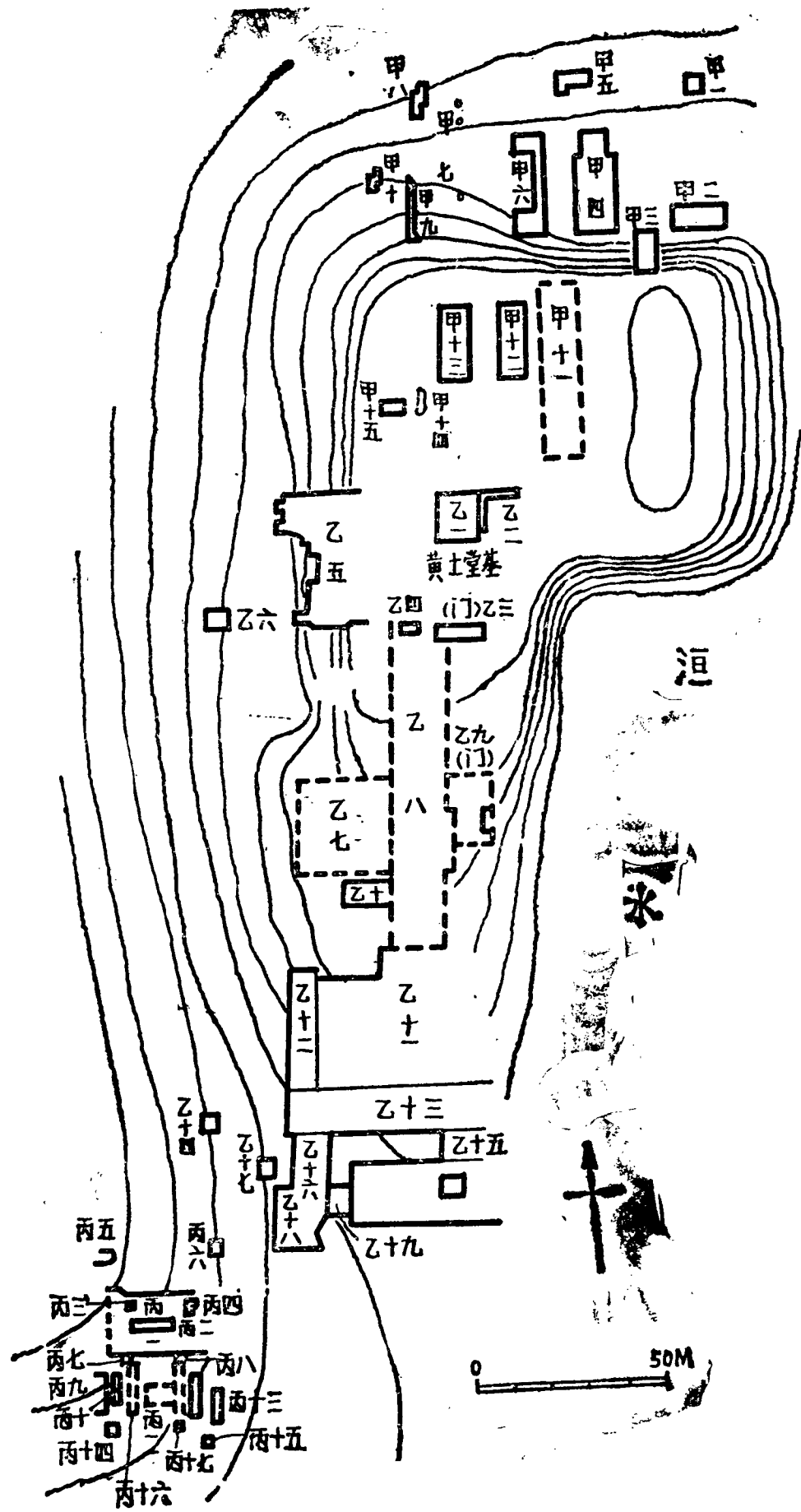
图五 河南安阳殷墟遗址

中心以西约200米的地方，发现了一条巨大的晚商壕沟，已探查了750米长的一段，宽为7—21米，深5—10米，由西南蜿蜒向东北，据推测，这就是商代王宫周围用人工挖成的防御设施。这的确是值得注意的现象，也许在小屯附近根本就没有城墙；不过距小屯再远的地方是否有城墙存在，还有待于继续探查。

殷墟晚商的宫殿区早已被揭露出来。从其分布的总面积来看，并不比郑州早商的大，包括靠近洹河湾已被冲毁的缺口在内，也还不到五万平方米，很有可能，宫殿遗址的范围还要向外延伸。应该提到的是，今天传世的十多万片有字甲骨，绝大部分都出土在这里。

已发掘的56座建筑遗址，分别属于甲、乙、丙三组。甲、丙两组可以看出一些规律。乙组基础较早，打破迭压关系复杂，比较难看出规律。丙组基础晚，甲组未定。有些迹象表明，官

殿的布局是经过一定规划的，特别是武丁时代的“水沟”，贯通整个乙组宫殿区，结构特殊、布局严密，显然是一项有计划的巨大建筑工程。



图六 安阳小屯村殷墟宫殿遗址

这些基础，其形状也是各种各样，大体说来有长方形、近

正方形、凸形 凹形、条形和圆墩形等。

综合几十座宫殿基址材料，我们对当时建造过程和建筑技术有了大致的了解。

宫殿基址的建造有两种不同的方法：一种是填基法，即把原来的洼地或早期遗迹如窖穴等填实夯筑而建；另一种是挖基法，即先在地面挖好房基，然后填土用夯打实。显然后者进步。

殷墟宫殿基址的方向，东西向者居多，南北向者较少，与一律南向的后世宫殿不同。方位接近磁针正方位，说明测位技术已相当进步。

与早商一样，殷墟建造宫殿的第二步是置础，础石多为天然磬砾，直径约10—30厘米，厚约10厘米，不加琢磨，较平的一面向上。令人惊奇的是，当时还使用了铜础。甲十一基础东西一排残存25个柱础中，有十一个檐柱都有铜础，挑檐柱则未见。铜础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特制的，呈锅状或器盖状，上面平滑稍凸，下面中心微凹，很多极平。铜础径约15厘米，厚约3厘米。另一种是不呈固定状的铜片。铜础之下往往有一个平面向上的石础，铜础与石础间还有厚约20厘米的灰土，大约是木质之类的支垫物的残迹，殷墟宫殿的地上部分几乎全无保留，房子的平面结构和立体结构都很难复原了。未发现瓦，可能是茅顶。

在宫殿基址之上和基础之下，以及础间、门侧或基址周围，经常发现人或兽的葬坑，这些葬坑就是建筑过程中举行奠基、置础、安门等仪式时留下的遗迹。一般奠基和安门时用人和狗，置础时用人、牛、羊、狗。一座较大的基址，奠基和置础用了1人、30牛、111羊、78狗。一座较小的基址，用1人、

10牛、5羊、21狗。安门时，埋的多是武装侍从，分置门的两侧和当门处，有的持戈持盾，有的仅持戈，多作跪状，人数多的有5—6人，其中不少是活埋的，尤其残忍的是埋在门下的还有小孩。这些宗庙或住所布置如此森严的守卫，无非是为了防止死鬼来侵扰。不难看出，晚商统治者这种怕鬼神作祟的迷信心理，也正是他们在现实生活中不得安宁的境况的一种反映。

〔湖北黄陂盘龙城〕

这是迄今发现的第二个商城标本。位于武汉市北约5公里的黄陂县滢口公社叶店大队的盘龙湖。这座商城坐落在今盘龙湖之滨的一个小山丘上，三面环水，北面与另一山丘相连，地势很不平坦，东北较高而西南较洼，城垣即随起伏的地势修筑，是一座完全暴露在地面上的古城。其周垣直到1954年还保存有比较完整的轮廓。现在仍然保存西墙、南墙及北墙的一部分，残墙高约1—3米，东墙基在有些地段还可以看出一些痕迹。从地面观察，城垣南北约290米，东西约260米，平面接近菱形。城的走向，其中轴约为北偏东20度。从北墙的断沟西壁来看，其夯法也分平夯和斜夯两种，同郑州商城比较相似，根据夯土层中包含物和层位迭压关系，其年代约与郑州商城二里岗相当。

城内东北部高地上分布有大型宫殿遗址，附近还未发现其他遗迹，所以断定城垣完全是为了保卫宫殿而修建的。城垣的外围，尤其是城北的山丘（如杨家湾、楼子湾等）上都分布有商代早期的一般遗址和墓葬，并有小型房基，表明城内外的居民有着不同的身分差别。这个遗址总面积不过1平方公里，城垣总面积7万多平方米，均为郑州商城的二十五分之一，但城垣布局等却同郑州商城一样，表明这里是一个商代的小王

国——方国之都。进一步研究盘龙城，对研究我国早期国家和城市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第四节 周都岐邑和丰镐

〔西周岐邑〕

周原位于关中平原偏西的岐山县和扶风县交界之处，是岐山之阳的一片广阔的冲积平原，自然条件十分优越，岐邑（亦作岐下）就位于周原的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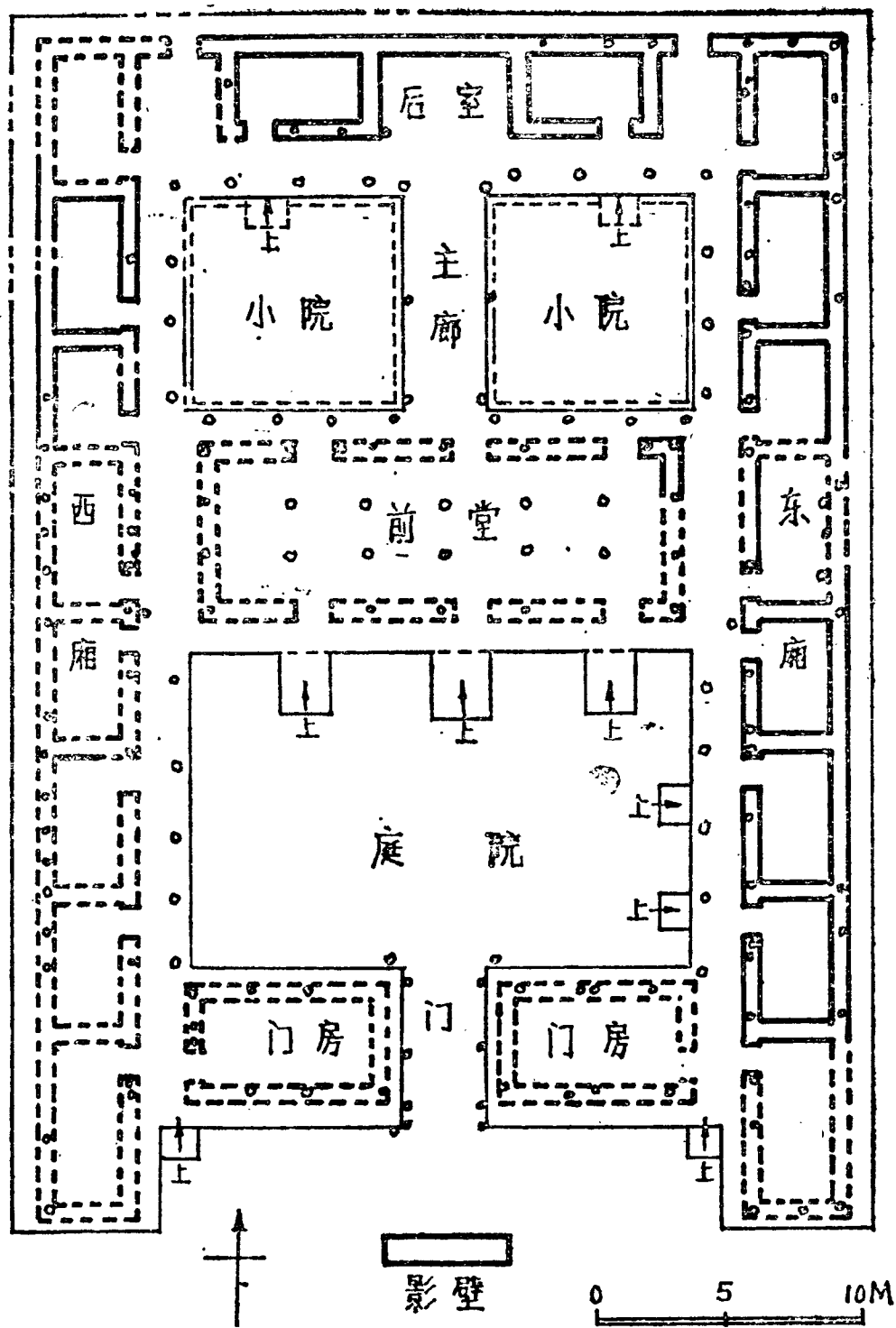
《诗经·大雅·绵》说周人在豳的时候，过的还是“陶复陶穴，未有家室（无土木之房）”的生活。到了周原之后，“古公乃贬戎狄之俗，而营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作五官有司。”⁽¹⁰⁾从这里可以看到，周人在岐邑已建立了奴隶制的国家机器。也可以说，岐邑是周人真正的第一个国都。周人在岐邑所建筑的城郭，目前还没有找到。但是，近年在岐山县京当公社凤雏村发现了一座周人的宫室遗址，即凤雏一号基址。

凤雏基址由三个庭院和四周的房屋组成。房屋南北长46米，东西宽32.6米，全部建筑坐落在一整片夯土台基上。

基址的南部正中是门道，门道四角各有一柱础石。东西两侧的房子，房顶可能是两面坡式。门外4米处有一道屏风墙，即影壁，长4米，厚0.4米。门道后是前庭，面积19×12米，北面即是殿堂，是主体建筑。殿堂之北是宽1.5米的横廊，横廊之北是并列的两个后庭，各8米见方，两庭之间是宽约3米的过廊。前后庭院，殿堂之东西为基本对称的两排房屋。两后庭之北为最后的一排横房。庭和房之间有回廊。

从平面布局看，整个基础显然是以殿堂为中心，围绕殿堂，合理地安排了庭、房、门、廊、阶、屏等单体建筑。殿堂开

间大，进深也深，可以看出也高大一些，应该是统治者处理朝政，或举行婚丧、祭祀等典礼的场所，就是文献中所说的“朝”或“堂”。殿堂之后，成“凹”字布局的房屋，可能是妃嫔居住的地方，即“寝”或“室”。整个建筑，大致符合周代“前朝后寝”，或“前堂后室”的设计。



图七 陕西岐山凤雏村西周建筑遗址

据王国维在《明堂庙寝考》⁽¹¹⁾一文中考证，周人“宫、寝、庙”常常混用，难得区分。宗庙亦称之为宫，是从生前所住的宫室转化而来的。死者的朝寝又称之为庙。所以，凤雏一

号基址，究竟是庙寝还是朝寝，比较难定。在周代，天子、诸侯、大夫、士都有宫寝，按其制度，形制是差不多的，只有大小的差别。按凤雏基址大小，堂合士一级，房合诸侯大夫一级，可见等级不高。同二里头宫殿遗址相比，时间晚千年左右，台基大小不及后者的四分之一，殿堂也仅二分之一强，即使作为周王的行宫，也觉太小。但可以肯定，它无疑是岐邑的一处重要建筑遗址。凤雏宫室的建造结构可以明显地看出是从二里头和殷墟的宫殿直接发展起来的。虽然规模远不及二里头、殷墟宏伟，但其布局的严谨、规整，又是二者所不及的。凤雏宫室最突出的特点是：前堂后室两部分形成一个整体结构，也就是说，把贵族的私人生活和政务场所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前堂后室的布局，正是集中反映了当时“家天下”的统治思想。

凤雏遗址始于西周早期，毁于中期。

〔丰镐〕

周文王消灭了丰水流域的崇国，在关中平原泔水河畔建立了丰京；武王时，又建立了镐京，通称丰镐，又叫宗周。之所以叫宗周，是因为“周王居之，诸侯宗之”。

周平王之前，周朝一直把丰镐作为首都。

《诗·文王有声》曾经记载：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丰，文王丞哉……考卜维王，宅是镐京，维龟正之，武王成之，武王丞哉。”

据《毛诗》郑笺：“丰邑在丰水之西；镐京在丰水之东。”

据这些文字记载，丰镐这两座古城，应该就在泔水的两岸。经过多次的实地调查，考古工作者根据文献记载，结合河道的变迁以及西周以来古迹的分布情况，大体确定了丰、镐二京

的位置。

汉以来的文献记载，说丰邑在泮水之西、汉长安城西南、唐长安城西、户县东三十里。从汉唐故城和泮水的位置，推定西周的丰邑应在泮河中游偏北，也就是今天的客省庄、马王村、西王村一带。根据考古调查和发掘，已经探明这一地区是一个面积广大、内涵丰富的周代遗址。遗址东以泮河为界，西至灵沼河，北至客省庄、张家坡，南至西王村、冯村，总面积约6平方公里。在这个遗址内，除发现大量的石、骨、陶器外，还发现了铸铜器用的陶范和制骨、制陶、制瓦等手工业作坊遗迹。在张家坡并发现有西周中小贵族的墓葬；在马王村发现有储藏铜器的窖穴。这一带未必是丰邑的中心所在，但至少也是接近丰邑的重要地区。

公元前121年，汉武帝在长安凿昆明池，破坏了镐京的一部分。汉昆明池后来又经过多次漫修，面积更为扩大了。现探明，今泮水东岸上泉北村和南丰镐村之间的土堤（即清人所称的“斡龙岭”）是昆明池的北界。在昆明池西北，即洛水村、上泉北村、普渡村、花园村、斗门镇一带，也是一个面积广大（约四平方公里）、内涵丰富的西周遗址。遗址的一部分已被昆明池破坏了。这种情况，正好同文献记载相合，从而证明镐京的中心应该就在这一带。

考古勘探和发掘虽然还未找到周代都城丰镐的确切位置，但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周礼·考工记》却对周人的都城宫室，作了大体上的描绘。

“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面朝后市，市朝一夫。（12）”

后代的许多都城，从汉长安开始，或多或少都附会《周

礼·考工记》的这个规则。如十二城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等等。但完全符合这个规则的都城却一个也没有。最接近这个规则的城市是元大都城。也有少数城市，如清盛京，是按《易经》的学说，并按内平外善的字形规划的城市布局。

《左传》与《礼记》等书，也叙述过周代的宫室制度。宫室前面有阙，接着是五重城门（皋门、应门、路门、库门、雉门）和处理政务的三朝（大朝、外朝、内朝）。阙在汉唐时继续使用，后来逐步演变为明清的午门。三朝和五门被后代附会、沿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隋唐以后历代宫室建筑的外朝布局。从汉代开始，宫室的祭祀建筑，如太庙、社稷、明堂、辟雍，也多附会周代的规则进行建造。

《三辅黄图》一书，在叙述秦汉城郭宫苑时，有些地方，追述了周都丰镐的建制。

首先，是西周有明堂、辟雍：

“周明堂，明堂之所以正四时，出教化，天子布政之宫也。黄帝曰合宫，尧曰衢室，舜曰总章，夏后曰世室，殷人曰阳馆，周人曰明堂。先儒旧说，其制不同，或曰，明堂在国之阳。”

又说“明堂也者，明诸侯之尊卑也。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服，知明堂是布政之宫也。”还有的文献说，明堂在“国之阳，应是三里之外，七里之内。

周文王的辟雍，《三辅黄图》说是在“长安西北四十里，也叫璧雍。如璧之圆，雍之以水，象教化流行也。”根据《三辅黄图》这两条记载，周代明堂、辟雍分在两地，至汉长安，已合而为一。明堂居中，辟雍环之。

周文王的灵台，“在长安西北四十里”（今长安县客省庄

有周灵台遗址)，“高二丈，周四百二十步。”至于它的作用，郑玄说：“天子有灵台者，所以观祲、察氛祥也。”

周文王灵沼，“在长安西三十里”（今长安县海子村有周灵沼）关于周的灵囿，《三辅黄图》引《诗·毛萇注》云：

“囿，所以域养禽兽也，天子百里，诸侯四十里，灵者，言文王之有灵德也。灵囿，言道行苑囿也。”

《史记·周本记》记载在丰镐完成了许多中国最早的著作：

“初：管、蔡叛周，周公讨之，三年而毕定，故初作《大诰》，次作《微子之命》，次《归禾》、次《康诰》、《酒诰》、《梓材》。”“成王既迁殷民，周公以王命诰，作《多士》、《无逸》。”这些，都是我们研究古代史的宝贵文献。

此外，据王国维考证，宗周彝器言王在萁京者五，言王在萁者一。萁字从艹从分。分今虽不可识，然与旁鼎之旁，旁尊之旁，皆极相似，当是从艹旁声之字。其具体地点，应是河东蒲坂。蒲，萁声相近，是阴阳对转之字。而《诗经·小雅》常提到“方”，亦即萁。古方、旁同字，小雅之方，即彝器之萁。周都丰镐，而萁亦称京，与唐都长安，而建蒲州为中都，道理是一样的。

郭沫若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宗周即镐京，‘萁’即丰京。”萁即方，《诗经·六月》说玁狁“侵镐及方”，就是指丰京。武王居镐，诸侯宗之，故镐亦称宗周。

但武王建镐京以后，丰京并未放弃，国家每有大事，周王皆至丰京，以其事告于宗庙，丰京的地位仍很重要，丰与镐互相配合，发挥着国都的作用。⁽¹³⁾”所以如果说丰京称萁，则镐京也

应称为蓉，即丰镐二京应统称蓉京。

岐邑和丰镐都在关中地区，丰镐更是在关中平原的中央核心地区。所谓关中，东为函谷关（河南新安县），西有散关（陕西宝鸡市），北是萧关（甘肃平凉、宁夏固原间），南止蓝田关（陕西蓝田县）。古代关中，气候温和，雨量适中，是全国最富庶的地区。苏秦赞扬关中：“秦四塞之国，被山带渭，东有关河，西有汉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马，此天府也。（¹⁴）”在军事上，关中“左据函谷二嶂之阻，表以太华终南之山。右界褒斜、陇首之险，带以洪河泾渭之川。（¹⁵）”所以，周、秦、汉、唐等朝，都相继建都关中。

第五节 洛水河畔寻周都

洛邑是西周的陪都，东周的国都。我国历史上设陪都，即有两京制度，始于西周。此后，许多大小朝代，尤其是一些著名的强大朝代，如东汉、隋、唐、明、清，无不模仿周代设两京制度。所以，周代设东、西两都，是我国政治制度上的重大创举，对于后来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黄河中游的伊洛盆地（或称洛阳盆地）是古代中国的腹地。伊洛盆地有伊、洛、瀍、涧四条河流流贯其间，是一片土沃物饶的冲积平原。这儿水源充足、气候温和，是古代人类生存发展的理想地区，早在新旧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已在这儿生存居住，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发源地之一。位居盆地中央的古代几个洛阳城，南对伊阙，背靠邙山，西有函谷，东踞虎牢。它北通幽燕，南抵江汉，东连江淮，西扼崤崧关中，位居天下之中，自古是中原地区水陆交通的中枢。唐朝孔颖达说洛阳：

“北有太行之险，南有宛、叶之饶，东压江淮，食渤海之利，西驰崤澠，据关河之胜”，“山河拱戴，形势甲于天下。”

洛阳二字中的“洛”字的写法，曾有过变迁。

洛阳为古“郑郛”之地，周武王时已有“洛邑”之称。《史记·殷本纪》说（武王）“营周居于洛邑而后去。”“乃迁九鼎于郑郛。”这儿用的是“洛”字。《汉书·地理志》说：“汉火行，忌水，故去水而加佳”。晋代张华所著《博物志》中说，“旧洛阳字作水边名，（汉）火行也，忌水，故去水而加佳。又魏于行次为土，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柔，故复（去）佳加水，变雒为洛焉。”

上述说法可靠不可靠呢？今用“洛”字，为曹操时所定，这是对的。但“洛”作雒并非汉所改。《正字通》引杨慎曰：“《左传》凡洛皆作雒，非汉始改。”可见早期洛与雒通。又汪之昌《青学斋集》卷二说：“伊雒字古不作洛解”。并谓《魏略》以雒为汉所改，其说不足凭。《说文》：“雒，忌欺也，原为鸟名，雒水假用之。”段玉裁说：“雍州洛水，豫州雒水，其字分别，自古不紊。”又云：“曹丕改雒为洛（原文作“改洛为雒”，当误）。以掩已纷改之咎，且自诡于复古。自魏至今，皆受其欺。”汪、段氏所说，不足全凭。古洛、雒通，《左传》为证。说汉改洛为雒，非自《魏略》始，《汉书·地理志》已有之。《说文》说雒为洛假借之字，可以说通，古来假借字用得很多，并非“自古不紊”。到战国时，周敬王徙居成周，为下都，称雒阳，“雒”字流行。至曹魏复改为“洛”，沿用至今。

周武王克殷以后，从朝歌南下至“管”（今郑州），西行至洛。《史记·殷本纪》说武王：“营周居于洛邑而后去。”

这条记载，说明武王曾经经营过洛邑。武王灭商，丰镐偏于西土。为了巩固统治，必须在中原建立一个政治、军事基地，才能监视“殷顽民”的活动，巩固周的政权。所以营洛邑，建陪都，就成为当时急不可缓的政治措施。武王在戎马倥偬之中，只是有了营建洛邑的蓝图，并未能够建成真正的陪都。

周人开始大规模地营建洛邑，是在周公摄政五年。这年的三月初五，首先在洛邑“卜宅”（占卜建都基地是否吉利），然后祭天祭地，于当月就召集“庶殷”（殷贵族），公布命令，安排劳役，进行大规模的兴建。到当年年底，即基本建成。周人把这个新建的陪都称之为“新大邑”、“新邑洛”、“新邑”。《康诰》：“周公初基新大邑于东国洛。”《召诰》：“知我初服宅新邑”。《多士》：“周公初于新邑洛……”洛邑开始大规模兴建之后不久，成王来到洛邑。召公以长者、监护人的身分，对成王告诫，这就是《书·召诰》。接着，周公向成王追述洛邑的兴建经过，并提出在新都统治的政策方针。成王表示，他将回宗周正式即君位，命令周公留在洛邑作为“四辅”（四方之辅），主持东都政务。年底，命令史官写成正式文件，册命周公，授给主持东都事务的大权，这就是《书·洛诰》。而召公辅助成王，主持西都事务，这就是《书·序》所谓：“召公为保，周公为师。”

洛邑在西周成王时代，是陪都。平王时，为避犬戎，东迁王城，定为首都，从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519年，约二百五十余年。周敬王又徙居成周，从公元前519年开始，约二百余年。周赧王最后三十六年，又迁回王城。《洛诰》记载：“我乃卜涧水东、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东，亦惟洛食”。《国语·周语》：“谷（涧）洛斗，将毁王宫。”据此可以推定

大概的地望。考古工作者已在涧、瀍之间找到东周王城。至于西周王城及成周城，仍在探寻之中，所以，我们说：“洛水河畔寻周都”。

根据文献记载进行的周东都研究，近年来比较活跃，今将简单情况作一介绍。

关于洛邑及王城、成周的位置和关系，目前主要有三种说法，即两城说，时间先后说，大小城说。

先看两城说。这是传统通行的说法。《公羊传》说：“王城者何？西周也”（昭公二十二年）。又说：“成周者何？东周也”（昭公二十六年）。这儿所说东周、西周显然已是战国时期的小东周和小西周。《汉书·地理志》说：“雒阳，周公迁殷民，是为成周。”又曰：“河南，故邾郟地……营以为东都，是为王城，至平王居之。”长期以来，据《公羊传》和《汉书》的记载，一直认为王城和成周是两个相对独立的城池。而且根据一些文献的记载，认为王城在涧瀍之间，成周在今白马寺以东的汉魏故城，相距约20公里。两城统称为洛邑。

但至今无论在王城公园或白马寺一带，都未发现西周时的城池。

再看时间先后说。近年来一些学者考证认为，洛邑和成周实为一地。成王之前，只称洛邑。周人尚文、武之功，对成、康二王亦念念不忘。至成王亲政时，方有成周之名。而西周初时，既无成周之名，也无王城与成周的区别。周敬王请晋国帮助“城成周”时说：“昔成王合诸侯城成周，以为东都，崇文德焉”（16）。“周公在丰，病将歿，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离成王”（17）。

从以上可以看出，从成王五年亲政开始，洛邑又称之为成周，到春秋时期，又出现“王城”之名。但一些文献将王城和成周之名混用，均指东都洛邑。如《左传》僖公二十五年曰：“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而记载同一事件的《国语·晋语》则作：“王入于成周”。可见“王城”、“成周”系指同一地方。《水经注·谷水》曰：“谷水（涧水）又经河南北，所谓成周矣。河南，河南县，故邾鄢地也。”京相璠曰：“邾，山名，鄢，邑名也。卜年定鼎，为王之东都，谓之新邑，是为新邑。”沈延周《逸周书集解》曰：“自郭以内统称成周，不专指王城。”这些记载，都认为王城和成周是同一所指。春秋时出现“王城”之名，是周王朝为了装点门面，强调自己的都城为“王城”，而诸侯争霸，亦打着“尊王”之旗。所以“王城”之名遂代替了成周。

到战国时期，周考王分封东西二周公，西周桓公名揭，居河南；东周慧公名班，居洛阳。周赧王时，东、西二周正式分治。《史记·周本记·索隐》曰：“西周，河南也；东周，巩也。……按，高诱曰：“西周，王城，今河南；东周，成周，故洛阳之地。”这时王城与成周已分成两地。

综上所述，可见洛邑之名甚早，武王时即已出现。成王时出现成周之名，春秋时出现王城之名，都是指洛邑。王城既统指洛邑，又是居成周西偏、属于成周的一部分。析言为王城、成周，统言则仍为成周。文献中所说“郭方七十里”，可能是十七里之误。

但这种说法也有问题：据一些文献记载，当时的洛邑位涧、瀍之间，又连瀍水之东。如果认为王城位于成周西偏，则整个洛邑，或者说整个成周从涧滨（今东周王城跨涧水）到瀍

东，范围实在太大了。再说既然王城与成周是一地，则东周敬王徙居成周，赧王又迁回王城之记载或者说不能成立，或者说没有什么意义，因两城紧连，如何能“避乱”？

最后再看大小城说。主此说者认为：

整个成周，有大小二城。小城是王宫所在，又称王城。大城叫“郭”，即“郭”，是居民会集和留守军队之所。结合当时其他诸侯国首都的布局，小城应在大城的西边，两城是相连的。且这个城的规模很大，大郭应位于紧靠王城之东，横跨澗水两侧地区。

至于“成周”命名的含义，这种说法认为，“成周之名，在于洛邑对于周朝统一大业完成的作用，且与“成王”称“成”，用意是相同的。郑玄说：“天下太平而此邑（洛邑）成，乃名曰成周”⁽¹⁸⁾。何休说：“名曰成周者，周道始成，王所都也。”⁽¹⁹⁾”杨宽认为这些解释不够确切。《诗·周颂》有一篇《昊天有成命》，贾谊曾释：“文王有大道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未成”，只有成王才“有成”⁽²⁰⁾。《吕氏春秋·下贤》说：“文王造之而未遂，武王遂之而未成，周公旦抱少主而成之，故曰成王。”马融所引解释“成王”的三种说法之一，也说：“以成王年少，成二圣之功，生号曰成王”⁽²¹⁾。成王原来确是“生号”，成王之所以称“成”，应该取义于周朝开国大业的完成，也就是昊天“成命”的完成。所以杨宽认为成周所以称“成”，也应是由于完成“成命”和取得成绩，建成了周朝统一四方的国都。

这个说法，否定了汉魏故城有周代遗址的说法。可是，据文献记载：秦汉时在今汉魏故城是有离宫的。这个离宫应该是周人已建有基础，秦和西汉得以保留、维护。到东汉刘秀时

“幸南宫却非殿，遂定都焉”，说明这个基础还在。如果周代没有这个基础，秦汉也未见有在洛阳大兴土木、修建离宫的记载，则这个“南宫却非殿”又从何而来呢？

《逸周书·作洛》记载东都洛邑的修建规模：

“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立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郭方七十里（有作七十二里，十七里）……制郊甸六百里，因西土方千里。”城方千七百二十丈，约十一里，与《周礼·考工记》所说“匠人营国，方九里”，相差不多。文献记载，王城内主要是周王行宫和官署。主要建筑有天室（明堂、祭祀与布政之所）、大庙（太庙）、社坛、五官、宗宫、考宫、京室（宗庙中的大室）、路寝等等。至于它们的具体情况，只能根据一些零星的记载进行推测，还无可靠的考古材料进行说明。

东周王城北城墙保存较好，全长2890米。北墙之北，有一条深约5米左右而干枯了的渠道，可能是原城墙的护城壕。城墙的西段，残高0.9米，残宽7米，其上压有春秋层，下压晚商至西周文化层。城西南面亦有部分遗存。城墙大约建于春秋中叶以前，用夯土筑成，夯法有平夯和方块夯两种，墙根旁有二层台，附近有道路和车道痕，大概是修筑城墙时形成的。在城内中部偏南，发现大片夯土遗迹，并有大量的板瓦、筒瓦和饕餮纹、卷云纹瓦当等的堆积，说明这一带应该是重要的建筑群所在。东周的王宫、祖、社有可能就在这里。城内西北部，有窑场、骨器场、石场遗迹，大部分属于战国时代。春秋时期的手工业区有可能也在这一带，这就符合了“面朝后市”的城市设计。紧贴墙根之北一米左右，发现了直径约20厘米的陶制排水管道。

作为城市的主干大道及其城门，还有待继续探查。

此外，在瀍西今洛阳东火车站北边台地上，发现了西周前期的铸铜作坊遗址，面积达28万平方米，其北又发现了西周墓地，已发掘300多座，这些现象都值得注意，作为进一步探寻周都洛邑的重要线索。据调查和部分地区的发掘，得知城内还有小规模居住遗址。根据出土物，可以断定这类遗址居住的为农业人口。但在全城约4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大部分地区依然是空旷荒凉之地，其居民大部为农业人口，这正是早期都城的一些特征。

东周洛邑的建设具有明显的政治目的，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首先建设洛邑是为了集中迁移殷贵族到“成周”，以便加强监督、管理和利用，从而巩固新建的周朝政权。

商的灭亡，殷贵族当然不会甘心，如发生了武庚等的叛乱。周当初把殷贵族就地监督、使用。这时，周公改变了当初的办法，一部分分配给封君，由他们将殷贵族带到各封国去，分散他们的力量。另一方面，将殷贵族集中到成周。在成周，驻屯“成周八师”，主要是用来对付殷贵族的。在“牧野”的所谓“殷八师”，军官和骨干无疑是周人担任。《东观汉记·鲍水传》说：“赐洛阳上商里宅”，《后汉书·鲍永传》作：“赐永洛阳商里宅”。李注引陆机《洛阳记》曰：“上商里在洛阳东北，本殷顽人所居，故曰上商里宅也”，说明洛邑有殷顽人所居的专门里宅。1952年，在洛阳东郊的摆架路口，下瑶村西区和东大寺区，都发掘到西周早期的殷人墓葬，他们沿袭殷的礼俗，但还有某些与殷墟墓不同的特点，如出土的铜铲和铅戈都是不能实用的明器，墓中显然缺乏觚爵之类酒器随葬，陶器中也没有酒器式样等，因此考古工作者推定是迁居

洛邑的“殷顽民”的墓葬。

其次，洛邑建成以后，东西两都并立，两都的京畿连成一片，形成统治四方的政治中心，加强了全国的统一。

洛邑建成以后“制郊甸方六百里，因西土为千里。”⁽²²⁾

《汉书·地理志》说：“初洛邑与宗周通封畿，东西长而南北短，短长相复为千里”。伊洛盆地和关中盆地都是东西走向的河谷盆地，通过函谷关、潼关连在一起，成为统治全国的枢纽，有力地巩固了周朝政权，特别是巩固了刚刚被征服的关东地区。丰镐是周人的根据地，周天子当然长居西都，成为周王朝统治中心。但是，在具体的政治作用上，东都比西都重要得多。因为成周是四方的中心，对于四方诸侯及四周戎族部落的事，都必须由洛邑的中央政权机构来管理。周王朝中央政权机构的最高官署，叫“卿事寮”，周公以“太师”之职主管各邑的“卿事寮”，管理“三事（京畿的政务官、司法官和地方官）四方（诸侯）”。以后周公的继任者也同样如此。

再次，洛邑建成以后，成为征收四方贡赋的中心，粮食财物积储的中心，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

《史记·周本记》记述营建洛邑的原因，是由于“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

由于洛邑向四方征收贡赋，主要对象是各级诸侯。周朝诸侯有侯、甸、男、采、卫五个等级，所出贡赋也有区别。《左传》昭公十三年记子产说：“昔天子班贡，轻重以列，列尊贡重，周公制也。”同时，周还对被征服的夷戎部落或国家征收贡赋。《兮甲盘》铭文中说：“王令甲（兮甲）政（征）鬲（司）成周四方责（积）”，就是周王命令兮甲（字伯吉义，就是尹吉甫，尹是官名）向四方诸侯征收贡赋并且储存（积）起

来。东都洛邑在征收储存贡赋，分配劳役，以保证中央政权和各方面经济、物资、劳务的需要方面，是很重要的前方基地。

另外，洛邑是周之举行四方诸侯及贵族“殷礼”的地点。“殷礼”是集合内外群臣大会见和对上帝、祖先大献祭的礼仪，具有对群臣奖励督促、考核的作用。

《洛诰》记载周公对成王说，很快要举行“殷礼”了，准备“祀于新邑”，要求“予齐百工（百官）、倅（使）从王于周（成周）。”这时成周即将兴建完工，举行“殷礼”具有庆功性质。自此以后，洛邑成为举行殷礼的主要地点，而且都由主持东都政务的辅佐大臣主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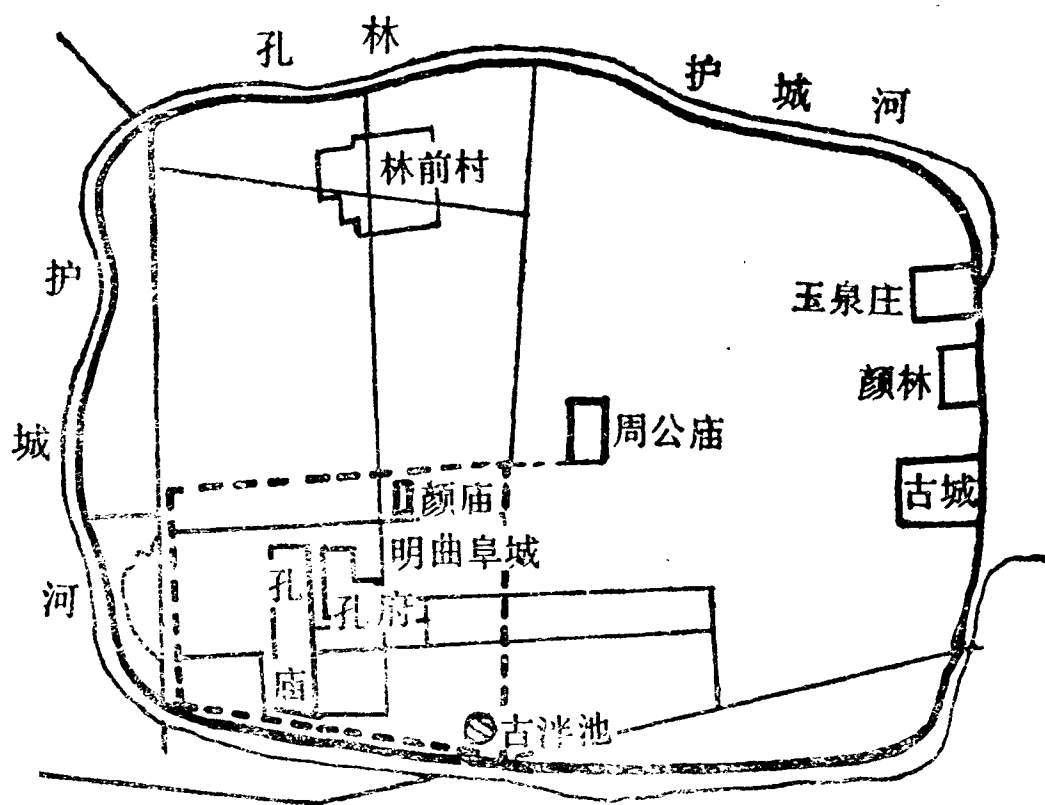
最后，由于西周对东都的经营，使洛邑成为东方的重要政治中心。致使在平王东迁时，能迅速地建立起东周政权，使周王朝又在洛邑苟延残喘了几百年。

由此可知，洛邑的建成，对于周王朝的政治稳定，经济物质车轮的运转，起了重大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此后中国历史的进程，以及后代的京城制度，都发生了重大的影响。

第六节 雨后春笋般的春秋都城和 各自雄霸一方的战国都城

春秋时期，诸侯蜂起，大国争霸，纷争不已。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的发展，各国相继筑城。《左传》等书，关于城某地、城某邑、筑某城的记载，不胜枚举，真如雨后春笋。据初步统计，春秋时代的诸侯国有一百四十多个，一些诸侯国

还不断迁都，如晋国就曾六迁而都七都。当然，这时候的一些都城，不是每个都城在中国都城发展史上都有意义，有些都城，实际上只是一个小县城。有些都城的地点，亦至今没有搞清，争论不休，如古晋都曲沃究竟在今曲沃，还是在今闻喜，争论了一千年没有解决，近年又出来了一个在襄汾之说。这些，一方面是由于文献记载的模糊，再则是由于行政区划历经变迁，地名有时发生转移，至使纷争迭起。春秋时代的都城，时间较久的，经营数百年，成为全国著名的大城市。如鲁都曲阜，东西长约4公里，南北宽约3公里，周长12公里，大致成曲折的横长方形。有城门十一，南面两门，城中心是宫殿区，城内还有居民区、墓葬区和分门别类的手工业区。



图八 鲁曲阜城遗址

这时期“礼崩乐坏”的局面在都城建设上明显地表现出来。《左传》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记载郑祭仲对郑庄公说：“都城过百雉（雉，三丈），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

不过三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临淄等城的情况，说明“先王之制”早已不循，王室微弱，大国争霸，都城宫室之制，早已过度。到西汉时，司马迁跑到楚国，看到楚国春申君故城，不禁惊叹：“宫室盛矣哉！（²³）”

这时期成书的《越绝书》（后人曾增补）记载了越国的首都山阴大城、勾践小城（浙江绍兴）和吴国的首都姑胥吴大城、吴小城（江苏苏州）的城市地理概况。

关于越都山阴：

“勾践小城，山阴城也。周二里二百二十三步，陆门四，水门一。今仓库是其宫台处也，周六百二十步。柱长三丈五尺三寸，高丈六尺”。“大城周二十里七十步，不筑北面。”“陆门三，水门三。”并说，大城是“范蠡所筑也，今传谓之蠡城（²⁴）”。

关于吴都姑胥：

“吴大城周四十七里二百一十步二尺，陆门八，其二有楼，水门八。南面十里四十二步五尺，西面七里百一十步三尺，北面八里二百二十六步三尺，东面十一里七十九步一尺，阖庐（闾）所造也。吴廓周六十八里六十步。”

“吴小城周二里，其下广二丈七尺，高四丈七尺，门三，皆有楼其上，增水门二，其一有楼，一增柴路。

东宫周一里二百七十步。

西宫在长秋，周一里二十六步，秦始皇帝十一年，守宫者照燕失火烧之。”

从上述记载，我们可以看到，春秋时代的吴越之都，同春秋、战国时代的其他列国都城一样，有大小两城，吴大城还有“廓”，而且宫室不止一处。《越绝书》的记载，至为详备，数

据很认真，甚至小到“三寸”，为我们研究吴、越之都提供了十分宝贵的材料。

我国现存最古老最完整的地面城池建筑为周代的奄国（又作淹）的都城——奄城。它位于今江苏省常州市西南，距市区约7公里。属武进县湖塘公社淹城村。在《越绝书》中，对这个城市就有记载：

“毗陵县城南，故古淹君地也。东南大冢淹君子女冢，去县十八里，吴所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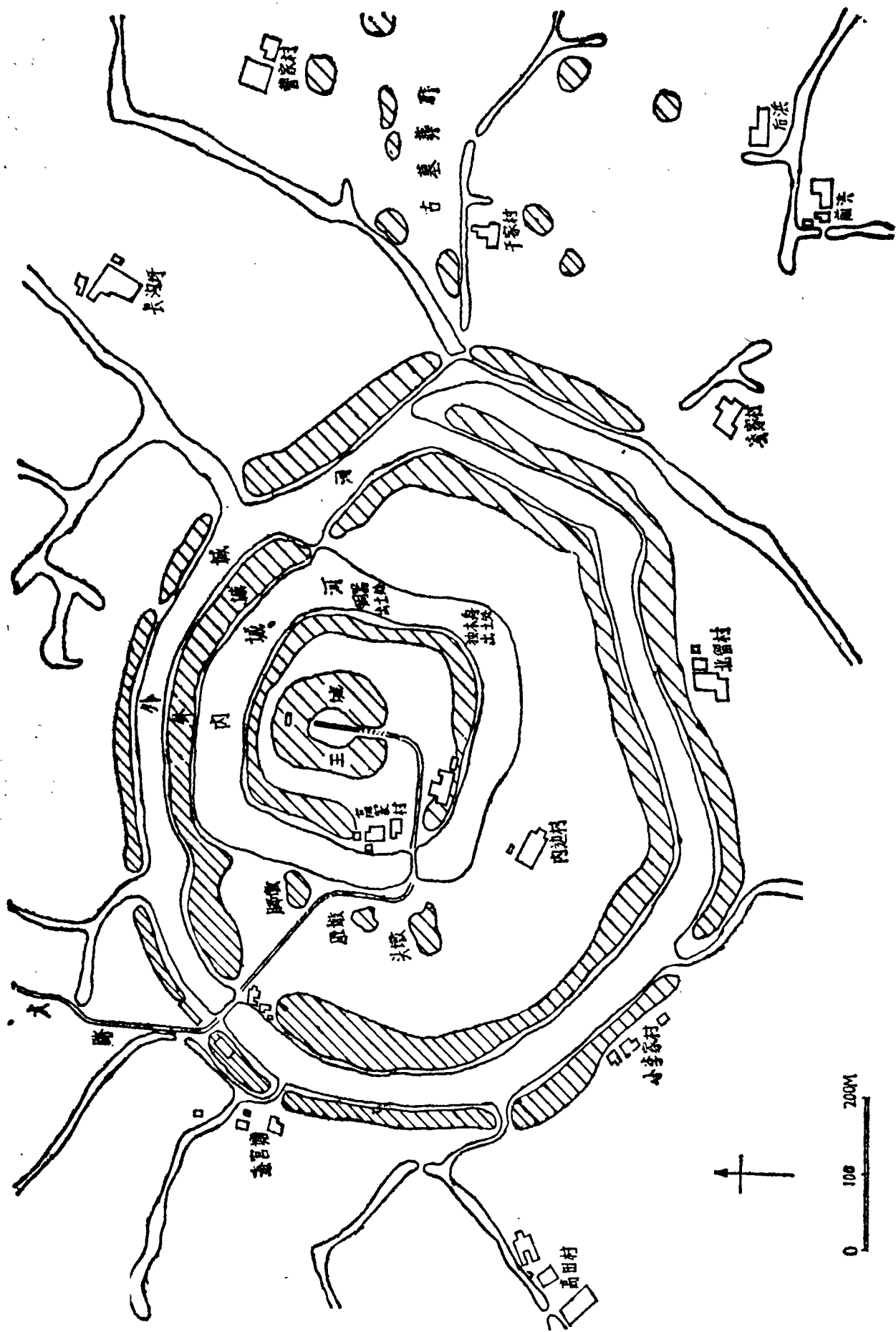
这儿对奄城的位置和来龙去脉都交代得很清楚。从子女冢为吴所葬，可知奄国是被吴国所灭掉的。

奄城遗址保存完好，是我国现存最古老、最完整的地面城池建筑。奄城有三重城墙，即王城、内城和外城。城垣土筑，现存残高尚有9—13米。三重城垣外都有护城河，护城河水面宽广，今宽40—80米，水深4—5米。可谓层层设防。三重城垣都只存一个旱路城门，并且三个城门不开在同一个方向上。

王城（又称紫禁城、子城）呈方形，周长约0.5公里，门南向，内城地势高，中间有块高地，可能是宫室遗址。

内城为不规则圆形，周长约1.5公里，门西南向；外城也是不规则圆形，周长约3公里，门西北向。外城西部，从南向北排列着三个土墩，今人称之为头墩、肚墩、脚墩。相传奄之邻国之君遣将攻奄城，久攻不克。奄公主见攻城大将少年英俊，产生爱慕之心，拟私开城门。后天机败露，奄君盛怒之下，将亲生女儿刳为三段，葬三处，即今之三墩。此说当然不可信，三墩可能是当时的建筑遗址。

奄城遗址内出土不少文物，如几何印纹陶罐、青铜器（鼎、剑、箭矢）、原始瓷器（碗、簋）等，一般认为是战国时代



图九, 江苏常州奄城遗址

的遗物，具有战国时代南方文化的特征。特别是护城河内出土的独木舟，据碳14测定，是二千年前的遗物（现在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根据以上出土文物推测，奄城在战国时代继续使用。

战国时代，列国都城迁徙不定，其大致情况如下：

秦：雍城（陕西凤翔县）→栎阳（陕西临潼县）→咸
阳（陕西咸阳市）

楚：丹阳→郢（湖北江陵）→都（湖北宜城）→郢
→陈（河南淮阳）→寿春（安徽寿县）→盱眙
（江苏盱眙县）→郴（湖南郴县）

齐：营丘→薄姑（山东博兴）→临淄（山东淄博市临
淄区）

燕：上都——蓟县（北京市），下都——武阳（河北易县）

韩：阳翟（河南禹县）→新郑（河南新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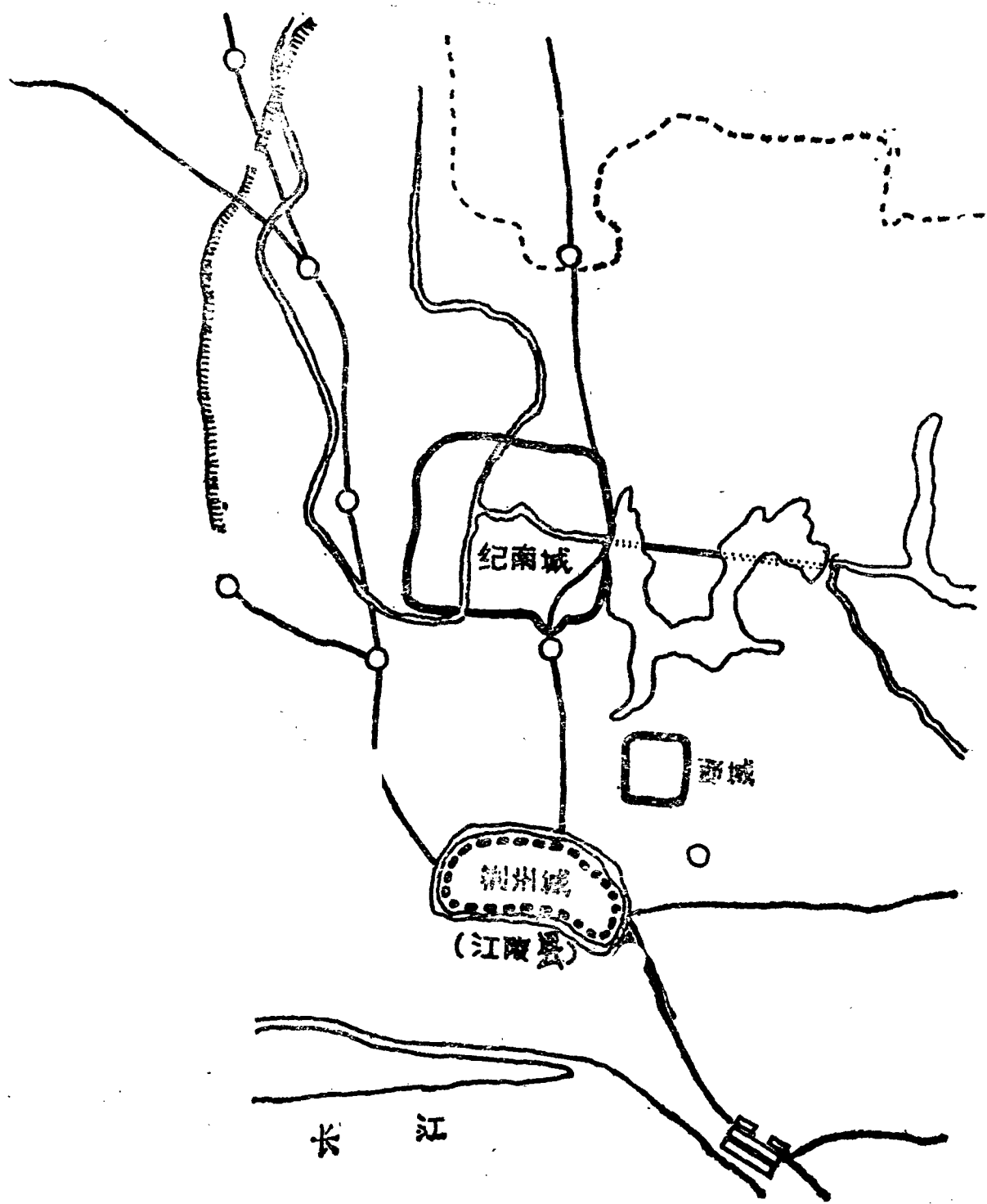
赵：晋阳（太原）→邯郸（河北邯郸市）

魏：安邑（山西夏县）→大梁（河南开封市）

〔楚都——郢〕

楚国都郢前，从公元前10世纪初至公元前689年，曾都丹阳三百多年。对于丹阳地望，历来说法很多（湖北秭归，湖北枝江，河南淅川丹淅古城、淅川下寺古城）至今没有定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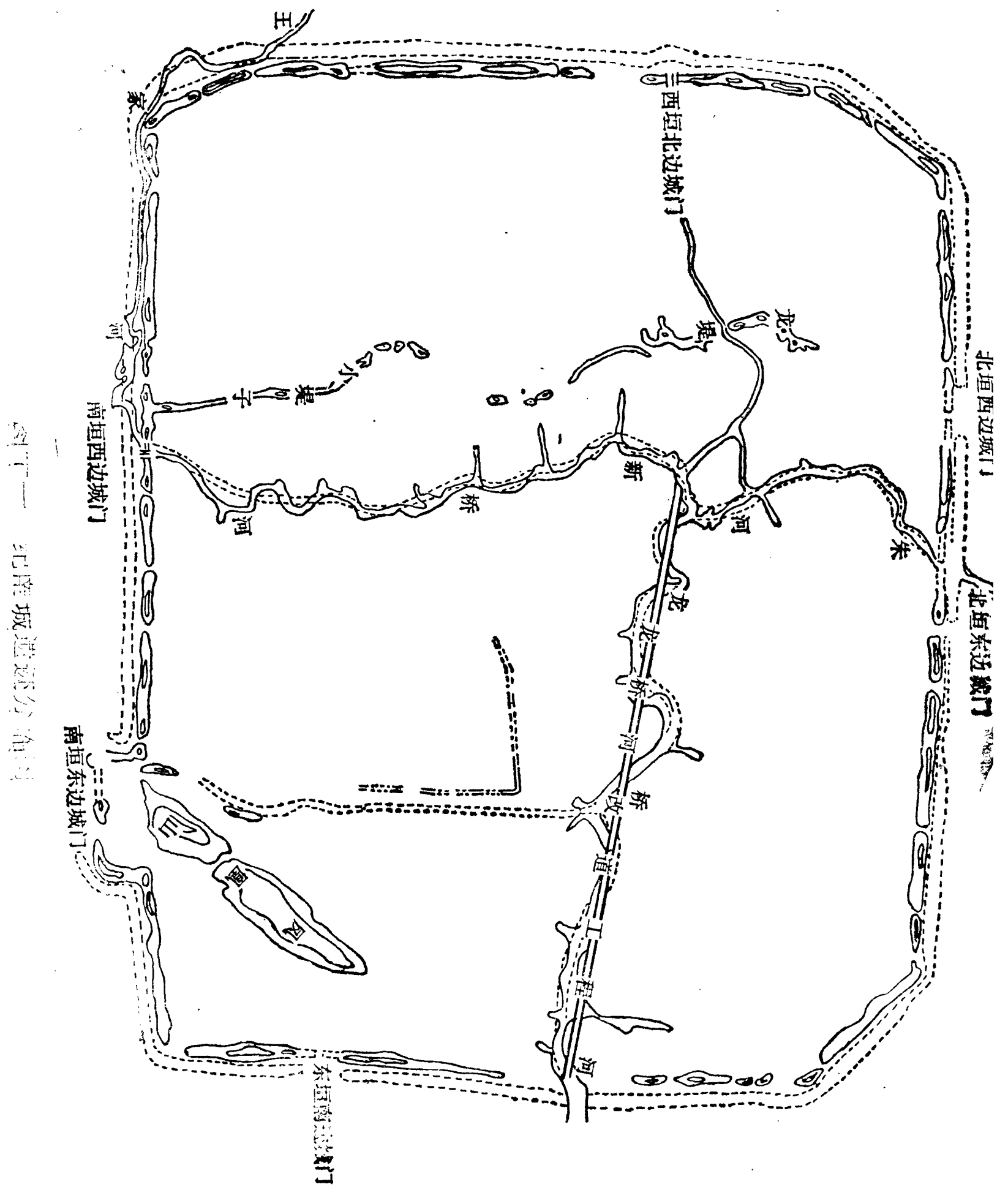
公元前689年，楚迁都郢，至公元前506年昭王迁都都，旋又复郢。《水经注·沔水》中说：“江陵西北有纪南城，楚文王自丹阳徙此。”结合其他一些文献，知道今湖北江陵县荆州城北5公里的纪南古城就是楚都郢。因其在纪山之南，后代名纪南城。到平王又筑一新城，名郢城，在纪城南一些，但城不大。



图十 湖北江陵纪南城与荆州城位置图

纪南城为长方形，东西长4.5公里，南北宽3.5公里，南面靠东段突出一块。总面积15.5平方公里，城垣周长14公里。城内西北高，中间低。发现城门七座，东垣一，其余三面各二，此外，南垣西段和北垣东段，还有水门两座。1975年，对西垣北门进行了发掘。该门一门三道，中道宽7.80米，南道3.80米—3.90米，北道3.84米—4.00米，中间用两道3.6米宽的土墙隔开，土墙长10.10米。探明四周有护城河，宽40米。

城东部有大型夯土台基多座，大部已夷为平地，基址存于



图十一 纪郿城遗址部分平面图

地下。留在地面上的，有的高达6米。初步认为这一带是宫殿区。有一座台基上发现房屋基址，有夯土墙基，红烧土夹瓦片的柱础，瓦片散水，陶圆形排水管道，古井等。城内还发现了

大型墓葬区，有七百余座封土堆，根据已发掘的部分墓来看，楚国的许多王公贵族，就葬在这一带。公元前278年，郢都被秦将白起攻陷，纪南城被毁（今城内很少见战国晚期的遗物，就是一证）。

楚昭王于公元前506年曾迁都都（湖北宜城县），但不久又返回郢都。公元前278年，楚迁都陈（河南淮阳）。公元前241年，又迁都寿春（安徽寿县）。后又迁盱眙（江苏盱眙）、郴（湖南郴县）。至公元前223年被秦灭亡，历国800余年。

楚都郢市面繁华，人口众多，文献说是车毂击，民肩摩，市路相排突，号为朝衣鲜而暮衣敝的城市。

〔齐都——临淄〕

从公元前9世纪中叶，齐献公由薄姑迁都于此，历经春秋战国，到公元前221年，秦灭齐，临淄作为齐国的国都长达600余年。

考古材料表明，临淄齐故城包括大城和小城两部分。大城周长14 158米，小城周7 275米，两城相依，略呈长方形。大小城总周长21 433米，总面积约30平方公里。探出城门十一座，其中小城五座。大城六座城门，东西门各一座，南北门各二座。小城南门二座，东西北各一门。有十条道路和两处排水系统。

宫殿夯土建筑基地集中在小城北部的“桓公台”和东北角的“金銮殿”周围。

城内还探出多处手工业作坊，有炼铜、炼铁、铸铁等的遗址，大城东北部探出大中型墓二十余座。故城周围，分布着数以百计的大冢。城内出土过许多春秋战国时代的文物，如铜器（簋、钟、盂）、铁削、金带钩、漆器、水晶、玛瑙等。

临淄是当时列国中最繁华的大城市之一。文献记载中说：“临淄之中七万户……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踏鞠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如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²⁵⁾”
繁华殷盛，可见一斑。

秦汉时代，临淄仍是郡国的重要都城。

〔燕都——蓟和武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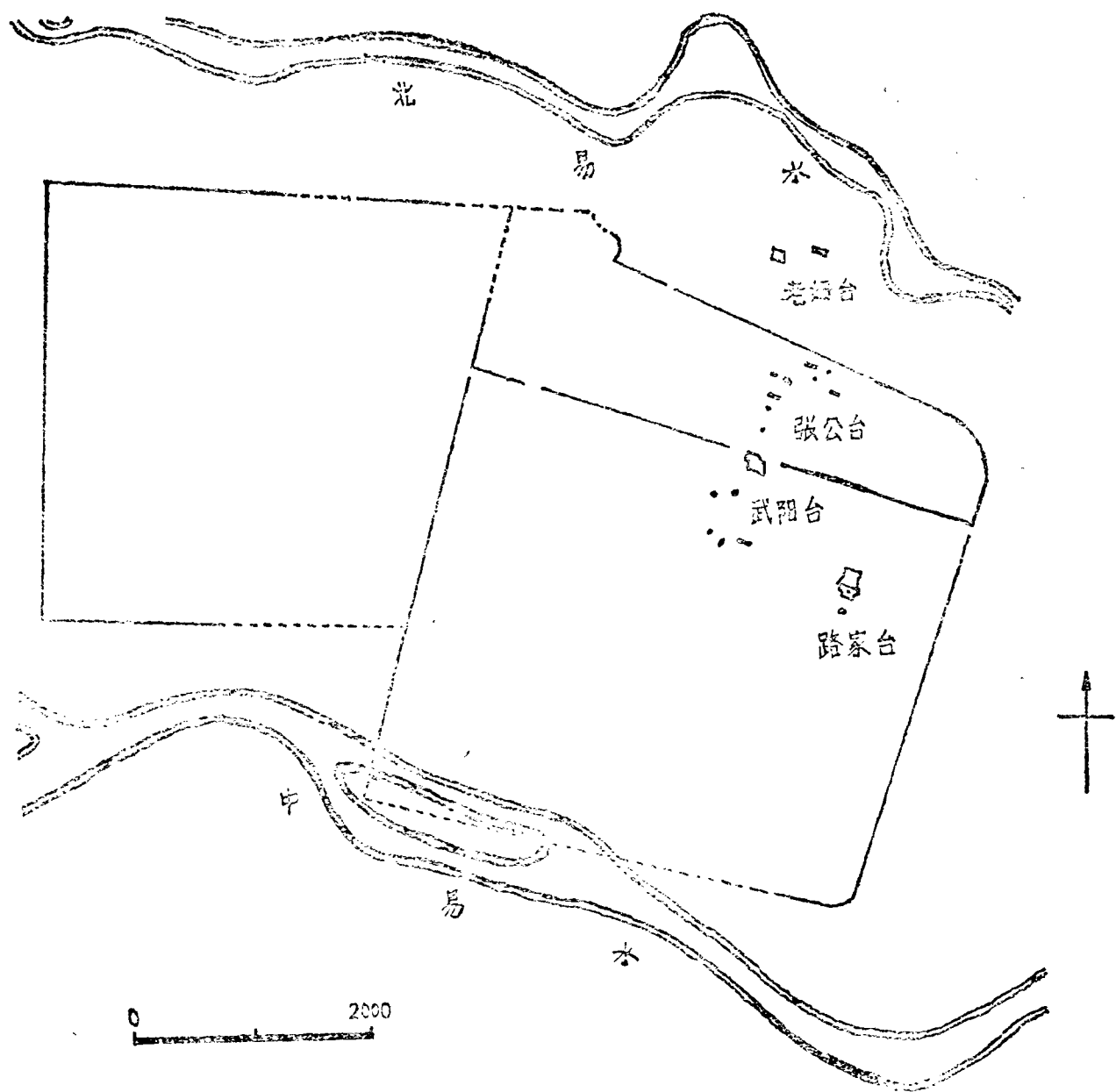
燕国的上都——蓟的遗址，至今没有找到。据考古勘察和发掘提供的初步线索，大约在今北京城的西南，宣武门到和平门一带。一说即房山县琉璃河董家林古城。

燕国的首都蓟，是北方的重要商业城市，名冠海内，为天下名都。它的贸易联系范围，除燕本国外，还远达今山东、山西、河南的一些地方。

燕国的下都武阳在今河北省易县东南，中易水和北易水之间。故城遗址东西长8300米，南北宽4000米，为现存战国遗址中最大的。一条古河道从中部纵贯南北（运粮河），使城分为东西二城。东城是内城，东墙长约3200米，东南城角为圆角，北墙长约4500米，中间有16米宽的缺口，正中有小块夯土，两旁有路土和石头，可能是城门遗址。西墙长约3100米，南墙只有一段，长约1500米。

外城在西北两面依着内城。东墙长230米，东北是圆角。北墙长8300米，南墙只剩一段，长1500米。北墙有缺口，传为古河道运粮河入口处。城墙版筑，现存最高处达10米。

城内外有50多处高大的夯土台基，最高的达20米，多利用天然土台修筑而成。靠近北垣正中的武阳台，估计为主要宫殿区。但在外城北垣内外，有多处高大的夯土台基，如张家台、



图十二 河北易县燕下都武阳城遗址

老姆台（城外），可能也是一些宫殿遗址。有些大土台有木柱痕迹和铜块、筒瓦、砖、下水陶管道和铺地方砖。内城西部有手工业作坊遗址，南部有很多居住遗址。外城东北角有窑址。内城西北角有许多大墓葬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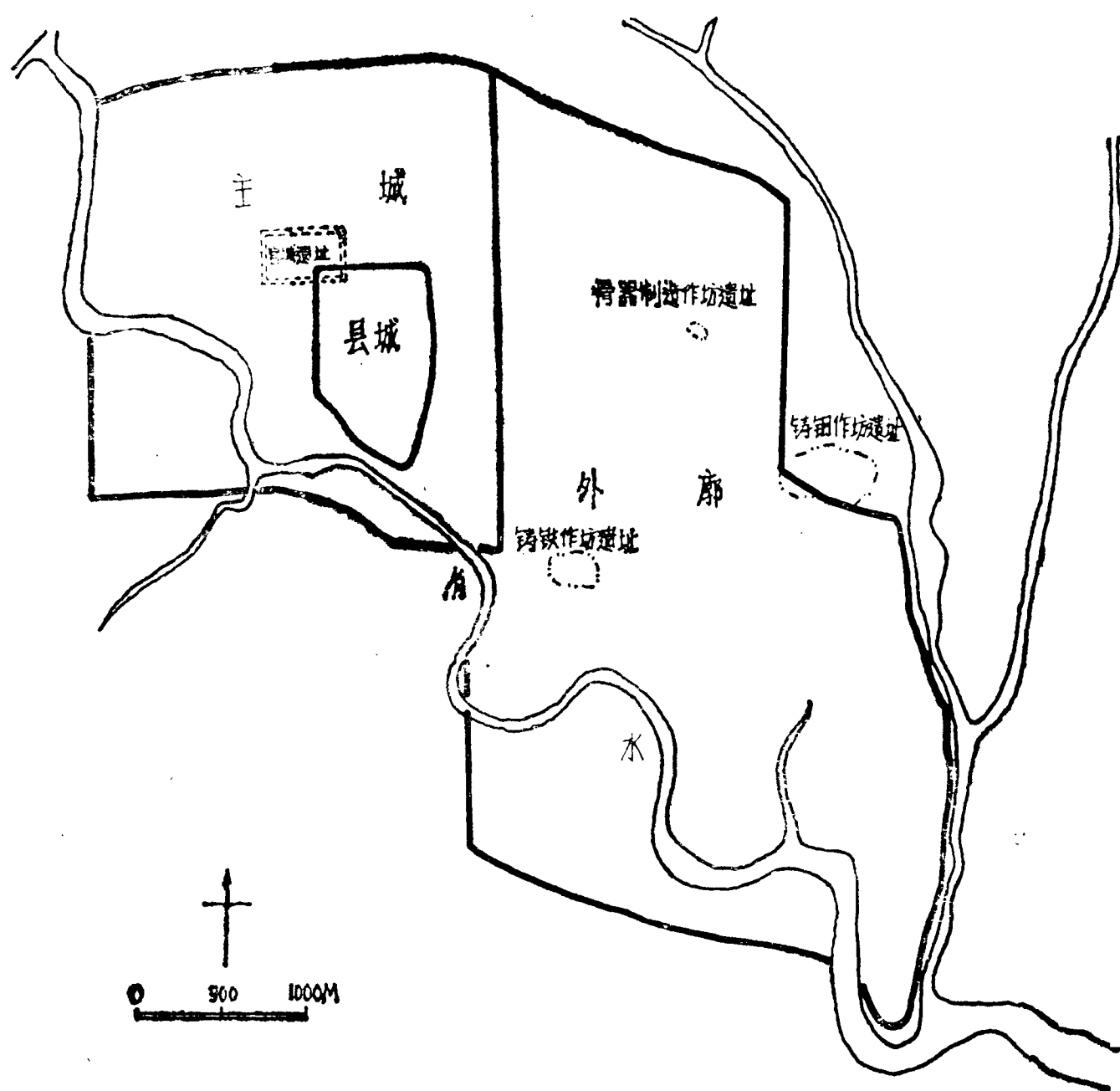
〔韩都——新郑〕

韩都新郑（今河南新郑县）考古学界一般称郑韩故城。

公元前375年，韩灭郑后，迁都于新郑，到公元前230年，秦灭韩止，韩国都新郑长达140余年。新郑古称“有熊”，相传曾是黄帝之都。从春秋初期开始，成为郑国的新

都。郑韩都此五百余年。

新郑郑韩故城规模巨大。为东西两城相依的形制，西城是主城，基本方形；东城是外廓城，东北顺黄水西行，成不规则形状。东墙北墙保存较好，南、西破坏严重。城的西南面，是双洎（jī）河（洧水），西南有陜山和风后岭，号称“咽喉九州之地”。



图十三 河南新郑郑韩故城遗址

主城周长9.8公里，面积6平方公里。外廓城约比主城大三分之一。全城周长19公里，面积14平方公里。郑韩两国的宫殿在主城内西北部。宫殿区内有一个东西长约500米、南北宽约300米的小城，可能是一处宫城，城内密密麻麻地分布着许多

建筑遗址，多是郑韩两国当年的宫殿遗迹。史书提到的郑国的周庙（周厉王庙）、大宫、西宫和北宫，大约就在这里。大宫是郑国的祖庙，西宫是朝会之所。主城的宫殿以北是贵族居住区，断崖上可以看到很多当时的房基、下水管道和水井。居住区以北，有烧陶窑址。

外廓城内主要是手工业、商业和一般市民居住区，有规模很大的冶铁遗址，曾掘出过鼓风管、炉渣、铁砂。冶铁场北面是玉器和骨器制造场，发现有锯过的骨器。手工业区的西边，是商业交易场所，外廓城内还有一座石仓城，是储存物资的大型仓库。

当年新郑有一些很有名的里、亭和街道，如南里、中分、逵市、羊肆、周氏之衢与大逵。据说大逵能并行九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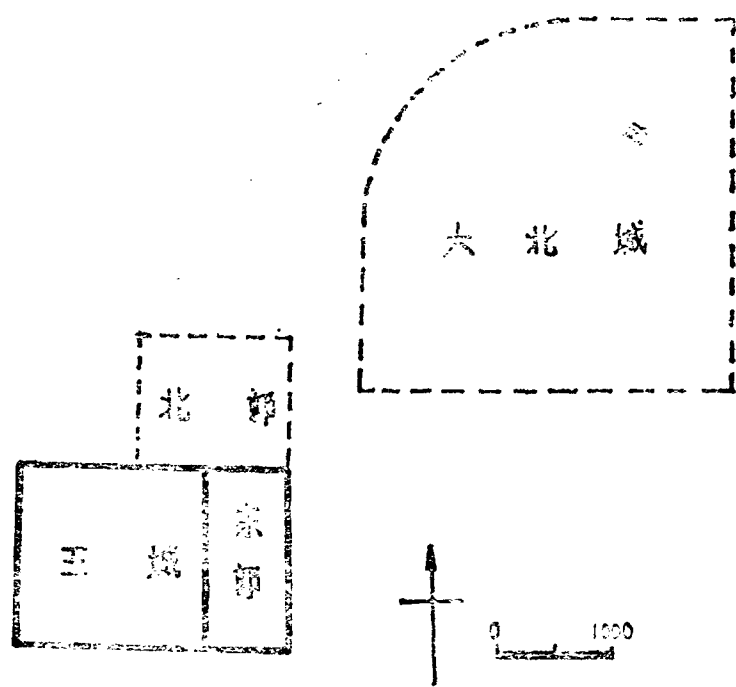
韩都当时城门很多，《左传》中提到的有闺门、时门、皇门、仓门、纯门、刳门、渠门、墓门、师子梁门和桔枳之门等。考古发现几处城门遗迹，有宫城的西门和北门，西城的北门和东门。

两千多年前的新郑，城高池深，门阙巍巍，街道纵横，官室林立，高车驷马，熙来攘往，也是一座繁华都会。

〔赵都——邯郸〕

赵原都晋阳（太原西南），公元前386年迁都邯郸，到公元前228年，秦将章邯毁城移民，赵都邯郸158年。遗址在今河北邯郸市西南约4公里的京广铁路西侧。

传古邯郸城东有甘山，山的尽头到城边。单意为尽，因名甘单市（曾出土一枚刀币，有铭文“甘单”，就是证明），加上表示城廓的邑（阝），就变成邯郸。邯郸城的形制特殊。赵王城南北长1475米，东西宽1387米。其东有廓城并列，廓城南北长



图十四 河北赵邯鄲城

475米，宽850米。赵王城和东郭城北边还有北郭城，南北长 $1\frac{1}{2}$ 550米，东西宽1275米—1508米。残存的夯土墙，有些地段高达3—8米。

故城以北，还有“大北城”，西垣南北长6100米。城中还有靠西垣的王郎城和另一小城。目前，对各个城之间的相互关系还未搞清。这样众多的城垣和复杂的布局，说明赵邯鄲当时是一座规模宏伟的城市。

赵王城内以龙台、南将台、北将台等大型宫殿建筑基址为中心，分布着十几个土台和夯土基础，这儿应是宫殿区。龙台在正中轴线上，应是正殿所在。一般认为，大北城是手工业作坊和商业、居民区。因在遗址内曾发现制骨制石作坊及冶铁、烧陶等遗址。

今邯鄲城（在大北城内）有一回车巷，传为蔺相如让廉颇而回车的地方。

〔魏都——大梁〕

魏国建都安邑，公元前364年（一说公元前339年），魏迁

都大梁（开封）。到公元前225年，秦王攻魏，引浚仪渠水灌大梁，大梁被毁。魏都开封141年。

大梁城地理条件优越：“地面平，诸侯四通辐辏，无名山大川之限。⁽²⁶⁾”这样的地理环境，对大梁的水陆交通提供了有利条件，同时也促进了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文献上说，魏之大梁，秦之咸阳，楚之郢，皆出入大贾小商之地。人口繁庶，到魏灭时尚存三十万人。城内除田宅外，无空地，人民车马往来，日夜不休。魏王的宫室中还有园囿池沼等豪华设施。

大梁城的冶铸、手工业也较为发达。大梁还是一个出人材的地方。李悝、范雎、商鞅、苏秦、张仪、信陵君、西门豹、孙臆、吴起、庞涓等大都是魏国人，都在大梁受过教育或活动过，然后出仕他国。

大梁城的东门叫夷门（因夷山而得名，即今铁塔一带）所以金代李汾诗云：“夷门自古帝王州。”

但总的说来，魏都大梁在当时是属于第二级的城市。比不上咸阳、洛阳、邯郸、临淄等城市的繁华。因为大梁是新兴城市，没有基础。条件虽好，但任何事情的发展，都需要有一个过程。

(1) 《戴震集》卷2，《明堂考》，上海古籍出版社，第29页。

(2) 殷璋璋《二里头文化探讨》，《考古》，1978年第1期。

石加《郑亳说商榷》，《考古》，1980年第3期。

(3) 邹衡《郑州商城即汤亳说》，《文物》，1978年第2期。

郑杰祥《商都汤亳说》，《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4期。

(4) 《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上海古籍出版社，第30页。

(5) 孔颖达《尚书正义引》。

- (6) 傅筑夫《中国经济史论丛》。
- (7) 《北京师大学报》，1982年第4期。
- (8) 《尚书·盘庚》上。
- (9) 《偃师商城的初步勘探和发掘》，中国社会科学院洛阳汉魏故城工作队，《考古》，1984年第6期。
《1983年秋季河南偃师商城发掘简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队，《考古》，1984年第10期。
- (10) 《史记·周本纪》，中华书局标点本，114页。
- (11) 《观堂集林》，卷3，《明堂庙寝考》。
- (12) 《考工记》，关中丛书本。
- (13) 《观堂集林》，卷12，《周蓍京考》。
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臣辰盃》。
- (14) 《史记·苏秦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2242页。
- (15) 班固《西都赋》，《文选》，22页。
- (16) 《左传》，昭公三十二年。
- (17) 《史记·鲁周公世家》，中华书局标点本，1522页。
- (18) 《公羊传》，宣公十六年疏引。
- (19) 《水经注·谷水》引。
- (20) 《新书·礼容语下》。
- (21) 《书·酒诰》正义引。
- (22) 《逸周书·作雒》。
- (23) 《史记·春申君列传》，中华书局版，第2398页。
- (24) 《越绝书·地传》卷8，四部备要本，第21页。
- (25) 《史记·苏秦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2257页。
- (26) 《史记·张仪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2285页。

第三章 发展时期的都城

(秦汉—隋唐)

第一节 发展时期都城的特点

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拆毁各国宫室，并在咸阳建设了庞大的秦都。但秦都毕竟还是战国时代秦国都城的继续延长，真正作为统一国家建设的第一个都城是西汉长安。从西汉开始，历经东汉、曹魏、西晋、北魏至隋唐，是中国都城急剧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都城的发展演变呈现以下的趋向和规律：

都城的平面形状，由近于正方形（西汉长安、南朝建康）演变为长方形，又由南北纵长方形（东汉雒阳、魏晋洛阳）演变为东西横长方形（北魏洛阳、隋唐长安）。

都城内的宫城，由多数演变为少数，由少数演变为单一的宫城。宫城的面积在都城总面积中所占的比例由大演变为小。宫城的位置由南部移向北部，宋开始又向南部移动，移动曲线呈马鞍形。

大小城的位置由战国时的两城相依，变为相套，小城（即宫城）置于大城中，宫城的位置，由都城的南部演变为北部。宫城的正门，由不明确而演变为明确地以南门为正门。

从都城的南面城门通至宫城南门的大街，由无发展到有，由短发展到长，终于发展成为全城的中轴线。

作为工商业区的“市”，其位置由在都城的北部演变为在宫城的南面。

作为居民区的许多“里”或“坊”，在都城所占面积的总和由小而发展到大，它们的区划和排列由不规整发展到规整。从曹魏邺城开始，里坊与宫阙有了明确分区。

当然，这些发展速度有缓有速，是逐步发展变革，逐渐趋向一定的布局规则。这些演变和发展，到宋、元、明、清时期，达到完全成熟的阶段⁽¹⁾。

第二节 秦都的逐步东移和横跨

渭水两岸的咸阳

秦之祖先，起源于戎狄，地当渭水上游，今甘肃南部天水一带。有周一代，秦国都城不断地由西向东迁移。王国维考证：

“有周一代，秦之都邑分三处，与宗周、春秋、战国三期相当。曰西垂、曰犬邱、曰秦，其地皆在陇坻以西，此宗周之世秦之本国也。曰汧渭之会，曰平阳、曰雍皆在汉右扶风境，此周室东迁，秦得岐西地后之都邑也。曰泾阳、曰栎阳、曰咸阳，皆在泾渭下游，此战国以后秦东略时之都邑也。”⁽²⁾”

这几个都城的具体地点，各家考证尚有分歧。今就其中比较确切或研究得较多的三个，介绍如下。

〔雍城〕

雍城是公元前677—前383秦国的都城。唐李吉甫说：“四面高曰雍，又四望不见四方，故谓之雍。”⁽³⁾”

秦雍城遗址在今渭河北岸的陕西凤翔县城南，后世称为南

古城。1962年，对秦雍城遗址进行了勘查和部分发掘。遗址东西长约4.5公里，南北宽约2公里，面积约11平方公里。出土以陶器为主，有盆、罐、缸、瓮、鬲、钵、豆、孟、绳纹水道（农民称“凤凰肠子”）、井圈、板瓦、筒瓦以及云纹、葵纹、“年官”和“械”等字样的瓦当，还有铜建筑构件，石磨、石犁、铜铤等生产工具。

雍城的地理位置重要，适当汧河流入渭河的交会点，即“汧渭之会”。又扼秦岭通巴蜀的交通要道，土壤肥沃，生产发达，开发较早。雍城又称雍隙，隙义孔道。唐代所发现的刻有文字的著名文物石鼓，即是雍城遗物。据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说，石鼓“在县南（今凤翔城）二十里许”，当即在秦的礼神中心三畴原所在。“石形如鼓，其数有十”，字体为秦籀（大篆），文体为诗，内容为记周宣王畋猎之事。这是存世最早的文字刻石。发明用石材刻字记事，借垂久远，是在甲骨和青铜两种材料之外的一大贡献，一直广泛应用到现在。

《史记·秦本纪》记载：“德公元年（公元前677年）初居大郑宫”，这是秦始都雍城。文献又记有穆公造“蕝年宫”，今南古城遗址出土有“年官”瓦当，当为省文。史载：“由余（戎狄使者）观秦，秦穆公示以宫室积聚。由余曰：‘使鬼为之，则劳精矣；使民为之，亦苦民矣。’”今凤翔城南豆腐村向西至断崖地，有夯土墙一段，有人认为即大郑宫宫墙遗址。从德公开始，直到秦朝灭亡（公元前207年）近五百年间，雍城始终居于特殊地位，秦人凡有大事都要到雍城告祀祖庙。如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商鞅修成咸阳宫，这时秦虽已迁都栎阳，但《史记·商君列传》却说是“秦自雍徙都之”，而不说是自栎阳徙都之。公元前238年，秦始皇年满

二十岁，他的加冕典礼，也要去雍城举行。雍城最繁华的时代是在穆公时代(公元前659—前621年)。是当时西北最有名的城市。其时秦霸西戎，盛极一时。今凤翔城南大冢相传是秦穆公墓，并有清毕沅所立碑，但“春秋不坟”，恐不确。今凤翔县南指挥一带，发现一秦公陵园，有“中”字、“甲”字墓多座。其中一号“中”字形墓，墓圻长60米，宽40米，墓道长300余米，为已发掘的全国第一大墓，估计为秦景公墓。雍城毁于何时，今尚不知。遗址内所出瓦片与陶水道，以汉代为多，可能直到汉代，雍城尚存在。

〔栎阳〕

栎(yùe)阳故城遗址位于今临潼县栎阳镇东的武家屯附近，在咸铜铁路阎良车站东南约十公里处，秦自公元前383—前350年，都此三十余年。

栎阳亦在渭河北岸。西临石川河，南近清河和渭河，土地肥沃，地势平坦。秦国雍城、栎阳、咸阳都在渭河北岸，这是应该注意的。当时渭河南北两岸各有一条东西交通大道，河北的一条更加重要，可以与当时农、工、商都很发达的晋国交通。秦都栎阳就是这条交通要道上的一个重要城市。“栎邑北却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现在当然仅为一普通农村。1962年，武家屯管庄村农民平整土地，发现一铜匣，内装八枚金饼，经考古学者研究，认为是秦都栎阳时的遗物。金饼上有字，名“鎰金”，为战国时的通货。

公元前五世纪前后，秦国由于奴隶主贵族势力膨胀，中央政权极度不稳，《史记·秦本纪》有“数易君”，“君臣乖乱”的记载。武公穆公以来秦人“饮马于河”的局面已不存在。公元前384年，具有非凡政治才能的秦献公、秦孝公先后

执掌政权。为了摆脱旧奴隶主贵族势力对政权的干扰和就近指挥对山东六国的战争，献公继位的第二年（公元前383年），就“城栎阳，徙都之”，励精图治，秦国又开始强大起来。秦孝公即位后，继续献公的事业。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宣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于是商鞅到了栎阳，开始变法。孝公前期一系列变法政令都是在栎阳发布的，栎阳在商鞅变法中起了重要的政治作用。

经初步考古探掘，栎阳故址发现三条街道（横二竖一）。街道两端均和城门相接，共六个城门。门洞路土宽6—8米左右，街道呈鱼脊形，宽11—17米，路两侧有明沟排水，沟宽半米左右。北城门西侧1.7米以下留存有城墙夯土。墙基长540米，宽2.7米。根据已探出的街道，城门和土墙墙基可以看出，该城南北2232米，东西1801米，总面积约4平方公里，呈南北长、东西窄的长方形。在城内靠近南墙的东西街道附近，瓦片堆积甚厚，出土有陶花砖、瓦当、金饼（镒）、铜釜、陶井圈等，这里可能是秦王族的居住区。在此区域附近，还发现铁铲、大量的铁渣和窑址，在南门外发现陶窑、红烧土等，这大概是朝廷的手工业区。

但从整个看，秦栎阳城范围小，城墙也窄，城内未发现巨大的夯土建筑遗址，反映了秦在战国初年商鞅变法前还较山东诸国落后的情况。而城内出土的大量铁渣、铁器以及花砖、各种纹饰的瓦当，又说明秦自献公至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迁都咸阳这个期间，已表现出急赶直追的劲头。

秦亡以后，项羽在鸿门宴后大封诸侯，司马欣被封为塞王，都栎阳。刘邦西都关中，初亦驻栎阳，至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长乐宫修成，才迁都长安。刘邦父亲死后亦葬栎

阳北原，名太上皇陵，并在栎阳城内置万年县守陵。因此，直到汉代，栎阳依然是一个有名的城市（曾修东渭桥以通栎阳）。

〔咸阳〕

《史记·秦本纪》说：“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作为咸阳，筑冀阙，秦徙都之。”^{〔4〕}

秦自公元前350年迁都咸阳，至公元前207年秦亡，都咸阳共144年，咸阳在秦国的历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咸阳位于渭水河畔，水陆交通便利，更有利秦国向东南的发展。秦迁都栎阳、咸阳，是新兴地主阶级夺取秦国政权后势力增强，并力图夺取全国政权的一个重要尝试。

秦孝公所以在秦国建都栎阳三十多年后迁都咸阳，是因为咸阳北依九峻山，南临渭河畔，是关中东西路水陆交通的枢纽，是理想的迁都地方。献公由雍迁栎阳，不是秦国最高统治集团没有认识到咸阳的重要性，而是秦国当时还比较弱小，建都咸阳易于遭受占据着河西之地的强大的魏国的突袭。公元前559年，晋败秦军后就曾追击秦军至泾水以西的棫林。献公改革内政，秦国复强，接连击败魏国。孝公继位后，任用大政治家商鞅变法，“内务耕稼，外劝战死”，秦国一跃而成为七国中最强大的国家。孝公八年（公元前354年），秦渡黄河围魏安邑，安邑被迫降秦。秦国已强大到能够保卫自己领土不受侵犯，建都咸阳的条件已经成熟。孝公迁都咸阳后，在长达一个半世纪里，咸阳成为当时最繁华的大都市之一。尤其是最后十余年，咸阳更跃升为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关于“咸阳”二字的来源，有多种说法。

今本《三辅黄图·三辅沿革》说：“咸阳在九峻山渭水

北，山水俱在南，故名咸阳。(5)”

这个说法显然有误。该书编者加按语说：“咸阳在九嵕山之南，渭水之北。山之南为阳，水之北为阳，故名咸阳。”

《汉书·地理志》王先谦补注引《三秦记》：“在九嵕山南，渭水北，山水俱阳，故名咸阳。”《元和郡县图志》说：

“山南曰阳，水北曰阳，县在北山之南，渭水之北，故曰咸阳。(6)”

这是比较传统的说法。

最近，又有人提出新的看法。根据秦都咸阳建筑范围和近年出土的陶文等材料分析，当时咸阳实跨渭水南北之地。认为“咸”即“咸亭”，“阳”即“阳里”，都是秦孝公时设置的乡里亭名，均在渭水之北。因此，秦时咸阳不特是“咸亭”、

“阳里”的简称，而是包有以咸阳城为中心的渭河两岸广阔的地域(7)。

但这种说法有两个问题无法解释：第一，既然咸阳是跨渭河南北两岸，则如取复合地名，应兼顾渭水南北各取一个地名复合而成，为什么仅仅用渭北的地名复合成首都的名称？

第二，咸阳地跨渭水南北，是秦人势力增强的结果。由栎阳初迁咸阳时，所修城垣、宫殿，如咸阳宫、冀阙等，皆在渭水之北。即使后来发展到跨渭之南北，主要部分仍在渭北。首都名称的确定，应在迁都前，或在迁都之初，当时的秦都决不可能“横跨渭水南北”。因此此说仍有值得商榷之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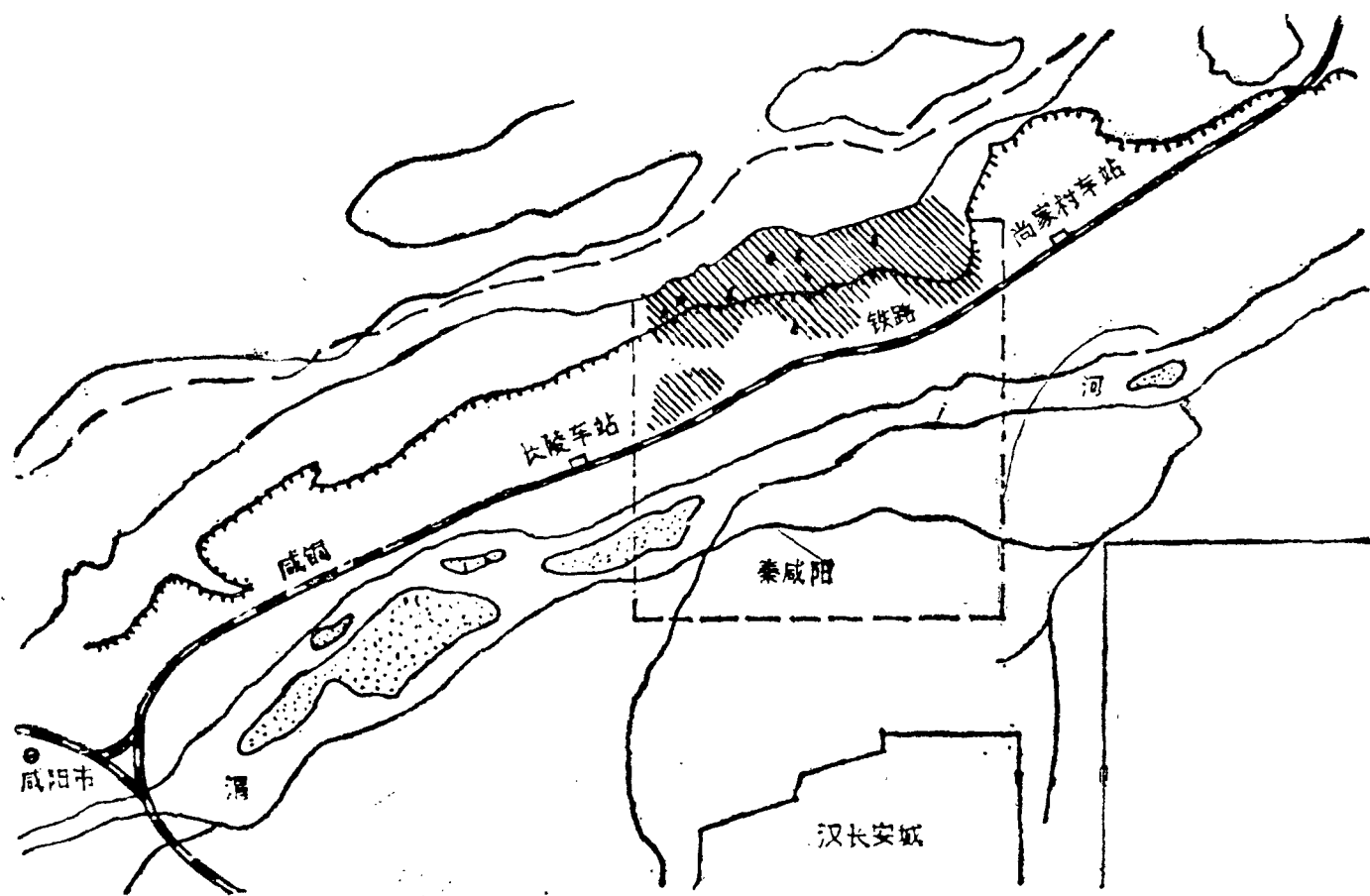
秦代一个半世纪的经营，使咸阳成为一个庞大的但又是松散的城市。整个城市范围相当大，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由一个中心城（咸阳宫所在的渭水北岸咸阳故城）为主，加上周围数百里范围内的许多离宫别苑组成的城市群。

“咸阳北至九峻、甘泉，南至鄂、杜，东至河，西至汧、渭之交，东西八百里，南北四百里，离宫别馆，相望联属。”⁽⁸⁾”

《长安志》卷一引古本《三辅黄图》说：“始皇表河以为秦东门，表汧以为秦西门。”

“咸阳其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⁹⁾”

这些记载，都是较晚的文献。当时文献没有留下比较系统可靠的记载。《史记·商君列传》说商君居（栎阳）三年，作为冀阙宫廷于咸阳”，可见咸阳宫廷是商鞅主修的。关于城的大小，《史记·白起列传》说白起“出咸阳西门十里”，被秦昭王迫死杜邮。这样看来，咸阳可能只有东、西、南、北四个门，而不是如《考工记》所说，每面三门，而与传统的都城制度不合。其原因，恐总的看来，迁都时秦依然比较弱小，后来



图十五 秦咸阳位置示意图

庞大的咸阳城市群是逐步建成的。

秦咸阳故城的范围约在今咸阳市窑庄乡毛王沟以东、红旗乡柏家嘴以西，高干渠以南，西安市草滩农场以北（即秦代渭河以北，由于河道北移，现已变为南岸），东西6公里，南北约7.5公里，遗址总面积达45平方公里。当然，这仅是一个推测的范围，并未发现城垣遗迹和可靠的文献记载。

据文献记载，秦咸阳城南临渭河⁽¹⁰⁾。但渭河由于种种原因，在两千多年中逐渐北移约四公里左右，这就把秦咸阳城南部约四公里宽的市区冲掉了。城址的大部分既已毁于渭水，关于秦都的城垣形制、城市布局以及与此相关的一些问题，就很难用可靠的考古资料加以复原了。

关于秦咸阳的人口数，目前得不出确切的数字。武伯纶先生估计有七、八十万人。根据是《秦始皇本纪》的一条记载：

“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武先生认为，十二万户每户五人，共六十万人。加上原有人口，总数近七十八万⁽¹¹⁾。

我们认为，这个数字恐有些问题。首先是一年之内，迁移十二万户富豪充实咸阳，以当时的交通运输条件来说，是有困难的。

其次，每户富豪五口人估计偏低。富豪一般每家不下十口人，甚至连奴隶、长工达数十口人。如以十口计算，则达一百多万人。但是，战国时，全国人口总数才约一千万人。经过历年战争，始皇在统一全国不久之时，人口不会成倍增长。所以估计咸阳人口在七十八万甚至百万以上，是估计过高。疑“十二万户”之数本身即有问题，可能是“十二万口”之误。

秦国一向好大喜功，崇尚宏伟壮丽。“秦每破诸侯，彻《史

记》作“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坂上。南临渭，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所得美人钟鼓以充之。⁽¹²⁾”

“始皇穷极奢侈，筑咸阳宫，因北陵营殿，端门四达，以则（仿）紫宫，象帝居。渭水（灌）贯都，以象天汉。横桥南渡，以法牵牛⁽¹³⁾。”

这两条记载告诉我们，秦始皇在关中平原修了无数的宫殿。这些宫殿，除了宏伟壮丽之外，在设计思想上处处体现“天命”，告诉人们，这是天子所居。这些宫殿，大体可以分为三组，即初期所建的渭北组，始皇时所筑的渭南组，以及“写放”的所谓六国宫室。今分别叙述如下：

渭北组 据文献所说，孝公迁都咸阳，首先“筑冀阙”。一般认为，阙是宫门两边的建筑物。“阙，观也。周置两观以表宫门，其上可居，登之可以远观，故谓之观。人臣将朝，至此则思其所阙。”这里，很可能是以阙名代宫名，冀阙就是冀阙宫。关于冀阙的文字记载寥若晨星。除前面提到的《秦本纪》、《商君列传》所记的几个字以外，别无记载。今本《三辅黄图》无论在宫殿和阙观部分都未将其列入。近年发掘的渭北咸阳宫遗址，也有人认为是冀阙遗址。

程大昌《雍录》释“冀阙”说：“孝公十一年，卫鞅围安邑，降之。十二年作冀阙。冀者，冀州也。安邑即冀州之邑也。冀之为州，尧舜禹皆尝都焉。今此孝公已得冀州作冀阙，其必仿古阙存者并立此名也。”程大昌这段考证，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到秦始皇时，又增筑咸阳宫。咸阳宫大概在昭王时（公元前306—前251年）即已开始修筑，《秦始皇本纪》载，秦始皇三十四年，始皇曾“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入前为

寿。”如前所说，咸阳宫修得象玉皇大帝的紫霄宫，引渭水横贯，象征天河，修横桥象征鹊桥。勘察资料表明，咸阳宫遗址分布于今咸铜铁路以北的二道原上，即400—420米等高线之间。西自毛王沟，东至柏家嘴，南北两公里，东西六公里。看来尽管渭河北移，宫殿区的主要部分并未被冲掉。在上述宫殿区的聂家沟与山家沟之间，宫殿遗址分布特多。牛羊沟西有五座相互联系的宫殿建筑遗址，其中的一号宫殿建筑遗址形似大冢，东西60米，南北45米，高6米，四周为陡坡。台面由西北向东南倾斜，经发掘，台基全为夯筑。夯台顶部是台基殿堂，台面及四周为宫室（居室及盥洗、沐浴用室）。台基下面的南、西、北三面有回廊及散水，俨然是一座战国以来盛行的高台建筑。它与其它四座大型建筑遗址错落分布在250米见方的范围内，构成一组可能以一号遗址为中心的建筑群。牛羊沟以东，赛家沟以西，与一号遗址对称，有一片70×50米的大型夯土遗址，其南部原的边上地下埋有大型圆形管道，当亦是宫殿遗址。往东，在纪家道原有一150米见方的方形宫殿建筑遗址。遗址中心偏北有一大夯土台，夯土厚达16米，台顶暴露有大石础。其南北又有许多宫殿遗址分布。纪家道以东，也有许多大型宫殿建筑遗址。总之，聂家沟至山家沟之间，在东西1500米，南北500米的范围内，原上原下，夯土遗址联层接片。原上有高大夯土台和大型建筑遗址，断崖暴露有地下水管道，地面上秦代砖瓦俯拾皆是，无疑是宫殿区的主体部分。考古发掘者认为，上述宫殿区的主体部分，当即咸阳宫。纪家道北，原上的大型方形宫殿，可能是咸阳宫的主殿。

渭北还有兰池宫。“始皇三十一年，为微行咸阳，与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盗兰池宫。”是说秦始皇微服出行，在兰池宫

附近碰到强盗了（汉亦存兰池宫，今出“兰池宫当”，当为汉代遗物）。

渭南组 渭南是秦的苑囿所在。宫殿主要有兴乐宫、信宫和未完成的阿房宫。

兴乐宫在阿房宫之东。今本《三辅黄图》说：“秦始皇造，汉修饰之，周回二十余里，汉太后常居之。”《史记正义》曾引《三辅旧事》云：“秦于渭南有兴乐宫，渭北有咸阳宫，秦昭王欲通二宫之间，造横桥长三百八十步。”今本《三辅黄图》所载与此稍异，说：“桥广六丈，南北二百八十步，六十八间，八百五十柱，三百一十二梁，桥之南堤，激立石柱。”可见咸阳宫、兴乐宫在秦昭王时均已有之，且于渭南渭北相对不悖。

秦始皇二十七年，作信宫于渭南。（今本《三辅黄图》说：“信宫，亦名咸阳宫”，误也。）“已而，更名信宫为极庙，象天极，自极庙道骊山，作甘泉前殿，筑甬道，自咸阳属之。”既用甬道连通骊山，则信宫于渭南无疑，不会是渭北的咸阳宫之别称。

阿房宫，又名阿城。秦惠文王时即已开始营造，宫未成而亡。秦始皇时，认为咸阳人口增加，先王宫廷狭小，说：“吾闻周文王都丰，武王都镐，丰镐之间，帝王之都也。乃营朝宫于渭南上林苑中”。阿房是朝宫的前殿，“阿房宫未成，成欲更择令名名之。作宫阿基旁，故天下谓之阿房宫。”阿房宫阿房以栏为梁，磁石为门，“东西五十步（疑有误，一作“百”或“千”），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建五丈旗。”整个建筑群，“规恢三百余里。离宫别馆，弥山跨谷，辇道相属，阁道通骊山八十余里。表南山之颠以为阙，络樊川以为池⁽¹⁴⁾。”当然，就中有些数据，众说纷纭，不可尽据。《关中胜迹图志》引《三辅旧

事》说：“阿房宫东西三里，南北五里，庭中可受十万人，车行酒，骑行炙，千人唱，万人和，其外有城名阿城，东西北三面有墙，南面无墙。”这个数据与《三辅黄图》差异较大。唐杜牧《阿房宫赋》中说阿房宫“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缦回，檐牙高啄，各扼地势，勾心斗角。”“规恢三百余里”、“覆压三百余里”之说，恐过分夸张。《雍录》说阿房宫“周五十余里，崇八尺。”程大昌考据，渭水至南山，宽仅百里许，东西鄂、杜至浐水，亦无百里，“安得覆盖三百余里也？”

总的说来，阿房宫设计的规模是很大的，但工程未就，并未居之。今阿房宫遗址在西安市西郊赵家堡和太古村之间，殿基夯土台址东西广五华里，南北长二华里。这样大面积的建筑夯土台基，确实世所少见，由此可见假若修成的话，阿房宫之宏伟壮丽，恐怕举世无双。

六国宫殿组 《史记·秦本纪》说：“秦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坂上。”而到了《三辅黄图》中则说是“彻其宫室”。前人已经考证，说“写放其宫室”，比较合理。说“彻其宫室”，恐无道理。因诸侯宫室，有的比较远，如燕如楚，地迂水逆，“岂可以彻移，使之入关也？⁽¹⁵⁾”

六国宫殿是战国末年开始修建的，在咸阳宫遗址以西今毛王沟一带的宫殿建筑遗址里，曾出土过云山纹瓦当，以东的柏家嘴一带，采集到有关东特点的瓦当。据此看来，六国宫殿可能分布在咸阳宫的两侧。宫殿分布情况说明，咸阳宫及六国宫殿，都在渭北高陵之上，地势高爽，加之多层楼阁高台建筑，登殿南望，平畴沃野尽入眼帘。不仅居高临下，便于控制全城，而且为宫殿区增加了山水色彩，使其显得更加壮观。但渭

北地面狭小，平地面积有限，为适应秦统一中国后的新形势，城市必然向渭南发展，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灭六国前，“诸庙及台苑，皆在渭南”，就是一例。

最后说一说秦的苑囿、礼制建筑等。这方面的记载较少，但一些零星记载，仍可看出秦苑囿很大。

《史记·滑稽列传》中说：“始皇尝议扩大苑囿，东至函谷关，西至雍、陈仓。优旃曰：‘善，多纵禽兽于其中，寇从东方来，令麋鹿触之定矣。’始皇以故辍止。”

再则，今本《三辅黄图》说：“汉上林苑，即秦之旧苑也。”

李善注《文选》曾引《三辅旧事》说：“秦始皇上林苑中，作离宫别观一百四十六所。”由此可见，上林苑在秦始皇时已经有之，非自汉始。

据一些文献记载，秦兽圈亦在咸阳附近上林苑中。

《太平御览》卷19、《太平寰宇记》卷25引《郡国志》说：“雍州虎圈，在通化门东二十五里。秦王置朱亥其中，亥瞋目，虎不敢动，汉文帝问上林尉处。”《长安志》等引《汉宫殿疏》：“秦故虎圈，周匝三十五步，去长安十五里。”（“周匝三十五步”之数，疑太小。）

秦咸阳的手工业和商业是很发达的。从陕西各地出土的各种秦器看，如铜器、兵器、货币、权量、诏版、陶器、砖瓦、水道等，一般都质量较高，表现为坚实、朴素、耐用。地下陶水道用细泥制作，非常坚固。上部为屋脊形，可以耐压，非常科学。临潼始皇陵出土的秦砖，质细量重，农民称灌铅砖。《吕氏春秋·孟冬季》中记载：“是月也，工师效功，陈祭器，无或作为淫巧，以荡上心。必功致为上，物勒工铭，以考其诚，

工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穷其情。”器物“物勒工铭”，后人认为始于秦，一直流传到现在。

早期手工业与市往往结合在一起。咸阳之市究竟有几个，尚不清楚。《史记·李斯传》中，李斯最后被“腰斩咸阳市”，似乎咸阳只有一个市场。

咸阳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统一国家的首都，是我国有名的古城。后世很久，还有人用它来代表首都。如杜甫诗《壮游》中说：“快活八九年，西归到咸阳。⁽¹⁶⁾”就是以“咸阳”指代首都长安。《吕氏春秋》一书，也是在咸阳写成的，给后世以很大的影响。吕不韦使其门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

项羽占领关中后，烧宫掘坟，大火三日不灭。今始皇陵、阿房宫、咸阳市等遗址，处处可见火烧的痕迹。中国历史上一座经营了一个半世纪的著名都城，就这样毁于一场大火之中。

第三节 鸿篇巨制的斗城长安

西汉王朝的首都长安，是我国封建社会初期最具代表性的都城之一，是当时全国第一大城市，在我国都城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该城虽是就咸阳渭南离宫改造扩建而成，但它决不是秦咸阳的简单继承。它创造性地巧妙地将诸多宫室与官署、市场、闾里等置于同一城中，布局上多所附会《周礼·考工记》的规则，如面朝后市、十二城门等等。因此，不能不说，汉长安的确是当时的鸿篇巨制。

据一些史籍记载，汉高祖刘邦于“汜水之阳”（今山东菏泽）即皇帝位之后，进入洛阳，曾欲长都于此。吕大防在《长

安图说》95卷中载：“高祖初定天下，悦卜洛之城，为天地之中，有周室遗风，将都之。”齐人娄敬于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远戍陇西，路过洛阳，通过齐虞将军求见高祖，力劝入都关中。娄敬认为，刘邦得天下“与周异”，因而不能都洛阳与周室“比隆”。周灭殷是“积德累善十有余世”，“诸侯自归之，国人争随之”，“至成王即位，周公相焉，乃营洛邑，以此为天下之中也。诸侯四方纳贡赋，道里均矣。有德则易以王，无德则易以亡。故周之盛时天下和恰，诸侯四夷莫不宾服，效其贡赋。及其衰也，天下莫朝，周不能制也。非唯其德薄也，形势弱也。⁽¹⁷⁾”而刘邦“起丰沛，卷蜀汉，定三秦，与项羽战荥阳、成皋之间，大战七十，小战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脑涂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胜数，哭泣之声未绝。伤痍者未起，而欲比隆成康之时，臣窃以为不侔也。⁽¹⁸⁾”娄敬并进一步指出关中的有利之处：“且夫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立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与人斗，不益其元，拊其背，未能全其胜也。今陛下案秦之故也，此亦楹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¹⁹⁾”

刘邦同群臣商量，群臣多“山东”人，都希望建都洛阳。理由是周王数百年，秦仅二世而亡。洛阳东有成皋，西有崤澠，背山面河，亦可依仗。刘邦又征求谋士张良的意见，张良说：

“洛阳虽有此固，其中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也。夫关中，左崤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东下，

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娄敬说是也。”⁽²⁰⁾

刘邦很高兴，赐娄敬刘姓，即日车驾入都关中，初驻秦旧都栎阳，不久移居长安城。前已说明，长安本是秦都咸阳的一部分。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才更咸阳名，称长安。

娄敬劝刘邦入都关中的慷慨陈词，尽管有其片面性，但他作为一个普通士兵，能有这样的远见卓识，确不一般。刘邦入都关中，决策是正确的，司马迁曾经指出：

“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²¹⁾

可见关中是当时全国最富庶的地区。刘邦定都关中，有坚实的经济基础。加之独有的地利，居四关之中，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对西汉王朝的发展和巩固，起了重大作用。

西汉长安城故址位于今西安城西北的龙首原上，距今西安城约8公里，民间有阳甲城、杨广城、杨家城等名（因隋初杨坚一度都此）。汉长安城位于龙首原的西北麓，后来的隋唐长安城位于龙首原的东南麓，主要宫殿都在龙首原高地上，城区渐次向两侧展开。汉长安宫殿主要在城南，而唐长安的宫殿已移到城北。两种布局，都使宫殿置于全城的最高点上，造成建瓴之势。

汉长安的兴建，大概可以分为三个时期。汉定都之前，长安仅是秦咸阳的一个乡聚名称。秦始皇之弟成蟜曾被封为长安君。秦在这儿建有章台和兴乐宫等离宫别苑。刘邦灭秦后出外东征，由萧何留守关中，并负责营建都城长安，刘邦东征回来，萧何已把秦章台改建成未央宫，兴乐宫改成长乐宫，两宫均前殿高耸，壮丽非凡，刘邦一见勃然大怒，责备说：

“天下匈匈，苦战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²²⁾

萧何答复说：“夫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²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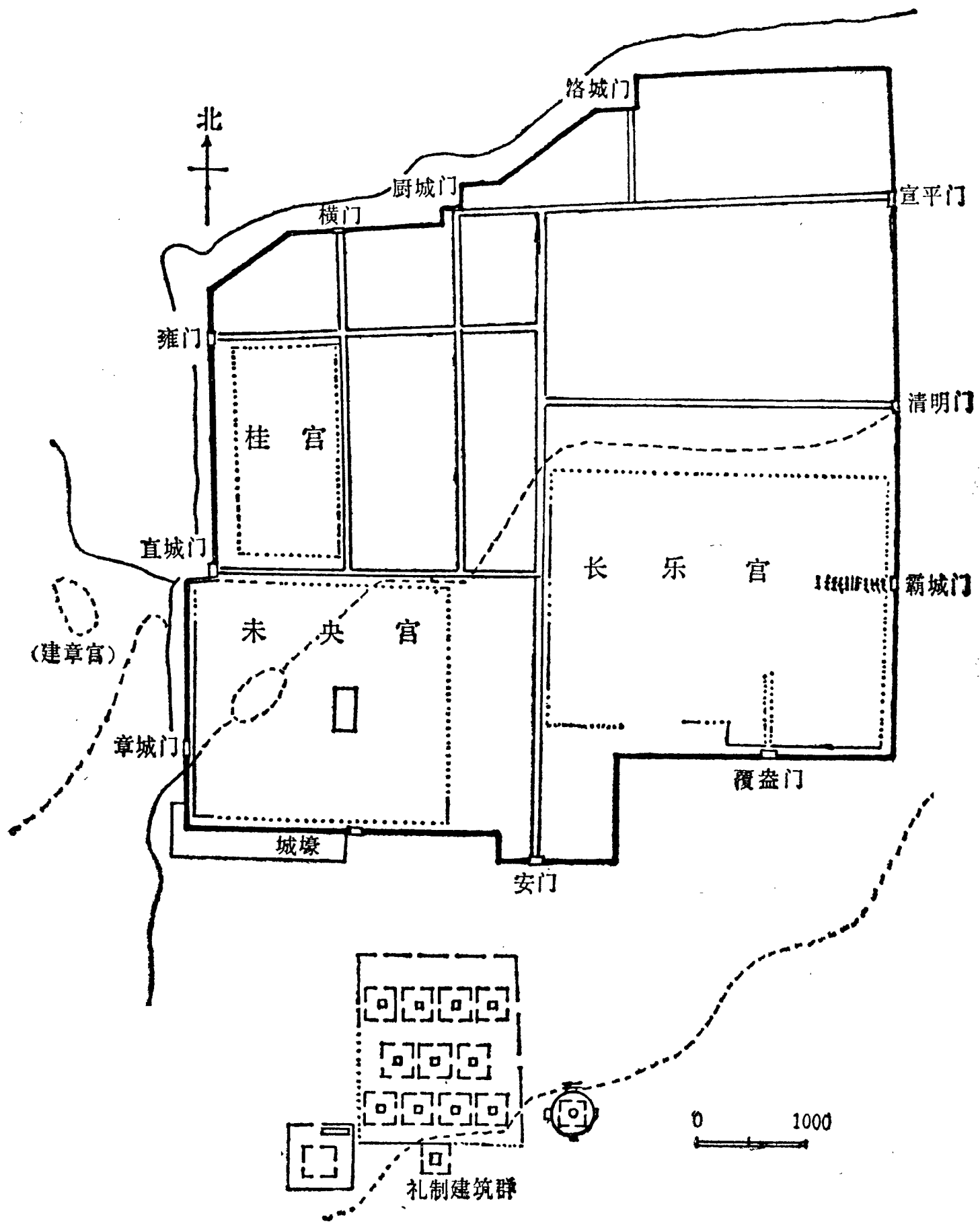
长乐、未央之辉煌壮丽今日虽不得复见，但两千多年后的今天，未央宫前殿遗址依然高耸地面十余米，占地甚广，南北长约340米，东西宽约150米，可见当时的宏伟规模。

汉长安城垣是在汉惠帝时才修筑的，这是汉长安的第二次大规模扩建。从惠帝元年至五年（公元前194—190年），分五次修成。其中两次大筑。《三辅黄图》一书对这两次修筑记载较详：

（惠帝）“三年春，发长安六百里内男女十四万六千人，三十日罢。城高三丈五尺，下阔一丈五尺，六月发徒隶二万人常役。”

“至五年，复发十四万五千人，三十日乃罢。九月城成，高三丈五尺，下阔一丈五尺，上阔九尺，雉高三坂，周回六十五里。城南为南斗形，北为北斗形，至今人呼汉京城为斗城是也。”⁽²⁴⁾

汉长安城垣遗址保存仍较完整。除西垣、北垣大部夷为平地，其余部分，特别是东垣部分，仍保留较好。霸城门附近，现尚有一丈多高的夯土墙。整个城垣除东垣为直线外，其余三面均曲折不齐。究其原因，南垣曲折是因为筑城垣时长乐、未央两宫均已建成，加之正门——安门规模宏大，向外突出，致使南垣形似南斗；西垣、北垣受渭水制约，只好向东北方向曲折而行，故形似北斗。都不是故意筑成斗形。据考古实测，以四个城角之间的经距和纬距计算，东垣长5940米，南垣长6250米，西垣长4550米，北垣长5950米，总长22.69公里。若以城垣曲折的实际走向计算，则长25.1公里，合汉代60里强，与上述



图十六 汉长安平面图

记载65里及《长安志》引《汉旧仪》“城方63里”的记载相近。但今存城垣下宽达16米，合汉制近7丈，由此可见，《三辅黄图》关于城高及上宽的记载未必可靠。城为夯土版筑，取龙首原土而成，土赤如火。二千年后，夯土仍坚硬如金石。

汉都长安的第三次大规模扩建是在汉武帝时期。至武帝时，汉朝国力雄厚，民殷国富，于是汉武帝大肆营建，扩建的离宫别馆以旧城以西的建章宫为最大。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柏梁台发生大火，有人对武帝说：

“粤俗，有火灾即复起大屋以压之。⁽²⁵⁾”武帝依仗国势强盛，借题发挥，大兴土木修筑建章宫，号称“千门万户”。建章宫位于未央宫西的都城城垣之外，与未央宫有“周阁复道”相连。除建章宫外，武帝又在城内未央宫北建桂宫和北宫，在长乐宫北建明光宫。又扩大上林苑，使西至周至，东抵宜春，南达终南山，纵广达数十上百公里。

据《三辅黄图》引《汉旧仪》文：

“长安城中，经纬各长三十二里十八步，地九百七十三顷（今测面积35平方公里），八街九陌，三宫九府。三庙十二门。九市，十六桥。⁽²⁶⁾”城内土为黑壤。宜栽槐树和榆树，松柏也很茂盛。

汉长安城的都市规划和布局，已同战国时代有很大不同，它改变了战国城市两城相依的旧章，而将宫殿、府寺、市场、居民区置于同一个大城之中。相对来说，城市居民的地位已有了提高。

汉长安的城门，严格遵守《周礼·考工记》十二城门之制，张衡在《西京赋》中说：“观其城廓之制，则旁开三门，参涂夷庭（三途一庭），方轨十二，街衢相经。⁽²⁷⁾”这就是说，每边三个城门，对着城门有三条道路，城上有城门楼（一庭），街道纵横相错。

南垣正中称安门，又称鼎路门，是汉长安城的南向正门。王莽时改称光礼门显乐亭。该门规模很大，稍向城垣外突出，

致使南垣中部曲折，形似南斗。安门西有西安门，东有覆盎门。西安门又称平门，王莽时改称信平门诚正亭。此门北向正对未央宫南门——端门。覆盎门又称杜门，王莽时改称永清门长茂亭。

东垣由南向北依次为霸城门、清明门、宣平门。霸城门因门色青，又称青城门、青门、青绮门，王莽天凤三年（公元16年）被焚毁。恢复后更名仁寿门无疆亭。青城门外的“东陵瓜”很为有名。今本《三辅黄图》载，“广陵人邵平，为秦东陵侯。秦破为布衣，种瓜青门外，瓜美，故时人“谓之东陵瓜”⁽²⁸⁾。清明门又称藉田门（因门内有藉田仓）、凯门、东城门。王莽时更名宣德门布恩亭。宣平门王莽时更名春王门正月亭，今人称青门坊。今本《三辅黄图》说宣平门又称东都门，但《汉书·元帝本纪》如淳注引古本《三辅黄图》云：“长安城东面北头门，号曰宣平城门，其外廓曰东都门也。”古本《三辅黄图》应较为可信，据此，东都门应是宣平门的外廓门名，而非宣平门的别名。

西垣由南向北依次为章城门、直城门、雍门。章城门又名章门、光华门，王莽时更名万秋门亿年亭。西北大学陈直先生旧藏有“章门观监”封泥，可见章城门内外有宫观。“监”是管理门观的官吏。直城门本名直门，门上有铜龙，故又称龙楼门，王莽时更名直道门端路亭。雍门本名西城门，又名光门，民间称函里门，王莽时更名章义门著义亭。

北垣由东向西为洛城门、厨城门、横门。洛城门又称高门、朝门、鹳雀台门。门外有鹳雀台，汉武帝制承露盘于其台上，王莽时更名进和门临水亭。厨城门内有长安厨，因以名门，王莽时更名建子门更世亭。《封泥考略》卷1收有“建子

门校尉”封泥，可能是王莽时物。横门又称横城门、便门，因门外有横桥，王莽时更名朔都门左幽亭。

汉城门皆有侯，主按时启闭城门。《三辅决录》：“十二门三涂洞辟，隐以金椎，周以林木。左出右入，为往来之径；行者升降，有上下之别。”

十二城门的确切位置，已由考古勘探查明。其中，宣平门、霸城门、西安门、直城门进行过正式发掘。因工商业区和居民区位于城北，所以北垣三门及东西垣北端的城门，是一般的出入要道。尤其东垣北端的宣平门，直通关东，文献记载中提到很多。

《汉书·疏广传》：

疏广“上疏乞骸……皆许之。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设祖道，供帐东都门外，送者车数百辆。”

《后汉书·逢萌传》：

萌谓人曰：“……不去祸将及人，即解冠挂东都城门（宣平门外廓门）。”

特别是从东面进军长安城，往往攻宣平门而入。如《汉书·昌邑哀王传》：

“贺（昌邑王）到霸上，大鸿胪郊迎……且至广明东都门。”“十月戊申朔，兵从宣平门入。”

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工作的结果，都证明宣平门和其它三个已经发掘的城门不一样。霸城门、西安门、直城门在东汉以后或是完全废弃，或是只清理一、二个门道继续使用。而宣平门道全部清理修整后继续使用。这说明东汉以后，宣平门仍是出入长安城的主要通道，而城内南部的宫殿、官署区则已很少人烟了。考古发掘发现宣平门经过两次修补。第一次修补是

在东汉或魏晋时。在王莽末年或是稍后的战争时期中，宣平门被焚毁。门道两壁被烧得发赤，并且有所崩塌。在晚期的土层中，发现了一些西汉和王莽时期的铜钱，以王莽时的货币和货泉为多。这些迹象正好说明了宣平门被焚毁的年代。第一次修补是在王莽末年被烧得发赤的旧壁上另用细密、坚实的夯土改作新壁。从地层关系上看，修补的时间应在王莽末年赤眉军进军长安城以后，在五胡十六国时代以前，即东汉或魏晋间。《后汉书·董卓传》：“王允奉天子保宣平城门楼上。”《三国志·董卓传》：“司徒王允挟天子上宣平城门避兵。”这两处记载，说明在东汉末年汉献帝迁长安时宣平门仍是一个筑有门楼的完整的城门。

宣平门的第二次改建是在后赵石虎时。《晋书·石季龙传》载：“以石苞代镇长安，发雍、洛、秦、并州十六万人城长安未央宫。”这说明后赵曾大规模地改建长安城。今中门道的两壁，发现用砖补筑的新壁，又将东汉时补筑的新壁压在其中。这些砖，大小厚薄不等，其中不少印有“石安田”、“石安曹平”、“石安王符”、“石安王承”等字样。石安是地名，为后赵咸阳郡所属县，余皆造砖人姓名。宣平门的外廓门——东都门在五胡十六国的北朝时期称青门，故今宣平门遗址附近几个村庄叫作青门口、青门口东村和青门口西村。

长安各门一门三洞，连接城内一街三道，每道宽8米。即《三辅决录》所谓“三涂洞辟”。门道之间夯土隔开。宣平门和直城门的夯土隔墙宽约4米多。霸城门和西安门两座城门正对着长乐宫和未央宫，夯土隔墙宽达14米，说明整个城门建筑更雄伟。门道两侧有圆石柱础和立木柱的凹槽，即所谓：“隐以金椎，周以林木”。由此可见，城门之上为过梁式的城门

楼。王莽时更改各城门名称，一律称“××门××亭”，这儿的“亭”，无疑即城门楼。宣平门门道中发现置门扉的砧石，臼窝中有铁锈的痕迹，可见门扉的转轴是铁制的。门道前端正中有半截埋入土中的“挡门石”，据此可以断定，两扉门是向内开启的。

霸城门门道的地面上，发掘到当时的车轨痕迹，宽1.5米。门道宽8米，除掉两边木柱，则正好每道可容四车通过，三洞正好可容十二辆车通过，即张衡在《西京赋》中所说：“方轨十二”，同考古发掘所见一致。

文献记载长安城八街九陌（纵称街，横称陌）。今遗址内纵横街道均已探出。紧靠城墙，有内环道一周。这是先秦以来，都城建设中的一项传统。探出的街道，除掉从城门专通长乐、未央宫的短街外，其余街道，如把纵横每逢相交处分割计算，共有纵街8条，横街10条，比文献记载多了一“陌”，如横街中有两段是以一陌计算，则正好八街九陌。

据《汉书》、《太平御览》、《长安志》等书中的零星记载，汉长安已见街名有香室街、夕阴街、尚冠前街、华阳街、章台街、薰街、太常街、城门街。我们认为，这八条街名，不见得都是纵街之名。横街通称为陌，但具体到街名时，也许仍称××街。不可能八条纵街名全部流传下来，而横街之名一条未见。汉长安城门和街道的制度，附会了《周礼·考工记》，也为后来的洛阳城所承袭。《太平御览》卷195引陆机《洛阳记》：

“城门及宫中大道皆分作三，中央御道，两边筑土墙高四尺余……唯公卿尚书章服从中道，凡行人皆行左右。”

根据这一记载，可知洛阳的大街也是三途并列，与汉长安

城相同，中央的一条称御道或中道，即相当于长安城的“驰道”。长安城的驰道特宽。如安门内驰道宽20米，两旁之道宽只有13米，驰道为皇帝专用，当时制度，包括太子在内，均不得在驰道上通行。《汉书·成帝本纪》中记载，成帝刘骜为太子时，元帝刘奭急召入宫，却不敢横绝驰道：

“帝为太子，初居桂宫。上尝急召，太子出龙楼门（可能是桂宫南门，一说是直城门别名），不敢绝驰道。西至直城门，得绝，乃度，还入作室门（未央宫北面别门）。”

与洛阳不同的是，汉长安大街之间不是筑土墙，而是用沟洫分隔，兼有排水作用。城内并经常出土有五角形或圆形陶管道，这说明汉长安有全城性的排水系统。在覆盎门旁边的城垣底部，还保存着嵌在城垣夯土内的向外倾斜的陶管道：中间是五角形的陶管道，两边各接一个圆形陶管道。如果排泄大量积水，这种管道仍嫌太小。在西安门路面底下发掘出来的砖券涵道，比较高，泄水量大得多。城垣外边，四周有城壕，即护城河，今仍可见遗迹，当时称官渠，又称御沟、王渠。《三辅黄图》称，护城河“广三丈，深二丈。”城内排出的水，可通过它注入渭河等。东汉班固《西都赋》所说：“呀周池而成渊”，就是指的长安城护城河。

汉长安城的宫殿区约占全城面积的大半（仅长乐、未央两宫即占全城面积的一半）。再加上武库、宗庙、官署、太仓等，则皇室、官府用地所占比例更大。

据古代文献和汉宫遗迹考察，汉代“宫”的概念是大宫中套有若干小宫，而小宫在大宫之中自成一区，自立门户。

长乐宫位长安城内的东南部，本为秦的兴乐宫，高祖七年徙居之。考古探明宫垣东西2900米，南北2400米。因位于未央

宫之东，故又称东宫。汉初许多有声有色的历史事件都是围绕长乐宫进行的。如吕后杀韩信，周勃安刘杀诸吕等，刘邦以后，惠帝移居未央宫。此后，太后居东宫成为我国封建社会的惯例。宋敏求《长安志》引《关中记》文：“长乐宫，本秦之兴乐宫也。周二十余里，有殿十四，汉太后常居之”。王莽时，改长乐宫为常乐室。

长乐宫遗址大半已湮灭，据今本《三辅黄图》，长乐宫“前殿东西四十九丈七尺，两杼中三十五丈，深十二丈。”

“长乐宫有鸿台，有临华殿。高帝居此宫，后太后常居之，孝惠至平帝，皆居未央宫。”

鸿台为秦始皇二十七年（公元前220年）所筑，“高四十丈”，上建“观宇”。秦始皇曾经在台上射飞鸿，所以称鸿台。汉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失火烧毁。临华殿为汉武帝所建，在长乐宫前殿之后。长信宫，汉太后常居之所。《通灵记》说：“太后，成帝母也。后宫在西，秋之象也。秋主信，故殿皆以长信、长秋为名。”毕沅在《释名补遗》中云：“秋者，阳之始；长者，欲其久也。”

未央宫一名紫微宫，王莽改寿成室。考古探明宫垣东西长2300米，南北长2000米。本为秦章台旧址，萧何主持修筑，汉初为大朝之地。今前殿遗址高出地面十余米，可见战国时流行的高台建筑，西汉时仍十分盛行。

《西京杂记》记载：

“未央宫周匝二十二里九十五步，街道周四十七里，台殿四十三所，其三十二所在外，十一所在后宫，池十三，山六。池一山二亦在后宫，门阙凡九十五。”

《长安志》引《关中记》：

“未央宫周旋三十一里，街道十七里，有台三十二，池十二，土山四，宫殿门八十一，掖门十四。”

《三辅黄图》又说：“未央宫周围二十八里”，三书所载皆不相同。据考古探测所得数据，未央宫垣周长8600米，合汉里24里多，与《西京杂记》所记较近。

“萧何营作未央宫，立东阙、北阙。⁽²⁹⁾”《史记正义》引颜师古的说法：“未央殿虽南向，而上书奏事谒见之徒皆诣北阙，公车司马亦在此焉。是则以北阙为正门。而又有东阙，至于西、南两面，无门阙矣。”

就是说，萧何初建未央宫，只有东、北两门，而无西、南门。究其原因，“无西、南二阙者，盖萧何以压胜之法故不立也。……秦家旧处皆在渭北，而立东阙、北阙，盖取其便也。”萧何就秦章台旧址改建未央宫时，外无都城环包，西无建章宫，无西、南二阙是合乎情理的。待惠帝筑长安城垣，立西安门，正对未央前殿，其时恐已有未央南门（称端门）。建章宫建成后，可能又开了西门。

未央宫的东门、南门，有过各种名称。《史记索隐》称：

“东阙名苍龙，北阙名玄武。”《汉书·孙宏传》如淳注说：

“武帝时，相马者东门京作铜马法献之，立马于鲁班门外，更名鲁班门为金马门”。可见武帝之前，北门的正式名称是“鲁班门”。又因北门设有公车司马，专管接受奏章，又称公车门。今本《三辅黄图》说：“汉未央、长乐、甘泉宫，四面皆有公车”。这应是后来之事。因甘泉宫是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所建，此时长乐、未央等宫已立近百年。《三辅黄图》解释司马门说：“司马门，凡言司马者，宫垣之内，兵卫

所在，司马主武事，故谓宫之外门为司马门。”《汉书·成帝本纪》：“永始四年（公元前13年）夏四月癸未，长乐宫临华殿，未央宫东司马门皆灾（失火）。”此时则已又过近百年。

未央宫的主体建筑是前殿，又称路寝，王莽时改称王路堂。今本《三辅黄图》说：“前殿东西五十丈，深十五丈，高三十五丈（疑为三丈五尺）。”

未央宫建成后，刘邦曾置酒未央前殿，大宴群臣。《史记·高祖本纪》中说：“未央宫成，高祖大朝诸侯群臣，置酒未央前殿。高祖奉玉卮，起为太上皇寿。曰，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殿上群臣皆呼万岁，大笑为乐。”此时刘邦是何等得意忘形，踌躇满志。

未央宫的建筑壮丽辉煌。张衡在《西京赋》中有过生动的描绘：“疏龙首以抗殿，状巍峨以岌业，亘雄虹之长梁，结棼撩以相结。蒂倒茄于藻井，披红葩之狎猎。……雕楹玉碣，绣栴云楣，三阶重轩，鏤檻文櫳。右平左城，青琐丹墀。”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未央宫前殿是建在龙首原上，疏山而为台殿，壮丽巍峨。长长的栋椽、长梁都画以五彩。藻井中央挂着多节的象倒茄形的装饰，柱础是玉石的，门梁、门楣、斗拱画着云气，犹如绣成的一样。三层台阶，雕鏤的轩宇门檻，栴次鳞比。台阶左有阶齿（便于人行），右则平斜而上（便于车行）。门户青彩，内为丹漆地面。当然，“赋”本身带有夸张的成份，不可尽信。如所谓玉石柱础，就今所见遗物，只不过是白色圆卵石稍经加工，将平整的一面向上以立柱而已。此类柱础石，未央宫内发现不少。近年发掘的椒房殿（前殿稍北）遗

址，许多柱础石还在墙基中原来的位置上，丝毫未加移动。

未央前殿的正室，称宣室殿。“宣室”之名，起于周代。《淮南子》说：“周武王杀纣于宣室”，汉承其名。《汉书·贾谊传》苏林注：“宣室，未央前正室也。”又《汉书·刑法志》如淳注：“宣室，布政教之室也。”

此外，未央宫有温室殿，冬居之所。清凉殿，夏居之所。温室殿“以椒涂壁，被之文绣，香桂为柱，设火齐屏风，鸿羽帐，规定以麝宾鬻馐。”清凉殿又称延清室，设备也很考究，说是四壁“中夏含霜”。室内以“画石为床，文如锦，紫琉璃帐，以紫玉为盘，如屈龙；皆用杂宝饰之⁽³¹⁾”董偃常卧于清凉殿，服侍者用扇扇之。董说，玉石何须扇了才凉快？又用玉晶为盘，贮冰于漆前。服侍者说，冰融了会湿了席子，董手一拂而使冰、玉俱碎。玉晶，是很贵重的东西，据说是干涂国的贡品。近年发掘的椒房殿，据载亦是“以椒和泥涂，取其温而芬芳也。”《太平御览》卷185引《汉官仪》文：“皇后称椒房，以椒涂室，主温暖除恶气也。”

未央宫凌室，专为贮冰之所。“大祭祀饮食则供冰。”周官凌人，职掌藏冰。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曾有凌室与织室一齐失火之事。

未央宫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著作和藏书之所。《三辅黄图》说：“未央宫有承明殿，著作之所也。”班固《西都赋》中说：“又有承明、金马，著作之庭。大雅宏达，于兹为群，元元本本，殫见洽文，启发篇章，校理秘文，⁽³²⁾”

石渠阁是藏书之所，在未央宫北，以藏秘书。《三辅故事》说是藏萧何所得秦世图籍。因磬石为渠以导水，故名石渠阁。宣帝甘露年间，五经诸儒曾“杂论于石渠阁。⁽³³⁾”另外，

还有天禄阁和麒麟阁。

天禄阁在未央大殿之北（天禄为异兽之名）。扬雄曾在此校书。

麒麟阁，因武帝猎获麒麟而作此阁，为藏书之地。宣帝时，把霍光等十一功臣画像挂于麒麟阁，以其地“清贵可尚而章（彰）显功臣于此也”。未央宫还有麒麟殿，《雍录》引古本《三辅黄图》说：“未央宫有麒麟殿，藏秘书，即扬雄校书处。”司马迁就是利用这些藏书写成《史记》一书，开我国纪传体史书之滥觞。刘向也在这里写成我国第一部目录学著作《七略》。

武帝时，修了著名的柏梁台。武帝元鼎二年（公元前15年）春建。铸铜为柱，香柏为梁，香闻十里。台上有铜凤，名凤阙。武帝曾置酒其上，诏群臣和诗，能做七言的才能上台。“七言者，诗也。句各七言，句末皆谐声，仍各述所职，如丞相曰：总领天下实难哉，大司农则曰：陈粟万石扬其箕，它皆类此，后世诗体，句为一韵者自此而始，名柏梁体。”⁽³⁴⁾

此外，未央宫殿阁台等见于文献的还有金华、武台、钩弋、寿成、万岁、广明、永延、玉堂、寿安、平就、宣德、东明、飞雨、通光、曲台、白虎、延年、丘明、长年、昆德、高门等宫殿。

未央宫有沧池（今前殿遗址西一低地传即沧池遗址），中有渐台，高十丈（亦说三十丈，均汉制），王莽死于此。《三辅黄图》说，“言池水苍色，故曰沧池。”

西汉末王莽之时，未央宫毁于战火。更始帝刘玄到长安时只好住在长乐宫。后赵石虎曾征召梁、雍等地十六万人修复长安，“城长安未央宫”，布政于此。隋文帝都大兴前，曾居未

央，并修“未央池”（即汉沧池）。唐时未央宫包入内苑。唐太宗李世民于贞观七年（公元623年），与太上皇李渊置酒故汉未央宫。李世民“奉觞上寿”说：“昔高祖亦从太上皇置酒此宫，妄自矜大，臣所不取也。”至唐敬宗宝历二年（公元826年）修未央宫，掘地得白玉床，“长六尺”。唐武宗会昌元年（公元841年），因游猎“至未央宫见其遗址，诏葺之，总三百四十九间，作正殿曰通光，其东曰韶芳亭，西曰凝思亭，立端门，其内门揭，未央宫名”⁽³⁶⁾。可见至唐初未央宫仍存，而中唐武宗时，已只剩“遗址”，修葺后殿、亭均已易名。至此未央宫已达千年之久。

建章宫为汉武帝时所建。“帝于未央宫营造日广，以城中为小，乃于宫西跨城池作飞阁，通建章宫，构辇道以上下”⁽³⁶⁾。据《三辅旧事》载，“建章宫周回三十里”。今遗址在西安三桥高堡子村一带。正门称阊阖门（意即天门），东门有别风阙，北门有凤凰阙，均高二十五丈（汉制）。“古歌云，‘长安城西有双阙，上有双铜雀，一鸣五谷生，再鸣五谷熟。’⁽³⁷⁾”这儿铜雀，即凤凰阙铜凤凰，长安民间称凤凰阙为贞女楼。

建章宫有骀荡、馭婆、枵诣、天梁、奇室、鼓簧等宫。又有玉堂、神明、疏圃、鸣銮、奇华、铜柱、函德等二十六殿，还有太液池、唐中池等。

建章宫南部的玉堂，台高三十丈（汉制），内殿十二门。璧门三层，因椽首饰以薄薄的璧玉，阶陛以玉为之。屋顶铜凤高五尺（汉制），表施黄金，下有转枢，向风若翔。

建章宫神明台，有汉武帝铸的仙人承露盘，承接露水。据说，露水和以玉屑服之，能长生不老。魏文帝曹丕搬移时，铜

人折，声闻数十里。

建章宫有太液池，遗址今称太液池苗圃。面积十顷（汉制）。太液的意思，“言其津阔所及广也”。今本《三辅黄图》引《关辅记》说太液池：“以象北海，刻石为鲸鱼，长三丈⁽³⁸⁾。中有三山，以象瀛洲、蓬莱、方丈。还有龙及奇禽异兽之类。

汉成帝常与赵飞燕嬉戏于太液池，以沙棠木为舟，以云母饰于鹢首，称云舟。又刻大桐木为虬龙，雕饰如真，夹云舟而行。恐船荡惊吓飞燕，成帝叫人用金锁缆住云舟，用翠缨结飞燕之裾。今本《三辅黄图》说：“今太液池尚有避风台，即飞燕结裾之处。”

太液池南有唐中池，周回二十里（汉制）。班固《西都赋》中说：“前唐中而后太液，览沧海之汤⁽³⁹⁾”。王莽时，建章宫遭到彻底破坏。“坏城西苑中建章十余所，取其材为九庙。⁽⁴⁰⁾”

桂宫、北宫、明光宫亦为汉武帝时所建。桂宫遗址经考古探测，南北约1800米，东西约880米，位于未央宫北，紧靠西城垣。北宫当在桂宫之东，明光宫当在长乐宫北，但遗址范围尚未探清。桂宫“中有明光殿，皆金玉珠玑为帘箔，处处明月珠”。“武帝为七宝床，杂宝案，厕宝屏风，列宝帐，设于桂宫；时人谓四宝宫。⁽⁴¹⁾”北宫在高祖时“制度草创”，武帝时“增修之”。“中有前殿、广五十步，珠帘玉户如桂宫”。惠帝张皇后，成帝赵皇后，均曾废居北宫；哀帝傅皇后，曾退居桂宫。明光宫为武帝求仙所建，“发燕赵美女二千人充之。率取二十以下十五以上，年满三十者出嫁之。”

汉宫中称为“禁中”，是说门阁有禁，非侍卫通籍之臣，

不得妄入。汉元帝避岳父名讳，改曰省中。“汉畿内千里，并京兆治之，内外宫馆一百四十五所。”“秦离宫三百，汉武帝往往修治之⁽⁴²⁾。”除以上所言六宫外，如甘泉宫、日华宫、曜华宫、池阳宫，均在汉都之外。班固《西都赋》说汉宫“前乘秦岭，后越九峻，东薄河华，西涉岐雍，宫馆所历，百有余区⁽⁴³⁾。”这就是说，自秦岭至九峻山，自黄河至岐山、雍城（今凤翔），汉代离宫有一百四十五所，还修治了部分秦代的离宫，可见其宫殿林立，绝不亚于有秦一代。

在长乐宫和未央宫之间，还有收藏兵器的武库（传为秦樗里子墓处），为萧何所造，吕后改称灵金藏，惠帝继位改灵金内府。遗址今已发现，总平面呈长方形，筑有围墙，周长2公里，分东西两院。内有七座建筑遗址。第七号建筑遗址有一段墙保存较好，尚有三四米高。从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王莽时期的货币，如大泉五十、货布、货泉等，说明武库是在王莽末年的战争中被毁的。从出土的兵器看，以铁兵器为主，反映出王莽时期铁武器已逐渐代替铜武器。武器种类有铁簇（出土一千多）、铁刀、铁戟、铁矛、铁铠甲等。

仓库和马厰亦是长安城的重要组成部分。萧何所建太仓，位于南城外。今本《三辅黄图》说：“文景节俭，太仓之粟红腐而不可食。”又《史记·平准书》说“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⁴⁴⁾”此外还有细柳仓、嘉仓等。马厰城内外都有，未央厰、承华厰均有马万匹。天子车马所在称都厰，皇后车马所在称中厰，未央宫中还有兽圈九，彘（猪）圈一和虎圈等。

《三辅黄图》引《庙记》云：“长安市有九，各方二百六十六步。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东。凡四里（闾里的里）为一

市，致九州之人在突门。夹横桥大道，市楼皆重屋。”张衡在《西京赋》中说：“郭开九市，通圜带匱，旗亭五重，俯察百隧。”（45）

从以上文献记载来看，长安城里有九个市场，都在横门内大道的两旁，横门又称便门，出城有便门桥通渭北，向东可通往通关东的宣平门，交通便利。北垣内外有大量居民区，到市场既近且便。位置又在未央宫、桂宫、北宫之北，符合“面朝后市”的传统规则。东西九市的确切位置尚未经考察勘探清楚。但据笔者地面调查所见，今汉城遗址西北隅的六村堡一带，田间残破的汉制陶俑（人、马、猪等）随处可见。稍东的相家巷一带，民间多见用汉五铢钱祖范铺地砌墙。可见这一带是汉的手工业作坊遗址。传世又有“建平四年（汉哀帝年号，公元前3年）十一月长安市造”的铜钟。综合以上这些现象，可见这一带是一个工商结合的市场区。手工制造业和商业密切结合在一起，正是这一时期工商业的历史特点。

从四川新繁出土的汉画像砖和有关文献考证，当时的货隧称为商肆，有东、西、南三门，南、北、左、右四隧。仓库称廩，靠近城墙。市楼为高层建筑，有令署。“以察商贾买卖贸易之事，三辅都尉掌之（46）”。汉长安城的九市名称，今已见者有东市、西市、孝里市、高市等。长安地区的商业活动并不全在东西九市中进行，当时城外的一些地方也曾立有市。如昆明池南有柳市（一说柳市在城内）。王莽时期安门之南有会市，渭桥北有直市。“物无二价，故以直市为名（47）。”

据《汉书·地理志》说，汉平帝刘衍元始二年（公元2年），“长安……户八万八百，口二十四万六千二百。（48）”武伯纶先生认为，这个数字偏低，他认为当时长安的总人口应达

四十万左右⁽⁴⁹⁾，元始年间为汉代户口最殷盛之时，长安八万余户之数，应即汉长安户口的最高数额。汉长安几大宫殿区，加上太仓、武库、衙署及市场等，已占去全城面积的十分之九以上。城内剩下供居住的，仅占十分之一。汉长安面积《三辅黄图》记载为“九百七十三顷”，十分之一即百顷左右，合汉亩约一万亩（汉亩每亩约当今0.49亩），即今五千亩。据《三辅黄图》记载，汉长安有一百六十间里，一般认为这就是汉长安的居民区。《周礼·天官·小宰》有“听间里以版图”，贾公彦疏：“在六乡则二十五家为间，在六隧则二十五家为里”。如果这一百六十间里全部在城内的话，以每间里二十五家计算，一百六十间里是四千户。如前计算，居民区总共占地五千亩，以四千户分，每户占地一亩左右。很可能有一部分居民区是在城外。今长安故城北垣外，犹存当时的文化堆积，而这片地段，又经渭河及皂河的冲刷、侵蚀，面积已大大缩小。估计在当时北垣外曾有较大面积是平民居住区。

再说一百六十间里内的四千户，以每户三口计算仅一万二千人，即使每户按十口计算，也仅四万人，与长安人口四十万相差甚左。因此，这一万几千人可能仅仅是皇亲国戚。《汉书·万石君传》中，唐颜师古注：“戚里，于上有姻戚者，则皆属之，故名其里为戚里。”若与皇帝有姻戚者都居住在“戚里”中，则仅二十五家，显然又不符合实际情况。因此“戚里”仅只是皇亲国戚所居住的间里之一。当然皇亲国戚中特别亲近的贵族、王公、内侍、奴仆、军队以及一部分大臣无疑是直接住在皇宫及衙署之中的。住在间里的，很可能是一部分与皇族关系较远，暂无官职的亲族。从今本《三辅黄图》所说：“长安间里一百六十，室居栉比，门巷修直”来看，这一百六十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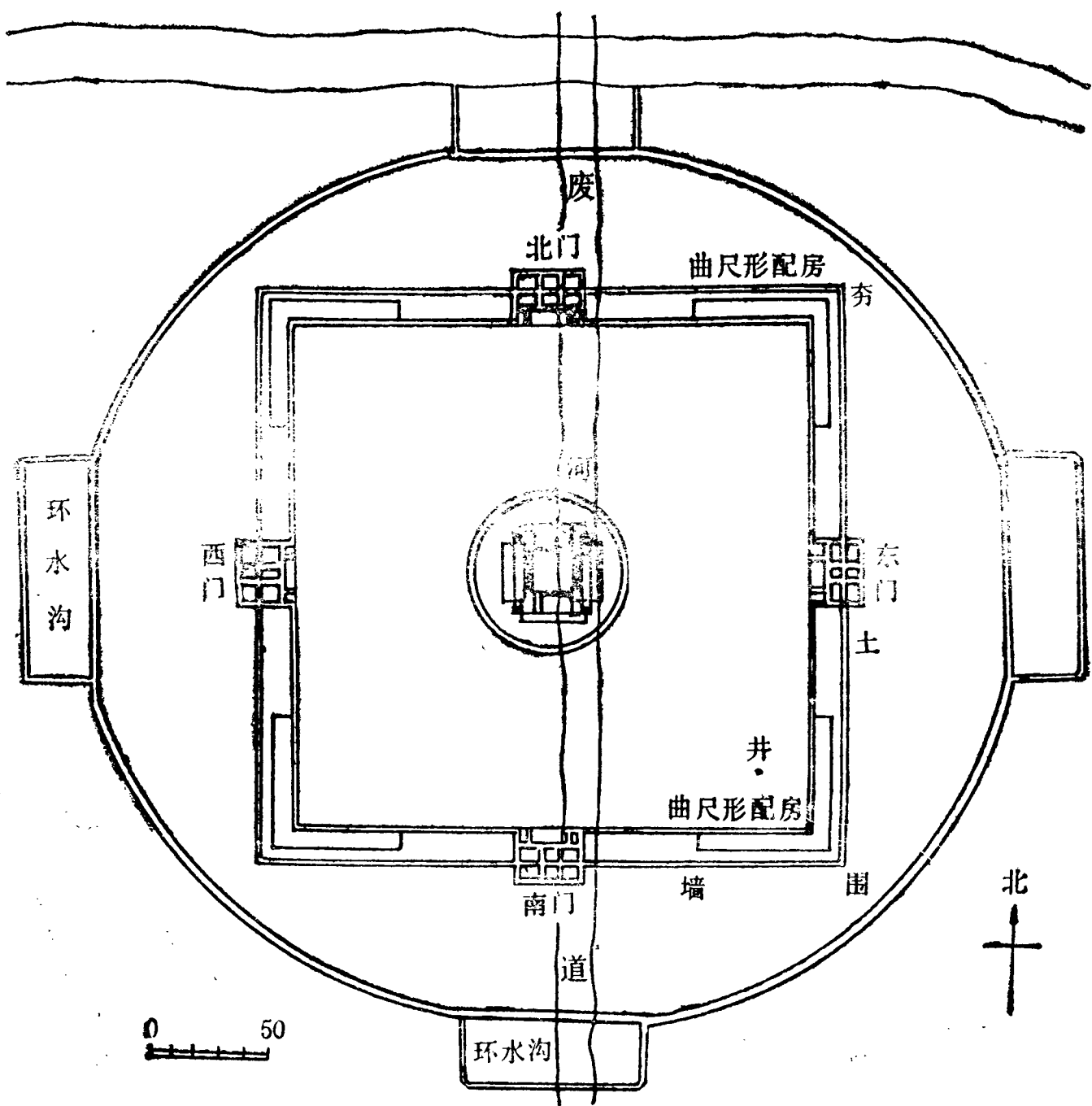
里也不是普通的居民区，而是经过严密规划的贵族聚居区。这一百六十间里，从各种文献仍可见其名的有宣明、建阳、昌阴、尚冠、修城、黄棘、北焕、南平、大昌、梁陵、函里、宜里、发利里以及戚里等十余里，居延汉简所见还有棘里、南里、器陵里、假阳里等，其余里名皆已佚失。

汉长安城的礼制建筑，主要有明堂、辟雍等。

前已叙述，按西周的古制，明堂是天子太庙，是祭祀祖先，朝见和布政之所。到汉初，已在未央宫布政。汉武帝时，才修筑明堂。

今本《三辅黄图》说：“汉明堂，在长安西南七里。《汉书》曰：‘武帝初即位，响儒术，以文学为本，议立明堂于城南，以朝诸侯。’”至王莽时，又进一步增修扩大。引古本《三辅黄图》说：“明堂者，王道之堂也。所以顺四时，行月令、祀先王，故谓之明堂。辟雍圆如璧，雍以水，异名同事，其实一也。”

五十年代，在汉长安城南郊（今西安土门村）发现了汉明堂辟雍遗址。明堂的平面布局，是明堂居中，四周环以水沟，将昆明故池之水引入其中。辟雍的特点就是外围一水，象征教化流行，且圆形图案，平面和谐，环境优美。与四门相对处，各有一个“冂”字形水沟，位于大环沟外侧，大环沟东西368米，南北349米。“冂”形水沟用长方形砖垒砌，深1.8米，宽1.8—2米，上面盖石板。围墙为方形，在中心建筑的外围，四边等长，各235米，距中心建筑物96米，夯土筑成，残高15—30厘米，上宽1米，基宽1.8米，基深1.2米，墙内砌柱，内外各有40厘米宽的防水坡，夯土筑，坡下有砌砖滴水沟，可能顶部原来有板瓦覆盖。四门为每边房舍中的夹门（房舍称为塾），房中



图十七 汉长安南郊礼制建筑遗址

间打墙，一般为前堂后室。夹门为礼仪性的门。围墙四面的正中，各有一门，东西门保存较好。此门被后期河道所破坏，每门中各有门道，两旁即内、外塾。四面有曲尺形的配房，院中有一井，圆形，深5.8米，直径1.38米。底部有黄色夹沙淤土，出土物为西汉制品，井壁是圆形陶制井圈，无底。

汉明堂辟雍的中心建筑平面为“亚”字形，遗址地基为夯土，直径62米，高出地面1.6米，方向正南北。南北长42米，东西宽42.4米，正中为长方形夯土台，南北长16.8米，东西17.4米。残高1.5米，按其遗址分析。原来可能建有楼阁式建筑。

大夯土台四周有东、西、南、北四堂室建筑，前面各有抱厦八间。

先秦宫室形制，一般是前堂后室，堂房有个（夹），室旁有房，堂前有散水霤（即流）和阶。主人走的阶叫作阼，客人走的叫宾。个前有侧阶，妇女所走。王莽率仿古制，明堂有九阶。明堂四出之名，东称青阳太庙，东出青阳象天市；南面叫明堂太庙，南出明堂象紫微；西面叫总章太庙，西方总成万物而彰明之；北面的叫玄堂太庙，北出玄堂象瑩石。正中的太室，即大室，中心建筑依然依台建筑，同先秦接近。

汉长安城南，尚有官社官稷遗址。汉初除秦社稷，立汉社稷。（社为土地之神，稷为五谷之神）其后，又立官社，配以夏禹，而不立官稷。至平帝元始三年，始立官稷于官社之中。

《独断》卷上说：“天子社稷土坛方广五丈，诸侯半之。”

在明堂辟雍和官社官稷遗址中间，发现王莽时期的宗庙遗址。王莽宗庙建于地皇元年至三年（公元20—22年），按西周古制，宗庙为五，王莽自认功过前代，建为九庙。九庙是：一黄帝，二虞帝，三陈胡王，四齐敬王，五济北悼王，六济南悼王，七元成孺王，八阳平顷王，九新都显王。殿皆重屋。“新莽坏彻城西苑中建章，承光、包阳、犬台、储元宫及平乐、当路、阳祿馆，凡十余所，取其材瓦，以起九庙。……穷极百工之巧，带高增下，功费数百巨万，卒徒死者数万。（50）”

此外，昆明故渠南尚有圜丘，亦是祭祀之所。城内还有太上皇庙及高祖修的各历代帝王庙。长安城外西北七里有太学（一说在南安门外）等。

汉长安的禁苑主要是上林苑。汉上林苑是因秦之旧苑。秦旧苑范围较小，且汉初大部分已令民耕种。到汉武帝，广开苑

囿池沼，大兴土木，修建离宫别馆。

汉武帝扩建后的上林苑，南至宜春、鼎湖（今蓝田县南）、御宿（今长安县南）、昆吾（今蓝田县东北），傍南山而西，至长杨（今周至县东南）、五柞（同上），北绕黄山（今兴平县马嵬镇北）频渭而东，周回数百里。《汉宫殿疏》说：“方三百四十里。”《三辅黄图》说：“苑中离宫七十所，皆容千乘万骑。”《汉旧仪》说：“苑中养百兽，天子秋冬射猎取之。”皇帝修了上林苑，天下群臣，争献名花异草，总数达三千种，种植其中，以标奇异。茂陵有个富民叫袁广汉，家有巨万之财，僮仆八九百人。他有一个东西四里、南北五里的花园，引水其中，构石为山，高十余丈，连延数里。并养各种珍禽异兽，广植奇花异草，后因罪诛，花园被没收，鸟兽草木，统统移于上林苑。司马相如所作《上林赋》曾描写过上林苑中的美丽景色和豪华宫殿。

除上林苑外，汉长安还有甘泉苑、御宿苑、思贤苑、博望苑、西郊苑、三十六苑、乐游苑、宜春下苑等。其中，甘泉苑周围五百四十里，有宫殿台阁百余所。思贤苑、博望苑都是文帝、武帝为太子所开，让他在苑中结交宾客。西郊苑周围“缭以周垣四百余里，离宫别馆三百余所。”⁽⁵¹⁾三十六苑有奴婢三万人，养马三十万匹。

上林苑中并有初池、鹿池、牛池、蒯池、积草池、东陂池、西陂池、当路池、大壹池、郎池等十池。积草池中有珊瑚树，高“一丈二尺”，一本三珂，上有四百六十二条，是南越王赵佗献来，号为烽火树，入夜光景焕然。

汉长安周围水系众多，人称八水绕长安，所谓八龙戏珠即指此。八水是泾、渭、灞、浐、沣、滈、涝、漓。

这八水，皆出入上林苑。据《三辅黄图》记载，灃水（又作霸水）出蓝田谷，注入渭河。泾水亦出蓝田谷，至霸陵，注入灃水。渭水发源于陇西，至华阴东注入黄河。泾水出安定泾阳开头山，在阳陵注入渭水。泔水出终南山丰谷，北入渭。漓水在昆明池北。牢水（又作滂、潦水），入潦谷，北流入渭。漓水在杜陵，从皇子陂西流，经昆明池入渭。这八条水道是关中地区尤其是汉长安地区的经济命脉。首都长安的水源供给，排水灌溉，以及运输交通，悉为所系。八水曲折，各呈其妙。

渭河发源于陇西鸟鼠山，横贯整个关中平原，东流入黄河。泾河是渭河最大支流。古代西安的几个城垣，都在泾河入渭的河口南岸。这一带是关中平原的中心，是关中最富庶的地区，是古代关中的水上交通枢纽。秦汉曾在渭河上架设三座桥梁。秦修横桥，汉改石柱桥，亦称中渭桥，主要是沟通秦渭北和渭南两组宫殿。遗址在今窑店公社附近。汉代在其东修东渭桥，以通栎阳。在中渭桥以西修西渭桥，因地近长安便门，称便门桥，以通茂陵。

汉代长安人口众多，东南地区的物资，主要通过黄河、渭河转运长安。汉代在黄、渭之交设船司空，专门调度上下船只，供应京师所需。但是，渭河渭北支流都源于黄土高原，泥沙淤积，运输困难。汉武帝时专门修了一条漕渠，傍南山直通长安。《史记·河渠书》说：“异时关东漕粟，从渭中上，度六月而罢。而漕水道九百余里，时有难处。”后来开凿漕渠，“发率数万人穿漕渠，三岁而通，通以漕，大便利。”据说漕渠通了以后，漕运“度可令三月罢。”时间上就节省了一半，还有灌溉之利。《水经注》中曾记载此渠，时已无水。根据《水

经注》的记载，可知漕渠是由长安城南引昆明池水向东流的。直到唐代，又在今咸阳市钓鱼台附近作堰拥渭水，再次使汉漕渠通水，以解决唐代的漕运问题，持续约上千年。

泾河虽则位于渭北，运输上意义不大，但是“衣食京师，亿万之口”所在，在经济上与长安的关系十分密切。

泂河和漓水都在渭南（今西安以西），泂河发源于终南山，两岸土地平坦肥沃，入渭口与泾渭之交不远。漓水从秦岭石鳖谷流出。到香积寺与漓水合，称交水，又称福水，在今秦杜附近流入泂河。由于隋代开永通渠，漓水导入永通渠。漓水消失，今漓水是古之交水。周代丰镐两京，就在泂河两岸，是西安附近最早建设的都城。

灞、浐二河位于西安东。西安最早的文明发源地之一的半坡村，就在它的二阶台地上。浐河是灞水支流。唐长安地近浐河、至唐时地位更加重要。

漓水在西安南郊，亦作泂水，古代直接入渭，今之已成滂水支流。滂水距长安较远，今在咸阳境入渭。

武帝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在城西南开昆明池，由石闕堰堵交水入昆明池，引入建章宫、明渠（由章城门入城）和漕渠。昆明池周围四十里（汉数，约合十公里），是长安城最大的蓄水库，又调节漕渠之水，在城市供水和交通运输方面都起了重要作用。据《汉书·食货志》说，汉武帝开昆明池是为了征服西南夷、通身毒（juān dú）而训练水军。因仿滇池而开，故曰昆明池，当时立有石刻牵牛、织女像和石鱼，以象征天河，今石刻尚存。昆明池遗址今仍为一洼地，面积10平方公里，在西安南郊长安县斗门镇一带。“昆明池刻玉石为鱼，每至雷雨，鱼常鸣吼，鬣尾皆动⁽⁵²⁾”。这当然是夸张的说法。“昆

明池中有戈船、楼船各数百艘，楼船上建楼橹，戈船上建戈矛⁽⁵³⁾”。说明昆明池确实曾训练过水军。

汉长安的周围，还有一系列卫星城。

汉初，从高祖起数帝皆葬渭北咸阳原上。汉朝廷为了安陵，因陵置邑，即实行陵邑制。这些因陵为邑设置的县共有七个（其中五个在渭北），不隶于郡，直属太常。《关中记》说：“徙民置县者凡七陵，长陵、茂陵各万户，余皆各五千户。”所以每个陵的周围，除了护陵官员、臣僚、宫女、守陵卫队，加之五千或一万户由各地迁来的豪富，形成一个数万人的繁华的城镇。这些城镇的作用，一方面是“奉陵邑”，另一方面，也使长安周围更加繁荣，形成一系列的卫星城，对长安的繁华起了烘云托月的作用。这在世界上来说，也是最早建设的卫星城。《三辅黄图》中记载了长陵城的规模：“周七里百八十步，因为殿垣，门四出，及便殿掖庭诸宫寺，皆在中。”⁽⁵⁴⁾

各陵邑周围，豪富相对集中，豪富之风盛，社会风气败坏。前面提到的茂陵富户袁广汉的私家园林，精巧庞大，遭罪诛后，连上林苑都看中这个园子，将鸟兽草木，皆移入上林苑中。富豪纨绔子弟更是斗鸡走马，横行霸道，人称“五陵公子”、“五陵少年”。

第四节 铜墙铁壁的东汉雒阳和魏晋洛阳

东汉首都雒阳又称东京。东汉光武帝刘秀于建武元年（公元25年），“车驾入雒阳，幸南宫却非殿，遂定都焉。”⁽⁵⁵⁾至190年献帝西迁长安，共165年。

刘秀定都雒阳，主要是因为关东当时已取代关中成为全国

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刘秀的主要根据地也在关东。至于当时的西汉长安，由于王莽变乱之后，战争连年，早已破败。东汉末年献帝时，董卓专权，挟献帝西迁长安。当时杨彪（司徒掾）出来反对。他说：“昔关中遭王莽变乱，宫室焚烧，民庶涂炭，百不一在，光武受命，更都雒邑。”⁽⁵⁶⁾这里，明确告诉我们，东汉之初所以定都雒阳，是因为关中遭西汉末年的战争破坏，早已不能建都。

东汉雒阳故城在今洛阳东郊白马寺东，距今洛阳约15公里。因后来曹魏、西晋、北魏均相沿建都于此，所以又称汉魏洛阳城，以别于后来的隋唐洛阳城。

也有人认为，东汉雒阳城是在西周时周公修建的成周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有但人持有不同意见，在考古方面，亦未发现有西周的踪迹。但是，自周赧王以后的“小东周”之都“巩”，很可能就是这里。周亡以后，秦汉时成为离宫，所以至东汉光武时才可能仍存“南宫却非殿”。

光武帝定都雒阳的第二年，“起高庙，建社稷”。建武十四年（公元38年），起南宫前殿，即千秋万岁殿。光武中元元年（公元56年），“起明堂、灵台、辟雍”。明帝永平三年（公元60年），“起北宫及诸官府”，规模始备。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董卓成乱，南北两宫大都焚荡，董卓“尽徙洛阳人数百万口于长安”“悉烧宫庙官府居家，二百里内无复孑遗”。曹魏文帝又从邺城迁都洛阳，从220—265年，都洛共46年。西晋从265—312年都洛，历48年。魏晋时都洛，都是因东汉故城，迭加修筑改建。至西晋末年的战争中，洛阳再次成为废墟。

1962年和1972年，中国科学院考古所洛阳工作队两次对汉

魏故城进行田野勘察和部分试掘工作，初步探明城墙、城门、街道、护城河、东北部的殿台和仓廩遗址。共探出十四城门（包括后代两门），探明了南郊的三雍（明堂、辟雍、灵台）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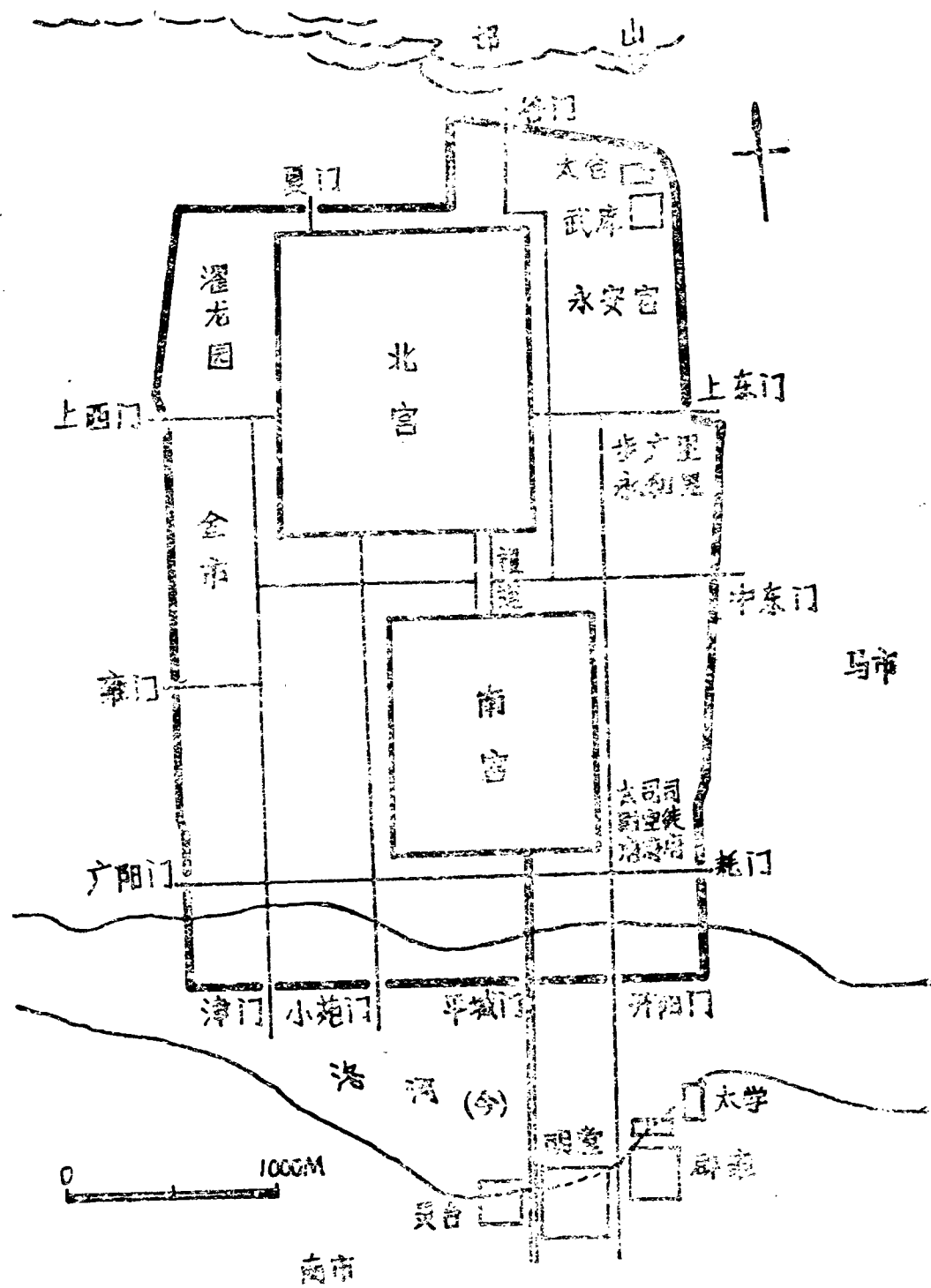
东汉雒阳城垣略呈南北长方形，全部用夯土版筑而成。当时南临雒水，北抵邙山。关于城垣规模，史书记载大同小异：《续汉书·郡国志》注引《帝王世纪》载“城东西六里一十步，南北九里一百步”。

《晋元康地道记》载“城南北九里七十步，东西六里十步”。

元《河南志》卷二载，“俗传东西六里，南北九里，亦曰九六城，与《帝王世纪》异”。所以采用九六这些数字，据说这些数字含有尊贵的意思。南城垣因洛河北移，已被冲毁，其他三面断断续续，依然相望（当然今存城垣，后来魏晋曾修改过）。经勘测，今存三面城垣宽度不一。北墙较宽，约25—30米，今东段尚存5—7米高。东墙宽约14米，今也残存5—7米高。西墙宽20米，残存高5—7米。

北墙今总长3700米，西墙残长4290米，东墙残长3895米。南墙长度暂以东西两墙南端间距离2460米计算。整个大城（包括西晋时修筑的金墉城）周长约今14公里，面积9.5平方公里。周长和总面积均比长安城缩小，这反映了随着豪强地主庄园经济的发展，东汉朝廷的政治、经济实力有所削弱的情况。

东汉雒阳有十二座城门。且它的分布与汉长安不同，不是每面三门，而是南面四门，东西各三门，北面两门。东、西、北八门遗迹尚存。《洛阳伽蓝记（序）》载：“一门有三道，所谓九轨。”



图十八 东汉雒阳城平面图

东垣三门：由南向北是秬（旄）门（一说望京门）、中东门、上东门。西垣三门，由南向北是广阳门、雍门、上西门。北垣两门，西为夏门，东为谷门。南垣四门，由东向西是开阳门、平城门、小苑门、津门。北垣夏门遗迹保存较好，经勘探，有三个门道，与文献记载一致。

城内的大街，都通向城门。共发现纵横大街各四条，若把相交的十字路口和丁字路口都分开计算，则有二十四段。《续

汉书·百官志》引蔡质《汉仪》：“雒阳二十四街，街一。”看来记载是可靠的。最长的大街全长3000米，但每个路口之间的段落约500米，最长也不超过1500米。大街宽度不一，一般约40米。横三道（由南数起）由于穿过宫城中部，宽达35—51米；纵三道由北宫直通南垣的小苑门，宽达40—42米。

大道一般分为三：

“宫门及城中大道皆分作三。中央御道，两边筑土墙高四尺余，外分之。唯公卿尚书章服从中道，凡行人皆行左右。（57）”

南北宫之间为闾里。有的专著认为，按全城24条街道，该有一百四十多个闾里。但如南北宫之间仅相隔一里的话，不会有这么多闾里（58）。

城内宫殿，主要是南宫和北宫。它们在西汉时即已存在。秦始皇时，封相国吕不韦为文信侯，食邑雒阳。吕不韦经营时，即已形成一个南北矩形的城市，称吕不韦城。秦末，河南王申阳曾建都于此。西汉初，刘邦“置酒南宫”，可能即秦时所建。西汉末，更始帝刘玄曾都雒阳，后迁长安。整个西汉一代，看来雒阳宫殿是存在的，否则，刘秀初到雒阳，就不可能有什么“南宫却非殿”。

光武帝初居雒阳，一直居却非殿。过了十余年，才另建南宫前殿，即千秋万岁殿。南宫的遗迹，至今尚未探清。但从街道的分布上，中东门大街之南，秣门大街之北，开阳门大街和小苑门大街之间，有一片略显长方形的区域。在这个区域的南部今龙虎滩一带，云纹瓦当遗存很多，大概这一带即南宫范围。这样，南宫的范围大体可以确定。南北长约1300米，东西宽约1000米，面积约1.3平方公里。《续汉书·五行志》说：雒阳城

南面的平城门是“正阳之门”，与南宫相连，举行郊祀的典礼时，皇帝的车驾由此门而出，是最尊贵的城门。在勘探中发现的平城门大街，由南部向北通入城内，直达上述南宫所在的范围，这就证明了以上关于南宫位置范围的推测是正确的。

北宫是汉明帝时建成的，一共花了七年时间。北宫的准确地望和四至，尚未探明。但与南宫一样，根据街道布局进行推测。在雒阳城的北部，中东门大街之北，津门大街和谷门大街之间的长方形区域，应是北宫所在地。谷门大街入城后，南行不远，便折而向东，然后再折而向南，这显然是遇到了北宫的北墙，从而可以认为北宫的北墙距离雒阳城的北墙是很近的。这样推测北宫南北长约1500米，东西宽约1200米，面积约1.8平方公里。

根据以上南北两宫位置和范围的推测，画出复原图以后，可以明显地看出南北之间的距离是一里。过去文献中说：“两宫相去七里”，显系一里之误。再说，南北九里之城，南北两宫根本不可能相距七里。

“南宫至北宫，中央作大屋，复道，三道行，天子从中道，从官夹左右，十步一卫。”⁽⁵⁹⁾由此可见，东汉雒阳与秦咸阳，西汉长安一样，各宫之间都是周阁复道相连。目的是为了保证皇帝和高级官吏往来时的安全。

德阳殿是北宫的主殿，据说周旋容万人，陛高二丈，殿前的朱雀阙高耸入云，从四十多里外就可以看见，足见其规模之雄伟。今在上述推测的北宫范围内，发现宫城遗址，南北长1398米，东西宽660米。但是否东汉北宫遗址，因后世经改建，很难确定。在遗址的西部金村一带，有一约高出周围地面4米，

长100米，宽60米的基址，老乡称“金銮殿”，不知是否即德阳殿遗址（因北魏主要宫殿在这一带，需考虑北魏改建因素）。

除上述两宫，还有永安宫。汉献帝即皇帝位时，“迁皇太后于永安宫。”“永安宫周围六百九十八丈，故基在洛阳故城中。”⁽⁶⁰⁾据文献记载，永安宫的位置应在北宫的东北。城的东北面还有太仓和武库。据勘探，在城的东北面距北墙仅53米处，有两座夯土围成的庭院建筑。西侧的一处面积约100×70平方米，中有五处大小不等的夯筑台基，猜测即永安宫，而东侧的一处即太仓。

在南宫的东南，靠近秣门和开阳门，有太尉府、司空府和司徒府，是重要的中央行政机构。达官贵族的住宅区，如步广里、永和里等，在城的东部，靠近上东门和中东门。董卓之宅即在永和里。一般居民区，可能多住在城外。此外，在城内还有皇家的苑囿，如北宫西北有濯龙园。城外苑囿更多，如西郊的上村苑、广成苑、鸿德苑、平乐苑、单圭灵昆苑。其中，单圭灵昆苑规模最大，周围约十一里。

东汉自然经济占了主导地位，城市贸易交换不发达，见于文献的市场名称有金市、马市和南市，只有金市在城内西部，上西门与雍门之间。“大市名金市，在城中；南市在城之南；马市在大城之东”⁽⁶¹⁾。

此说据陆机《洛阳记》，有人认为这三市是西晋洛阳之市，不是东汉雒阳之市。

东汉雒阳城南有明堂、辟雍、灵台，即所谓“三雍”。——解放以前，在洛河以南碑楼庄，朱圪塔村和大桥之间的地段，曾有不少的东汉熹平石经和曹魏正始（三体）石经的残块出土。还出土一块晋武帝（司马炎）咸宁四年（公元278年）的

辟雍碑，可见东汉三雍即在这一带。

据《东观汉记》记载，三雍（明堂、辟雍、灵台）起于光武后期中元年间。《汉官仪》载：“明堂距平城门二里所，天子出，从平城门，先历明堂，乃至郊祀。”

明堂为一高台建筑，上平而无屋。高六丈，方二十丈。四周环以廊屋，依台建筑，每边五开间。西侧多一排密室，内方砖铺地（东汉特征）。灵台职掌类似天文台，是一个科学的机关，属太史令管辖。张衡先后两次任太史令十几年，直接主管灵台，有属员43人，灵台丞1人，候星14人，候气12人（24节气），候晷3人，候钟律7人，舍人1人（观察万物生长与自然界的规律）。

墙壁用四色涂抹，东青西白，南红北黑。灵台顶部是观测天象的场所，四周建筑物依台而建。洛阳灵台是东汉最大的国家天文台，机构完善，设备精良，工作效率很高。

灵台是目前我国发现最早的一座天文观测台遗址。灵台的发掘，使我们对1900年前的天文台有了一个概略的认识，是我国重要的科学历史文物遗址。

公元220年，魏文帝曹丕从邺城迁都雒阳，并改雒为洛，一直至西晋南迁，总计都洛93年（公元220—312年）。考古试掘证明，曹魏和西晋的洛阳城垣位置，一仍东汉雒阳之旧，但部分城垣和城内、城外的安排，有不少改变。

考古发现有三个方面的改造：

北垣加厚到25—30米左右；西北外侧增筑马面，每个长18米，宽约8米，每隔120米1个，现存7个，群众称为炮台；在西北面修了目字形的三个小城——金墉城。

金墉城是魏明帝所筑，可能是仿曹操在邺城修筑铜雀三

台。它实际上是一种军事性质的堡垒，紧靠邙山，地势高亢，可由此俯瞰洛阳全城，在防卫上具有制高点的作用。西晋末年，“永嘉之乱”时称为“洛阳垒”，是交战双方的必争之地。金墉城南北长1080米，东西宽250米，由三个城堡组成，有门相通，墙厚13米。北头两个突出城垣外，南面一个正嵌在城角中。金墉城外壁同样设有马面，每隔六七十米一个，每个长15米，宽8米，比大城上的马面稍短些。这种设于城墙外壁的马面，除了边塞城障之外，在两汉至隋唐的城墙上没有其它类例。北宋修建汴梁时才开始正式称为“马面”。马面的出现，乃战乱频繁之际的特殊发明。东汉至魏晋期间，洛阳城重重设防，完全可以说，是建成了—一个“铜墙铁壁的洛阳”。

在文献的记载上，曹魏对洛阳城也进行了两个方面的改造。首先，在金墉城东北隅修建城楼，东部有宣武场，操练兵马。其次，对大夏门进行了特殊布置，据《水经注》记载，“门有三层，高百尺”，门内又起景阳山、凌云台。

在魏文帝时，参照邺城的布局，主要修复了东汉时的北宫。黄初元年（公元220年）“十二月，初营洛阳宫”，以建始殿朝群臣。至明帝时于汉南宫崇德殿处起太极、昭阳诸殿。^{〔62〕}可见恢复两宫，建太极殿等已是魏明帝时的事了。从此以后，“历代殿名或沿或革，唯魏之太极，自晋以降、正殿皆名之。^{〔63〕}”“太极”一名作为皇宫正殿之名为后代开创了先例。

东汉末年对雒阳城的破坏是很严重的，重建时的工程很艰巨。文献记载当时情形“百役繁兴，作者数万，公卿以下，至于学生，莫不展力，帝乃躬自掘土以率之。^{〔64〕}”

另外，对东汉雒阳的城门名称，作了更改，兹将东汉、曹

魏、西晋十二门名称对照如下：

	东汉	曹魏	西晋	北魏
南	开阳门			
	平城门 (平门)	平昌门		
	小苑门	宣阳门		
	津门	津阳门		
东	上东门		建春门	
	中东门		东阳门	
	秣 门 (望京门)	清明门	清阳门	青阳门 (承明门)
西	上西门	阊阖门		
	雍 门	西明门		西阳门 (北移约500米)
	广阳门			西明门
北	谷 门	广莫门		
	夏 门	大夏门		

汉魏晋三代洛阳宫城门名称：

东汉时，南、北宫各门名称相同，都是南朱雀、北玄武、东苍龙、西白虎。曹魏时，南宫的南门为皋门，北为永明门，东为云龙门。西晋时，南门叫朱明门，北门为永明门，东云龙门、西凤虎门。

东汉、曹魏、西晋时期，洛阳是我国重要的文化中心。继西汉长安太学以后，东汉雒阳太学是我国第二个国立大学。东汉太学位京城东南开阳门外，学生多达三万人，讲堂长十丈、宽二丈。历史上的“党锢之祸”就发生在这里。《汉书》成书

于雒阳，班固在雒阳活动达二十多年。蔡邕用八分体写成的《尚书》等六经石碑“熹平石经”，刻成四十六块碑石，立于太学门前。我国最早的佛寺白马寺，位于东汉雒阳的西垣外，建于东汉明帝时。

曹魏时继续设有太学，并用隶书、大篆、小篆之体刻石经二十八方立于太学前，作为国家标准版本。因刻于正始年间，故称正始石经，又称“三体石经”。

西晋时官僚豪族在洛阳争相建造花园别墅，如石崇所修的金谷园，后成为洛阳八景之一，称金谷春晴。

张衡是东汉著名的科学家，除了主持灵台工作以外，写了著名的《三京赋》（东京赋、西京赋、南都赋）。班固亦在洛阳写了《两都赋》（东都赋、西都赋）。到西晋时，左思的《三都赋》（魏都赋、蜀都赋、吴都赋），描写了邺城、成都、建邺的经济、文化及景物盛况，时人争相抄阅，致使“洛阳纸贵”。

西晋末年，洛阳历遭“八王之乱”、“五胡乱华”，后被匈奴族的刘曜攻破而彻底毁灭。

第五节 室北移的先声——曹魏

邺北城和东魏北齐邺南城

邺城是我国著名古都，位于华北大平原的南部，曹魏、后赵、前燕、东魏、北齐各代均建都于此。城有南北二城，北城为曹魏所建，南城为东魏所建。今北城在漳河北，属河北省临漳县范围，南城在漳水南，属河南省安阳县范围。两城古代均在漳

河南。后因漳河南移，致使北城今已在漳河之北。

曹魏都邺从204—220年，当时虽然东汉王朝首都名义上在许，但实际上政治中心在曹魏的邺城。220年，曹丕代汉，正式迁都洛阳。335—370年，后赵、前燕都此；534—577年，东魏、北齐都此。三度建都，总计约95年。

曹魏邺城在今临漳县西南17.5公里，相传最初时城垣建于春秋齐桓公时。《水经注·浊漳水》条描绘曹魏邺城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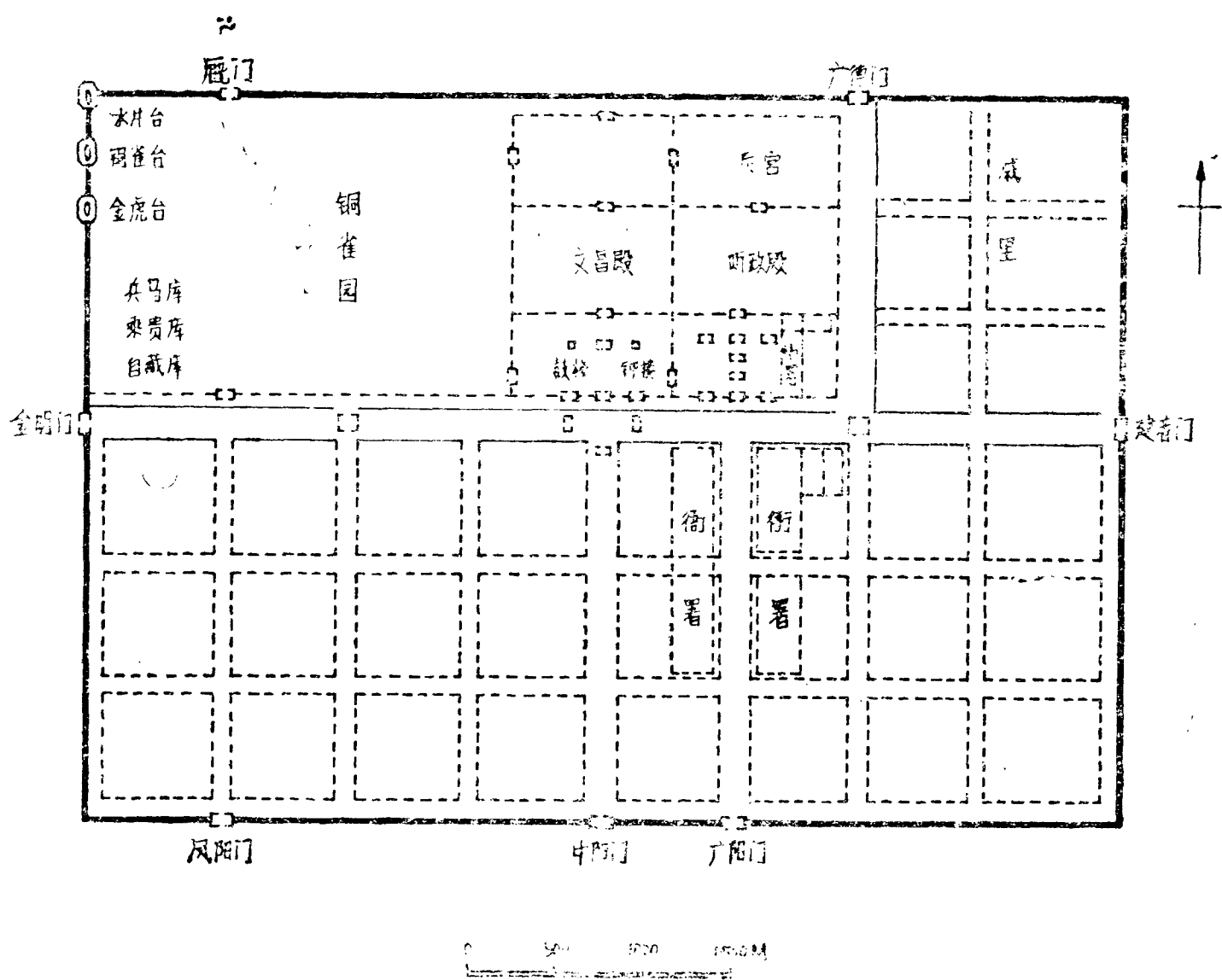
“（城）东西七里，南北五里，饰表以砖（这是我们在都城史上见到的第一个砖城），百步一楼。凡诸宫殿门台隅雉，皆加观榭，层甍反宇，飞檐拂云，图以丹青，色以轻素，当其全盛之时，去邺六七十里，远望若亭，巍若仙居。”⁽⁶⁵⁾今按晋尺

（晋尺=0.245米）折算，合东西3087米，南北2205米。

邺城有七门，南三门，北二门，东西各一门。南垣正中是中阳门（一曰永阳门），两侧是广阳门、凤阳门。东垣建春门，西垣金明门，北垣广德门、廐门。

《水经注》又说：“城之西北有三台，皆因城为基。”铜雀三台，南为金虎台（后赵石虎时改成金凤台），中铜雀台，北冰井台。三台遗迹，今已荡然无存。只金虎台（俗传铜雀台）基尚好，台基底部东西70余米，南北120米，高8—9米。其北约80米，铜雀台基残存一半，50×80米，高仅3米。最北的冰井台，已完全为漳河所冲毁。据说：“三台皆砖砌，相去各六十步，上作阁道如浮桥……施则三台相通，废则中央悬绝也。”文献虽一再描绘曹魏贵族游宴三台的情况，但高耸的三台建筑主要是为了军事需要而修建的瞭望制高点。因为，当时在这里挖掘了不少巨大的窖井，储藏粮、水、盐和燃料等大量物资，武库、马厩也集中在附近。

邺城有一条东西大街，直通东垣建春门和西垣金明门。大街将城市分为南北两部分，北部为官署区，南部为居民区里坊。《魏都赋》所谓“其间阎则长寿、吉阳、永平、思忠。”里坊制度这时开始形成，为以后北魏洛阳奠定了基础，并影响到隋唐时期。城南垣还有三个市及手工业作坊。南垣三门到东西大街有三条干道。中阳门大道居中，正对宫城端门和正殿——永昌殿。广阳门大街正对司马门和听政殿。凤阳门大街通向铜雀园。



图十九 曹魏邺城平面想象图

城市北部正中是宫殿区，分为东西两组。西组居北部全城正中，前面为宫庭广场，正殿永昌殿是大朝之所。东组前面是官署。其后有常朝用的听政殿。宫殿区之东为戚里，是贵族的居

住区。左思《魏都赋》说：“亦有戚里，填宫之东。”宫城西铜雀园为王室专用园林。宫殿区比较规整，已有明显的中轴线，并置于城的北部。已改变了“面朝后市”的传统，也与东汉雒阳南北两宫之制不同。中轴线的北端是齐斗楼，正殿前有钟鼓楼，殿后为皇家生活区，仍是“前朝后寝”之制。邺城宫殿毁于西晋末年。

邺城的水源是引漳河之水入铜雀园，进入宫城，分流入坊里区，最后由建春门附近流出城外。苑囿区除铜雀园外，城西有玄武苑，北城外有芳林园，其东有灵芝园等。

后赵石虎，“起内外大小殿九，台观四十余所。其于曹魏宫室改易多矣。”⁽⁶⁶⁾”

东魏、北齐又筑邺南城。《邺中纪》说：“邺南城东西六里，南北八里六十步”，仅比北城稍大些，但由邺北城的東西长于南北，变为南北长于东西，致使南北两城组成T字形。

“南城自兴和（公元539—542年）迁都之后，四民辐辏，闾里填溢，盖有四百余坊，然皆莫见其名，不获其分布所在。”⁽⁶⁷⁾据文献记载，东西廓有东西二市，朱明门内南街之东有东魏太庙，端门外东有大司马府，西街有御史台。“邺都南城，其制度皆取诸洛阳，与北邺然。自高欢缮之，高洋饰之……故规模密于曹魏，奢侈甚于石赵”⁽⁶⁸⁾。

557年，北周灭北齐。580年，相州总督尉迟迥起兵讨杨坚失败，杨坚焚毁邺城，尽迁其居民，城址目前已无明显痕迹，还无法复原，近百年之都，地位从此一落千丈，至今已只是一片农田村舍。

邺城的规划布局，在中国古代城市规划中有重要影响。中国中古时期，宫室由“面朝后市”移向紧靠北城垣居中，这种布

局是从曹魏邺城开始的，所以它是我国宫室北移的先声。曹魏洛阳的布局与东汉雒阳有重大区别，《嘉靖漳德府志》中提到邺城制度“取诸洛阳”，仅是指宫城内部布局而言。城市规划上有明确的分区，宫殿、官府、苑囿与一般居民区严格分开，一方面继承了古代城与廓的区分，也直接继承了汉代宫城与外城的区分。但不象汉长安与洛阳宫城与里坊相杂，或为里坊所包围，反映了当时阶级对立严重和封建等级的森严。

整个城市布局上，将道路正对城门，干道成丁字相交于宫门前。这种全城布局对称的手法，从一般建筑群，扩大到应用于整个城市。这种手法，对以后中国都城布局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六节 群星拱月的建康

从孙吴开始，东晋及南朝的宋、齐、梁、陈，相继建都建康（初名建业），即今南京。

南京处于长江下游的向北突出的江湾上。南京附近，长江江面狭窄，宽仅一两公里，沿江大部分地区岗垄连绵，江岸比较稳定，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已是沟通大江南北的重要渡口，是南北陆路交通的要冲。南京东距长江入海口仅240公里，早在东吴时期，就已是长江流域的最大港口。所以，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说：“能与天下相权衡者，江南而已。”他还举例，北宋末年，宋室南迁，名将张浚阻移杭州，请都建康，说：“东南形势，莫重建康，临安僻在一隅。”相传三国时，著名政治家诸葛亮曾劝孙吴迁都建业，他评论金陵是：“钟阜龙蟠，石城虎踞，真乃帝王之宅也。”⁽⁶⁹⁾

在自然条件方面，南京除了有长江天堑、虎踞龙蟠的山川

形势之外，周围地区雨量充沛，土地肥沃，农业发达，是著名的谷仓。所以南京自古是东南重镇。

南京最早的城垣建于公元前472年。越王勾践灭吴以后，派范蠡在今中华门外长干桥一带筑土城，周“二里八十步”，俗称越城或范蠡城，今已无存。公元前333年，楚威王灭越，在今清凉山筑城，并埋金以压王气，名金陵邑。公元212年，孙权在楚金陵邑原址兴建一座石头城，周“七里一百步”，作为水军的江防要塞。但孙权当时尚未称帝，也未下决心建都南京。公元220年，孙权建都武昌（今湖北鄂州市）。229年在武昌称帝，并迁都南京，在石头城东建了一座新城——建业，一直到280年吴亡为止。西晋时改名为邺，西晋末避愍帝司马邺之讳，改名建康。公元317年，晋室南迁，司马睿在建康称帝，仍都孙吴旧城。其后，南朝宋、齐、梁、陈相继在南京建都，到589年隋灭陈，前后约360年，南京是南部中国的首都，所以唐朝人称之为“六朝故都”。

孙吴在后主孙皓时，曾于265年又一次迁都武昌，遭到江东士族大家的反对。当时陆凯上书说：“武昌土地实危险而壅坳，非王都安国养民之处。船泊则沉漂，陵居则峻危，且童谣言：‘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加之武昌粮缺物贫，逆流供给，以为患害，孙皓不得不于第二年即还都建业。

孙吴肇基南京后建立的建业都城，位于今南京市中部玄武湖之南，是今日南京市所在。城的规模“周围二十里一十九步，东晋、南朝因之。”平均每边长五里。又说：“都城在淮水北五里，据覆舟山下，东环平岗以为安，西城石头以为重，后带元武湖以为险，前拥秦淮以为阻⁽⁷¹⁾。”据初步推定，建业

城北垣大概在今玄武湖南有一段称为“台城”的古城墙上，这段城墙虽是明都城的一段，但所用之砖明显不同，可能是六朝遗迹。西垣在中山路以西南京大学东墙鼓楼岗下，东垣至青溪覆舟山一线，南垣可能到新街口以南（今淮海路一带）。

城平面为方形，从都城南垣中门宣阳门开始，向南直到淮水，长五里，形成一条中轴线，称为苑路，即御街。苑路两旁“廨署栉比，府寺相属。”孙吴初都建业时建的太初宫，位城的西部⁽⁷²⁾。

太初宫形制狭小，周围三百丈（一说五百丈），共开八门。南垣五门：正中是公车门，东侧升贤门、左掖门，西侧明扬门、右掖门。东、西、北称为苍龙门、白虎门、玄武门。御道南端，近淮水是大航门，跨淮水有朱雀航（遗址大约在今中华门内镇淮桥以西），正殿是神龙殿。孙皓从武昌还都建业以后，着手在太初宫的东侧建设昭明宫，周五百丈，正殿赤乌殿。

孙吴都城，初界竹篱，后来是土墙篱门。到齐高帝建元二年（公元480年），始立六门都墙。

昭明宫是十分豪华的。为了营建昭明宫，二千石以下的官员都得进山督掇伐木。还开一条城北渠，引入宫内，使清流绕堂，日夜不绝。“大开园囿，起土山作楼观，加饰珠玉，制以奇石……穷极伎巧，功费万倍。”⁽⁷³⁾

除了太初宫和昭明宫，孙吴的宫苑建筑还有南宫、西池和苑城。南宫是太子宫，孙权曾经住过。西苑是太子孙登所建，东晋明帝为太子时又进一步修缮，起楼养士，时人称太子西池。东吴和东晋时，西苑一直是太子的花园。苑城名建平园，在太初宫东北。

左思著名的《三都赋·吴都赋》说建业“朱阙双立，驰道

如砥。树以青槐，亘以绿水，玄荫耽耽，清流亹亹。”⁽⁷⁴⁾可见当时的建业自然环境如绿化等还是很好的。但总的说来，孙吴建业的城市、宫苑布局缺乏总体规划，比较零乱。

东晋南渡，定都建康。其后，宋、齐、梁、陈相继都此。西晋灭吴，建业城未受到大的破坏，但在西晋末年的战争中太初宫毁于兵火。南渡之初，元成二帝，居旧府舍。晋成帝咸和二年（公元330年），“筑新宫，修苑城”，新宫名建康宫。此后，虽然晋建康城仍是东吴旧制，但不断改建后的城市布局上，因为东晋皇室都是魏晋旧族，对旧都念念不忘，基本上是仿照曹魏邺城和魏晋洛阳城的制度，形成了我国都城特有的以中轴线为基准，即主要建筑物左右对称的风格。建康城的这种布局，成为后来北魏重建洛阳城的范本。

关于建康的城门，历来说法不一。一种说法是南齐以前的建康都城为六门（另附朱僊据《至正金陵新志》所列之表）。南面三门，正中为宣阳门，史载宣阳门三道，上起重楼悬挑，两边置龙虎相对。宣阳门东侧为开阳门，西侧为陵阳门。东面是清明、建春二门，西面是西明门。除宣阳门为东吴所筑外，其余各门都是东晋咸和五年新筑过的。

建康城门的名称沿革如下（据朱僊《金陵古迹图考》）：

	东晋	宋	齐	梁	陈
南垣	清明门	—	—	—	—
	开阳门	津阳	—	—	—
	宣阳门(白门)	—	—	—	—
	陵阳门(尚方门)广阳	—	—	—	—

北垣	{	延熹门	—	—	—	—
		—	广莫门	—	—	北捷
		玄武门	—	宣平	—	玄武
		大夏门	—	—	—	—
东垣	{	建春门	—	—	—	建阳
		东阳门	—	—	—	—
西垣	{	西明门	—	—	—	—
		—	闾阖门	—	—	—

这里有必要指出，《宋书·文帝本纪》曰：“元嘉二十五年（公元448年）夏四月，新作闾阖、广莫二门，改先广莫门曰承明，开阳门曰津门。”按新作之闾阖、广莫二门系指都城，先之广莫门则指宫城而言，因都城新作广莫门，故改宫城之广莫门为承明门也。

这种说法认为，东晋咸和年间以后，建康都城立十二门。但门的分布同西汉长安与东汉洛阳都有区别，因地制宜，没有遵循《周礼·考工记》关于“边三门”的规则。

从西明门到建春门是一条东西横街，将都城分为南北两部分，南窄北宽，北面是宫城，南面是朝廷各台省所在。宫城即建康宫，亦称台城，因魏晋谓天子所居禁省为台，又称苑城，其地为东吴后苑⁽⁷⁵⁾。

建康城在齐高帝建元二年（公元480年），改立砖墙。今玄武湖南一段称为“台城”的城垣，是明都城的一段。但其中夹杂着一些时代较早的小砖，规格有35×18.5×8厘米，37×19×8.25厘米和30×15×6厘米三种，砖上模印“正右”、“正中”，“正左”以及“元年元月”等阳文隶书，显然不同于模印有里甲姓名的明代大城砖，尤其是30×15×6厘米一种，规格与六朝墓砖完全相同。很可能这一段是利用六朝都城北垣改筑的。

东晋建康宫周长八里，它的范围，文献说：“覆舟山、鸡笼山皆在六朝宫之后。⁽⁷⁶⁾”康熙《江宁府志》卷五引《东南利便书》：“吴太初宫，晋建康宫及历朝宫阙，皆北接覆舟山麓，牛首在其前，即王导所指天阙也。”据今人考证，认为建康宫在今进香河以东，珍珠河以西，乾河沿以北的鸡笼山前一带，即大致是南京工学院的范围。

建康宫改建时，百物匮乏，修缮并不完备，连城门前的双阙都未建立。所以才有前面提到的王导指牛首为双阙之事。当时宫城还是土墙，仅西南边数十丈用茆苫，还规定“除以官身各出钱二千充修宫城用。⁽⁷⁷⁾”这个规定至陈才废。东晋咸康五年(公元339年)，才用砖垒。由大臣谢安亲自负责，并全面缮修宫室。约经半年左右，“秋七日，新宫成，内外殿宇大小三千五百间”⁽⁷⁸⁾。为了修缮宫室，每天役使的民工达六千人。

建康宫的布局仍然仿照魏晋洛阳宫殿的旧制。正殿是太极殿。前已讲过，“太极”一名用于作为宫室正殿的名称，始于曹魏明帝修复洛阳南宫时。太极殿共十二间，以象征十二个月，两旁有东、西二堂，文献记载，太极殿高八丈，长二十七丈，宽十丈，殿前方庭六十亩，为皇帝召见大臣和处理日常政务之场所。太极殿后是显阳殿(原名昭阳殿，后避司马昭之讳，改为显阳殿)为皇后居所，梁天监十二年(公元513年)二月，再新建太极殿并东西二堂。太极殿十三间(加一闰月)，东西堂各补了七间，全部都用绵石砌成。萧梁之时，“宫阙巍峨，梵刹连云，二百四十尺之瓦官阁，同泰寺之九层浮图，‘盘承云表露，铃摇天上风。’”

陈后主至德二年(公元584年)，于光昭殿前起临春、结绮、望仙等三阁，“阁高数丈，并数十间，窗牖户壁栏槛，

皆以沉檀香木为之，又饰以金玉珠翠，外施珠簾，内有宝帐，其服玩之属，瑰宝珍丽，皆近古所未有。每微风一至，香闻数里，朝日初照，光映后庭。其下结石为山，引水为池，植以奇树，杂以花果。(79)”

在宫城东门外，有东宫，梁时因编《文选》而名扬天下的昭明太子萧统在东宫凿九曲池，更立亭馆，与朝士名素游其中。

宫城以北是苑囿区。东晋时，在鸡笼山一带修华林园（东汉有芳林园，曹魏避齐王曹芳之讳改华林园），覆舟山有北郊坛和药园。刘宋在玄武湖立方丈、蓬莱、瀛洲三神山，又在华林园内作景阳山，并引玄武湖水入华林园天渊池，通向建康宫。梁以前，华林园内已有景阳山、武壮山、天渊池、花萼池、景阳楼、琴堂、灵曜殿、芳香堂、日观台、兴华殿、风光殿等建筑。梁武帝时，“又造重阁，上名重云殿，下名兴光殿及朝日、夕月楼。”(80)刘宋文帝在覆舟山修乐游苑。此外，城内外还有离宫别馆多处。

东晋修建建康宫时，宫垣两重。梁天监十年（公元511年）增建第三重宫墙。宫垣三重，是我国都城发展史上的孤例。东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阶级斗争激烈、社会动荡不已的时期。从邺城的铜雀三台，曹魏洛阳的金墉城、马面，以至都城之垣修到三十米厚，到萧梁宫室的三重宫垣，都说明了这个问题。

从东晋开始，建康宫城门名称，列表如下：

东		晋
外垣		内垣
南	大司马门（亦称章门）	端门

	闾阖门 (南掖门)			
北	平昌门			
东	东掖门			云龙门
西	西掖门			神虎门
		刘	宋	
	外垣			内垣
南	大司马门			端门
	南掖门			
北	承明门			
东	东华门			万春门
西	西华门			千秋门
		萧	齐	
	外垣			内垣
南	大司马门			端门
	南掖门			
北	承明门			
东	东华门			云龙门
西	西华门			神虎门
		萧	梁	
	外垣		中垣	内垣
南	大司马门		端门	
	南掖门			
北	大通门			
	北掖门 (承明门)			
东			云龙门	万春门
西			神虎门	千秋门

	陈	陈	
	外垣	中垣	内垣
南	大司马门	端门	
	南掖门		
北	北掖门		
东	东华门	云龙门	万春门
西	西华门	神虎门	千秋门

在今南京工学院院内，常发现六朝时的莲花纹瓦当和残琉璃瓦件，当是东晋以来的六朝遗物。惜建康宫今日为南京闹市区，加之历代改建时的破坏，建康宫已无法通过考古发掘加以复原。否则，孙吴以来，我国南方最繁华雄伟的宫殿将可以通过考古发掘，重现在世人面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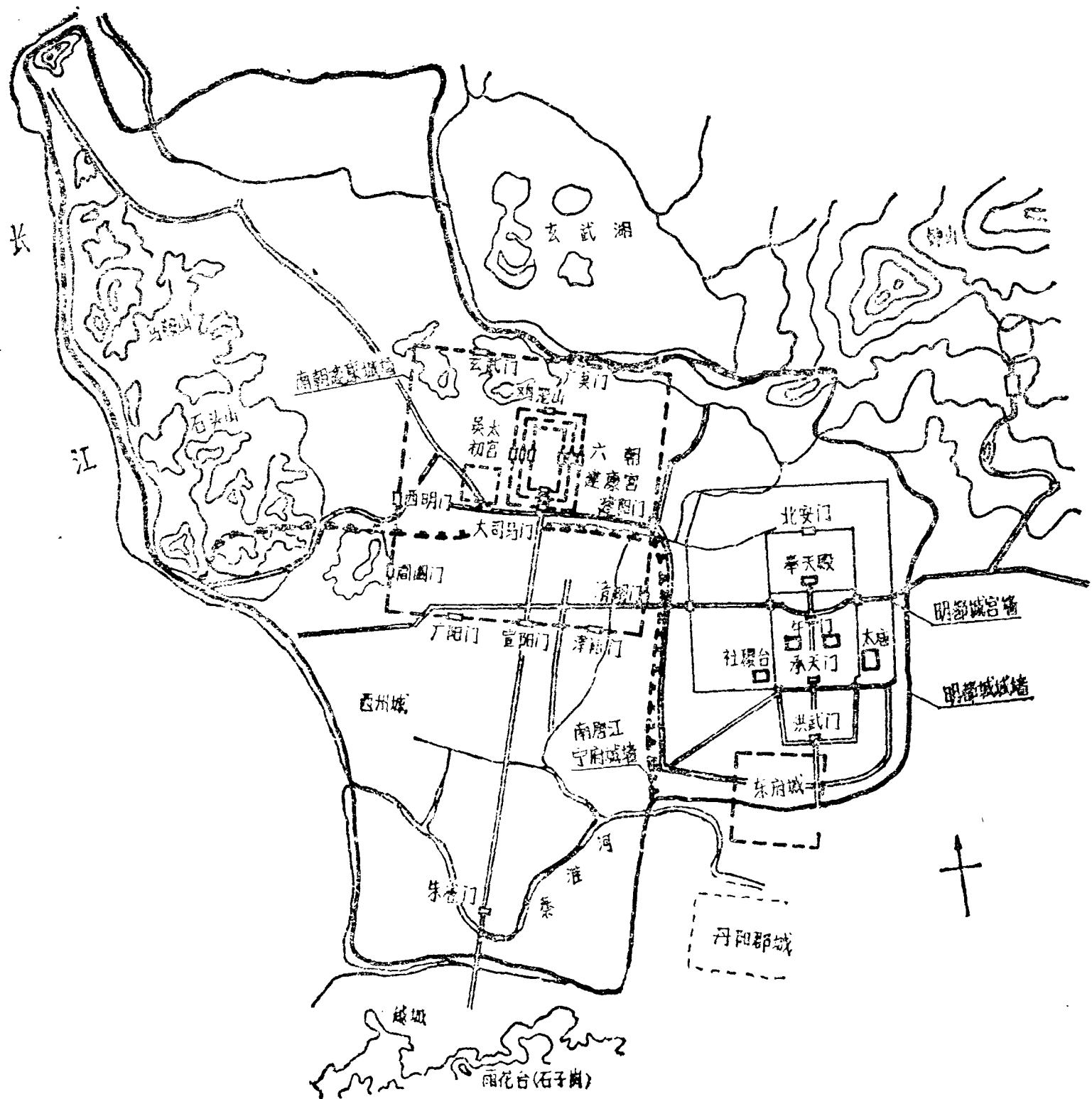
根据前面叙述的建康都城和宫室规制，建康无论外城或宫城，范围都不大。吴晋南朝时庞大的中央机构和众多南迁的居民，都不在城内，而是在城外，“梁都之时，城中二十八万余户，西至石头，东至倪塘，南至石子岗，北过蒋山，东西南北各四十里。⁽⁸¹⁾”由此可见，当时的建康是一个庞大城市。二十八万户，以每户四至五口计算，则达一百几十万人。因此，南朝的建康，是我国都城发展史上第一个人口超过百万的大城市。

建康城的都城城垣外，除宣阳门到朱雀航的御街两侧布满衙署和居民、商业区以外，周围有一系列附城。用现在的术语说，即是卫星城。这些官署区、居民区和附城环列在建康都城的周围，形成群星拱月之势，也可以说，这是我国继秦咸阳、汉长安以后，形成的又一个城市群。

前面已经讲过，孙权于公元212年已在楚金陵邑的废墟

上，建立了石头城。这个石头城位于所谓“石头虎踞”的石头山上（今清凉山），城本身却是筑土为之。直到东晋义熙六年（公元410年），才改筑为砖城。城下西北临大江，所以东开二门，北开一门，这就是今日南京所以别称石头城的来历。至今我们仍可在南京清凉山看到红赭色砾石的悬崖峭壁，成为明都城的天然墙基。

221年，孙权将丹阳郡治所迁来南京，建立了一个面积一顷的丹阳郡城，这个丹阳郡城设东、南、北三个城门。史书记



图二十 南京历代城址变迁图

载它“在长乐桥东一里”⁽⁸²⁾，但长乐桥的位置已不可考。通常根据今长乐路地名，将它定在今武定桥附近。

以后，又在今通济门东北建东府城，城周“三里九十步”。它原来是晋简文帝的旧宅，司马道子领扬州刺史兼录尚书事时，以此为治所。晋义熙十年（公元414年）冬天，开始在这儿筑城，名为东府，曾作为宰相的办公处所。刘宋年间，曾“拓北墉，浚西堑”⁽⁸³⁾，可知其是有护城壕的。梁末侯景之乱时，板筑女墙被毁，改用砖瓦。陈代又加修缮，一度为扬州刺史治所，与东府城遥遥相对，在今朝天宫西南望仙桥附近建有西州城，周围三里，是扬州刺史的治所。

东晋咸和三年（公元328年），陶侃在幕府山（当时称岩山）到狮子山之间筑白石垒，即后来的白下城，这是南京又名白下的来历，其西又有宣武城。

这样，在建康的外围，就有东府城、丹阳郡城、西州城、石头城、白石垒、宣武城等拱卫京师。在其周围，还有一系列的县城，如琅玕、秣陵、临沂、江乘、怀德、同夏、胡熟（有些是侨县）等，以为都城的倚角。这样重重城堡，敌人要想进入建康，确实很不容易。

建康既然有一百余万人口，又位于经济发达的东南地区，经济与文化的繁荣，是很自然的。居民区位于宣阳门至秦淮河长五里的御街两侧。当时就是连王导、谢安这样的军政要员，住宅都不在都城之内，而在御街东侧的秦淮河畔，即著名的“乌衣巷”。后来，唐代刘禹锡的著名诗句：“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写的就是这里。乌衣巷今仍存在，当然早非旧观。

孙吴时，建业就有两市：一是建初寺的大市，另一个是东

市。左思《吴都赋》里说：市内店肆林立，百货齐全，不但有本地的产品，而且还集中了来自交、广和南洋诸国的犀、象、玳瑁、珠玑等货。到东晋南朝时，有“大市百余（百余疑衍）、小市十余”^{（84）}，大部分在冶城以东的秦淮河两岸，今日南京的旧城区。《隋书·地理志》说：“丹阳旧京所在，人物本盛，小人率多商贩，君子资于官禄，市廛列肆，埒于二京。”这些市场，许多建在佛寺附近。东晋南朝佛事隆盛，寺院附近人烟稠密，来往频繁，自然是交易的好地方。到了南朝，已经有专业市场，如牛马市、纱市、蚬市等。还有不固定的草市，以及宫中的苑市。经济商业等的发达，也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早在春秋吴时，就建立了冶城。著名的干将莫邪剑，即在冶城铸成。六朝时，建康设有左右尚方和东瓦冶等机构，管理和从事铜铁冶炼，纺织也逐步发展，织锦业在南朝开始发达。海上交通除到达台湾外，一直到了今印尼一带。

在思想文化方面，六朝建康占有重要的地位。范晔的《后汉书》，裴松之注《三国志》，范缜的《神灭论》，刘勰的《文心雕龙》都是在建康编写的。指南车、千里船，及祖冲之圆周率的计算，《大明历》（大明为宋孝武帝年号）的编写，也是那时在建康完成的。钟荣的《诗品》，萧统的《文选》也是在建康完成的。王羲之父子的书法，顾恺之的绘画，也主要是在建康成就的。

建康是当时南方的佛教中心，“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85）}杜牧诗言：“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孙吴时，即在今城南雨花台下建了一座“建初寺”，意思是在江南第一次建寺。其后，由于统治阶级的提倡，佛教迅速在南方传播开来，寺院也迅速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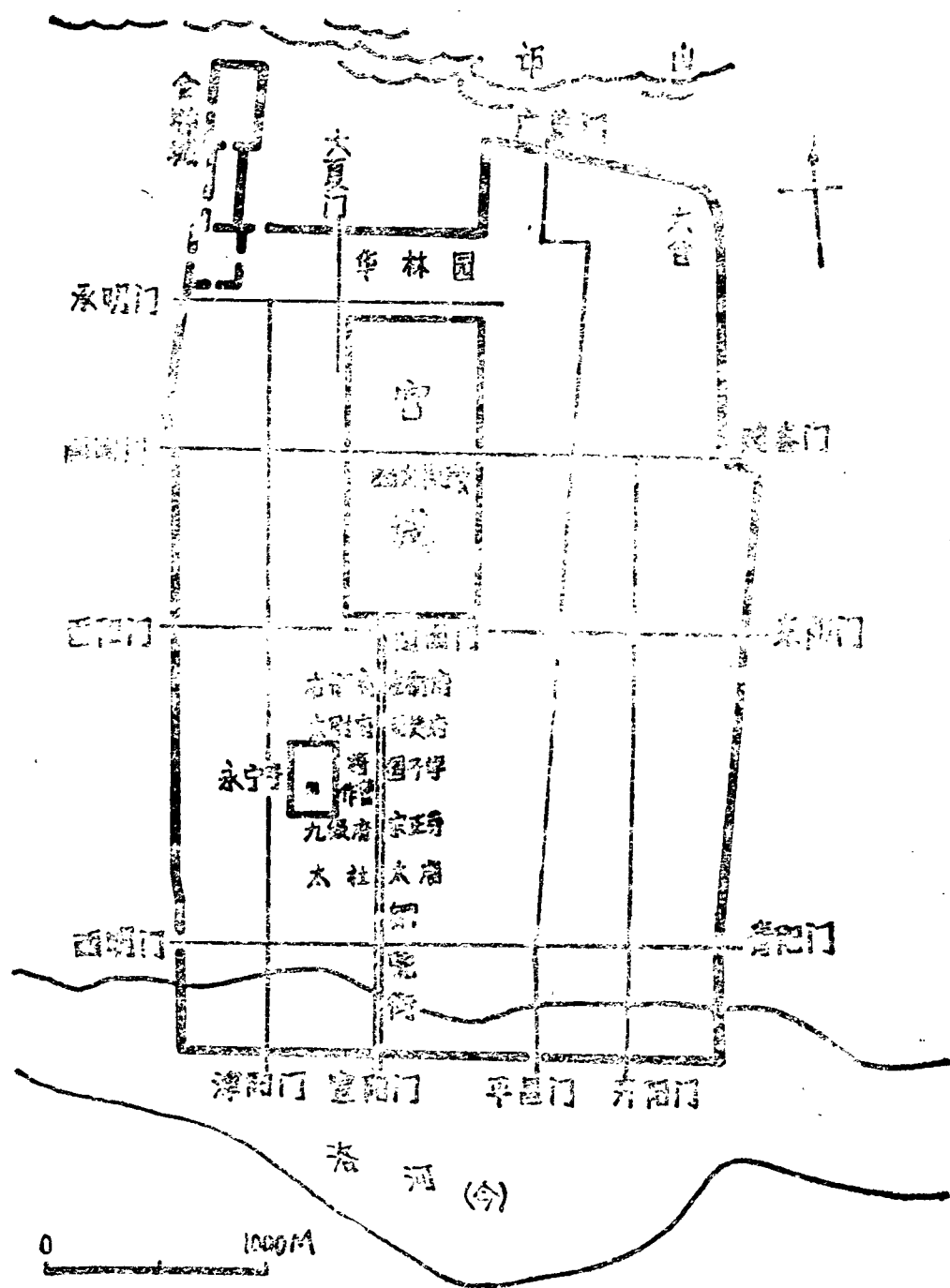
加。梁以前，仅钟山一带，已有寺院七十余所，梁以后又大为增加。城市与宗教的寺院相结合，是这一时期城市的最大特色。除建初寺外，著名的寺院还有同泰寺（今鸡鸣寺）、瓦官寺、栖霞寺等。栖霞寺后山的石窟，即是此时所开。著名的佛学家法显，曾到过印度，在建康译《华严经》、《无量寿经》，写了著名的《佛国记》一书。

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文帝杨坚灭陈，下令拆除建康城墙、宫殿，辟为农田。在石头城设蒋州辖江宁县，旋复置丹阳郡。唐置安业县，改江宁为白下，后又改昇州，辖上元县，统称金陵。至南唐，再立城垣，定都江宁府，开始了南京发展史上的新时期。

第七节 伽蓝林立的北魏洛阳（洛京）

鲜卑拓跋氏建立的北魏政权，初都平城（今山西大同）。但平城偏处北方，常有风沙雨雪，这对于想饮马黄河、统一中原的拓跋氏当然是不利的。孝文帝元宏想迁都洛阳，但又怕群臣反对，因群臣多是游牧民族出身，当然不愿意离开久据的根据地。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孝文帝就以“伐齐”为借口，率大军南下。当时北魏建国未久，力量并不强大，“伐齐”之举在廷议时就遭到群臣的反对，不果而散。事后，孝文帝亲自对尚书任城王拓跋澄说：“国家兴自朔土，徙居平城，此乃用武之地，非可文治。今将移风易俗，其道诚难。朕欲因此迁宅中原，卿以为如何？”^{（86）}拓跋澄只好表示赞成。于是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孝文帝亲率大军三十万（实际上约二十万人）南下。大军至洛阳，霖雨不止，雨中行军，自然苦不堪言，但孝文帝依然“戎服乘马而行”，诸将劝止，孝

文帝就乘这个机会，以大军“动而无成，何以示后”为由提出了他的迁都打算。并让反对的站右边，赞成的站左边。当然，反对的人还是有。但多数人不愿南伐，站到左边，皆呼万岁，于是就决定了迁都之地。后来，他又亲自到平城，以“今代在恒山之北，九州之外，非帝王之都也。”⁽⁸⁷⁾”动员尚留在平城的官属南迁，并将祖宗牌位等从平城迁洛。太和十九年（公元495年），北魏迁都终于完成，并定洛阳为洛京。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是一个有远见卓识的重大决策，使此后北魏的经济得以空前繁荣，四十多年间，洛阳又一次成为北部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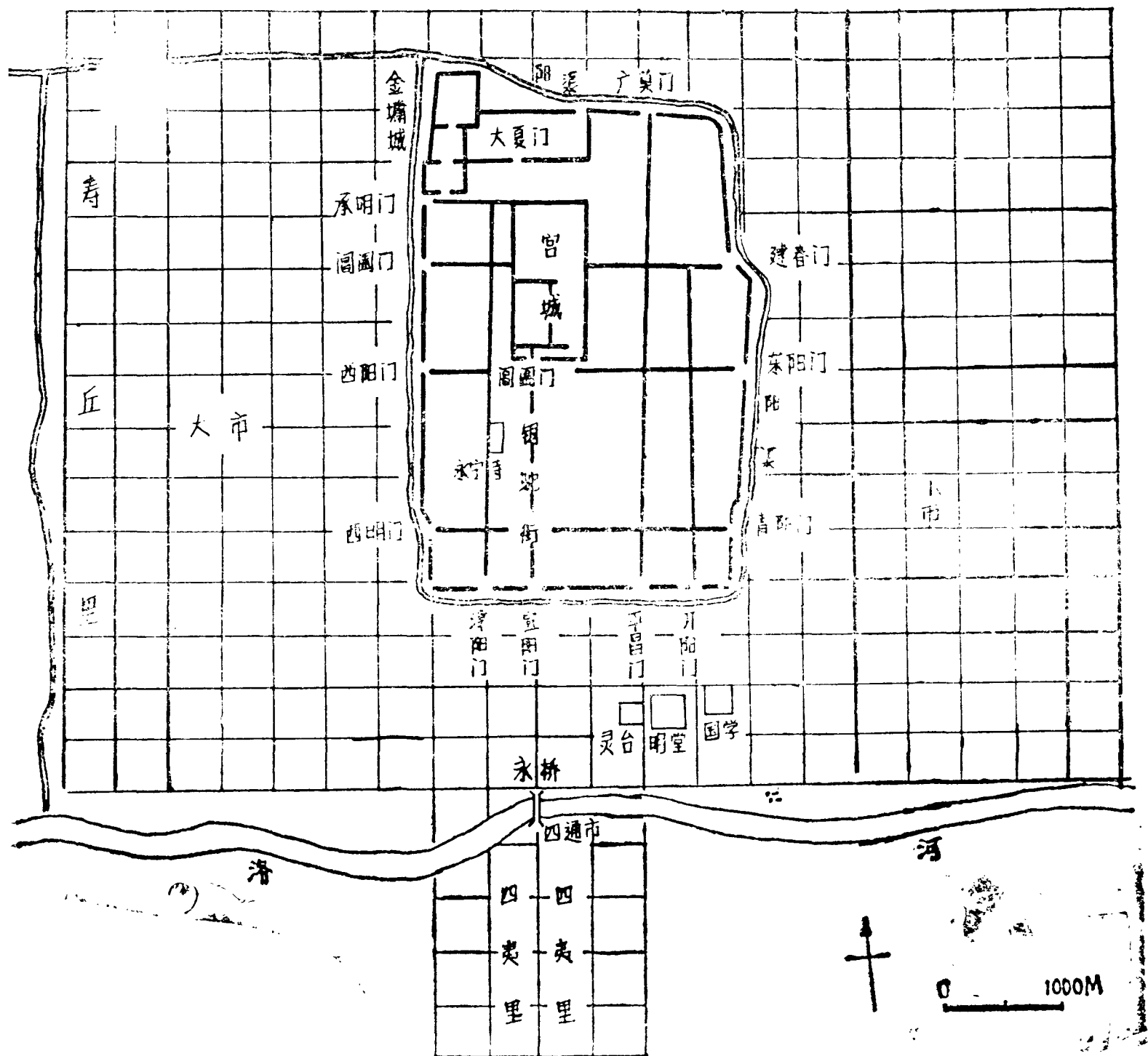
图二十一 北魏洛阳城平面图

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冬十月，孝文帝元宏：“诏司空穆亮，将作董迹缮洛阳宫室。”

在这之前，太和十五年（公元491年），北魏就曾派李道固为正使，蒋少游为副使，使赴南齐建康（蒋少游“有公输之思”，“有机巧”），“密令观京师（建康）宫殿模式。”所以南齐认为：“虏宫室制度皆从此出。（⁸⁸）”蒋少游是建筑宫殿的专家，早在北魏初建平城时，就被派往洛阳，“量准魏晋基址”，以为建设平城的参考。蒋少游副使建康，有观察建康宫室规模之意，这是无疑的。但也不能说北魏洛阳全仿自建康，时地相异，再则，蒋少游也不是北魏洛都建设的主事大臣。据陈寅恪先生考证，洛都计划布局，还有平城和河西的影响。北魏平城，截平城西部为宫，并河西之民徙居平城宫城之南，悉筑为坊。坊开巷，大者容四五百家，小者容六七十家。在宫城之南建坊，与曹魏邺城倒是极象。

据《洛阳伽蓝记》记载和考古勘测资料，北魏洛阳主要部分仍是汉魏旧城。但在汉魏旧城之外，新加一重外廓。外廓城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北依邙山，南廓在今洛河之南约里许的牛王庄北侧，传有残夯墙，可能是洛阳南廓遗址。在今洛阳城西七里的张方沟、长分桥一带有南流入洛的小渠，可能是西廓外城壕的残迹。西廓南廓大体确定之后，东廓、北廓的方位，也可比定。又据文献记载，当时宣阳门外的御路两侧，还有向外突出的部分。“宣阳门外四里（一说五里）至洛水上作浮桥，所谓永桥也……永桥以南，圜丘以北，伊洛之间，夹御路东有四夷馆……道西有四夷里……别立市于洛水南，号曰四通市，民间称永桥市……永桥南，道东有白象、狮子二坊。（⁸⁹）”这样看来，也许当初是想建成一个东

西、南北各二十里的方城。如此看来，北魏洛阳规模之大，在我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因此，有人认为：“北魏洛阳规模之大，在我国历史上不仅是空前的，而且也超过了过去认为我国封建时期最大的都城——隋唐长安城。”（90）



图二十二 北魏洛阳外廓示意图

北魏洛阳绝大多数沿用了魏晋街道，只是城门名称作了更改。个别街道曾部分改道，并开辟了一条新街。

东西横街四条：

一横街 西明门（东汉广阳门）——青阳门，沿袭未改。

二横街 西阳门——东阳门，北魏太和（公元477—499年）中，废魏晋西明门（东汉雍门），北移约500米与东阳门相对，改称西阳门，于是有东、西阳门之间直通的大街。宽约40米，是洛阳最宽的横街。

三横街 阊阖门——建春门大街，此街通过宫城（北宫），把宫城分为南北两部分，前朝后寝。

四横街 承明门大街，为北魏新开。路面宽17~22米，残长约1410米。门洞缺口宽约20米，纵深13米，一门洞，缺口下路土宽11米。

南北纵街四条：

第一条开阳门——三横街（建春门），沿袭未改。

第二条平昌门——广莫门，沿袭未改。

第三条宣阳门——宫城大门阊阖门，即铜驼街，宽41~42米，残长1650米，是北魏洛阳最宽的街道。

第四条津阳门——大夏门，沿袭未改。

北魏宫城位于内城的中部偏北，正殿是太极殿，南北长约1398米，东西宽约660米，北为苑城（即华林园），南为宫殿区，与平城布局相同。北魏废了东汉、魏晋以来的南宫，所以只剩一个北宫。今遗址内夯土台基颇为密集。在金村南，有俗称“金銮殿”的夯土台基，东西长100米，南北宽约60米，可能即太极殿遗址。“金銮殿”遗址南约500米，正当宫城垣阙口处的“午门台”附近，夯土台基平面复杂，其前还有相对的双阙遗址，这里应是宫城南门“阊阖门”的遗址。

据文献记载，宫城外东侧有太仓、洛阳地方官署和经营苑囿、籍田的机构与“拟作东宫”的空地。西侧原为晋“大市”

（金市）所在，北魏废为佛寺。金市是晋的后市，后市的废除，是宫城布局上的一项改革。

在宫城北部，“自广莫门以西，至于大夏门，宫观相连，被诸城上”⁽⁹¹⁾。说明北魏在曹魏时加厚的北城垣内侧，兴建了不少高层建筑，与北魏兴建的宫城连成一片。北魏时期，二横街（东、西阳门）以北几乎全为皇室所占。在城的南半部，铜驼街两侧，布置了中央衙署和一些庙、社。铜驼街成为全城的南北轴线，宣阳门也就代替了东汉的平城门而成为正门。其余地区，如已近南城垣的东侧以迄东南城隅一带，近年来也不断发现涂有朱红色的残墙，并同出有大量刻划或捺印出文字的残瓦、莲花或兽面纹瓦当和大型兽面纹砖等标准的北魏官府建筑遗物。整个情况说明，洛阳旧城内，已大部为北魏官府控制，成为北魏的政权核心所在，所以居民区，甚至贵族，只好住到外廓城中去，市场也设在外廓城中。

北魏洛阳城有许多显著的特点。

首先是宗教发达，全城寺院林立。

佛教自东汉明帝时传入我国，到魏晋时空前发展，佛寺泛滥成灾。据《洛阳伽蓝记》记载：“寺有一千三百六十七所。”个别坊内，有十所佛寺，大大超过了平城，在城市史上亦少见。

著名的永宁寺，建于熹平元年（公元516年），又称为“木宁寺”，在宫前阊阖门南一里的御道（铜驼街）西侧。寺中“有九层浮图一所，架木为之，举高九十丈。上有金刹，复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去京师百里，已遥见之。”又说：

“刹上有金宝瓶，容二十五斛。宝瓶下有承露金盘，重一十一重。”金盘和各层各角悬金铎一百三十铎。门上钉着金铃，共

五千四百枚。复有金环铺首。“殫土木之功，穷造形之巧……至于高风永夜，宝铎和鸣，铿锵之声，闻及十余里。（92）”

浮图之北，有佛殿一所，“形如太极殿。”另外“僧房楼观，一千余间。雕梁粉壁，青璣琦疏，难得而言。”还说，“寺院墙皆施短椽，以瓦覆之，若今宫墙也。四面各开一门，南门楼三重，通三阁道，去地二十丈，形制似今端门。（93）”

据今遗址实测，永宁寺平面为长方形，四面夯筑围墙，周长1040米（南北约298米，东西约210米），中心为塔基遗址，三级夯土台基，保存完整。底层为100米见方，中层为50米见方，顶层为30米见方。顶层中部又用土坯垒砌10米的正方形，其间还残存被毁后的木柱遗迹，清晰可辨。遗址附近，发现灰烬和火烧过的木块，砖瓦碎片，佛像残图等。据文献记载，永宁寺在永熙三年（公元534年）被焚。

白马寺建于东汉，位汉魏旧城西垣外，在北魏仍是重要寺院，延续到唐代还有遗迹可寻。唐代张继诗曰：“白马驮经事已空，断碑残刹见遗踪。”今白马寺就是在原地重建的。

南廓外的伊阙，有北魏开始开凿的龙门石窟，其中“宾阳三洞”，北魏皇室耗费了八十万以上民工，历时二十四年（公元500~523年）还未完工。

其次是铜驼大街两侧，衙署林立（见下页表）。

铜驼街两侧为衙署、寺院、高官宅第等所占，今已在街道两侧探明不少大面积的夯基。这种在宫门前御道两侧布置中央衙署的做法，大约是参考了南朝都城建康的设计，也是这一时期都城布局上的重大变化。

第三个特点是规整的里坊和森严的等级。

据《洛阳伽蓝记》记载，“京师……户十万九千余。庙社

官室府曹以外，方三百步为一里……里开四门……合有二百二十里”。⁽⁹⁴⁾

北魏宣武帝元恪景明二年（公元501年），“九月丁酉发畿内夫五万人，筑京师三百二十三坊，四旬而罢。⁽⁹⁵⁾”

“于京四面筑坊三百二十，各周一千二百步。⁽⁹⁶⁾”

这里，洛阳里坊的数字从二百二十至三百二十三，各不一致，据有关专家计算，若洛阳外廓全部作为里坊计算，至多只能容纳三百一十坊，如果除去“庙社宫室府曹”，则二百二十坊的数字比较可靠。

闾 闾 门		
右卫府 太尉府	铜	左卫府 司徒府
永宁寺 将作曹		国子学
九级府 太社 凌阴里	街	宗正寺 太庙 护军府 衣冠里

里坊的划分是中原城市的旧制，但这样大面积的统一规划部署，是以前的城市所没有的。特别是在里坊的管理上，“方三百步为一里，里开四门，门置里正二人，吏四人，门士八人”。这种制度也前所未有的，目的是为了“虽有暂劳，奸盗永止⁽⁹⁷⁾。”

当然，这样大规模的设置里坊，可能还有另外的原因。“后魏迁洛阳有八氏十姓，咸出帝族，又有三十六族，则诸国之从魏者，九十二姓，世为部落大人者，并为河南洛阳人。⁽⁹⁸⁾”“以代迁之士，皆为

羽林、虎贲。⁽⁹⁹⁾”因此，北魏迁洛，在组织上还有相当一部分保留着旧日的部落性质的军事编制。这部分人是既属羽林、虎贲性质的宿卫亲军，又都携家带口。为便于管理，又可以适当安排这些大批迁来者，恐怕也是洛阳都城为数众多的规整的里

坊出现的重要原因。“自延酤（里）以西，张方沟以东，南临洛水，北达邙山，其间东西二里，南北十五里，名为寿丘里，皇宗所居也。”⁽¹⁰⁰⁾皇宗所居如此集中，估计对其他迁洛各大宗族姓，也都按规划集中居住，并严格管理，保证迁洛后的社会安定。

第四个特点是水陆畅通，商业发达。

洛阳有三市，分别安排在东、西、南三廓的中部密集的里坊中间，这也是前所未有的。同里坊一样，洛阳市场的安排，对以后隋唐长安城产生了重大影响。

西廓名大市，在白马寺西侧，周回八里。大市周围十个里，“多诸工商货殖之民”。在大市范围内，近年在正骨学院附近勘探时，曾发现大面积的瓦片堆积层，有的地方厚达两米以上，有力地证明了当初大市的繁荣。大市周围，佛寺、里坊密布。北部有奉终里、慈孝里、金肆里、阜财里、开善寺等。东有通商里、达货里、法云寺等。西有延酤里，治觞里等。南有调音里、乐律里、皇女台等。通商、达货二里，“里内之人，尽皆工巧，屠贩为生，资财巨万。”“市西有延酤、治觞二里，里内之人多酤（《河南志》作酿）酒为业。河东人刘白堕善能酿酒。季夏六月，时暑赫晞，以瓮贮酒，暴于日中，经一旬其酒味不动。饮之香美，醉而经月不醒。”⁽¹⁰¹⁾

小市在东郊，范围小。

南廓有四通市，位于旧城宣阳门外，“商胡贩客日奔塞下……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其地位于伊洛两水之间，迁洛时敕：“今移都伊洛，欲道远四方。”⁽¹⁰²⁾看来，这里扼洛阳水路要道，是洛阳最繁盛所在。洛阳工商区的规模和布局，远比以前的都城市场宏大、合宜。洛阳工商市场的繁荣，表明中原

经济已有很大恢复和发展，北魏统治集团提倡的汉化政策，正在日益深化。

北魏永熙三年（公元534年），东魏孝静帝在高欢胁迫下，迁都于邺。四年后，侯景围攻独孤信于金墉城，街市官室被焚烧，洛阳再次成为废墟。“城廓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墙被蒿艾，巷罗荆棘，野兽穴于荒阶，山鸟巢于亭树。游儿牧豎，踣躅于九逵；农夫耕老，艺黍于双阙。”⁽¹⁰³⁾”此后洛阳一蹶不振，再也没有恢复。

第八节 棋盘之城——隋唐长安与洛阳

〔隋唐长安城〕

隋唐长安城故址包括今西安城及其近郊，位于汉长安城的东南。城西北角压汉明堂、辟雍遗址。

隋初都汉长安城，文帝开皇二年（公元582年），命高颎、宇文恺等人在汉长安城东南龙首原设计新京城。唐高宗李治永徽五年（公元654年），才全面建成。隋初名大兴城，唐改长安城，或称京师。天显元年（公元742年），称西京；至德二年（公元757年）改称中京；上元二年（公元761年），复称西京，次年定名上都，学术界一般称“隋唐长安”。

隋初为什么定名大兴，有两种说法。一说可能和太极殿所在地大兴村有关。从城到宫均名大兴，显然有永远兴隆昌盛的意思。

另一说认为，“隋文初封大兴王，及登极，县、门、园、池多取其名。”这座新京城也以大兴为名，“谓之大兴城。”⁽¹⁰⁴⁾”

隋文帝为什么要建立新京城？文献上有比较明确的记载。

隋文帝杨坚建立隋王朝的第二年即开皇二年六月，召集王公大臣出谋献策，“咸云羲农以降，至于姬、刘，有当代而屡迁，无革命而不徙。曹马之后，时见因循，乃末代之宴安，非往圣之宏义。”认为汉长安“凋残日久，屡为战场，旧经丧乱。今之宫室，事近权宜，又非谋筮从龟，瞻星揆日，不足建皇王之邑，合大众所聚……龙首山川原秀丽，卉物滋阜，卜食相土，宜建都邑，定鼎之基永固，无穷之业在斯。”“仍诏左仆射高颀，将作大将刘龙，钜鹿郡公贺娄子干，太府少卿高龙叉等创造新都。”“十二月丙子，名新都曰大兴城”，“三年春正月，将入新都，大赦天下。”⁽¹⁰⁵⁾从上述引文，可以看出：

汉长安城已残破，其它文献还讲到汉长安水咸卤，考虑到这些及历代都建新都等情况，文帝决定迁都。新都选在龙首原，相距汉长安十几华里，北枕渭水，南临终南山，东有灞、灊，西有沣河。修建新都的人员，参照其它文献，得知领衔修大兴城的是左仆射高颀（从二品），总设计的人是太子左庶子宇文恺（正四品）。《隋书》说宇文恺“巧思过人”，“多伎艺”。除了京城以外，当时好些重大工程都是由他设计营造的。

迁都时间是开皇三年（公元583年）正月。从开皇二年六月到第二年三月，从修建到搬迁只有九个月的时间，看来是初具规模就迁都了。

隋大兴城东西9721米，南北8651.7米，城周37.7公里，面积84平方公里，规模宏大，相当今西安城（今西安明城东、西垣长2.6公里，南垣长3.4公里，北垣长3.3公里，面积8.71平方公里）面积的9.65倍。

汉长安城周长25.1公里，魏晋洛阳城周长12公里，北魏洛阳城外廓，文献记载为35公里（实约31.5公里），隋唐长安周长36.7公里，较前述几城都大。明太祖朱元璋建南京城周长37.14公里，外廓80余公里。明成祖迁都北京，修城周长24公里，嘉靖加筑外城长15.45公里，总长32.8公里，较隋唐长安城为小。近代学者都认为古代世界城址遗留至今者，以明南京城最大，大兴城只是未保留至今。西北大学的考古教材上说，隋大兴（唐长安）城，实应是古代世界最大的城⁽¹⁰⁶⁾。

隋唐长安城分三部分：外廓城、皇城和宫城。宫城居北沿正中，皇城居宫城之南，外廓城从东、西、南三面卫护皇城和宫城。

外廓城南三门，中明德门，东启夏门，西安化门；东面三门，北通化门，中春明门，南延兴门；西面三门，北开远门，中金光门，南延平门；北面三门，均在西偏，东芳林门，中景曜门，西光化门。明德门一门五道，其余均一门三道。两侧的两门道是车道，发现有车轨痕迹。也有说，大明宫西南面的兴安门，原也是城门之一，则隋大兴应有十三城门。墙为夯土版筑，墙基宽9~12米，墙外距墙基3米许，有宽9米，深4米的城壕。

大兴城所在地，从南向北，有自然形成的六条坡岗，宋人说长安南北尽廓有六条高坡，象乾卦的“六横道”符号，宇文恺设计大兴城时也有意地把“六坡”视为“乾之六”，于是，“九二置宫阙，以当帝王之居，九三立百司，以应君子之数，九五位贵，不欲常人居之，故置玄都观，兴善寺以镇之。”⁽¹⁰⁷⁾

对城四角的安排，东北角一方“入苑”。西北角“修真坊”，是汉明堂、辟雍旧址，建有积善寺。东南隅是曲江芙蓉

园。西南隅的两坊土地被禅定寺、大禅定寺所占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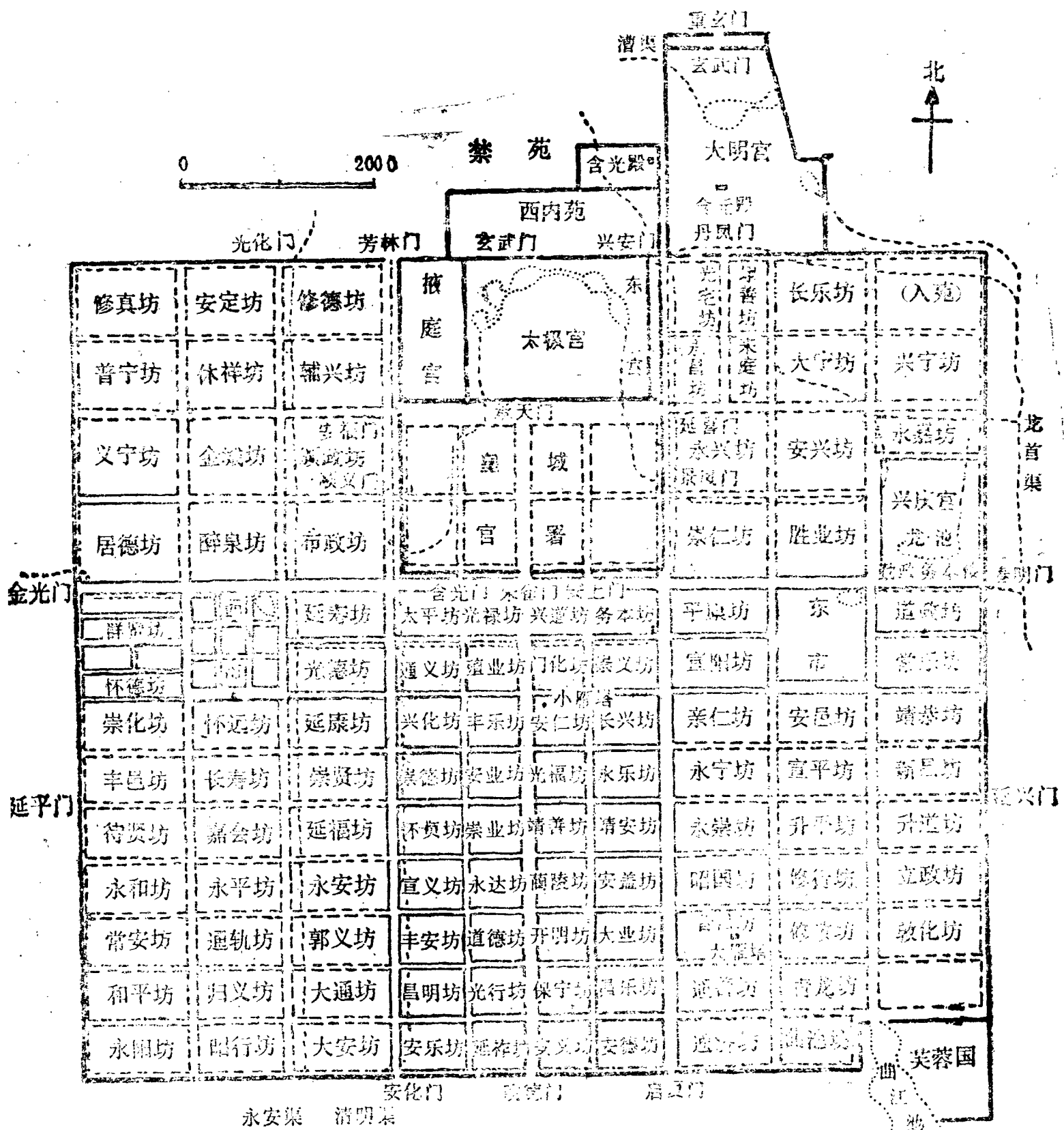
隋初开凿龙首、清明、永安三条水渠。城东龙首渠，引济水向长乐坡，然后分两支：一支经过通化门、兴庆宫，由皇城入太极宫；一支绕城东北角入大明宫南部流入禁苑。城南的永安渠引交水经大安坊，再经大通坊西部入禁苑。城南的另一条是清明渠，引交水经安化门东部向北流入安乐坊，再北入皇城和太极宫。

隋宫城名大兴宫，唐改为太极宫，亦曰西内，位于北部正中，其东为东宫（太子所居），西为掖庭宫（妃嫔所居），中即太极宫，南为皇城，北与外廓墙间为太仓，墙外为大兴苑。宫城南北1492.1米，东西2820.3米。周长约8.6公里，面积约4.2平方公里。墙为夯土版筑，甚为坚实，基宽一般18米，东墙部分为14米。太极宫城南五门，中曰承天门（隋称广阳门、昭和门；唐称顺天门），东长乐门，西广运门。长乐门东永春门，广运门西永安门。东垣一门：凤凰门（初称建春门、通训门）。西垣二门，南通羽门，北嘉犹门。北面二门，中为玄武门，东为东安门。东宫还有一个至德门。经发掘承天门有三个门道，地面铺石条和石板，显得很讲究，是承天门特有的设施。

太极宫有大殿十六，正殿曰太极殿。东有武德殿、神龙殿、昭庆殿、承香殿、凝阴殿、大吉殿、立政殿；西有万福殿、承庆殿、安仁殿、淑景殿，北有两仪殿、甘露殿、延嘉殿。

皇城位于宫城之南，南北长1843.6米，东西宽2820.3米（同宫城）。周长约9.2公里，面积约5.2平方公里。皇城南面正中朱雀门，北和宫城正门承天门相对，南经朱雀大街与外城正门

明德门相通。朱雀门东为安上门（今南大街），西为含光门。东面二门，南景风门（今东大街），北延嘉门。西面二门，南顺义门，北安福门。北面无墙，隔“横街”与宫城相望。“横街”宽441米（据文献记载折算），今考古实测220米，实际为一个广场。



图二十三 唐长安城复原平面图

皇城内南北七条大街，东西五条大街。皇城内唯列府寺，不与民杂居，公私有别，风俗齐肃。皇城是封建国家机关的所在地，为当时的行政中枢。太庙、社稷亦在皇城内。

大兴城内，南北大街十一条，东西大街十四条。通南面三门和东西六门的六街，是主干街道。延平门至延兴门大街，宽55米，其余各街均宽100米以上。朱雀门大街（实际北起承天门，也称天街）宽150米至155米。各道中高侧低，旁有2.5米宽的排水沟，除皇城、宫城和东西两市外，这些大街把全城分成108坊（又说109坊）。这108坊以朱雀门大街为界，以东属大兴县（后改为万年县），以西属长安县。各坊大小不一，朱雀门大街两侧四列坊最小，南北长500~590米，东西宽550~700米。其两侧至城六列坊稍大，南北长同前，东西宽1020~1125米。皇城两侧六列坊最大，南北长660~838米，东西宽同前。皇城南面四列坊只开东西横街，以防“泄气”、“冲城阙”，这是一种迷信的禁忌。其余各坊均开东西南北四门，有东西南北四街，街宽15米左右。每小区又用十字形小巷分成四部分，每坊实际是分16区，日本平城京一坊分为十六町，看来也是起源于唐长安。坊周为土墙，基宽2.5~3米。由此可见，所谓“大街”实际上仅是大道，两旁并无店肆，犹如一条死胡同，商业主要集中在东西两市。各坊实际是居民区。城南各坊，久无定居之民，“耕垦种植，阡陌相连⁽¹⁰⁸⁾”，说明长安城并未全部建成城市。白居易说：“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隋唐长安整齐划一，确如一围棋棋局。

大兴城有两市，东曰都会，西曰利人，唐改称东、西两市。两市各占两坊之地，约一平方公里。两市东西、南北各两条街道，构成井字形，九个方块，每方四面都临街道，开设店

铺，两市各220个行业，是长安商业最集中的地方。

西市设大衣行、鞍辔行、绢行，卖蜡烛的窦家店，侯景先当铺，张家楼饭店等。

东市行业大致与西市相仿。武宗会昌三年（公元843年）六月二十七日夜，东市失火，一次烧毁“曹门以西十二行四千余家”，包括铁行、肉行等许多行业。

围绕东西市，还有不少小商贩，如颁政坊有馄饨业，长兴坊有毕罗店（即抓饭店），胜业坊有小车卖糕饼等等。

长安城手工业发达，如靖恭坊有毡曲；道政坊、常乐坊有酿酒业，其酒闻名长安；崇化坊造乐器；延寿坊造玉器；西市窦义家造蜡烛，而通化门是东出的重要通道，车匠多在此营生。手工业主要分布在东西两市附近和交通要道旁，自然是为了便于采购原料和容易出售产品。

对两个市的探测和部分发掘表明文献记载是正确的。西市南北长1931米，东西宽927米。市内有井字街，街宽10米，街路面还有唐代的车辙痕迹，辙宽1.35米，与各城门所见车辙宽度一致。

对西市北街发掘了三十多米长一段，路土厚1米多，水沟砖砌，房子三间，小巷有道通市街，每间房灶址很多，大间三个灶。出土有唐代瓷片、瓦片。对南街中部的发掘，曾出土珍珠玛瑙残片、骰子、鎏金残片、骨器雕刻物等。

唐都城长安，主要是沿用了隋大兴城并进行了部分扩建，很多地方只是更改了名称。除前已提到的城名、宫名、城门名称的改变外，最重要的就是将隋“里”改为唐“坊”。

东内大明宫的最早修建，是在太宗贞观八年（公元643年），是李世民为他父亲李渊避暑而修的，当时叫永安宫，又

名蓬莱宫，次年改名大明宫，修在京城外东北面龙首原高地上。到高宗龙朔二年（公元662年），唐高宗李治患风湿病，嫌太极潮湿，改修大明宫，龙朔三年又大加修建。

龙朔元年（公元661年），武则天已参预朝政，开始“决百司奏事”。大明宫扩建后，龙朔三年（公元663年）唐高宗和武则天就把政治中心迁到大明宫，这里成了主要的朝会之所。中间除了唐玄宗的几十年间，直到唐末，大明宫一直是朝廷所在地。高宗、武则天迁到大明宫后，原来的太极宫除办理皇帝丧事和即位典礼外，成了一个清闲的处所。

有关大明宫的文献和图象，都把大明宫画作长方形。考古勘察结果发现，大明宫北部修成梯形，南部为长方形。这是由地形所造成的。

大明宫遗址在唐长安城中算是保存最好的遗迹，地面多处宫墙遗迹隆起地面，一些宫殿遗址也高耸于地面上。

大明宫北墙长1135米；西墙长2256米；东墙由东北角起向南1260米，然后向东折304米，南折1050米与南墙接。南墙是京城的北墙，大明宫范围内的部分为1674米。这几个数字相加应为7679米，面积约3.2平方公里。

城墙建筑分城基和城墙两部分，城基宽13.5米，深1.1米，城墙筑在城基中间，两边较城基各窄进1.5米，底部宽10.5米。北墙之北160米处和东西墙外侧约50米处，发现了与城墙平行的夹城，夹城基宽约4米。宫城四壁都设有门。北面除玄武门外，夹城也设门，叫重玄门，都是一个门洞，只有南墙正中的丹凤门为三个门洞。

大明宫内布局，北有太液池，南部有三道东西向平行的宫墙，宫内探明的殿亭遗址有三十多处，多分布在宫城北部。

含元殿是大明宫的正殿，高宗龙朔二年（公元662年）建，遗址位于丹凤门正北610米处龙首原南沿上，高出平地15.6米。《长安志》讲，这个地方，“北据高原，南望爽塿，每天晴日朗，南望终南山如指掌，京城坊、市、街陌，俯视如在槛内。”现遗存的殿基东西宽75.9米，南北长47.3米，殿面阔十一间，进深四间，还有一个巨大的石柱础，约1.4米见方，设想上面原来木柱的直径当在1米左右。殿左、右、后三面，筑厚1.3米的土墙，墙内外壁涂白灰，底部并绘有朱红色边线。台基南面有长约70余米的南出的三条平行的阶梯和与斜坡相间的砖石阶道，中间与两侧的阶道间距约8米，阶道坡度作有节奏而缓和的升降，当时称之为龙尾道。

含元殿两侧各有向外延伸并向南折出的廊址，与殿东南、西南的翔鸾阁、栖凤阁相连。东边的翔鸾阁、西边的栖凤阁台基都高出地面15米。含元殿遗址出黑色陶瓦，大的径23厘米，约是殿顶用瓦，小的径15厘米，应是廊顶用瓦，遗址还有少量琉璃瓦片，可见殿顶已装饰琉璃。从台基四周出土的残石柱和螭首等石刻残片，可见台基周围原亦有石栏和螭首等装饰。

麟德殿的修建略晚于含元殿，遗址位于太液池西隆起的高地上，西距宫城西墙90米，唐代常在这儿大宴群臣。麟德殿夯土台基南北长130.41米，东西宽77.55米，分上下两层，共高5.7米，台基周围砌砖壁，其下绕敷散水砖。台基上三座殿址前后毗连。前殿面阔约58米，十一开间，进深四间，正中减六柱，前附副阶一间，附阶前有东西阶址，前殿后为一宽6.2米的过道，其北接中殿，中殿面阔同前殿，进深五间，以墙隔为中、左、右三室。前、中两殿和其间的过道地面原铺对缝严密的磨光矩形石块。后殿面阔同中殿，进深三间。后殿之后另附

面阔九间、进深三间的建筑。后殿与所附建筑，地面原铺方砖。全部建筑长约85米。中殿左右有东西亭方形台基各一处。后殿左右有矩形楼阁台基一处。《雍录》卷四载，麟德殿东廊有郁仪楼，西廊有结麟楼。左右矩形楼阁台基各有向南延伸的廊址，廊址范围宽广。玄宗“尝三殿打球，荣王堕马闪绝。⁽¹⁰⁹⁾”

三殿即麟德殿。麟德殿打球，证实回廊内的庭院确为空敞。

“大历三年（公元768年），宴剑南陈、郑神策军将士三千五百人于三殿。⁽¹¹⁰⁾”麟德三殿容纳这样众多的人，当然要把回廊和殿前庭院的空间都计算在内。在麟德殿举行这样规模的宴会，也可想见殿堂规模之大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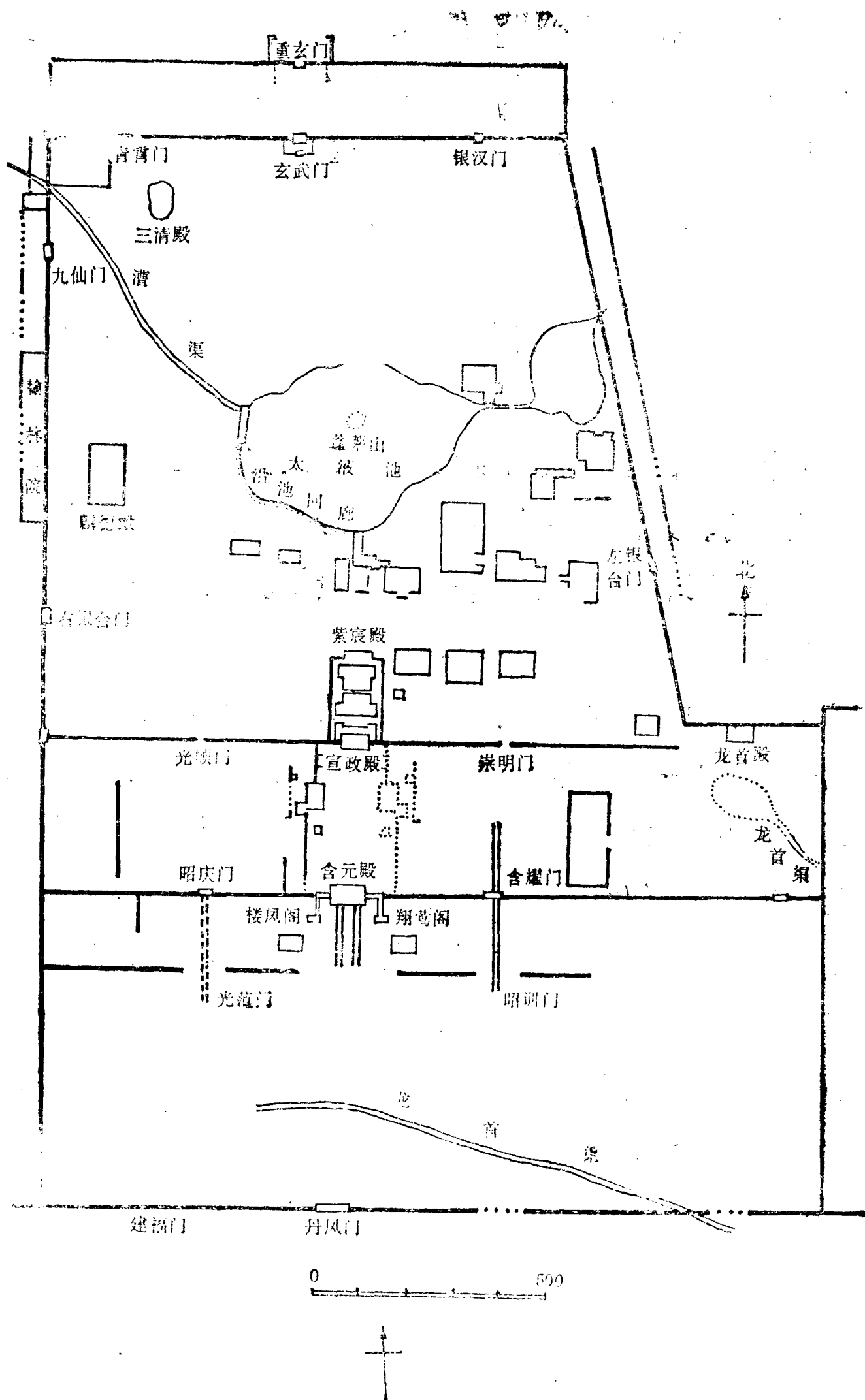
值得注意的是含元殿、麟德殿在建筑布局上的变革。高耸的含元殿，前列两高阁，并有漫长的龙尾道。麟德殿三殿相连，翼以两楼两亭，周绕回廊。这种布局不同于过去殿堂布局的旧传统，可能是由于唐太宗以来，经济文化的逐步繁荣，反映在建筑技术和设计上有了一些新的突破。含元殿之北，为宣政殿和紫宸殿，都在宫城中轴线上。

大明宫西壁外210米处的一个殿堂遗址中，出土了刻有“含光殿及球场等，大唐大和辛亥岁（公元831年）乙未月建”字样的石碑一通，这是宫殿旁建有球场的实证，它与含光殿并列题名，规模之大是可想而知的。

大明宫北部有太液池，池中有蓬莱山，宪宗时曾在周围建游廊四百间。这一带是大明宫的园林风景区。

兴庆宫（南内）是唐玄宗时扩建的一处园林式宫殿区。兴庆宫位置在原来的兴庆坊。兴庆坊本来是玄宗李隆基当太子时的“藩邸”。李隆基当皇帝以后，于开元二年（公元714年）把兴庆坊改造为兴庆宫。开元十四年又扩建兴庆宫置朝堂，开

元十六年竣工，玄宗移此听政。



图二十四 唐大明宫重要建筑遗址

兴庆宫东接京城东墙，南接春明门通金光门的東西大道。宫墙东西宽1080米，南北长1250米，总长4.6公里，平面长方形。墙厚5~6米，南墙20米外还筑有宽3.5米左右的复墙。宫城四面都设门，宫的正门兴庆门在西墙北部。宫内以墙隔为南北两部，北为宫殿区，南为园林区。南区正中有一椭圆形水池，是有名的龙池，池东西长915米，南北长214米，面积达18200平方米。

龙池南部共发掘17处建筑遗址，较重要的有一号和六号遗址。

一号遗址，位于宫城南部西段，西距宫城西壁125米。是一个面阔五间、进深三间的基址。六号遗址位于一号遗址西北，周围有回廊。廊内北部为一建筑遗址。这两处遗址目前尚不能确知为当时哪个楼的遗址。

唐玄宗李隆基前期还关心朝政，历史上有所谓“开元之治”（公元713—742年）。到了天宝时期，他的腐朽糜烂达到了顶点。所以兴庆宫和其它宫城不一样，主要特色是以园林为主，建筑平面多样化，建筑装饰瓦种丰富多彩，仅莲花瓦的种类就多达73种，在宫城东西隅还发现了黄绿两色的琉璃滴水。

唐长安的风景区主要是曲江池。为了皇帝出游曲江池，在靠京城的东墙增修复壁，这就是所谓“筑夹城入芙蓉园”，“人主潜行，外人不知之”。夹城与廓城相距23米，紧接原廓城东部，与廓城东墙南北平行。夹城全长7970米。这种夹城到9世纪初，在大明宫的东西北三面也兴建起来。

曲江芙蓉园在唐大和、开成年间（公元827—840年）几加陶冶，现在探明的曲江芙蓉园遗迹，应是这时的遗迹。遗址在廓城东南隅，面积约141600平方米，合200余亩。曲江池在芙蓉

园的西部，现已无水，据钻测，其遗迹南北长约1400米，东西最宽处约600米，面积约70万平方米。九世纪中叶以后，唐长安统治阶级在这里纵情恣欲，不仅皇室新造楼亭，作乐移日，不少官衙也在曲江各置船舶，“进士开宴常寄其间，大中、咸通（公元847—873年）以来……曲江之宴，行市罗列，长安几于半空”。⁽¹¹¹⁾晚唐长安奢侈游逸之风到如此程度，表明唐王朝已达到极其腐朽的状态了。

隋大兴城在设计、布局上有几个特点。首先，对宫城的防卫加强了。大兴城把宫城置于北部正中，南有皇城，北有禁苑，东、西、南三面有“里坊”、皇城、外廓城的拱卫。宫城墙最高，“崇三丈五尺”，也最厚；外廓城“崇一丈八尺”。

其次，专设皇城。封建统治者为了确保自身的安全，自曹魏邺城开始，历代王朝都城内的中央衙署便开始集中。比如魏晋洛阳，其中央衙署即集中在宫城南出大街铜驼街的两侧。但在衙署外围另筑一城，形成一个皇城，则是隋以前所没有的。《长安志》卷七载：“自两汉以后至于晋末梁陈，并有人家在宫阙之间，隋文帝认为不便于民，于是皇城之内，风俗齐肃，实隋文新意也。”隋文新意的实质就是把封建国家机关与城市居民严格分开，划出森严的界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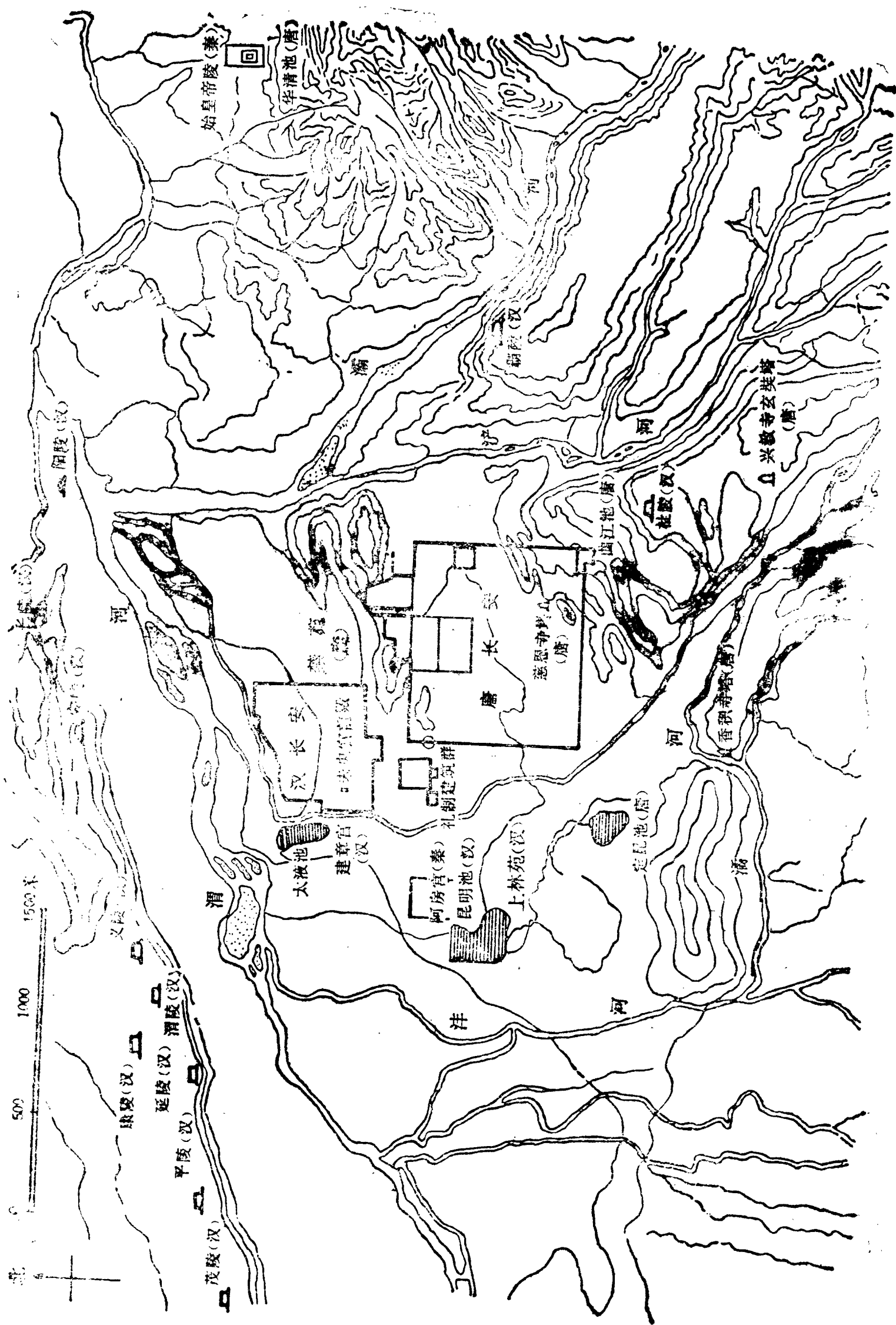
再次，按封建礼教规划都城。皇城内的东南角是太庙，西南角是太社（左祖右社）。皇城南纵列九坊，法周礼王城九逵之制。东西四坊象四时，这些坊只开东西门，害怕“冲城阙”。皇城东西纵列十三坊，象一年有闰。六坡高地都被官衙、王府、寺庙所占有。这些都集中体现了封建时代的建筑特色，是以封建礼教为依据的。

最后，利用宗教进行统治。“文帝初移都，便立寺额120枚于朝堂，下制文：有能修造，便任取之”⁽¹¹³⁾。并且还敕令大兴、长安两县各置县寺一座。在隋王朝大力宣扬、指导之下，大兴城内寺院林立，多达百余座。据清徐松《唐两京城坊考》一书载，唐长安有“僧寺八十一，尼寺二十八，道士观三十，女观六，波斯寺二，胡袄祠四”。

总起来看，大兴城的设计布局，把最高封建统治者皇室居住的宫城，置于北部正中；并有禁苑，皇城，“里”，外廓城以卫护。而且主要高地、主街两侧遍布官府、王宅、寺观，充分体现了以封建皇室为中心，突出最高封建统治者威权的主题。

黄巢农民起义失败后，军阀混战日甚一日，都企图夺取政权，建立自己的小朝廷。盘踞凤翔的军阀李茂贞，盘踞太原的军阀李克用，以及盘踞在开封的叛军将领朱全忠（朱温）等割据势力，你争我夺，互相火并。天祐元年（公元804年），朱全忠为把政治中心挪到他的势力范围以内，以便其把持控制，逼昭宗迁都洛阳，并对长安城进行了毁灭性的破坏。据《旧唐书·昭宗本纪》记载：“全忠率师屯河中，遣牙将寇彦卿奉表请车驾迁都洛阳。全忠令长安居民按籍迁居，彻屋木，自渭浮河而下，连薨号哭，月余不息。秦人大骂于路曰：‘国贼崔胤，召朱温倾覆社稷，俾我及此，天乎！天乎！’”这段记载虽很简单，但可以想见当时用武力强迫人民，按门挨户拆毁房屋，迁移他乡的悲惨情况。经此历史上一大浩劫，长安城顿成虚墟。

此后不久，诗人韦庄写了《长安旧里》一诗：“满目墙匡春草深，伤时伤事更伤心。车轮马迹今何在，十二玉楼无处



图二十五 西安附近汉、唐遗址分布图

寻。”子兰在《悲长安》诗中也写道：“何事天时祸未回，生灵愁悴苦寒灰。岂知万顷繁华地，强半今为瓦砾堆。”这两首诗反映了经过朱全忠破坏后，房屋被拆毁，长安城已面貌全非，到处是墙匡、瓦砾堆，一代都城历史已告结束的情景。

唐长安城比汉长安城在时间上距今为近，规模比汉长安城大，但实物遗址保存到现在的反比汉城为少，这大概是因为唐城在现在西安城周围，历代用土多，破坏力大的缘故。

〔隋唐洛阳城〕

隋唐东都洛阳位于今洛阳市旧城周围、汉魏洛阳城西约六七公里的陇海铁路南侧，东都地形是“前直伊阙，后据邙山，左瀍右涧，洛水贯其中”（113）。

《元和郡县图志》说：“（东都）其宫北据邙山，南直伊阙之口，洛水贯都，有河汉之间……初炀帝尝登邙山，观伊阙，顾曰：‘此非龙门邪？自古何因不建都于此？’仆射苏威对曰：‘自古非不知，以俟陛下。’帝大悦，遂议都焉。”（114）

隋朝统一全国后，社会出现了短暂的繁荣现象，特别是江南地区的农业、手工业、商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从地理位置看洛阳更接近江南。隋炀帝为了更进一步控制关东和江南，为了便于榨取、搜刮这些地方的财物，在即位第二年，即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命令杨素、宇文恺等人营建东都，称为新都。据《隋书》记载：“每月役丁二百万人”，“大业二年春正月辛酉，东京成”。前后修建不到一年时间，大约是初具规模。

唐高祖李渊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废东都，改为洛阳都督府；太宗李世民贞观六年（公元632年）号洛阳宫；高宗李

治显庆二年（公元657年）复称东都。武则天光宅元年（公元684年）称神都。中宗李显神龙元年（公元705年）定名东都，玄宗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改称东京，肃宗李亨上元二年（公元761年）废，第二年，代宗李豫复称东都。

东都洛阳城的外廓东垣长7312米，南垣7290米，北垣长6138米，西垣迂曲，长6776米，总长约28公里，都是夯土筑成，这同西京长安是一样的。南垣三门，各有三个门道，正中定鼎门，东长夏门，西厚载门。东垣三门，正中的建春门也是三个门道，南永通门，北上东门。北垣二门，东安喜门，西徽安门。西垣无门。全城共八座门。

皇城宫城位于全城西北隅，西连禁苑，南临洛河。宫城隋名紫微宫，旋改洛阳宫。皇城在宫城的东、西、南三面，宫城位于全城西北最高处，略近方形，南北稍短，东西稍宽。宫城之北有曜仪城，再北有圆壁城。皇城之东有东城，东城之北有含嘉仓城。所以，《旧唐书·地理志》记：“宫城有隔四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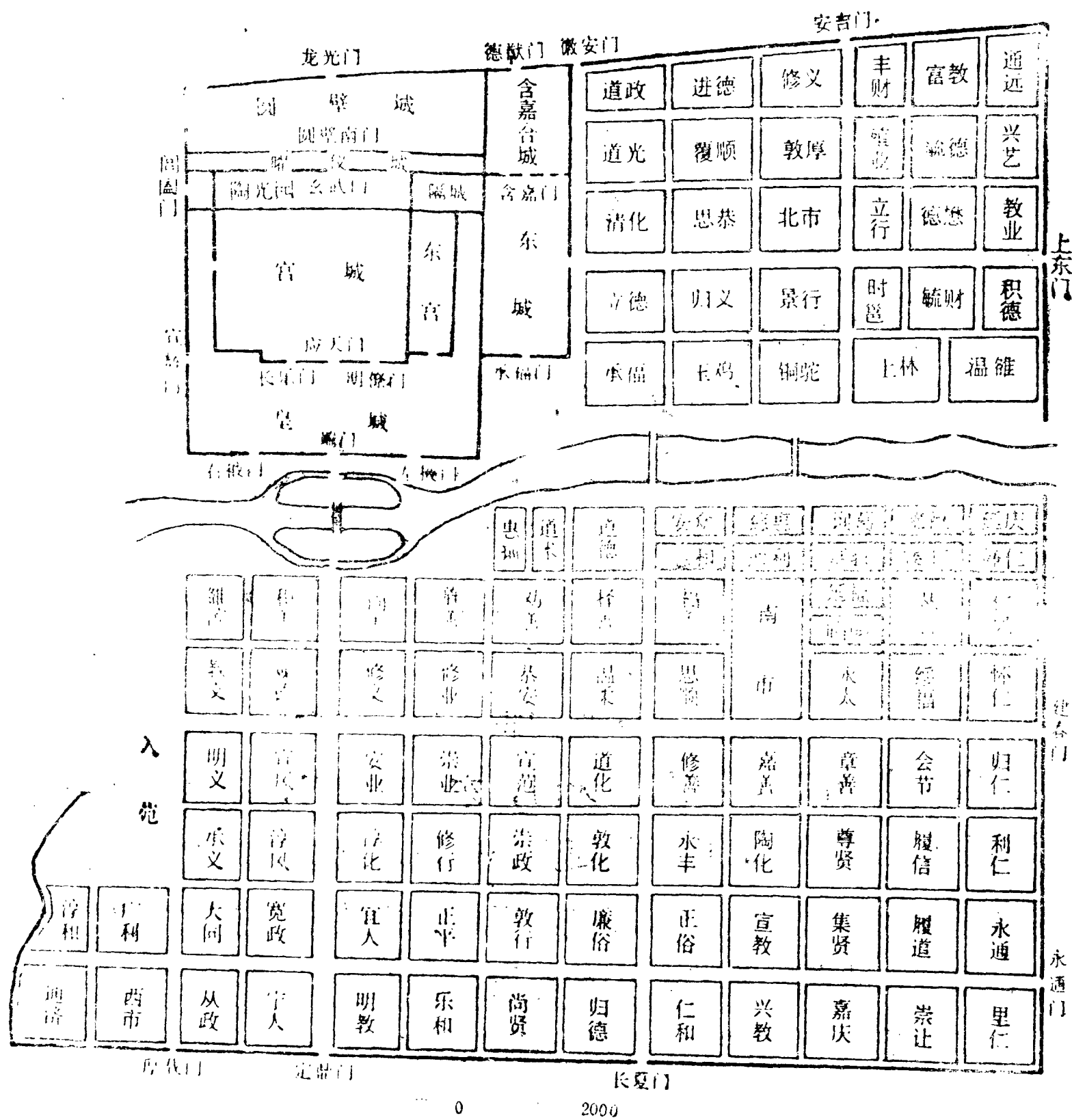
宫城南墙四门，正门应天门，东为明德门，再东重光门（即东宫之南门），应天门西为长乐门，北正门曰玄武门，西垣有嘉豫门。正殿含元殿北有贞观殿、徽猷殿。还有宣政、仁寿、观文、大仪、流杯、宏徽等殿。

皇城隋名太微城，在宫城之南，又称南城。其南三门：中端门，东左掖门。西右掖门。东面一门：宾耀门。西面二门：南丽景门，北宣辉门。皇城中东西南北各四街。1959年发掘右掖门遗址有三个门道。从堆积物看，此城沿用到宋代。

皇城、宫城为土筑砖包。

东城紧附在皇城之东，呈南北纵长方形。皇城和东城内，分布着各衙署。

含嘉仓城在东城之北，南北长约700余米，东西宽600余米，仓城内发现粮窖二百余座，排列整齐，揭示了唐代漕仓储粮的情况。



图二十六 隋唐洛阳城

东都城中，洛水横贯，把洛阳南北一分为二。城北东部是里坊区。洛水之南也是里坊区。据文献记载：都内纵横各十街，一百三坊三市。每坊东西南北各广三百步，开十字

街，四出趋门。三市共占四坊，计一百另七坊。洛南各坊东西500~580米，南北530~560米，基本方形。洛北各方，因城垣东北角为86.5°的锐角，各坊形制略有变化。

在洛水以南探得南北向街道十二条，东西六条。定鼎门大街北起皇城端门，南至外廓城定鼎门，是全城中轴线上的主干大道，亦称天门街、天津街、天街。现存宽度，保存最好处121米，一般约90米，路土厚60厘米，按文献记载应宽147米，长约4000米，其余各街宽度小于定鼎门大街。里坊的数字，《隋书·地理志》、《元河南志》、《两京城坊考》等书均为“一百三坊三市”，唐代坊里数目说法不一，洛阳城址经洛水改道冲刷，经后世建筑占压，已不能探明坊数。中国科学院考古所洛阳工作队经对比文献和探查情况，把唐代里坊数目暂按“一百九坊三市”加以复原。探查证明洛阳里坊基本是方形，或矩形，大小也不尽相同，一般在460~580米之间，坊内有十字街，街宽14米。一些坊内的十字街还可以探出来，也有一些十字街的遗迹还被沿用至今。

洛阳隋代有三市，至唐略有变化。丰都市缩小了半坊，唐名南市；通远市迁到临德坊，唐名北市；大同市迁到固本坊，唐名西市。

西市位于厚载门之西，占一坊。南市原占两坊，纵横各三条街道。其内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四壁有四百余店，“货贿山积”。三市分别临近漕渠、运渠和通济渠，交通运输方便，有利于商业经济的发展。

禁苑位于宫城之西，隋称会通苑，又称上林苑。唐高祖李渊武德初改芳华苑，武则天改神都苑。其范围西至孝水，东抵宫城，北背邙山，南拒非山，谷洛之水会于其间。东面十七

里，南面三十九里，西面五十里，北面二十四里（一作二十里）周126里。东面四门，由北向南：嘉豫门、上阳门、新开门、望春门。南面三门：中兴安门、东兴善门、西灵光门。西面五门，由南向北：迎秋门、游义门、笼烟门、灵溪门、凤和门。北面五门，从西向东：朝阳门、灵囿门、元圃门、御冬门、唐福门。内有凝碧池、上阳宫、龙麟宫、黄女宫、明德宫、含璧宫、芳树亭等主要建筑。

唐代在皇城西南面、禁苑的东部建筑了上阳宫，高宗晚年居此宫听政。此后，上阳宫便成为东都的主要宫殿，代替了原来的宫城，与长安建大明宫有些相似。

与长安城相比，洛阳城的建设有如下特点：

洛阳是竖长方形，面积比长安小；长安皇城、宫城居北部正中，洛阳皇城、宫城居北部之西北隅。北面还有圆壁城、曜仪城，东面有东城，皇城南临洛河，皇城、宫城与居民区的“坊”完全不相接；洛阳里坊面积较小，基本呈方形；洛阳三市，比长安多一市，位置不对称，而且市与渠通，反映商业比长安更繁荣；洛阳宫城偏在西北隅，但通过宫城、皇城正门的中轴线正对伊阙，向北直抵邙山，估计当时规划的意图，可能以此为轴线，建造一个与长安相似的布局对称、而规模比长安更大的都城，但未及完成，因此隋唐洛阳是一个没有建设完成的都城。

隋唐两京的设计规划，对国内外有巨大的影响。

唐州城大多是根据长安、洛阳坊内十字街的设计和洛阳方正的里坊制度而部署的，如南方的益州城和北方的幽州城、云州城，较小的州县城也大抵如此。直至今日，我国的大小城

镇，许多是十字街和正方形的街坊，而放射状和其他形式的街坊、街道较少见。

唐西州和交河城（今新疆吐鲁番市境）是新疆唐代城址的典型代表。西州城为方形，分宫城、内城和外城三部分，和隋大兴、唐长安城布局相仿，城内也有寺院和手工业作坊。交河城发现了类似大兴——长安城的坊的遗址，也使用莲花纹瓦当。

渤海国曾仿唐制设五京，上京龙泉府（今黑龙江宁安县渤海镇）经考古发掘，知该城设计大体摹仿长安：城垣方整，宫城位于正中北偏。宫城南为内城，是中央政府机关所在地。里坊呈东西长方形，亦摹仿长安。中京显德府（吉林省和龙县西古城子）、东京龙原府（吉林省琿春县半拉城），宫城也都在北部正中，为仿长安制；里坊方整，则仿制洛阳。

唐时南诏国在大理修崇圣寺塔，塔高60米，16级，平面方形，造型和唐长安小雁塔基本上一样。在南诏的遗址中发现的建筑材料，和长安兴庆宫遗址中出土的极为相似。

隋唐两京形制对后代都城有很大的影响。

明初定都应天（今南京），仿隋唐洛阳，内城依山傍水建筑。南临秦淮，北控长江，西包石头城，东依紫金山。内城墙全长37.14公里，土筑砖包；外城系利用天然土埂，堆土而成。外城周长号称180里，城门十六。仿洛阳制，根据地形，筑皇城于东偏，亦采用南北中轴线对称式。正南门曰承天门，正北门曰玄武门，承天门前左右侧还有长安左、右门，皇城前大街亦称朱雀大街。由此而见，应天城是综合洛阳、长安两城的特点，又结合应天的自然形势而规划设计的。

明移都北京，皇宫城基本仿制南京。城垣规制方整，宫城位于北部正中，正门也称承天门（后清改天安门），同于长

安。承天门两侧大街以长安命名，称为东西长安街，可见长安城的影响之大。北京城整个规制，也是仿唐长安的规整建制，整齐划一。

另外，两京设计规划对国外也有很大的影响。

在西方，由于唐代国势西展，唐城规制也就影响到中亚。如现在苏联托克马克西的阿克彼兴古城（唐碎叶城）和塔拉斯城（唐恒逻斯城）等，也都是具有十字街道布局的城镇。

对国外影响最大的是对日本五京：腾原京、难波京、平城京、长冈京、平安京。

平城京的面积相当于大兴——长安城的四分之一，东西三千多米，南北近四千米，四周不建城墙，但绕以水渠。城内街道为东西向和南北向的棋盘式的布局，把整个城区分为若干居民坊。每坊之内，又有东西、南北各三条街，分一坊为十六块。宫城位于北部正中，约占四坊面积。宫城南门叫朱雀门。朱雀门至外廓城“罗城门”的大街也叫朱雀大街。朱雀大街把城内诸坊分为左京和右京，又称洛阳和长安。左右京各有一市，叫东市、西市，各坊也有不少寺院。

不仅如此，日本五京都是南北长、东西短，宫城位于北部正中，里坊全部或大部分方形。平城、平安两京均是对称设置东、西两市，每坊内划分十六小区。平城京每坊置东西坊门。

日本各京城的设计，大约在八世纪以后也影响到日本的地方城市。日本设在九州北部筑前的太宰府城和本州西端的周防国府城，都是日本京城的小型化。但主要为接待唐代使臣而设的太宰府城，东西宽于南北，一反日本各京南北长于东西，即仿于洛阳的惯例。而东西长、南北窄的形制，正是隋唐西京长安的制度。

隋炀帝兴建东都洛阳，固然有自己的享乐的因素，但是，我们也不能完全这样看问题。隋东都的建立，有重要的政治、经济方面的原因。这在总论一章中我们已经讲过全国经济发展与都城位置的关系，这儿不再重复。从以后唐代东都的恢复，也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秦王李世民平定王世充叛乱后到了洛阳，“观隋宫殿，叹曰：‘逞侈心，穷人欲，无亡得乎？’命撤端门楼，焚乾阳殿，毁则天门及阙”⁽¹¹⁵⁾。这里说得很清楚，唐初废东都洛阳，撤毁部分标志皇都的建筑，是李世民亲自下的命令。可是，没过几年，唐太宗又下令重修洛阳宫，“以备巡幸”。

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六月“乙卯，发卒修洛阳宫，以备巡幸。”五年九月，“又将修洛阳宫……竟命将作大匠窦璡修洛阳宫。璡凿池筑山，雕饰华靡，上遽命毁之，免璡官。”⁽¹¹⁶⁾这一段记载，很明确地告诉我们，太宗自己推翻了自己当初废东都的命令，又开始修复东都，说明太宗自己开始认识到，建立东都，是政治、军事上的需要。但太宗毕竟比较清醒，不赞成“凿池筑山”，所以罢了窦璡的官。高宗显庆元年（公元656年），在东都旧殿遗址修乾元殿。第二年，高宗“手诏改洛阳宫为东都”。至此，唐代正式恢复东都。其后，东都虽屡建屡废，武则天时甚至正式迁都洛阳，情况是比较复杂的。大体上说，废是因为政治上的原因，复建是由于经济与交通运输上的需要。武则天定洛阳为神都，在位二十余年，只有两年在长安，其余都住洛阳。高宗在位期间，也曾七次到洛阳。玄宗开元年间，亦五次到洛阳。

为了提高洛阳的地位，武则天在天授二年（公元691年）

七月，“徙关外雍同秦等七州户数十万，以实洛阳。”⁽¹¹⁷⁾

初唐以后，洛阳逐渐成为关东江淮漕米的集散地。运往长安的漕米，先运到洛阳储存起来，再转运长安。主要原因是因为黄河三门峡地区运输条件差，运量小。集中到洛阳的漕米一下子运不走，修了著名的含嘉仓储存待运。最后，实在无法，皇帝也只好带着中央政府的官员，“就食洛阳”。

唐初运到长安的漕粮每年仅二十万石，玄宗开元二十一—二十三年，运七百万石，而到开元二十九年，达到四百万石。所以要运这么多粮食，是由于“唐都长安，而关中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常转漕东南之粟。”⁽¹¹⁸⁾

这么多粮食要运到长安，当然是很不容易的。《新唐书·食货志》记载了这一运输困难的情况：

“河有三门砥柱之险，显庆元年（公元656年），苑西监褚朗议凿三门山为梁，可通陆运，乃发卒六千凿之，功不成。其后将作大匠杨务廉又凿为栈，以挽漕舟，挽夫系三钁于胸，而绳多绝，挽夫则坠死，则以逃亡报。因系其父母妻子，民以为苦。”

当然，唐代皇帝去不去东都，还有政治上的原因。照理，关中无粮，皇帝携带官员去洛阳，是很自然的。但中宗时，尽管长安粮食已十分困难，但中宗仍不愿去洛阳。

景龙三年（公元709年），“是岁，关中饥，斗米百钱。运山东江淮谷输京师，牛死十八九，群臣多请车驾复幸东都。韦后家本杜陵，不乐东迁，乃使巫祝彭君卿等同上曰：‘今岁不利东行’。后复言者，上怒曰，‘有逐粮天子耶？’乃止。”⁽¹¹⁹⁾这里说得很明白，唐代遇到粮食问题，即必须东幸洛阳。但中宗不去，表面上是由于韦后的阻挠，但实际上，是由

于武则天长都洛阳，所以中宗不愿去洛，这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

而武则天长都洛阳，也有政治上的原因。高宗立武则天为皇后，武则天残忍地将王皇后和萧淑妃害死于太极宫中。后来，武则天在宫中整日惶惶，老是看见王、萧二人披发沥血，如死时之状，改居大明宫同样如此。所以武则天就跑到洛阳去了。这种说法，属迷信揣测之词，但也不完全是无的放矢。

隋唐两代，皇帝东幸洛阳，中央政府官员和有关诸卫将士都要随行。随行官员可以携带家属，队伍庞大，所过之处，惊官扰民。东幸洛阳，绝非一般“巡幸”，而是把整个中央政府的主要职能机构全部迁到洛阳办公。随员将家室同迁洛阳生活。许多官员，在东、西两都都有住宅。这个制度，从隋代就开始了。在洛阳行使中央政府的职能，各方面有其便捷之处，效率更高，有利于巩固唐王朝的统治地位。洛阳和长安互为补充，共同发挥着国都的职能。

安史之乱以后，东都残破，皇帝也不再去洛阳，洛阳的地位也就下降了。但是，不等于唐长安的粮食等问题已经解决了。德宗贞元（公元785—804年）初年，太仓储粮“供天子六宫之膳，不及十日；禁中不能酿酒。”⁽¹²⁰⁾禁军无粮，上街游行要粮。这时，有三万石米运至陕，德宗欣喜，走到东宫对太子说：“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正因为长安粮食如此困难，后来朱温拆城东迁，以示不能再在这里建都。在一定程度上倒是反映了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

隋唐两京宫殿的政治作用，隋唐两代亦有变化。隋代和唐初长安仅有一宫，即太极宫（隋称大兴宫），所以太极宫是全

国政令中枢。太极宫南门承天门，是举行重要典礼的地方。太极殿是大朝之所，太极殿后的两仪殿是常朝之所，即皇帝处理日常政务的地方。太极殿两廊外为中书、门下等省，两仪殿两旁的一些宫殿，是皇帝住所。

大明宫建成不久，皇帝迁居大明宫。大明宫含元殿名为“殿”，实际作用只相当于“门”，与太极宫承天门作用相似。含元殿后的宣政殿才是大朝之所，紫宸殿是常朝之所。麟德殿前、中、后三殿相连，规模巨大，是集会和宴请之所。

玄宗时，政令中枢一度移到兴庆宫。但安史乱后，玄宗被迫迁居太极宫，兴庆宫失去原有地位，政令中枢返回大明宫。

东都洛阳宫城应天门，是举行大典的地方，同长安承天门相似。乾元殿是大朝之所。武则天时，乾元殿被改建为明堂，后边建佛寺，政令中枢移到上阳宫，这是特例，当时即有人反对。玄宗即位后，拆改明堂为含元殿，恢复旧制。洛阳宫常朝之所宣政殿在乾元殿之西，与长安不一样。皇帝寝殿也在宫城的西部。中书、门下等省也不在乾元殿两侧，而是在宫城东西部。

在宫城之南另建一皇城，集中中央各衙署，是从隋代开始的，唐代沿袭使用。此后，历代都城一般都有皇城，只是形制有所变化罢了。

经济方面，市场是两京经济生活的集中表现。长安有东、西两市，西市设有总管两市的市署。洛阳有三市，以南市、北市为主，西市较偏僻。长安西市号称“金市”，盛唐以后尤较东市繁华。两市的管理比较严格，质量、价格都要检查。时间上，日中为市，日落闭市。各个里坊，都是封闭式的围墙，本没有商肆店铺。但后来有所突破。这种突破说明，随着经济的

发展，这种封闭式的里坊和过分集中的市场，是社会经济发展桎梏的桎梏，所以到后来北宋首都开封，封闭式的里坊已被繁华的街道所代替。唐后期，不但里坊之中有了商业，连夜市也出现了。崇仁坊内，“昼夜宣呼，灯火不绝”。唐政府明令禁止，也无效力。

唐长安和洛阳的手工业种类繁多，工艺水平很高，唐代的金银器、瓷器、铜镜，都达到很高的水平。尤其是唐三彩，两京都有烧造，名誉中外。手工业有官营和私营两种，官营手工业主要是供皇室和官府消费，设少府监（尚方监）管理。还有将作监管理土木工程。

隋唐两京，特别是长安，是全国文化的中心，也是国际文化中心，许多外国人、学者，旅居两京。国子监里有许多外国留学生，其中以日本的最多。

唐代开官修史书之滥觞。在长安设史馆，贞观时修撰梁、陈、北齐、北周、隋书，合称《五代纪传》。后又修《五代史志》、《南史》、《北史》、《晋史》等。著名的《通典》，亦是杜佑在长安修成的。

(1) 本节行文，参考了王仲殊《中国古代都城概说》一文，见《考古》，1982年第5期。

(2) 《观堂集林·秦都邑考》，卷12。

(3) 《元和郡县图志》，中华书局本，41页。

(4) 《史记·秦本纪》，中华书局标点本，203页。

(5) 《三辅黄图校证·三辅沿革》，陕西人民出版社，1页。

(6) 《元和郡县图志》，中华书局本，12页。

(7) 王丕忠《咸阳名称新解》，《西北大学学报》，1981年第2期。

- (8) 《三辅黄图校证·三辅沿革》，陕西人民出版社，7页。
- (9) 《元和郡县图志》，中华书局本，12页。
- (10) 《三辅黄图校证》，陕西人民出版社，6页。
- (11) 武伯纶《西安历史述略》，陕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 (12、13) 《三辅黄图校证》，陕西人民出版社，6页。
- (14) 同上，11页、14页。
- (15) 程大昌《雍录》，卷1。
- (16) 《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卷12。
- (17、18、19、20) 《资治通鉴》，卷11。
- (21) 《史记·货殖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3262页。
- (22) 《史记·高祖本纪》，同上，385页。
- (23) 《史记·高祖本纪》，同上，386页。
- (24) 《三辅黄图校证》，陕西人民出版社，18页。
- (25) 同上，40页。
- (26) 同上，19页。
- (27) 同上，42页。
- (28) 同上，21页。
- (29) 《史记·高祖本纪》，中华书局标点本，385页。
- (30) 张衡《西京赋》，《文选》，中华书局版，38页。
- (31) 《三辅黄图校证》，陕西人民出版社，55页。
- (32) 班固《西都赋》，《文选》，中华书局版，26页。
- (33、35) 程大昌《雍录》卷2。
- (34) 同上，卷3。
- (36) 《三辅黄图校证》，陕西人民出版社，42页。
- (37) 同上，44页。
- (38) 同上，97页。
- (39) 班固《西都赋》，《文选》，中华书局版，27页。
- (40、41) 程大昌《雍录》，卷2。

- (42) 《三辅黄图校证》，陕西人民出版社，82页。
- (43) 班固《西都赋》，《文选》，中华书局版，29页。
- (44) 《史记·平准书》，中华书局标点本，1420页。
- (45) 张衡《西京赋》，《文选》，中华书局版，42页。
- (46、47) 《三辅黄图校证》，陕西人民出版社，30页。
- (48) 《汉书·地理志》，中华书局标点本，1543页。
- (49) 武伯纶《西安历史述略》，陕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104页。
- (50) 《三辅黄图校证》，陕西人民出版社，123页。
- (51) 同上，90页。
- (52、53) 同上，94页。
- (54) 同上，141页。
- (55) 顾炎武《历代帝王宅京记》，中华书局版，116页。
- (56) 《后汉书·杨彪传》，卷84。
- (57) 《太平御览》卷195，引陆机《洛阳记》。
- (58) 《中国城市建设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页。
- (59) 《后汉书·光武本纪》引蔡质《汉典职仪》。
- (60) 《后汉书·献帝本纪》及李贤注。
- (61) 《元河南志》卷2引华廷鑄《洛阳记》。
- (62) 《三国志·魏志·文帝纪》。
- (63) 《初学记》卷24。
- (64) 《三国志·魏志·高堂隆传》。
- (65) 《水经注·浊漳水》卷6。
- (66、67、68) 《嘉靖彰德府志》卷8。
- (69) 《建康实录》卷3引《吴录》。1984年12月，中国古都学会在南京召开第二次年会时谭其骧先生在大会发言中说，此说《三国志》未见记载，诸葛亮亦未到过南京，唐朝人的这条记载不可尽信。
- (70) 正中书局《建都问题论集》附《历代建都议》。
- (71) 陈文述《秣陵集》。

- (72) 朱僊《金陵古迹图考》，96页。
- (73) 《建康实录》卷4。
- (74) 朱僊《金陵古迹图考》，96页。
- (75) 郭黎安《试论六朝时期的建业和武昌》，未刊稿。
- (76) 《南齐书·竟陵文宣王子良传》。
- (77) 《建康实录》卷7。
- (78) 《晋书·谢安传》。
- (79) 《建康实录》卷20。
- (80) 同上，卷13。
- (81) 《太平寰宇记》引《金陵记》。
- (82) 《至正金陵新志》引《宫苑记》。
- (83) 《景定建康志》卷20。
- (84) 《隋书·食货志》。
- (85) 《南史·郭祖深传》。
- (86) 正中书局《建都问题论集》附《历代建都议》
- (87) 《通鉴纪事本末·魏迁洛阳》。
- (88) 《南齐书·魏虏传》。
- (89) 《洛阳伽蓝记》卷3。
- (90) 宿白《北魏洛阳城与北邙陵墓》，《文物》，1978年第7期。
- (91) 《洛阳伽蓝记·序》。
- (92、93) 同上，卷1。
- (94) 同上，卷5。
- (95) 《魏书·世宗纪》。
- (96) 《北史·魏太武五王·广阳王建附子嘉传》。
- (97) 《洛阳伽蓝记》卷5。
- (98) 《隋书·经籍志》。
- (99) 《魏书·高祖纪》。
- (100、101) 《洛阳伽蓝记》卷4。

- (102) 《魏书·成淹传》。
- (103) 《洛阳伽蓝记·序》。
- (104) 《太平御览》卷156转引《西京记》。
- (105) 《隋书·高祖纪》卷1。
- (106) 西北大学考古教研室讲义《隋唐考古》。
- (107) 《唐会要》卷50玄都观条。
- (108) 宋敏求《长安志》卷7。
- (109) 《类说》卷7引《教坊记》。
- (110) 《册府元龟》卷110。
- (111) 唐《摭言》卷3。
- (112) 宋敏求《长安志》卷10。
- (113) 《新唐书·地理志》
- (114) 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中华书局版，130页。
- (115) 《资治通鉴》卷189。
- (116) 同上，卷193。
- (117) 《唐会要》卷84。
- (118) 《新唐书·食货志》。
- (119) 《资治通鉴》卷209。
- (120) 《新唐书·食货志》。

第四章 成熟时期的都城

(宋元—明清)

第一节 成熟时期都城的特点

宋元明清时期，我国古代都城发展到最成熟的阶段。从奴隶社会以来，经过封建社会初期和中期的逐步发展，无论在城市布局、社会经济各个方面，宋元明清时期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两宋的都城开封和临安，虽是在旧城的基础上逐步扩建而成，在街道布局上不太规整，但在城市布局的科学性、合理性方面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开封改变了隋唐长安等城市置宫城于北垣正中的布局，基本上置宫城于城的中央。南宋临安和明南京是根据实际情况将宫城布置在比较合适的地点。元大都基本上是完全重新规划和布局的都城，它继承和发展了唐宋以来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优秀传统，是最接近于《周礼·考工记》中都城规制的城市。明代北京又对元大都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建，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规划建设的一个全国性都城，使中国古代传统的都城规则布局达到最高峰，至今仍是享誉世界的伟大杰作。到清代，在都城宫室方面没有新的建树，但却在北京西郊修建了三山五园，使中国传统的园林艺术达到了新的高峰。

从宋代开始，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商业街。封闭

式的里坊和集中的市场发生了变化，商业经济比起中世纪的都城，空前繁荣，尤其是两宋的开封和临安，更是繁华竞逐，热闹异常。

由于商业和经济的发展，都城范围突破了城垣的限制，在城门外发展起来，形成了关厢。手工业的发展，使城市中出现了同行业的“行会”，保障从业者的利益。

从隋唐以后，中国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经常出现分离情况。除明初一段时间外，全国性都城建于北方，而经济中心已彻底南移到东南沿海地区。为了加强两个中心之间的联系，除了分裂时期外，运河成为联系两大中心的主要交通干线，是封建王朝赖以生存的经济命脉。为了政治和军事上的需要，明代一直把南京作为留都，政治上以奉宗庙，经济上成为南方的中心，作为北京的补充。

由于经济的发展，都城规模空前扩大。北宋开封达到130万人，南宋临安达到120万人，明南京达到120万人，北京达到60万人，清末北京超过了100万人。

这一时期，在北方原来比较落后的边疆地区，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地区性的都城，数量上有很大增长。这些都城，虽比不上中原都城的规模和繁华，对全国的政治、经济上影响也不大，但少数民族都城，尤其是不止一个陪都的出现，说明少数民族受汉族先进文化的影响，开始了农垦和定居。

由于这一时期民族之间的战争频繁，加之军事技术的发展，将火药等用于战争，城市的防御设施进一步加强。魏晋以来个别城市的包砖城垣，发展到明代两京全部用大型城砖建筑都城，使城垣坚固无比，南京城历六百年至今仍屹立在祖国的大地上，成为世界第一大城，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从汉代开始

部分边防城堡使用的瓮城、马面、箭楼，从北宋开封开始，全面运用到都城建设上。护城河也越挖越深广。到明代南京，甚至利用天然的秦淮河及玄武湖等作为护城河，成为我国都城中最深最广的护城河系统。

第二节 繁华竞逐的北宋开封

开封位于华北大平原的南端，周围是一马平川，地势坦荡，给人一种“楚地大无边，苍茫万顷连”的感觉。

北宋前后，开封周围河流成网，湖泊成群。汴河、蔡河（惠民河）、五丈河等河流穿城而过，成为黄淮间的漕运干线。北宋为了漕运的需要，又开凿了金水河，使开封成为诸河水运网的中枢，扼南北交通的咽喉。

开封周围，还是湖泊棋布的地区。西南的园田泽，北宋时烟波浩渺，无边无际。东南有白羊陂、孟渚泽，波光粼粼，水天一色。开封城内外，蓬泽、沙海、金明池、太液池、灵沼池等，更象一颗颗明珠，簇拥着开封。

开封周围，又是气候温和，农业发达，物产比较富裕的地区。文献记载说，都城左近，皆是园圃，百里之内，并无闲地，四周林涧水滨奇花异草，百亭千树，处处田园风光。

当然，开封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也有不利的一面。平畴沃野，无险可守，战略条件不如洛阳，更不如长安。致使北宋一代，常以重兵防守，多达四十万人。加之西近豫西山地仅五十余公里，洪水常顺势而下，由西而东，倾泻在平原上。开封正当河流和洪水冲击汇聚的地方，洪水俯灌都城，在京城周围形成大片低洼易涝的盐碱地，妨碍了都城及周围经济的发展。因而与隋唐时代一样，都城所需粮食及其它物资，主要靠漕运

由江淮地区供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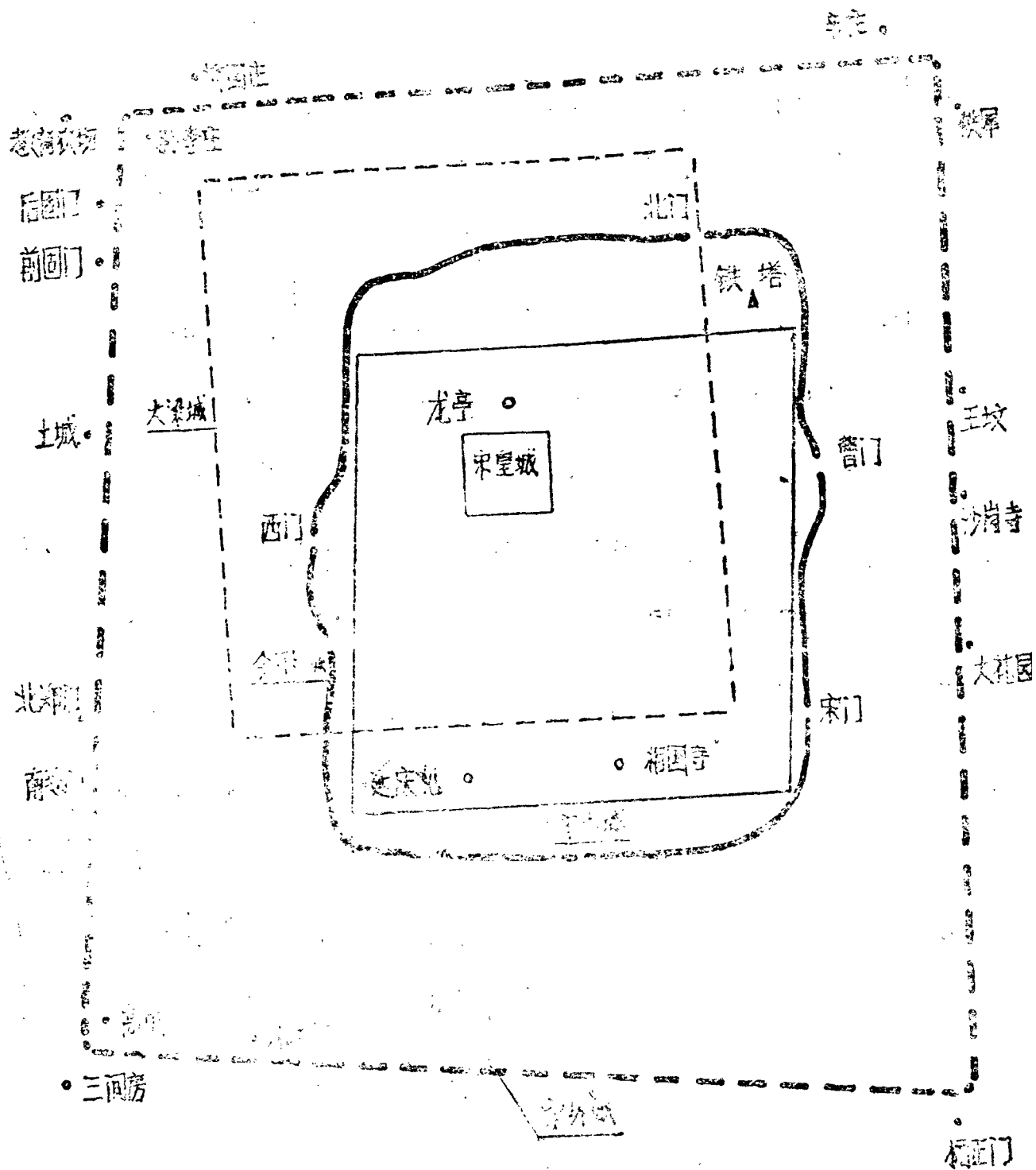
北宋的东京开封是承继五代而来的。

五代时，后梁建都开封（公元907—923年），称为东都开封府，以洛阳为西都。后晋建都开封（公元947—950年），称东京。后周亦定都开封（公元951—960年），也称东京、后周世宗（柴荣）时，曾扩建改造开封城，为北宋都城奠定了基础。北宋自960—1126年，建都开封，称为东京开封府，以洛阳为西京，历时166年。东京开封府因唐代为汴州，故又称汴京、汴梁等。北宋建国后，曾一度想迁都于周汉故地，并将皇陵建于河南巩县，但终未迁成，这是由于全国经济、交通情况已经有了变化，国都西迁是违背历史和经济、交通发展规律的。金人南下，曾都此二十年，名为南京。

梁晋汉周都开封时，均因唐汴州旧城，即原来的开封里城，规模较小，文献记载周二十里一百五十五步，后周显德三年（公元956年），发动十万丁夫，在旧城外围包筑一层廓城，“周四十八里二百三十三步。”北宋时，又多次增修。“大中祥符九年（公元1016年）增筑，元丰九年（公元1086年）重修，政和六年（公元1116年），诏有司度国之南，展筑京城，移置官司军营。^{（1）}”经过几次展修以后，开封外城达到周“五十里一百六十五步。”神宗熙宁年间，“始四面为敌楼，作瓮城及漫治濠堑”^{（2）}，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又买木修置京城四御门及诸瓮城门，封筑团敌马面。”瓮城、马面等正式运用到京城的城垣上。几经增筑，开封城形成了外城、里城和宫城三重城垣和护城河。

外城又称新城、罗城、国城。有门十二，南三门、东二门、西三门、北四门。《宋史·地理志》载十一门，曰西二

门，漏西垣最北端金耀门（即固子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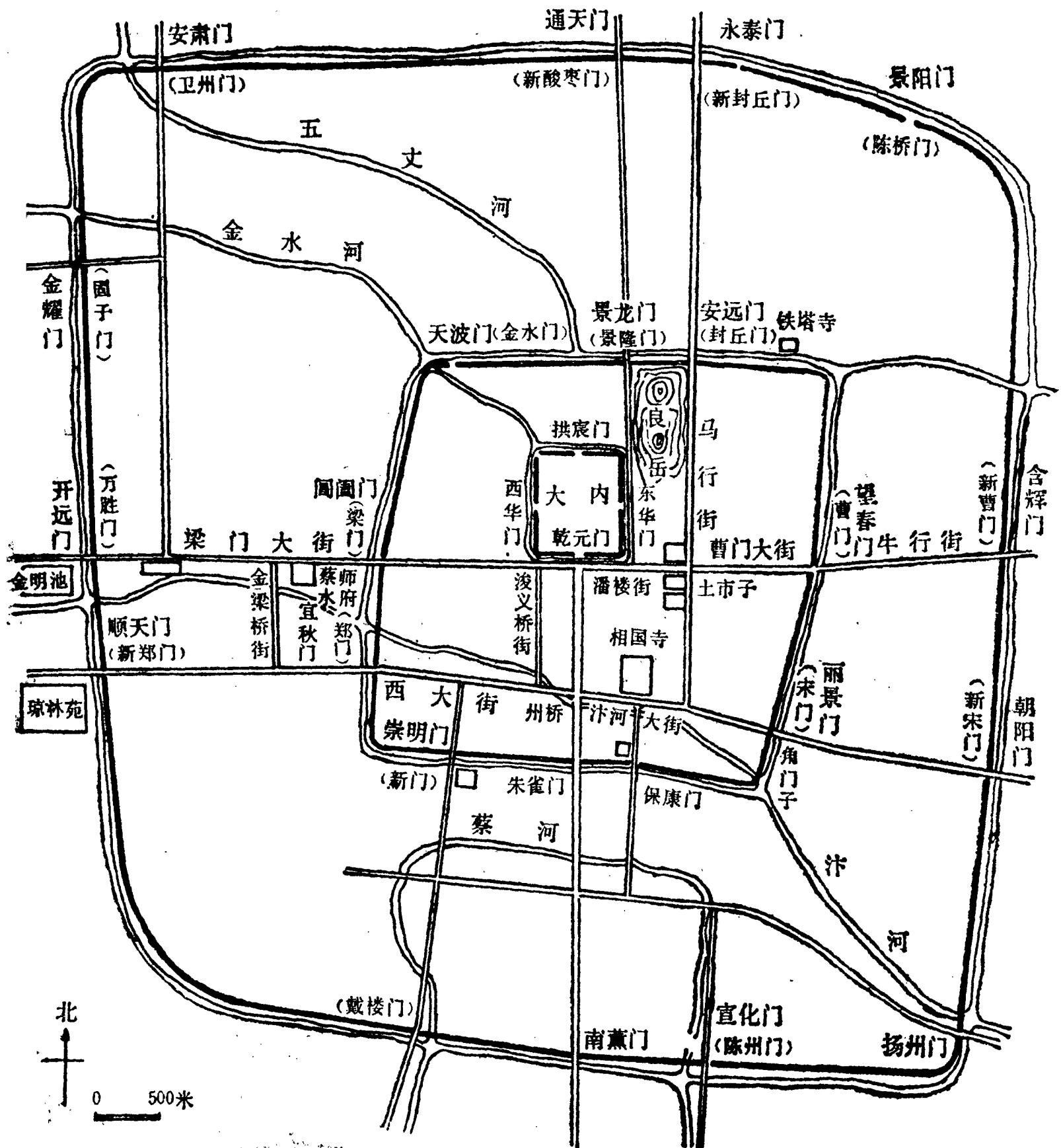
图二十七 开封城垣变迁图

南三门：中为南薰，东为宣化（陈州门），西为安上（戴楼门）。

东二门：南为朝阳（新宋门），北为含辉（曾改寅宾门、新曹门）。

西三门：中为开远（万胜门），南为顺天（新郑门），北为金耀（固子门）。

北四门：中为通天（曾改宁德、新酸枣门），东为景阳（陈桥门），再东永泰（新封丘门），西为安肃（卫州门）。



图二十八 宋东京（开封）复原想象图

东京外城之门除正名外，都有俗名。这些俗称，含有交通地理意义，很有科学性，反映出开封与当时附近州、县、市镇

的交通联系。如出曹门可达曹州（今山东菏泽南），宋门可抵宋州（今河南商丘县），郑门可通郑州（今河南郑州市），万胜门通万胜镇（今河南中牟县东北），陈州门通陈州（今河南淮阳县），陈桥门通陈桥镇（今河南封丘县陈桥），封丘门通封丘（今河南封丘县），酸枣门通旧酸枣县（今河南延津县），卫州门通卫州（今河南汲县）。

“城门皆瓮城三层，屈曲开门，唯南薰门、新郑门、新宋门、封丘门皆直门两重，盖此系四正门，皆留御路故也。”⁽³⁾”

开封有四条河流贯城而过，号称“四水贯都”。外城除陆门外，尚有水门六座。水门跨河，两岸各有门，通人行路。汴河上流水门（西水门）北岸名宣泽，南岸名大通；下流水门（东水门）北岸为通津，南岸为上善。蔡河有水门两座，上流为广利，下流为普济，旁无门通人行路。五丈河（广济河）上承金水河，有水门二座。上流水门列门二，一行水，一行人。行人者称咸丰，行水者称永顺（南北门）。下流只一门行水，称善利。

汴河下流两岸的水门，系水路从东南入京城的第一道门户，至关重要，故于水门外，设拐子城，夹岸百余丈，用以捍卫水门。

东京开封城形状不十分规整，大体是南北略长的矩形。据记载，宋太祖时，为了加强防御，将城墙建成曲屈形状。后人说开封外城状如卧牛，善利门其首，宣化门其领，呼卧牛城。从城西南十里的望牛岗望之，卧牛之形状尤为明显。后来蔡京时，为追求外形美观，才改筑成长方形。外城遗址至明代还存在，清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因黄河泛滥而淤没。

外城之外有护城河——称护龙河。“阔十余丈，壕之内

外，皆植杨柳，粉墙朱户，禁人往来。”（4）

“新城每百步设马面、战棚，密置女头，旦暮修整，望之耸然。”（5）

旧城又称里城、阙城。周二十里一百五十五步，即唐代汴州城。唐德宗建中二年（公元781年），宣武军节度使李勉所筑。宋屡有增修。里城十门，城外亦保留护城河。

南三门：中朱雀，东保康，西崇明（新门）。

东二门：南丽景（旧宋门），北望春（旧曹门）。

西二门：南宜秋（旧郑门），北闾阖（梁门）。

北三门：中景龙（旧酸枣门），东安远（旧封丘门），西天波（金水门）。

另外，还有两个角门。一为丽景门南汴河南岸角门子，一为宜秋门北汴河北岸角门子。

开封内外城皆为土筑，收分很大。《宋会要辑稿·方域》中说：“横厚之基五丈九尺，高度至四丈，而埤堦七尺。”后周显德三年（公元955年）筑城时，“以其土碱，取郑州虎牢关土筑之。”（6）

开封城门为过梁式结构门洞，仍是汉以来的传统。神宗熙宁年间，开始在外城的城墙上设敌楼，城之偏门加筑瓮城。瓮城原用于边防城堡，魏晋洛阳遗址亦曾发现。开封城全面采用瓮城，反映了北宋统治者对防御的重视。到徽宗时，四正门也加筑瓮城。有了瓮城，城门的情况是：“先入瓮城，上设敌楼，次一瓮城有楼三间，次方入大城，下列三门，冠以大”（7）。”

开封的宫城位于内城中部，又称皇城、紫禁城，即大内。周围五里。城外亦有护城河。宋开封三套城墙有三套护城河，

也是中国都城史上少见的。宋大内原是唐宣武节度使治所，后梁称建昌宫，后晋称大宁宫。后周曾经修缮，宋太祖建隆三年（公元962年），“广皇城东北隅，命有司画洛阳宫殿，按图修之，皇居始壮丽矣。”⁽⁸⁾

宫城有门六。

南三门：中为乾元（宋初，依梁、晋之旧，称明德；太平兴国三年，改丹凤；大中祥符八年，改正阳；明道二年，改宣德；雍熙元年改乾元），东曰左掖，西曰右掖。

东垣一门；称东华门，西垣一门，称西华门。北垣一门，称拱宸门（旧名玄武，大中祥符五年改）。另外，东华门北有湫门，是一便门，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始标额。宫城的四角建有角楼，高数十丈。我国历史上宫城建有角楼自此始。

乾元门为宫城正门，是北宋帝王重大政治活动的主要场所，建筑威严壮丽。“列五门，门皆金钉朱漆。壁皆砖石间甃。镌镂龙凤飞云之状。莫非雕甍画栋，峻桷层椽，覆以琉璃瓦。曲尺朵楼，朱栏彩槛，下列两阙亭相对，悉用朱红杈子。”⁽⁹⁾

乾元门（宣德楼）后是正殿大庆殿。“殿九间挟各五间，东西廊各六十间。有龙墀沙墀，正式朝会、册尊号御此殿，响明堂恭谢天地即此殿行礼。”⁽¹⁰⁾

大庆殿“庭设两楼，为寺院钟楼，上有太史局保章正，测验刻漏，逐时刻执牙牌奏。每遇大礼车驾斋宿及正朔朝会于此殿。”⁽¹¹⁾大庆殿殿庭广阔，可容数万人，是宫城内最高大的建筑，坐落在全城的中轴线上。从建筑布局上表现了封建帝王的唯我独尊。在大庆殿的西北是文德殿，即所谓正衙殿。赵匡胤时，“元朔亦御此殿，其后常陈入阁仪如大庆殿……熙宁（公

元1068—1077年)以后,月朔视朝御此殿。⁽¹²⁾”文德殿东北是紫宸殿,“即视朝之前殿,每诞节称觞及朔望御此殿。⁽¹³⁾”紫宸殿西为垂拱殿。“即常日视朝之所,节度使及契丹使辞见,亦宴此殿。⁽¹⁴⁾”此外,还有春秋诞圣节赐宴和策进士的集英殿等。

外朝以北,是后宫,即内廷,是皇帝、后妃生活起居之所。正寝殿是福宁殿,皇帝居。坤宁殿,皇后所居。还有太子、妃嫔等居所。还有后苑及内诸司(学士院、皇城司、四方馆)等机构。

宫城内,还有供皇帝阅事、讲筵、藏书等殿阁。宋宫内主要殿堂是工字形布局,这是宋代才出现,且对元、明、清诸朝宫殿建筑都有极大影响的一种建筑形式。尤其是元大都,就采用这种建筑形式。

开封明堂设在左掖门内。左掖门南有左南廊,为明堂颁朔布政府。

宋宫城居中,且四面开门,与隋唐长安不同。这种方式,对后来金中都及元大都影响很大。

徽宗政和三年(公元1113年)春,在宫城北拱宸门外,修建比宫城略小的新延福宫,号称延福五位(区)。据《宋史·地理志》记载:延福宫东西长度同大内,南北稍短。东到景龙门,西至天波门。这时,宫城加上延福宫,周长达“九里十八步”。宫设东西二横门,一为晨辉,一为丽泽。延福宫内,亭台楼阁数十座,造石为山,凿池为海,疏泉为湖,满布奇禽异兽、嘉花名木,幽境宛若天成,不类尘境。其后,又跨旧城修了延福第六位。城外浚濠,水深三尺,又建二桥,东为景龙,西为天波,二桥之下造石为固,引舟相通,名曰景龙江。后又

继续开辟，东至封丘门，夹岸植奇花珍木，殿宇比比对峙。

徽宗即位之初，“有方士言京城东北隅地协堪舆，但形势稍下，倘少增高之，则皇嗣繁衍矣。⁽¹⁵⁾”于是，政和七年（公元1117年），于里城东北部上清室篆宫之东，仿杭州凤凰山形势，筑万寿山，命名艮岳。山周围四十余里，最高一峰高达九十步。山上修筑楼馆亭台，山下开凿池沼洲渚。“山林岩壑日益高深，亭榭楼观不可胜记，四方花竹奇石咸萃于斯，珍禽异兽无不毕有。⁽¹⁶⁾”为了修筑艮岳，派人搜罗天下奇花异石，特别是到江浙一带搜寻太湖石，用船运往开封，堆砌假山景，就是花石纲。花石纲使天怒人怨，全国鼎沸。延福宫和艮岳，是宫城的延伸和扩大，属于离宫别馆的性质。

开封城外，还有金明池等皇家苑囿。金明池位于顺天门（新郑门）外，“周围九里三十步。池东西直径七里许。⁽¹⁷⁾”池岸建有临水殿阁、船坞、码头等。池中央有岛，建有圆形回廊及殿阁，以桥与岸相连。“入池门内南岸，西去百余步，有面北临水殿，车驾临幸，观争标锡宴于此。往日旋以采幄，政和间用土木工造成矣。又西去百余步，乃仙桥，南北约数百步，桥面三虹，朱漆阑楯，下排雁柱，中央隆起，谓之‘骆驼虹’，若飞虹之状。桥尽处，五殿正在池之中心，四岸石甃，向背大殿、中坐各设御幄，朱漆明金龙床，河间云水，戏龙屏风，不禁游人。⁽¹⁸⁾”宋画《金明池夺标图》，形象生动地描绘了金明池的布局和龙船、虎头船争标的情况，除金明池外，还有琼林苑、宜春苑、玉津园等。

北宋东京开封城因是逐步扩建而成，整个城市，街道布局等与唐长安有显著的不同。街道成井字形。主要街道有“御路”四条：从乾元门至南薰门；从乾元门向东至土市子，向北

至永泰门（新封丘门）；从州桥向东经丽景门（旧宋门）至朝阳门（新宋门）；从州桥向西经宜秋门（旧郑门）至顺天门（新郑门）。

东京城的街道宽窄不一。乾元门前的御街宽约二百余步，约今三百米。实际上是一个宫廷前广场。“两边乃御廊，旧许市人买卖于其间，自政和间官司禁止，各安立黑漆杈子，路心又安朱漆杈子两行。中心街道，不得人马行往，行人皆在廊下朱杈子之外。杈子里有砖石甃御沟水两道，宣和间尽植莲荷，近岸植桃李梨杏，杂花相间，春夏之间，望之如绣。”⁽¹⁹⁾

其它街道宽二十五步至五十步。著名的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上所画的一段街道，估计15—20米宽。由于开封沿街开店铺，形成商业街，同时人口激增，所以街面十分繁华，中世纪长安、洛阳那种大街上只见死气沉沉的坊墙的局面消失了。

开封城内有四条河流，均通过护城河相互连通。汴河横穿城东西，通南北大运河，东通泗州入淮，是开封运进物资的生命线，光汴河运输的粮食每年就达五六百万石。“漕引江河，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²⁰⁾。

由于河流多，城内外桥也很多。据文献记载，汴河上有桥十三，蔡河上有桥十一，广济河（五丈河）上有桥五，金水河上有桥三，共计桥三十二座。汴河上东水门七里有一座虹桥，“其桥无柱，皆以巨木虚架，饰以丹雘，宛如飞虹。”⁽²¹⁾州桥（即汴州桥，正名天汉桥）“正对大内御街，其桥与相国寺桥皆低平，不通舟船，唯西河平船可过，其柱皆青石为之，石梁石笋楯栏。近桥两岸，皆石壁，雕镌海马水兽飞云之状，桥下密排石柱，盖车驾御路也。”⁽²²⁾”河流纵横，桥梁飞架，加上城

内外的泽藪湖泊，使北方城市开封，有了江南水乡风光。

东京的居民数文献记载不一。《宋史·地理志》记载，“开封府，崇宁间有户二十六万一千一百一十七，四十四万二千九百四十口”，宋朝的口是指男丁数，妇女不计。全城总人口当在110万—130万之间。除去城外附属县（当时开封府有16县，城内开封、祥符两县，城外14县）约40万人。加上禁军约40万，故实际人口仍在110—130万左右⁽²³⁾。为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开封城的面积只有唐长安的一半，人口比唐长安多，可见人口密度、建筑密度显著增加。

开封居民居住的是密集的院落式住宅，里城和外城都有居住区、商业区。外城之外，还有商业和居民区。按地段划分坊，若干坊为一厢。城内有8厢121坊，城外有9厢14坊，这些都只是行政管理单位。唐以前严格的里坊制度和坊墙制度已经没有了。

开封在作为首都以前，已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商业都会。五代几个小朝代作为首都，曾不断有所增修。北宋时虽曾大规模增修，但由于迁就于旧城原有的布局，所以，它不象隋唐长安、洛阳那样规整。这是我国古代都城中的一种重要类型。尤其在商业经济方面，宋开封由集中的市发展为繁华的商业街，分布城市各处。服务行业、游乐场所大量增加，甚至御街亦半开放为交易处所，出现了夜市等，反映了我国都城由中期向后期变化的特征。开封城在我国都城史上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乾元门前的宫廷广场，中央一些官署集中在它的两旁。据文献记载，有秘书省、尚书省、景灵东宫、西宫、大晟府、太常寺等。但中央百司没有集中一处，宫城面积开始时也不很大，是迁就了旧城改造的结果。

东京都城之外,出现了民居、店肆和官私手工业作坊,所以在大中祥符年间,在新城外置八厢(以后增为九厢),以便管理,但城外九厢仅管十四坊,而城内八厢管一百二十一坊,说明城外商业居民区相对比较稀疏。

东京开封在城市经济方面,比过去历代都城有很大发展。东京有工商业及服务行业一百六十行,工商业及其他服务性行业一万五千户,约占东京总户数的十分之一。这是一个很不小的比例。到北宋末年,比例还要大一些。当时国内其他城市的工商业情况,没有一个能和开封相比的。

由于工商业户的增加,坊市制度的崩溃,北宋前期,居民及工商“侵街”现象不断发生,工商店铺和御店越来越多。原来宽广的大道两旁,建成了栉次鳞比的临街房舍。尽管北宋政府屡次禁止,下令拆除,但效果不大,最后,北宋政府只好承认了这个事实。

宋代东京的手工业,无论官营、私营,都有较大的发展,官私手工业队伍庞大,据《宋会要辑稿》提供的有关材料统计,官手工业的各种工匠,即达八万人以上,这是过去历代首都所不及的。除工匠以外,宋代东京还大规模地利用军匠进行生产。北宋是雇佣兵制,为了生产武器,把大批厢军及工艺技术较高的士卒,转到官营手工业作坊中进行生产。他们的服务性质是终身的,其待遇以技术高低为标准,并不比雇佣的一般工匠低。军匠不足时,即招募民间工匠。这种招募虽带有强制性,但给以雇佣工值。官营手工业经营的种类多,分工细,规模大,一些新兴工业,如“火药作”,还实行严格的保密制度,官营手工业的产品,主要是供皇室消费和国防军需,也用于对外贸易即“贡赐”贸易中的“回赐”。剩余部分,亦可在

市场上出卖。

私营工业一般说来规模小，一家一户，父子兄弟世代相袭，亦工亦商，工商结合。经营品种比较单调，一种是技术师徒相传，如刺绣、染色、衣帽、制笔等行业。一部分作坊有雇佣劳动，形成作坊主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雇佣剥削关系。由于雇佣关系的发展，行会在这方面的职能加强了。“凡雇觅人力，干当人、酒食、作匠之类，各有行老供雇。觅女使即有引至牙人。⁽²⁴⁾”东京桥头街巷口，每逢早晨，有一些竹木匠人等，在那里等候呼唤，受雇做短工。当然，宋代东京这种能雇佣人力的小作坊还是很少的，规模又小，被雇佣者还形不成一个阶层。

开封大街小巷，店铺林立，繁华异常，宫城南的乾元门外御街，两边有御廊，曾一度准许商人买卖交易。尤其是州桥（即汴州桥）以南，至朱雀门，两边酒楼、饭店、香药铺、茶馆和其他商店，夜市直至三更。“自州桥南去，当街水饭、爇肉、乾脯。王楼前獾儿、野狐、肉脯、鸡。梅家鹿家鹅、鸭、鸡、兔、肚、肺、鳝鱼、包子、鸡皮、腰肾、鸡碎，每个不过十五文。曹家从食。至朱雀门，旋煎羊、白肠、鲜脯、爇冻鱼头、姜丝剝子、抹脏、红丝、批切羊头、辣脚子、姜辣萝卜。夏日麻腐鸡皮、麻饮细粉、素签沙糖、冰雪冷元子、水晶皂儿、生淹水木瓜、药木瓜、鸡头穰沙糖、绿豆、甘草冰雪凉水、荔枝膏、广芥瓜儿、咸菜、杏片、梅子姜、莴苣笋、芥辣瓜儿、细料饅饅儿、香糖果子、间道糖荔枝、越梅、镡刀紫苏膏、金丝党梅、香枳儿，皆用梅江匣子盛贮。冬日盘兔、旋炙猪皮肉、野鸭肉、滴酥水晶鲙、煎夹子、猪脏之类，直至龙津桥须脑子肉止，谓之杂嚼，直至三更。⁽²⁵⁾”

自州桥东转为东大街有经相国寺前后至宋门，有鱼市、肉市、金银器铺等。自州桥西转为西大街有珠玉铺、鲜果行等，琳琅满目。开封的水果、糖果，有河北、西京（洛阳）的梨，河阳的石榴，沙苑的温棣，四川的乳糖、狮子糖，温州、鼎州、广州的柑子，江西的金柑，福建的荔枝、龙眼等等。皇城东华门外，“市井最盛”，禁中买卖在此，天下之宝玉、珍玩及饮食、花果、时装等，无奇不有。附近潘楼一带，大商人云集，每一交易，动辄千万。光京师酒楼，正式的就有七十二家。酒楼前，“皆缚采楼欢门”，渲染气氛。除夜市不受时间限制外，还出现一种鬼市子。“东十字大街，曰从行里角，茶坊每五更点灯，博易买卖衣物、图画、花环、领抹之类，至晓即散，谓之‘鬼市子’。（26）”

“任店酒楼，入内主廊约百余步，南北天井两廊皆小阁子。向晚灯烛荧煌，上下相照，浓妆妓女数百，聚于主楼面上，以待酒客呼唤，望之宛若神仙（27）。”

瓦市交易是开封商业活跃的又一个方面。瓦市是一种定期交易场所。相国寺瓦市很为典型。相国寺每月五次开放“万姓交易”。万物百货，分区交易。大三门是飞禽猎犬之类，二、三门皆动用什物。迎佛殿，则密煎、笔、墨占定两廊，是师姑们卖绣作、领抹之处。殿后资圣门前，如书籍、玩好、图画及诸路罢任官员土物香药之类。后廊皆日者货术传神之类。相国寺中廷、西廷，可容两万人交易。和尚惠明，在“烧猪院”成了善做猪肉佳肴的能手，达官贵人也到那里去品尝。佛教圣地，失去佛之灵光，成了商品交易的“破脏所”。官府专门成立了“寺务司”，管理寺院修缮和市场交易。

商业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一批富商大贾。官僚、贵族亦争

相开店，古代官场以商为耻的思想，已被冲荡干净。宋真宗时宰相王旦曾说，“京城资产百万者至多，十万而上，比比皆是。⁽²⁸⁾”宰相赵普，遣亲吏到秦陇“贩木规利”，“广第宅，营邸店，夺民利”⁽²⁹⁾。北宋末年，官僚何执中，“广殖资产，邸店之多，甲于京师”，每天可以得房钱一百二十贯，每年可得四万余贯。⁽³⁰⁾”

开封的商业税收是宋政府的重要财政来源之一。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以后，东京每年商税，酒税即达四十万贯以上。元丰八年，更增至五十五万贯以上。官府直接经营的其他工商业收入还不在于其内。

工商业的发展，在户籍上，出现了“坊廓户”，东京坊廓户分上、中、下三等。这是我国都城经济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

在文化生活方面，东京开封最突出的娱乐场所是瓦子勾栏。瓦子勾栏的伎艺有说书、小唱、杂剧、傀儡、讲史、小说、散乐、舞蹈、影戏、杂技等。东角楼“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则中瓦，次里瓦。其中大小勾栏五十余座。内中瓦子、莲花棚、牡丹棚，里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容数千人。⁽³¹⁾”瓦子除娱乐项目外，“多有货药、卖卦、唱故衣、探搏、饮食、剃剪、纸画、令曲之类。⁽³²⁾”

在文化事业方面，东京是全国的文化中心，也是一个国际文化城市。太学是最高学府，位于保康门内。崇宁年间有学生3800人。太学内有北宋仁宗嘉祐年间用篆楷两书体刻的石经，称“嘉祐石经”或“二体石经”。太学以外，还有国子学、四门学、武学、律学、算学、医学等，都是一些专科学校。昭文馆、史馆、集贤馆藏书八万卷。

北宋刻版印书、绘画、书法都很发达。国子监所刻书版，称为“监本”。除官刻外还有私刻，如春明坊宋家，昭德坊晁家。北宋初，宫廷中设有翰林图画院。宋真宗时，营造玉清昭应宫，征集全国画家三千人。《清明上河图》的作者张择端，就是画院画家之一。宋徽宗以宫廷生活为题材的画和瘦金书，都颇有造诣。政和年间，曾把绘画列入科举学制，这是前所未有的。

北宋很重视类书的编纂。《太平御览》、《册府元龟》都是在开封编成的重要类书。

开封城内还有很多重要建筑。佛寺有相国寺等五十余处，道观有朝元万寿宫等也达五十余处。庙、庵等有六十余处。可惜由于北宋后几次大水漫灌，除开宝寺铁塔外，均已不存。

开封还是一个国际经济文化城市。高丽、印度、日本、越南等国在开封同宋都有文化交流活动。高丽等国在开封派有留学生，有的学成不归，登进士第，在中国做官。同印度之间双方僧人往来甚多。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还在太平兴国寺专门设立译经院，从事佛经翻译工作。高丽、越南等国在开封采购大批书籍，这是他们派遣来的使节和留学生的任务之一。书画、雕刻、舞乐等方面，北宋开封与亚洲各国的交流也是十分频繁的。高丽曾有“伶官”十余人到东京专门进行表演。

第三节 钱塘形胜——南宋“行在”临安

杭州位于浙江西北部富庶的杭嘉湖平原的南端，钱塘江口的北岸。杭嘉湖平原是湖沼和河流冲积平原，海拔在20米以下。平原土壤肥沃，雨量充沛，水网密布，物产丰饶，与苏州并称“天堂”。

平原的西北方是天目山，西南东南是龙门山和会稽山。钱塘江在杭州以东是一个喇叭口，称杭州湾，杭州湾以东是王盘洋。王盘洋东南方，是散落在海上的一串宝珠——舟山群岛，形成一道海上的天然屏障。

正是由于这是一个四方拱卫的鱼米之乡，又有一个风景优美的西湖，杭州才可能在南宋的150多年中，发展成为南部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明正德三年（公元1508年），郡守杨孟瑛请浚西湖疏中曾概括说：“杭州地脉，发自天目，群山飞翥，驻于钱塘。江湖夹挹之间，山停水聚，元气融结……故杭州为人物之都会，财富之奥区，而前贤建立城廓，南跨吴山，北兜武林，左带长江，右临湖曲，所以全形势而周脉络，钟灵毓秀于其中。”⁽³³⁾”

北宋末年，金人南下，宋室南迁，自高宗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驻蹕临安，至1276年临安被元军攻破，南宋建都临安共147年。南宋一代，始终称临安为“行在所”，以示他们不忘收复中原，还都汴京。实际上，南宋一代，在临安“春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哪里还有北归之念。

起初，金军攻陷汴京后，高宗赵构重建宋室于南京（今河南商丘）。仅仅五个月，又被迫南迁，先后建行都于扬州、建康、杭州、越州等地。南逃途中，宋臣多数主张建都建康，少数主张临安。建炎年间，高宗与群臣关于建都问题的讨论，较大的有三次。南京复建宋室仅一、两个月，在南京提出了三种方案：李纲请营南阳，宗泽请幸汴京，汪伯彦、黄潜善请幸东南。李纲说：“天下形势，关中为上，襄、邓次之，建康又次之。今宜以长安为西都，襄阳为南都，建康为东都，各命守臣，葺城池、治宫室、积糗粮，以备巡幸。”⁽³⁴⁾”这次议而未决，但军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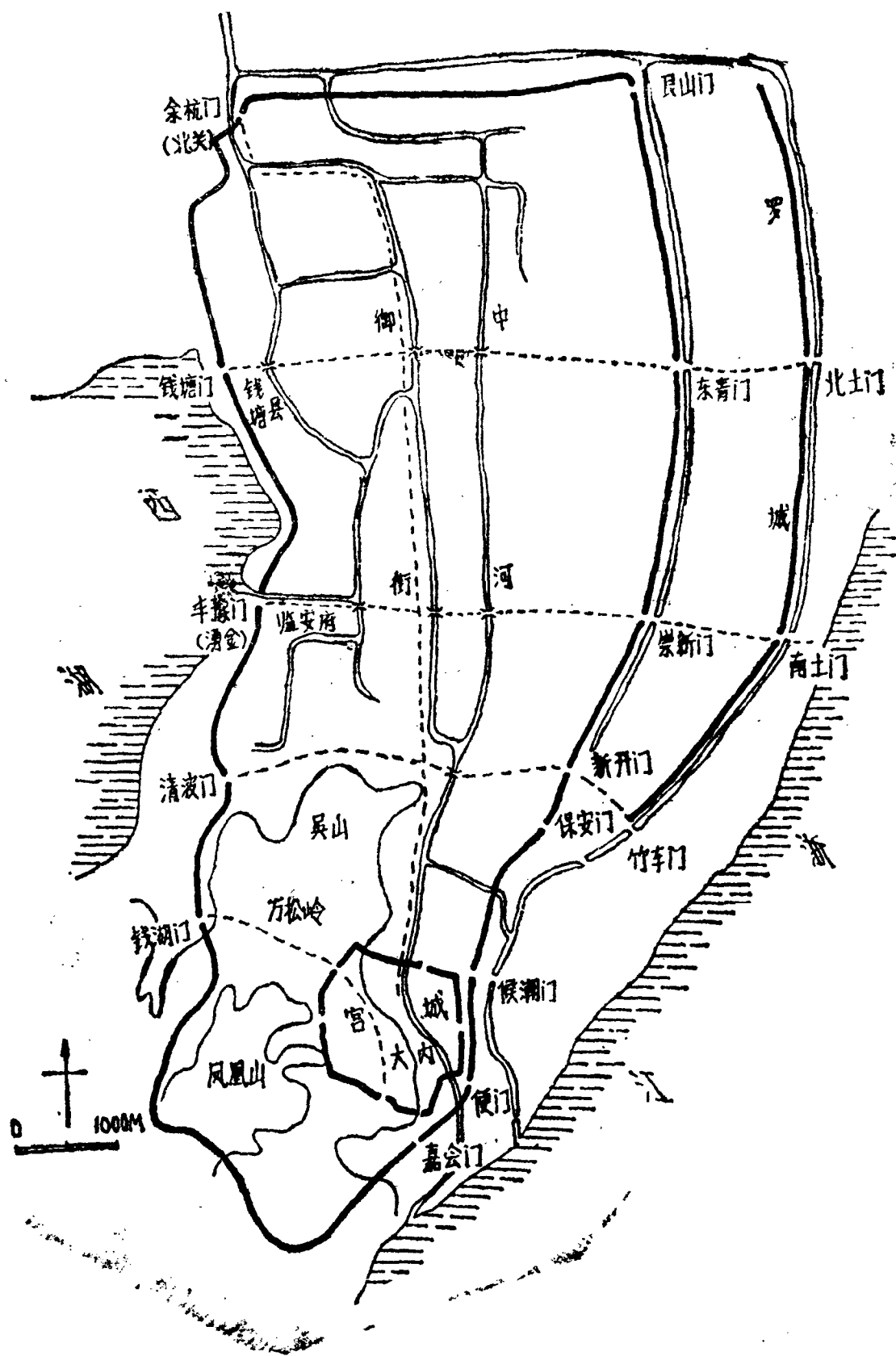
上迅速溃退，金军兵临城下，次月，高宗决定“巡幸东南以避敌之计”。卫尉少卿卫肤敏上言：“建康实古帝都，外连江淮，内控湖海。负山带海，为东南要会之地”。⁽³⁵⁾中书舍人刘珣则指出“幸南阳”之弊：“新刳于乱，千乘万骑，何所取给”，并进一步阐述定都建康的有利条件：“夫骑兵，金之长技，而不习水战。金陵天险，前据大江，可以固守；东南久安，财力富盛，足以待敌。”经过一番议论商讨，认为迁都建康是可行的：第一，建康是六朝故都，东南故地；第二，东南久安，财力富盛，具有雄厚的经济基础；第三，凭险长江，有利于军事上的固守。可是军事形势的发展，却出乎意料。赵构从商丘南巡到扬州，仅一年多，金兵已至城下，高宗逃至镇江，再次召议，径趋杭州。行至平江府（苏州），当时已提举杭州洞霄宫的卫肤敏，再次入对。坚持说：“余杭地狭人稠，区区一隅，终非可都之地，自古帝王未有作都者……欲以号令中原，难矣！”⁽³⁶⁾可是高宗深恐大江阻挡不了金军，建康不保，去杭之志已定。于是，卫又转而附和“为今之计，莫若暂图少安于钱塘，徐诣建康”。⁽³⁷⁾于是迁杭之事就事实上定了下来。

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二月壬戌（十三日），高宗到了杭州，三月初发生苗傅和刘正彦兵变，逼高宗逊位于皇子魏国公，经多方斡旋，一个月后，高宗勉强复位，只好装出一副抗金姿态，移蹕建康。不久建康又告急，高宗再次召议迁都。高宗提出，“朕若定居建康，不复移蹕；与夫右趋鄂岳，左驻吴越，山川形势，地利人情，孰安孰否，孰利孰害？”张浚提出迁都武昌，张扩提出上策幸巴蜀，中策都武昌，下策都建康，这两种意见都遇到反对，认为东南是今日根本。张邵提出，“今纵未能遽争中原，宜建都金陵，因江、淮、蜀、汉之资以

图恢复”⁽³⁸⁾。于是，高宗只好暂留建康，但不久建康危若累卵，百官群臣中希望权都杭州的人逐渐增加，于是尚书考功郎楼炤提出，“权都建康，渐图恢复……权都吴会，以养国力。”于是正中高宗下怀，升杭州为临安府。金军迫近，高宗一路逃难，历经越州、明州，下海逃往温州、台州，金人下海追三百里，遇风暴而返。高宗北返越州，升越州为绍兴府，作为行都，并改年号为绍兴。第二年又以漕运不济，而迁往临安。这时金军力所不及，已退往江北，于是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正式定临安为行在所。然而，终南宋之世，虽定都杭州已属既成事实，但移都建康之议仍绵延不绝。如陆游在《上二府论都邑劄子》中曾大声疾呼：“然某闻江左自吴以来，未有舍建康他都者。……天地造设，山川形势有不可易者。”高宗也不得不装装样子，屡次短期移蹕建康，并定建康为宋“行都”，作为陪都。至孝宗即位也曾下诏经理建康，以图进取，但终未能改变都杭之事实。主要原因，一则杭州较建康远离前线，南宋君臣北进收复中原只不过是装装样子。二则杭州终离建康不太远，同样位居江浙最富庶地区，在财、物的供给上，与建康没有太大区别。所以，南宋终以临安府为“行在所”，是由当时的军事形势及杭州本身的经济、文化等条件所决定的。

南宋临安城的前身是吴越西府城。吴越曾在隋代城垣的基础上大规模地扩建罗城，周达“七十里许”（吴越制），称为西府城，城垣夯土版筑。南宋在吴越城的基础上增修，东南扩大了一些，北部紧缩了一点，并逐渐修成砖城。城是腰鼓形，故俗称“腰鼓城”。据《南宋古迹考》载，“宋行在十三门。《咸淳志》载绍兴二年，霖雨城坏。二十八年，增筑内城及

东南之外城，附于旧城。⁽³⁹⁾”十三城门的名称，东为便门、候潮、保安、新门（又名新开门）、崇新、东青、艮山，西为钱湖、清波、丰豫（又名涌金门）、钱塘，南为嘉会，北为余杭（又名北关门）。另有水门五：保安、南水、北水、天宗、余杭。水陆共十八门。



图二十九 南宋临安城复原想象图

“其诸门内，便门、东青、艮山皆瓮城。水门皆平屋。其余旱门，皆造楼阁。诸城壁各高三丈余，横阔丈余，禁约严切，人不敢登，犯者准条治罪”⁽⁴⁰⁾。

临安宫城即内城，周九里（宋制），在城南端凤凰山东，即旧临安府治子城。有四门，南为丽正门，北为和宁门，东为东华门，西为西华门。和宁门北，还有一门——朝天门。和宁门前，是一条一直通向城北的御街（今中山路）。御街用石板铺成。丽正门有三门道，“皆金钉朱户，画栋雕甍，覆以铜瓦，镌镂龙凤飞骧之状，巍峨壮丽，光耀溢目。左右列阙，待百官侍班阁子。登闻鼓院、检院相对。悉皆红杈子，排列森然，门禁严甚，守把铃束，人无敢辄入仰视。”⁽⁴¹⁾整个宫城，规模较北宋东京更小，主要大殿只有两个，即大庆殿和垂拱殿。

丽正门内正殿即大庆殿“遇明堂大礼，正朔大朝会，俱御之。如六参起居，百官听麻，改殿牌为文德殿，圣节上寿，改名紫宸；进士唱名，易牌集英，明裡为明堂殿。”“二曰垂拱殿，常朝四参起居之地。”⁽⁴²⁾另外，宫中尚有延和、勤政等十殿。福宁是寝殿，坤宁、秣华为皇后所居。“天章诸阁，奉艺祖至理庙神御之出图制之籍。”⁽⁴³⁾“宝瑞之阁，建于六部山后，供进御膳。”⁽⁴⁴⁾“和宁门外红杈子，早市买卖，市井最盛。盖禁中诸阁分等位，宫娥早晚令黄院子收买食品下饭于此。”⁽⁴⁵⁾三省六部衙门，在和宁门以北，比较集中。其他行政机构，则较分散。如太常寺在罗汉洞，秘书省在天井坊左，武学、太学、国学监在纪家桥。内诸司大部在宫中，官府营手工业则分散在城内各处。将作监及军器库在保民坊，造纸局在赤山湖滨，车辂院在嘉会门外。

礼制方面的建筑，太庙在瑞石山之左，圜坛在嘉会门外以

南四里，三岁一郊天。太社太稷坛在观桥东北。九宫坛在东青门外。高禘坛在嘉会门外以南四里的龙华寺。社坛旧在利涉门（嘉会门）内一百步，后徙于城西一里昭庆寺。“杭城今为都会之地，人烟稠密，户口浩繁。⁽⁴⁶⁾”乾道年间，“户二十六万一千六百九十二（包括附属九县），口五十五万二千六百七。”估计总数约一百余万人。咸淳年间，更增加到三十一万多户，一百二十四万余口（包括附属九县）。全城居民区分8厢，共68坊。城外尚有两厢。坊与巷实际是一回事，只是一个地段的名称。厢是行政及治安管理的单位。由于宋室南迁，城市人口急剧增加，居住非常拥挤，与北宋东京相似。由于居民不少从开封迁来，保留了不少开封的生活习惯。饭店、点心铺亦是开封迁来，挂的多是开封的招牌。

城内寺院很多，有五十七处之多。加上近郊，有三百余处。还有庵舍三处。道观仅城内就有二十余处。

临安东邻钱塘江，西是西湖，即明圣湖。北近宝石山，南是凤凰山，城内还有吴山，加之市河、茅山河、盐桥运河、清湖河、清山河、菜市湖等和众多的桥梁（马可·波罗说有一万二千座桥），皇家和私人园林又遍布城内，所以临安是一个风景优美的城市。尤其是西湖、苏堤春晓等十景，更是脍炙人口，一直流传至今。

南宋临安手工业发达。其主要特点是私营手工业作坊和小商品生产明显增加。除军器不准私家生产和宫廷手工业以外，其余都是商品生产。衣服、家内杂物、家具、熟食品，都是专门的作坊生产。如：“碾玉作、篔作、腰带作、金银打钹作、裹贴作、铺翠作、裱褙作、装奁作、油作、木作、砖瓦作、泥水作、石作、竹作、漆作、钉铰作、箍桶作、裁缝作、脩香浇

烛作、打纸作、冥器等作分。”⁽⁴⁷⁾《武林旧事》卷六《小经纪》条记载南宋临安各种小商品生产有一百七十多种，大部分是自产自销的日用小商品。

临安最著名的手工业作坊是丝织业。浙江是有名的蚕桑之乡，故临安的丝织业有坚实的基础。官营的有绫锦院，私营的手工业作坊又很多。私营作坊的织造技术，水平很高，能织出许多精巧名贵的丝织品。《梦粱录》中记载了临安丝织品的品种和质量：“绫，柿蒂、狗蹄。罗，花素、结罗、熟罗、绵住。锦，内司街坊以绒背为佳。剡丝：花、素二种。杜纆，又名‘起线’。鹿胎，次名‘透背’，皆花纹特起，色样织造不一。纴丝、染丝所织诸颜色者，有织金、闪褐、间道等类。纱，素纱、天净、三法暗花纱、粟地纱、茸纱。绢，官机，杜村唐绢，幅阔者密，画家多用之。绵以临安于潜白面细密者佳。绸有绵之织者，土人贵之”⁽⁴⁸⁾。晁补之也对临安的丝织业作了生动写照：“杭故王都，俗上工巧。……衣则纨绫绮绉，罗绣毅绉，轻明柔纤，如玉如肌，竹窗轧之，寒丝手拨，春风一夜，百花尽发。其制而服也，或袍或鞞，或绅或纶，或绿或表，或缝或澜，或紫或纁，或绀或殷。”⁽⁴⁹⁾丝织工业的发展，使经营丝绸的店铺也很多。如市西坊南的刘家、吕家、陈家彩帛铺；市西坊北的纽家彩帛铺；水巷口的徐家绒线铺；清河坊的顾家彩帛铺；三桥街的柴家绒线铺；沿（盐）桥下生帛铺；铁线巷生绢一红铺……这些铺子，昼夜营业，还兼营织、染，就是所谓“前店后坊”。官营的花作，“所聚奇异，飞鸾走凤，七宝珠翠，首饰花朵，冠梳及锦罗帛，销金衣裙，描画领抹，极其工巧，前所罕有者悉皆有之。”⁽⁵⁰⁾

临安的造纸工业也特别发达。临安府余杭县由拳村的藤

纸，富阳的小井纸，都负有盛名，为人们所珍重。由于造纸业的发达，甚至发生了奸商买卖货物时，“以伪易真，至以纸为衣”，欺骗顾客的情况。

临安的手工业，一种是从北方迁来的，在北宋原有基础上继续发展。另一种是南渡后才发展起来的。总的说来，种类繁多，分工细致，生产技术有很大提高。

临安是繁华的商业城市，它首先表现在城内三大商业区的形成。定都前，临安较集中的商业区仅有城中一处，其它坊巷仅有一些小店铺。宋室定都临安，沿着和宁门北的御街，逐步发展成城南、中、北三个商业闹市区。自官巷口至羊坝头，是传统的商业区，位于城中，规模最大，诸行百市，样样齐全，大小铺席，处处密布。据《梦粱录》卷13《铺席》所载，有名可考的商店，即达一百二十余家。

城南商业中心，大致自和宁门杈子外一直到朝天门外清和坊。这个商业区紧邻皇宫和各官署衙门，四周所居多是皇亲国戚和达贵显官。因此，这儿高档消费品很多。“早间珠玉珍异及花果时新，海鲜野味、奇器，天下所无者，悉集于此。⁽⁵¹⁾”

“其夜市除大内前外，诸处亦然，惟中瓦前最胜，扑卖奇巧器皿百色物件，与日间无异。其余坊巷市林，买卖关扑，酒楼歌馆，直至四鼓后方静，而五鼓朝马将动，其有趁卖早市者，复起开张。⁽⁵²⁾”连饮食业，也特别珍异，“凡饮食珍味，时新下饭，奇细蔬菜，品种不缺。遇有宣唤收买，即时供进。如府宅贵家，欲会宾朋数十位，品件不下一二十种，随索随应，指挥办集，片时俱备，不缺一味。⁽⁵³⁾”

城北商业中心，大致自棚桥至众安桥。与城南商业区一样，也是后兴起的。它的附近，有最大的民间游乐场所——北

瓦子。贡院也在此区，科举、混补、三学考试络绎不绝。因此，这儿的店铺，以书铺和饮食业为主。全城三分之二的书铺设于此。饮食日夜营业，讲求价廉物美，不尚排场。

除三大商业区外，大街小巷，大小铺席，连门俱是。清和坊有一条“扇子巷”，是扇铺集中之处，巷名至今未改。

临安商业的繁荣，还表现在经商人员的增多和经营行业的分细。“经纪市井之家，往往多于店舍”⁽⁵⁴⁾，城南吴山一带，是外地“江商海贾”寄寓之地。

茶楼酒肆，商业店铺，分工细致，林立全城。“京都有四百四十行⁽⁵⁵⁾”，可见行业之多。酒楼餐馆，既有高级的，也有普通的。普通酒店，有茶酒店，又名茶饭店，卖酒为主，兼营添饭配菜。包子酒店，专营灌浆馒头、薄皮春卷、包子等，以便僧尼斋客。

临安榻坊（客栈）遍布水陆码头和闹市区，城北“水门内，有水数十里曰白洋湖。其富家于水次起造榻坊十数所，每所为屋千余间，小者数百间，以寄藏都城店铺及客邸物货，四维皆水，亦可防避风烛，又免盗贼，甚为都城富室之便。”⁽⁵⁶⁾除了这种设备齐全，服务周到，安全可靠的高级客栈，还有在码头和集市附近的简易堆货栈，称为“廊”（可避风雨）或“堆朵场”（露天货栈）。

除了四处开店铺外，府城内外还形成许多“行业街市”。就是同行业的店铺、货摊相对集中，设于一条街巷之内，称为“行”、“团”或“市”。“市肆”谓之‘团行’者，盖因官府回买而立此名，不以物之大小，皆置为团行。”⁽⁵⁷⁾有名为“团”的，如城西花团、泥路青果团、后市街柑子团、浑水闸鲞团。有名为“行”的，如官巷万梳行、销金行、冠子行，城

北鱼行，城东蟹行、姜行、菱行、北猪行，候潮门外南猪行、南土北土门菜行。坝子桥鲜鱼行、横行头布行、鸡鹅行。更有名为“市”者，如炭桥药市、官巷花市、融合市南坊珠子市、修义坊肉市、城北米市。

各行各业人员，服装上也有不同。“杭城风俗……且如士农工商诸行百户，衣巾装着，皆有等差。香铺人顶帽披背子。质库掌事，裹巾着皂衫角带。街市买卖人，各有服色头巾，各可辨认是何名目人。⁽⁵⁸⁾”但后来服装变化也大，引起了一些人的议论。“自淳祐以来，衣冠更易，有一等晚年后生，不体旧规，裹奇巾异服、三五为群，斗美夸丽，殊令人厌见，非复旧时淳朴矣。⁽⁵⁹⁾”

临安商业的繁华，还表现在经营方式灵活多样。

营业时间延长。原来营业时间多限于白天，以上午居多，过午则散。南宋定都，夜市十分兴盛。闹市区清和坊至官巷口一带，与日间无异。和宁门外城南市区，甚至通宵达旦。晚唐诗人杜荀鹤有“夜市桥边火，春风寺外船”⁽⁶⁰⁾的诗句说明夜市起于晚唐，而到两宋，已相当发达。

营业的品种丰富多彩，经常变换。如饮食店铺，早市点心，冬天卖五味肉粥、七宝素粥，夏天则卖义粥、馓子、豆子粥。

商店酒楼也很讲究铺面装饰。高级酒楼，仿汴京遗风，店门彩画，门内设红杈子，绯绿帘幕，上悬贴金红纱梔子灯，有厅院、廊庑，舒适豪华。夏有水壶（降温），冬有火箱（取暖），还有乐队奏乐助兴。服务态度，周到细致，多使顾客满意。顾客进店，先“提瓶献茗”，然后“支酒”，供小酌；热菜之前，先上冷盘。最后还有有助于醒酒的“醒酒口味”。

临安人口众多，官府林立，所需物品须从国内外运米。近者，“东门菜，西门水，南门柴，北门米。盖东门绝无居民，弥望菜圃。西门则引水注城中，以水散给坊市。严州、富州、富阳之柴，聚于江干，由南山入苏湖。米则来自北关。”⁽⁶¹⁾临安每日需米三四千石，来自苏州、镇江、湖州和秀州等处。海鲜水产，从明州（宁波）、越州（绍兴）、温州、台州（临海）等处运来。除内河水道外，城东二十五公里的澉浦镇，是对外贸易的商港，海面上桅樯林立，船舶云集。大船达五千料（石），中者可载一、两千料（石）。这些船只，有的还来自印度等国。马可·波罗说，在运河岸边，“建有容量很大的石砌的仓库，供给从印度和其他东方来的商人储存货物及财产之用”⁽⁶²⁾。

临安设有“市舶务”，最初设在城东南面的保安门外诸家桥之南，后来移至城北的梅家桥（今梅东桥一带）。市舶司的税收，约占南宋政府总税收的二十分之一，高宗时年达二百万贯。“东南之利，舶商居其一”⁽⁶³⁾，“南渡后，经费困乏，一切倚办海舶。”⁽⁶⁴⁾

临安文化事业发达，有太学、宗学、武学和医学等各类学校。太学是最高学府。绍兴十三年（公元1143年），设太学于风波桥东（今浙江医大南面）。太学内布局可分三大部分：中间是太学机关的办公区，有崇化堂、首善堂、讲堂等。西部是孔庙，有大成殿，门外是二十四戟。东部是太学生的宿舍区，有屋二十幢。最多时，太学生有一千七百一十六人。“诸生衫帽出入，规矩森严，朝家所治学廩，动以万计，日供饮膳，为礼甚丰。”⁽⁶⁵⁾

学制有五年、九年，甚至十五年的。绍兴十四年（公元

1144年），设宗学，地址在睦亲坊（今粥教坊）。“国朝宗子，分为六宅，宅各有学，学各有训导之官。”⁽⁶⁶⁾”

武学是培养军事人才的学校，医学又名太医局，分科教授。

杭州府还有府学，钱塘县还有县学。生员的膳舍均由国家供给，月修课考。还有乡校家塾、蒙馆等，都是初等和启蒙教育。临安城内，“弦诵之声，往往相闻”⁽⁶⁷⁾。

临安的刻版印刷，分官、私两种，有的是从开封迁来的。王国维说：“自古刊版之盛，未有如吾浙者。”⁽⁶⁸⁾而两浙又以杭州为最。“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⁶⁹⁾”

南宋绍兴九年（公元1139年），设国子监，开始雕刻经史。所刻之书，称为“监本”，印刷技术极高。临安拥有大量刻工，仅绍兴年间刊刻《仪礼疏》，就用刊工一百六十人。《资治通鉴》就是首先在杭州刊刻印行的，《史记》、《两汉书》，也曾在杭州镂版印刷。私家刻书也很盛行，书铺林立，称为经铺，经坊或经籍铺、经书铺、文字铺等。宋本书刻印技术高明，纸墨工料讲究，校勘详密，错误甚少，向为藏书者所钟爱。

临安太学有书库，为藏书之所，太学中还有石经阁，藏有“南宋石经”，是高宗和他的皇后亲自书写的。朝廷秘书省藏书达四万多卷。私人藏书也很多，一些有名的书坊主，也是有名的藏书家。如陈起，开书坊，家有藏书楼，藏书甚丰，还著有《宝刻丛编》。发明活字版的毕升，就是杭州的雕板工。

临安百戏杂伎，名目繁多。著名的游乐场所“瓦子”，是从北宋开封传来的。“瓦者，野合易散之意也……甚为士庶放

荡不羁之所，亦为子弟流连破坏之地”。⁽⁷⁰⁾北瓦子最大，有十三“勾栏”（娱乐区）。

娱乐项目，有杂伎、傀儡戏、纸影戏、皮影戏、禽虫戏、角抵相扑、杂剧、说书等。

临安还是一个有文化传统的城市。吴越时，寺塔之盛就倍于其他九国，至南宋更是有增无减。灵隐寺九楼十八阁，七十三殿，房屋一千三百余间。开仕寺六和塔矗立至今。显严院寺雷峰塔中外闻名。临安是南宋名副其实的文化中心。

宋德祐二年，即元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元军攻入临安，随即拆毁城墙，洗劫宫殿，西湖湮塞，城市萧条。繁华了一百五十多年的临安，遭到极大破坏。后来，在明末张士诚起义，占据杭州，重建杭州城垣时，东部向外拓宽三里，新增三城门，由南向北是竹车门、南土门、北土门。

第四节 开封的翻版——金中都大兴府城

辽国以幽都府为其南京，是陪都之一。金代迁都中都，北京正式成为北部中国的首都，其后，元、明、清等朝，均建都于北京。

北京西北是燕山山脉，西南是太行山脉，东北方向距辽河、黑龙江流域都不远，南面是广阔的华北大平原，东控渤海湾，四出交通方便，地形可攻可守，自古以来，视为要地。

“幽州之地，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北扼居庸，南襟河济，诚天府之国。”⁽⁷¹⁾

“天下山川形势，雄伟壮丽，可为京都者，莫逾金陵。至若地势宽厚，关塞险固，总扼中原之夷旷者，又莫过燕蓟。虽云长安有崤函之固，洛邑为天下之中，要之帝王都会，为亿万

年太平悠久之基，莫金陵、燕蓟若也。”（72）

金于贞元元年（公元1153年）正式迁都燕京。燕京之名，始于辽代。金初占燕京，仍称燕京析津府。迁都时改称圣都，旋改中都永安府，第二年，又改为中都大兴府。

辽国建有五京，南京幽都府（后改析津府）是陪都之一，规模最大。城垣基本上沿用唐代幽州城址，只在西南角修了一个很小的皇城，叫大内，城内宫殿也多沿用旧有建筑。

据许元宗《奉使行程录》记载，南京幽都府城周长二十七里（许于金天会三年使金，时辽城尚未改建。《辽史·地理志》说南京三十六里，不确。）城墙高三丈，宽一丈五尺，城有八门：东为安东门、迎春门，南为开阳门、丹凤门，西为显西门、清晋门，北为通天门、拱宸门。

皇城南垣外三门为南端门、左掖门（后改万春门）、右掖门（后改千秋门）。西门称显西门，设而不开。东门称宣和门。宫内正门为宣教门（后改称元和门），内有元和殿、昭庆殿、嘉宁殿、临水殿、长春宫和球场、湖泊、果园等。

南京城有居民三十万人，城中划分为二十六坊，街巷、坊市、廨舍、寺观，井然有序。今广安门外天宁寺塔，仍是辽的基础，该寺在辽代称天王寺。

辽五京中，南京是汉族地区先进经济文化的代表，因而成为契丹辽全国学习的范本。中原经济文化，通过南京不断影响契丹辽，促进了契丹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南京处于北方牧区和中原农区接壤之处，因而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城市，促进了各民族的大融合。辽建南京之前，幽州尚未成为重要的政治中心。此后，金建中都，这里成为北部中国的政治中心。到元代，进一步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辽南京的建立，可以说是燕

京成为全国政治中心的前奏。

金朝是女真族建立的政权，它控制了淮河以北的广大地区后，因上京会宁府远在东北（今黑龙江省阿城市），难以控制内地，必须将政治中心南移。在经济上，东北地区当时还比较落后，皇室所需大批物资，必须从关内运去，运输艰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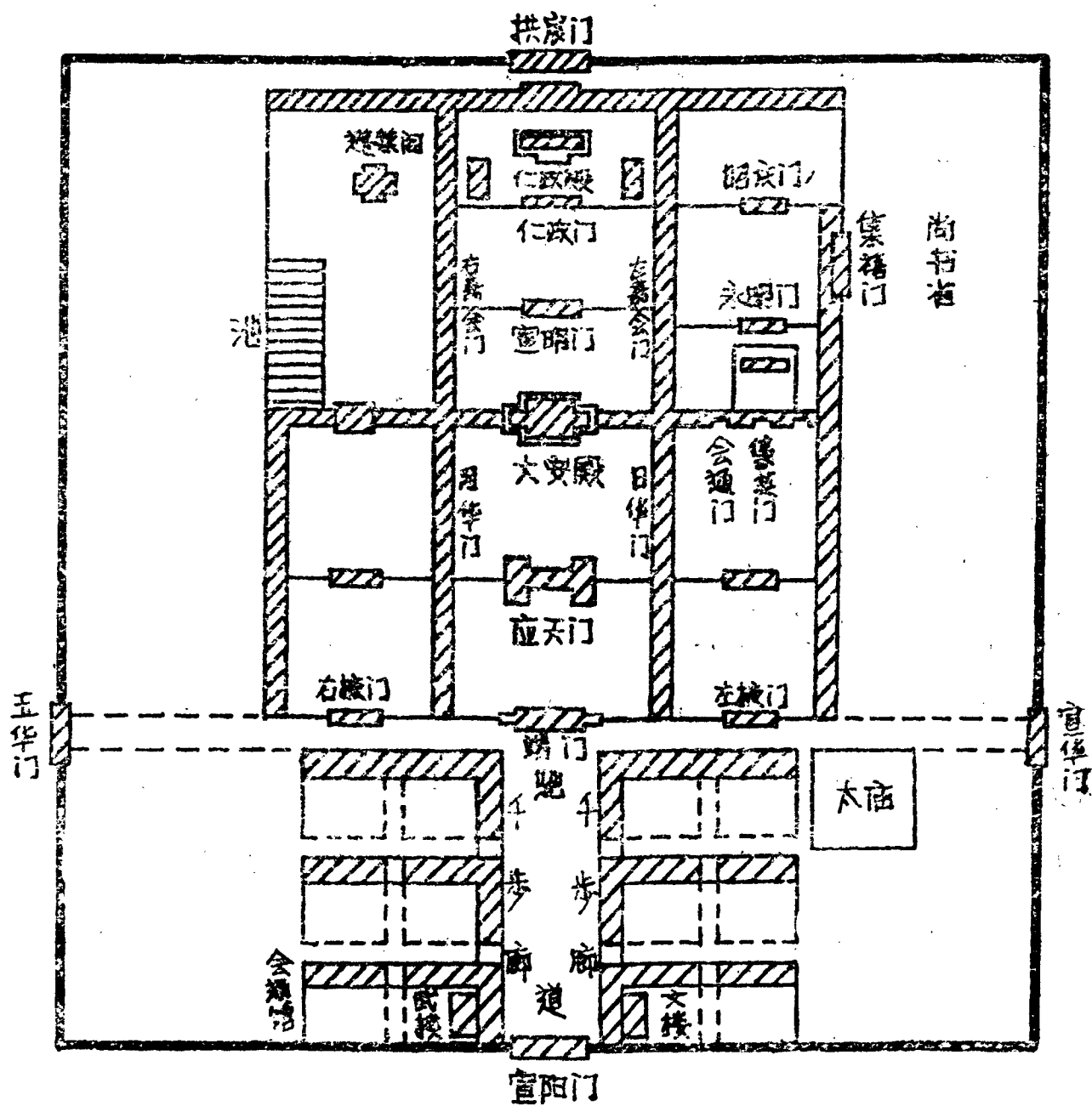
“是时上封事者，多以会宁僻在一隅，官艰于运输，民艰于赴诉。”⁽⁷³⁾“人拘道路之遥，事有岁时之滞。……京师居在一隅，而方疆广于千里，以北则民清而事简，以南则远而事繁。”⁽⁷⁴⁾金中都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

金中都城是在辽南京城的基础上，东、西、南三面加以扩大而成，略成正方形。东垣约在今宣武门大街以东、琉璃厂西口外一带，长约4510米。西垣在广安门外约两公里，长约4530米。南垣在长安门外约一公里处，长约4250米。北垣至宣武门城墙略北，长约4900米。总长约18690米，当三十七里有余，城垣规模是巨大的。为了修建中都城，曾征调民夫八十万，兵夫四十万，历时三年才建成。金中都的设计和施工主持者，是张浩（左相）、梁汉臣（修燕京大内正史）、孔彦舟（副使），都是汉族人。加之少数民族的都城，往往模仿汉都设计，致使金中都城的改建，完全仿照汴梁制度，与中国传统的都城设计规则十分接近。改建之前，完颜亮“先遣画工写京师（开封）宫室制度，至于阔狭、短曲画其数，授之左相张浩辈，按图以修之。”⁽⁷⁵⁾可见，金中都的改建是先画开封宫室之图，按图修建，所以说，金中都是北宋首都开封的翻版。

金中都城外城有十二城门，每边三门，符合《周礼·考工记》的规则。这十二城门，“正东曰宣曜、阳春、施仁，正西曰灏华、丽泽、彰义，正南曰丰宜、景风、端礼，正北曰通

玄、会城、崇智。(78)”

外城之内有皇城，位于外城中部偏西南，是辽旧内，“城之四周……九里三十步”(77)。皇城正门是宣阳门，正对外城南门丰宜门。东为宣华门，西为玉华门，正北是拱宸门。宣阳门“门分三，中绘一龙，西偏绘一凤，用金镀铜钉实之。中门不常开，惟车驾出入；两偏分单双只日开一门。(78)”



图三十 金故宫还原图

皇城之内为宫城，正门应天门，后有仁寿门，左右为日华、月华门，仁寿门后为大安殿，是正殿。殿后为宣明门，再

后为政和门，门后为仁政殿，是常朝之所，殿后有墙二重。仁政殿是辽南京旧殿。皇城遗址，东至今南线阁街稍东，西至白云观铁道西，南至鸭子桥以南，北至白菜籽村北，周长约五千米。基本符合文献记载的九里三十步的规模。

宣阳门内，正中是驰道，颇为宽阔，两旁有沟，沟旁种杨柳。再北是左右对称的曲尺形的千步廊，两侧千步廊南北各二百多间，东西转折以后，各有一百多间。“廊脊覆以琉璃瓦，宫阙殿门，也都覆以碧瓦，一望都作翠碧色。”⁽⁷⁹⁾

千步廊北有端门，再北即是应天门，门上有楼，各十一楹。“门及殿凡九重，殿三十有六间，阁倍之。正中曰皇帝正位，后曰皇后正位，位之东曰东内，西曰西内，各十六位，乃妃嫔所居之地也。”⁽⁸⁰⁾西门玉华门外，将一片小湖（今莲花池）圈入城内，建成皇家苑林——同乐园，亦称西华潭。内有瑶池、蓬瀛、柳庄、杏村等名胜。城南有皇宫建春宫，香山、玉泉山也有离宫。以城东北琼华岛（今北海）的离宫最为重要。初建称大宁宫，迭经改名寿宁宫、寿安宫，最后改为万宁宫。这儿原是一片浅湖，疏浚后，堆土为岛，即琼华岛，琼华岛上有广寒殿，并迭石为假山。据说，假山之石是从开封艮岳拆来的太湖石。运途遥远，每一石折粮若干，所以叫“折粮石”。

中都宫殿富丽堂皇。“遥望前后殿屋崛起甚多，制度不经，工巧无遗……其屏扆窗牖，皆破汴都辇致于此。”⁽⁸¹⁾可见金中都不仅宫殿制度仿照开封，甚至建筑材料也是一部分拆自开封（另一部分拆自河北真定“潭园”）。

中都城内划分为六十二坊。城东南、东北二十坊，西南、西北四十二坊，每坊有坊门。中都建成后，金朝曾下令征调

“四方之民”“实京师”。因此中都人口有很大增加，整个大兴府（包括十县一镇），有户二十二万五千余。为了加强中都与南方各地的交通联系，在芦沟桥渡口修建了著名的芦沟桥，桥长265米，宽7.5米，桥下拱券十一，桥栏柱头等刻有千姿百态的狮子四百八十五个，是我国古代雕刻艺术的杰作。

金末蒙古族兴起，大举南攻。蒙古军攻进中都前夕（公元1211年），中都发生大火，五日不绝。蒙古军围城过程中，因柴薪缺乏，中都宫殿被拆毁一部分当柴烧。蒙古军于1215年占领中都，第二年，即1217年，又发生一次大火，使中都城，尤其是宫殿，遭到彻底破坏。

第五节 汗八里——元大都

据《元史》记载，元世祖忽必烈初至燕京，曾说：“今天下稍定，我欲劝主上（成吉思汗）驻蹕回鹘，以仗兵息民。”蒙古贵族巴图鲁（又译霸突鲁）劝他说：“幽燕之地，龙蟠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覲。大王果欲经营天下，驻蹕之所，非燕不可。”忽必烈幡然明白，“非卿言，我几失也。”及即帝位，即定都于燕，并说：“朕居此以临天下，巴图鲁之力也。”⁽⁸²⁾

汉族谋士郝经等人也劝忽必烈“都燕”。认为“燕都东控辽东，西连三晋，背负关岭，瞰临河朔，南面以莅天下。”⁽⁸³⁾

元世祖于1260年在开平府（后定上都，今内蒙多伦东南）自立为帝，1264年迁都燕京，到1368年元亡，都燕京105年。至元元年（公元1264年），初都燕京，仍辽旧城，定名中都大兴府，至元四年开始建新城。至元八年定国名元。至元九年命

名新城为大都，蒙古语称之为“汗八里”。“八里”是城的意思，“汗八里”是大汗之都的意思。原来的中都旧城，则成为大都的一个组成部分。上京开平府则成为陪都。

元世祖采用汉法，定都燕京，遭到少数蒙古贵族的反对。他们派遣使者质问忽必烈：“本朝旧俗，与汉法异，今留汉地，建都邑城郭，仪文制度遵用汉法，其故何？”⁽⁸⁴⁾忽必烈顶住了这种压力。行汉法，迁国都，应该说，是一种积极的措施。

元代所以避开旧城，在旧城近旁另建新城，是因为旧燕京经战争、大火，十分残破，尤其是宫殿，基本无存。旧城水源主要靠莲花池水系，水源不足，不适应新都的需要。

新都的营建始于至元四年（公元1267年），至元十三年大都城建成，至元二十年，城内修建基本完毕，政府机构全部迁入新城。至元二十二年，又规定了旧城居民迁入新城的具体办法。

大都的主要设计者是刘秉忠，还有赵秉温。具体领导修建的还有汉族将领张柔、张弘父子，行工部尚书殷桢（殷天祐），蒙古人野速不花，女真人高麟，还有色目人也黑迭儿等。殷桢后来还长期担任大都留守。

大都城位于今北京城略微偏北处，城“方六十里，十一门”⁽⁸⁵⁾，南北略长于东西。实测总长28600米，南北长7400米，东西宽6650米。东西两垣与今北京内城一致，南垣在今东西长安街南侧，北垣在今德胜门、安定门外五里，俗称土城头，部分地段，仍可看到高达数米的残土墙。

南垣在西段庆寿寺处为绕开庆寿寺海云、可庵双塔，特经忽必烈批准，“远三十步许环而筑之。”⁽⁸⁶⁾故有一小段呈弧形（此段解放后扩建长安街时才拆除双塔，将路修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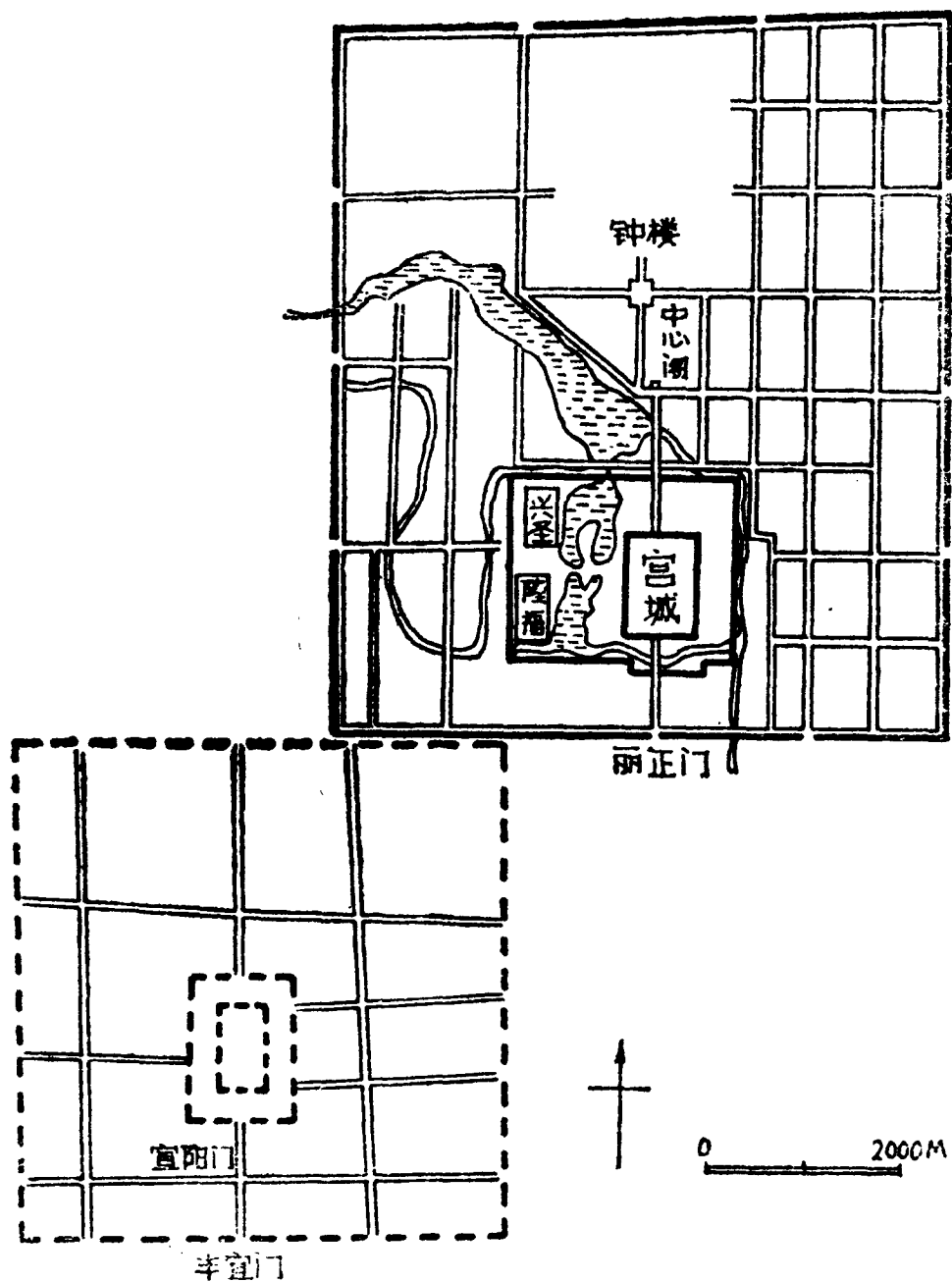
大都城垣为夯土筑成，实测基、高、顶宽的比例为三：二：一。基宽24米。土中有“永定柱”（竖柱）和“经木”（横木），目的是为了加固城墙，顶部曾用苇衣和管道防水，但仍经常发生“雨坏”都城的问题。以海运起家的新贵朱清、张瑄，曾提出要自备资财，包砌城墙，但终未获批准。只西南城角，有小部分后来砌过砖，但整个大都城的防雨问题，始终没有解决。

大都城共有十一城门。南、东、西各三门，北面两门。南面正门是丽正门（今天安门南），西顺承门（今西单南），东文明门（又称哈达门，今东单南）。东面三门由南向北是齐化门（又称海岱门，今朝阳门）、崇仁门（今东直门）、光熙门（又称广西门，今和平里东）。西面三门由南向北是平则门（今阜成门）、和义门（今西直门）、肃清门（俗称小西门，今学院南路西端）。北面东为安贞门（今安定门小关），西健德门（今德胜门小关）。之所以开十一门，是附会哪吒三头六臂两足的缘故。

肃清门和健德门的瓮城土墙，还部分残存于地面之上。从肃清门和光熙门的基址钻探情况表明，城门地基夯筑坚实，城门建筑是被火烧毁的；大量的木炭屑和烧土的堆积层证明，城门建筑很可能是“过梁式”木结构门洞。1969年配合建设工程，拆除西直门箭楼时，发现了和义门瓮城门遗址。门洞内青灰皮上的题记表明，它是1358年即元亡前夕仓促加筑的，连地基都未筑。城门高22米，门洞长9.92米，宽4.62米，内券高6.68米，外券高4.56米。门砧石上还留有承门轴的半圆形铁球——“鹅台”，为考古发现中仅见的实例。砖券只有“券”（竖砖），而没有“伏”（丁砖），说明砖券技术还不成熟，

是由过梁式木结构城门发展到明清砖券城门的过渡形式。门额上方还有用石箮等做成的可通水到木质门额的水窝，可能是防止火攻城门用的。这种结构，也是前所未见的。城上有三楹三进的地堡式城门楼。

城的四角都有巨大的角楼。今建国门南侧的观象台，就是元大都东南角楼的旧址。城外部等距离地建有加强防御的“马面”。此外，再绕以又宽又深的护城河。



图三十一 金中都及元大都城址图

元大都皇城和宫城、宫殿的修造，比大都外城要早一些，

是在金代中都城外东北方原万宁宫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至元三年（公元1266年）就开始了。至元四年正月，又专门成立了管理施工的机构——提点宫城所。至元十年“初建正殿（大明殿）、寝殿、香阁、周庑两翼室。”⁽⁸⁷⁾”至元十一年，忽必烈始御大殿。至元十一年建东宫（在太液池西岸南部），称隆福宫。元中叶，又建兴圣宫，在隆福宫以北。

皇城城墙称为萧墙，又称阑马墙，基宽3米左右，周约二十里。墙外密植高大参天的树木。皇城南墙在今东西华门大街以南，东墙在今南北河沿的西侧，西墙在今西皇城根，北墙在今地安门南。

皇城南墙正中大门灵星门，在今午门附近，南面正对大都城丽正门。灵星门又称红门，前面有宫廷广场，西侧有千步廊，长约七百步。在元以前，宫廷广场一直处于宫城正内的前方，大都城改在皇城正门的前方，在平面设计上是一个极大的变化。这种布置，加强了大都城正门和宫城的层次序列，使宫禁门阙更加森严。门内数十步有河，“河上建白石桥三座，名周桥。皆琢龙凤祥云，明莹如玉，桥下有四白石龙，擎戴水中甚壮。绕桥尽高柳，郁郁万株。”⁽⁸⁸⁾”

宫城在皇城的东部，成南北长方形。“周回九里三十步……高三十五尺。”⁽⁸⁹⁾”

宫城是砖砌的，东西墙和今故宫东西墙相近，南门崇天门（即午门），约在今太和殿的位置。崇天门左有拱星门，右有云从门。北门厚载门在今景山公园少年宫前。夯土基址已经发现，东西两垣约在今故宫东西垣附近。东西垣上有东华门和西华门。宫城四角都有十字形角楼，上下三层，琉璃瓦顶。崇天门左右有两观，平面是凹形。门东西187尺，深55尺，高83尺，

门上有楼，两观上有角楼，下开五门。崇天门内是大明门，左右有日精、月华两门。

宫城内建筑分南北两部分。南面以大明殿为主体，北面以延春阁为主体，坐落在全城的中轴线上。大明殿又叫长朝殿，落成于至元十年。建筑东西长二百丈，深一百二十尺，高九十尺，规模宏伟。一切重大的仪式，如皇帝即位，元旦、庆寿等等，都在这里举行。大殿台基分为三级。用雕龙刻凤的白石栏杆围绕，栏下压以螯头，虚出栏外，形制可能同今日故宫的台基相仿。“殿楹四向皆方柱，大可五六尺，饰以起花金龙云，楹下皆白石龙云，花顶高可四尺。楹上分间，仰为鹿顶斗拱。攒顶中盘黄金双龙，四面皆缘金红。琐窗间贴金铺，中设山字玲珑金红屏台，台上置金龙床，两旁有二毛皮伏虎，机动如生。(90)”殿内有帝、后并列的座位。帝后同榻登御，是蒙古族的传统。

值得注意的是，台基上种植着一方莎草，是从沙漠移来的，这是元世祖忽必烈为了使子孙不忘创业之难，永记兴王于沙漠的历史而特意安排的。诗云“黑沟万里连沙漠，世祖深思创业难，数尺阑干护春草，丹墀留与后人会。(91)”

大明殿后是延春阁，其下是延春堂，总高度比大明殿还要高。大明殿和延春阁后面都有寝殿，中间连以柱廊，成工字形，寝殿两侧又有小殿。这种布局是宋、金宫殿的传统。这两座工字形建筑的四周，都有一百多间周庑围绕，呈长方形，从而使大明殿和延春阁形成两组封闭的小建筑群。两个小建筑群中间是横贯宫城的大道。延春阁后面是清宁宫，规模较小。宫城后门厚载门上，也建有高阁。阁前有舞台，表演歌舞用。马可·波罗评论说，皇宫“设计合理，布局相宜，非常美丽，建

筑艺术的巧夺天工。可以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92)”

官城以北是御苑，除花草树木外，还有水碾，是引玄武池（太液池）水灌溉花木的。苑中有假山，“山顶上有一个装饰别有风味的亭子，亭身全部绿色。青山、翠树、绿亭，混然一体，形成一副爽心悦目的园林奇景。(93)”

官城之西是太液池，包括今中海和北海（南海是后来明代开凿的）。太液池中有两个小岛，南小岛称为瀛州，就是今团城，北面即琼华岛，后又称万寿山或万岁山。玲珑的太湖石堆成的假山，传为金人拆开封艮岳而来。山上广寒殿，亦初建于金代。万寿山与瀛洲之间是长达二百余尺的白石玉桥。瀛洲东还有木长桥，西有木吊桥。太液池东，建有灵圃，即皇家动物园。据《马可·波罗游记》说，“湖中养着许多品种不一的鱼类，供皇家用。湖中还有天鹅和其它水鸟。(94)”

太液池西，有两组宫殿，南面是隆福宫，主要建筑是光天殿。布局结构与大明殿几乎一样。围墙是砖砌的。本是皇太子真金所居。但其未即位即死，忽必烈孙（真金弟之子）即位后尊奉真金妻为皇太后，并改皇太子东宫为隆福宫。“因为他（指皇太子真金）是皇位继承人，所以这里的一切礼仪和他的父皇一样。(95)”

兴圣宫位于隆福宫以北，建于元武宗时期，主要建筑是兴圣殿，也有柱廊连着寝殿，有砖垣两重，内垣相当于周庑。专门收藏文物图书的奎章阁（后改宣文阁），就在兴圣宫内。元末顺帝时，改宣文阁为端本堂，皇太子读书肄业之所。隆福宫西，还有西御苑，有假山、流杯池等。

元代宫殿的建筑形式，基本是以汉族传统为主的，但也大量吸收了兄弟民族，尤其是蒙古族的习俗。宫殿装饰大量采用

琉璃瓦，以及若干盞顶殿和畏吾儿殿、棕毛殿、温石浴室和水晶圆殿（通用玻璃装饰），都有鲜明特色，是以前所没有的。红色方柱，饰以金龙，普遍用壁衣（毡毯为主）、地毯、毛皮、丝质帷幕进行装饰，也表明了受蒙古等族游牧习惯和喇嘛教、伊斯兰教建筑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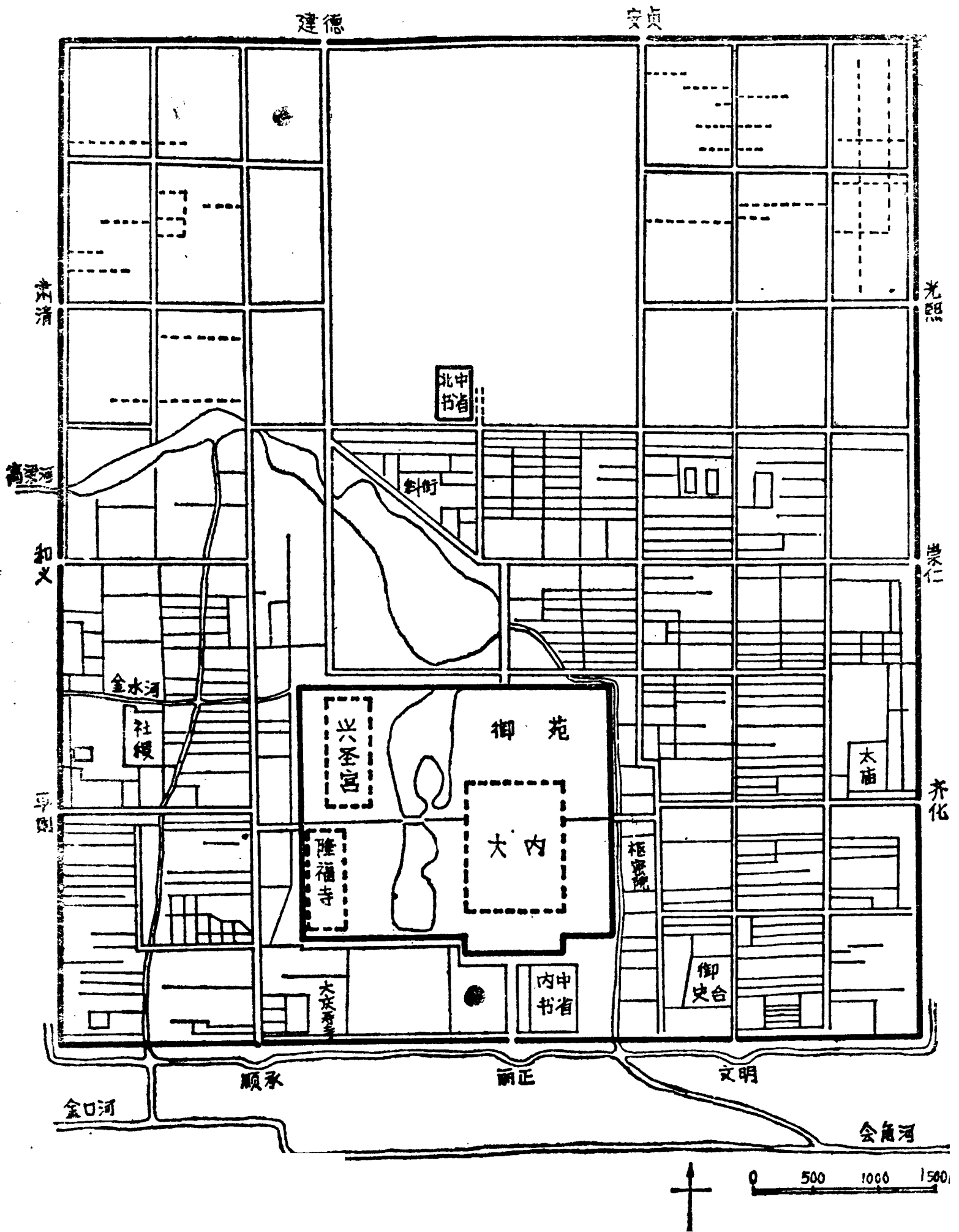
总之，元代的宫殿，十分奢侈华丽，不惜工本。明初吴节在萧洵的《元故宫遗录·序》中说：“门阙楼台殿宇之美丽深邃，阑槛琐窗屏障之金碧流辉，园苑奇花异卉峰石之罗列高下曲折，以至广寒秘密之所”，“一何盛哉，自近古以来，未之有也。”（96）

大都城规划严密，布局井然有序。它的中轴线，南起丽正门，经皇城灵星门，宫城崇天门、大明殿、延春阁、厚载门，经万宁桥（海子桥，即今地安门桥），至中心阁（今鼓楼以北），这也是后来明清北京城的中轴线。中心阁西十五步，有“方幅一亩”的中心台，立石碑曰“中心之台”，这是全城真正的中心。对城之中心作出标志，在我国都城建设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创举（实际上，东墙稍近，因墙东地势低，适当收缩了些）。

中心台之南有鼓楼，当时叫齐政楼。中心台之北有钟楼。钟鼓楼位中轴线稍偏西。至明清时代，钟鼓楼才建在中轴线上。元代沿袭前代制度，实行宵禁，“一更三点，钟声绝，禁人行。五更六点，钟声动，听人行。”（97）

皇城两侧靠近外城垣的地方，东为太庙，西为社稷坛。太庙建于至元十五年至十七年（公元1277—1280年），在齐化门稍北。社稷坛建于至元三十年，在和义门内稍南，“得地四十亩为墟垣。”（98）”这种布局，仍是附会《周礼·考工记》所叙述的

传统规则。



图三十二 元大都（北京）复原想象图

大都城内有纵横宽广的街道，互相交错。但由于南部正中

是皇城，皇城北部是海子（今积水潭），北城垣是两门，所以大街布局相应作了些调整。有丁字街、斜街（海子之北）等。但总的说来，至今未发现有任何两门之间直通的大街。顺承门和文明门大街北首对着城垣。而健德门和安贞门大街南首对着城垣。文明门以东还有一条直通南北城垣的大街，两端都无城门。东西向的横街，因皇城和海子的中隔，都不能直通。大街宽24步，约当今25—28米，小街阔12步。除大街外，还有三百八十四火巷，二十九珙通（胡同）。火巷和胡同排列在南北主干道的两侧，呈东西向排列，这是为避免寒风袭击，又利于通风采光。这些火巷和胡同，宽度在6米左右。今日北京城内许多胡同的排列，仍是元代遗迹。北京东城一至十二条胡同即是。马可·波罗对大都城的布局十分赞赏：“整个城区按四方形布局，如同一块棋盘。设计的精巧和美观，简直非语言所能描述。（⁹⁹）”大都约有居民十万户，总人口约四五十万。后期略有增加。居民区地段划分为五十坊，各有坊名，悬于坊门之上。和开封一样，坊只是行政单位，不同于隋唐的坊制。

元朝政府的中央机构，分在全城各处。中书省最初在丽正门内千步廊之东，后来一度迁到钟楼以西，不久又迁回原址。新址作了翰林国史院。枢密院则在皇城东侧。御史台在皇城以东的文明门内。大都路总管府和警巡院，都在中心阁以东。

大都城的商业区——市，有两处。一处是在钟楼以西。即“面朝后市”。另一处是皇城以西的顺承门内的“羊角市”。

大都城内两条水道。一条是由高粱河、海子、通惠河（皇城东墙外）构成的漕运系统。海子较今日积水潭、什刹前海略大，漕运船只停泊于海子中。金水河从和义门南入城，穿过皇城，从皇城东南角出城，流入通惠河。金水河是宫城的

用水系统。

大都城有比较完善的排水系统。街道两旁的明渠，宽1米，深1.6米，用石条砌成，部分地段还在顶部覆盖石条。城墙基部，有石砌的排水涵洞。但因城内路面大都是土路，加之处于北方雨水较少的地区，道路常常弥漫尘沙，长期下雨后又“泥漳入数尺”，甚至阻塞交通。整个城市，南部中部人口稍密，北部人烟稀少，街巷胡同也少，所以明初攻占元大都后才能废弃北部。

元大都是我国都城中最接近《周礼·考工记》的规则。宫、市、庙、社的安排井然有序。三套城垣，宫城居中，中轴对称的布局，是从曹魏邺城开始，逐步发展而来的，体现了皇权的至高无上。

宫殿和苑囿的有机结合，取得了高度的艺术效果。上下水道和运输水道的安排，及水道两侧的绿化（如金水河两旁栽有“御柳”），既便利生活，又美化城市景观。

元大都是由蒙古政权创建的，利用汉族和其他民族的工匠，甚至外国人，共同规划设计，形成了多民族的特色。规划之完整、严密，规模之巨大，建筑之崇丽，都是当时世界上少有的。

在经济方面，元大都是元代北方最大的手工业中心和商业中心。

大都手工业种类很多，较重要的有丝织、毡罽、采矿、冶炼、军器制造、修建、酿造等。马可·波罗曾说大都每日有丝千车入城。“根据登记表明，用马车和驮马载运生丝到京的，每日不下一千辆次。丝织物和各种丝线，都在这里大量生产。”⁽¹⁰⁰⁾由此可见大都丝织业规模之巨大。

大都手工业中出现了许多新技术和新产品。如丝织品纳失

失（原产波斯）、撒答刺欺（原产中亚）；冶铁业中的镔铁（特种钢）；酿造业中的阿刺吉（蒸馏酒，即烧酒）等。这些新产品，都是迁移到大都的兄弟民族带来的。如制造纳失失的别失八里局，是由别失八里城（今新疆吉木萨尔）的“田地人匠”组成的。同时，这也是同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加强分不开的。阿刺吉酒原是波斯、阿拉伯的产物，元代传入后大规模生产，这是我国酿造史上的一大革命。镔铁原产中亚，传入大都后元政府设立了“镔铁局”，所造镔铁刀“价贵于金，实为犀利，王公贵人皆佩之。”⁽¹⁰¹⁾

大都的采矿业中以采煤最为发达。宛平县的大谷山有黑煤三十余洞，桃花沟有白煤十余洞。煤是大都城居民的重要燃料，专设有煤市。马可·波罗惊叹契丹省挖自矿山的“黑色石块”可作燃料。而且“一经点燃，效力和木炭一样，而它的火焰却比木炭更大更旺，甚至可以从夜晚燃烧到天明仍不会熄灭。”⁽¹⁰²⁾大都宫廷也大量用煤，加之居民的不断增长，煤的供应问题日趋突出。元政府开掘金口河引卢沟河水东流，计划用水路运西山之煤，新挖的金口河“深五十尺，广一百五十尺，役夫一十万”，但河成后因泥沙淤塞而“船不可行”，这个计划终于落空。

元大都的商业也很发达。国内外的商品，集中到这里进行交易。“东至于海，西踰于昆仑，南极交广，北抵穷发，舟车所通，货宝毕来。”⁽¹⁰³⁾马可·波罗描述：“世界上最为稀奇珍贵的东西，都能在这座城市找到，特别是印度的商品，如宝石、珍珠、药材和香料。契丹各省和帝国其他各省，凡有贵重值钱的东西都运到这里，供应那些被这个国家吸引，而在朝廷附近居住的大批群众的需要。这里出售的商品数量，比其他任

何地方都多。(104)”马可·波罗还提到大都附近城镇居民从商的情况：“在京城附近，有许多用城墙围绕的城镇。它的居民，大部分依靠做朝廷的生意来维持生活，出售自己生产的物品，换取自己需要的东西。(105)”

钟鼓楼附近的商业区，有段子（绸缎）市、皮帽市、帽子市、鹅鸭市、珠子市、沙刺（珠宝）市、铁器市、米市、面市等。羊角市有羊市、马市、牛市、骆驼市、驴骡市等，体现了游牧民族的特色。中书省前面还有文籍市、纸札市。各城门外，尤其是南城外，也有集市。穿街走巷的商贩，沿街叫卖。大都还是一个国际商业都市。外国商人，来得较多的是波斯、阿拉伯和高丽的商人。

管理大都商业市场的机构是大都宣课提举司，秩从五品。提举司以下，各市分设提领和大使，大都商业有政府官营的，如粮食、盐、酒等，还有寺院和一般民营的。寺院所营，原不纳税，因影响政府收入，后来也得交税，连皇族的权贵，有的也去经商获利。元代中期，大都商税收入为十万三千锭，除江浙（二十六万余锭）、河南（十四万锭）外，据全国第三位，可见大都商业之繁荣。

大都还是全国印刷纸币的中心。马可·波罗曾详细地叙述了大都印造纸币的经过，以及纸币代替金银在全国流通的权威：“这种纸币的制造，无论它的规模和认可手续，都和真正的纯金币或纯银币那样郑重可信。他们的所有臣民，都毫不犹豫地接受采用这种纸币，因为他们到任何地方营业，都可以用它购买他们所需要的商品，如珍珠、宝石、金银等。……皇帝陛下的所有军队，都用这种纸币发饷。这对他们来说，就象金银一样有价值。”“没有人敢冒生命危险，拒绝支付使用。”

“凡伪造纸币的行为，被看成弥天大罪，要受到严厉的惩办。⁽¹⁰⁶⁾”纸币是在宋代出现的，元代纸币的权威和大量通行，说明商品交换的发达和商品交易额的巨大，是大都经济繁荣的一种标志。

“元都于燕，去江南极远，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¹⁰⁷⁾”元大都所需江南物资的运输途径，元初主要依靠运河，水陆兼运。元政府整修疏浚了运河，运粮河（通惠河）中船只直达城内。有的文献说，大都多一半粮食，是通过御河（运河天津至山东临清段）运来的。元代中期以后，随着航海技术的提高，海运占了主要地位，年运量达三百余万石。元末战乱，运河和海运中断，大都立即陷入混乱，元王朝终于倾覆。

大都的文化生活比较丰富。宋、金对峙时，全国文化重心移到南方。元代北方汉族传统文化有所恢复。儒生赵复被俘后，在大都开办太极书馆，讲授程朱理学，著有《伊洛发挥》、《希贤录》等，大都城成为北方的理学中心。至元二十四年（公元1287年），大都设立国子学，这是全国最高学府，地点在东城崇仁门内，东边是孔庙，西距大都路总管府不远，教授四书五经、程朱理学。

大都宗教寺院也很多，著名的如大护国仁王寺（大都城西高粱河畔，忽必烈皇后所建）、大圣寿万安寺（平则门内，今白塔寺，忽必烈时建）、大天寿万宁寺（大都城中心，元成宗时所建）等。

元大都壁画盛行，内容以山水竹木为主。宫廷、官府、寺院、宅第，都绘有壁画。元杂剧的出现，更是我国戏剧史上的重要一步，标志着我国戏剧艺术已趋于成熟。大都可以说是杂

剧的摇篮。元代著名杂剧家，据记载有五十六人，其中大都籍的即十七人。“元曲四大家”，大都占了三家，即关汉卿、马致远和王实甫。关汉卿的代表作是《窦娥冤》，王实甫的代表作是《西厢记》，杂剧作者当时习惯称为才人。演员称为乐人，属教坊司管辖。大都有一批著名的女演员，如珠簾秀、顺时秀、天然秀（均为艺名）等。珠簾秀本姓朱，门徒很多，都尊称她为朱娘娘。顺时秀本名郭顺卿，“教坊女乐顺时秀，岂独歌博天下名！意态由来看不足，揭簾半面已倾城。”（108）”

杂剧作者组成书会，剧本编成后加以刊印，公开发行。元代流传下来的杂剧剧本，往往印有“大都新编”字样，说明大都当时是刊印杂剧剧本的重要中心。

元至正二十八年（公元1368年），朱元璋定都南京，国号大明。明将徐达率军北伐，于七月到达通州，元顺帝于七月二十八日夜由健德门北逃。八月，明军占领大都，改名北平，并立即派人拆毁元朝宫殿。工部郎中萧洵，奉命至北平毁元旧都。当时，他将宫殿規制布局，作了一份比较详细的记录，这就是《元故宫遗录》，是一份十分珍贵的文献。但据后来的一些文献记载，当时只是拆毁了元大内的主要宫殿。朱棣封为燕王后，因元旧内隆福宫作燕王府，可见虽经拆毁，遗存仍是不少的。明初为了防御需要，将大都城北垣南缩五里，从海子（积水潭）最窄处通过。西段为让开水面，稍向南曲。

“行人千步廊前过，犹指宫墙说大都。”（109）”这是明初诗人的两句诗，说明大都已成历史过去，任别人评说是非了（110）。

第六节 明代的中都和两京

明初设两京一都，即以应天府为南京（洪武十一年改称京

师),开封府为北京,凤阳府为中都。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罢北京。永乐时,定都北平,称京师顺天府,改应天府为南京。

其实,明代直到英宗正统六年(公元1441年),才真正定下北京顺天府为京师。关于定都何处的问题,一直摇摆了七八十年,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少见的。即使在英宗以后,国都问题还是时起风波。

明初定鼎金陵,是明太祖的重大决策。在此以前,他曾有建都凤阳之意。朱元璋曾长期生活在凤阳,认为凤阳是龙兴之地,自然相当重视。元至正二十六年(公元1366年)春,当凤阳等地相继被攻占以后,他便亲到凤阳,省视祖宗坟墓,观察山川形势,意欲建都凤阳。后来,又借口凤阳为祖陵所在,锐意营建中都。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九月,朱元璋再次诏问群臣建都之地。“或言关中天府之国,或言洛阳天地之中,汴梁亦宋旧京,或言北平宫室完备,上以平定之初,民未休息,供给力役,悉资江南。建业长江天堑,足以立国。临濠(凤阳)前江后淮,以险可恃,以水可漕,诏以为中都。⁽¹¹¹⁾”这个问题上,刘基曾诚恳劝告朱元璋:凤阳虽帝乡,但不是建都之地。加之财力不济,朱元璋方于洪武八年四月,“诏罢中都役作。初,上欲如周汉之制,营建两京,至是以劳费罢之。⁽¹¹²⁾”可见当时虽已南、北两京并建,但朱元璋是准备废开封而以中都为两京之一的。

朱元璋攻下太平(今安徽黄山市)后,陶安等人都曾劝朱元璋定都金陵。朱元璋问儒生陶安:“吾欲取金陵,何如?”

陶安答复说:“金陵古帝之都,取而有之,抚形胜以临四方,何向不克?⁽¹¹³⁾”

布衣叶兑,亦献书太祖,提出战略决策:

“夫金陵古称‘龙盘虎踞’,帝王之都。借其兵力资财,

以攻则克，以守则固。……今之规模，宜北绝李察罕，东并张九四，抚温台，取闽越，定都建康，拓地江广，进则越两淮以北征，退则画长江而自守。（114）”

这些意见，是符合朱元璋的心意的。再则，自1356年朱元璋攻占金陵后，已以此为根据地，指挥了十年的战争，在金陵已有了根深蒂固的基础。朱元璋的得力助手刘基，也是赞成定都金陵的。金陵新宫的卜地定基，都是刘基所为。

“丙午（公元1366年）八月庚戌，拓建康城。初建康旧城西北控大江，东进白下门外，距钟山既阔远，而旧内在城中，因元南台为宫，稍卑隘。上乃命刘基等卜地定基，作新宫于钟山之阳，在旧城东白下门之外二里许。故增筑新城，尽钟山之趾，延亘周回凡五十余里，规制雄壮，尽据山川之胜焉。（115）”

新宫建成以后，朱元璋便于元至正二十八年（公元1368年）正式即皇帝位，定国号明，建元洪武。四月，攻下开封，便下令以金陵为南京，大梁（开封）为北京。

“朕惟建邦基以成大业，兴王之根本为先，居中夏而治四方，立国之规模最重。……朕观中原土地，四方朝贡，道里适均，父老之言，乃合朕意。然立国之规模固重，而兴王之根本不轻，其以金陵为南京，大梁为北京，朕于春秋往来巡守。播道尔民，使知朕意。（116）”在大梁建都，自然居中夏而四方均。但金陵是肇基之地，当然以根本为重。大梁虽定为北京，但立国之初，百废待兴，开封旧有基础早已在金、元时破坏殆尽。朱元璋在财力和精力上，都顾及不上在开封新建宫室。春秋巡守成了一句空话，北京早已有名无实。终于在洪武十一年，以“民生凋敝，水陆转运艰辛”，粮储不继为由，而罢废北京。

可是，到朱元璋晚年，又一次考虑迁都的问题。主要是由

于帝国版图的进一步扩大，诸王拱边，军事势力增强，朱元璋是不放心的。再则南京宫城北部系填燕雀湖而成，南高北低，从洪武门入皇城，越走越低，按照封建迷信说法，是不利于大明的江山社稷的。

“初大内填燕雀湖为之，地势中下，南高而北卑，高皇帝后悔之。”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祭光禄寺灶神文曰：“朕经营天下数十年，事事按古有绪。维宫城前昂后洼，形势不称。本欲迁都，今朕年老，精力已倦，又天下新定，不欲劳民。且兴废有数，只得听天。惟鉴朕此心，福其子孙云。（117）”

在此以前一年，朱元璋亦曾派太子朱标巡抚陕西，除省观秦王动静，也是一个迁都的准备。朱标临行前，朱元璋说：“天下山川，惟秦地号为险固，向命汝弟台封其地已十数年。汝可一图游，以省观风俗，慰劳秦民。（118）”朱标回来后，献上陕西地后就病了。朱标病中，朱元璋还曾与其讨论“经略都事”。

当然，在客观上，朱元璋晚年是不可能迁都的。首先是当时南京是兴王的根本，形成全国政治经济中心的形势已定。再则，难以选择适当的建都地点，也是重要原因。“大梁四面受敌，非建都之地。（119）”洛阳“虽曰宅中图治，道理适均”（120），但“嵩邙非有崤函、终南之阻。涧、瀍、伊、洛非有泾、渭、灞、浚之雄”。而河东（山西）“地势高，控制西北，尧尝都之，然其地苦寒。”（121）剩下一个北平，朱元璋又讨厌是亡国之地，“地气已尽”。早在建国之初，刚刚攻下北平时，朱元璋就曾策问廷臣：“北平建都可以控制胡虏，比南京如何？”翰林修撰鲍频说：“胡主起自沙漠，立国在燕，及是百年，地气已尽。南京兴王之地，不必改图。”（122）所以，迁都北平也是不

可能的。关中虽有山河之固，但比起开封来，漕运更为艰难，并不是理想的建都之地。从祭灶文看，朱元璋最后“只得听天”，取消了迁都的打算。

明成祖时迁都北京，保留南京为留都，明代两京制初步形成。文献记载成祖建两京之制的原因时说：“汉、唐、宋皆并建两京。汉、唐以长安为西京，洛阳为东京。宋以汴为东京，洛为西京。其地皆相去不远。高皇帝定鼎金陵，文皇帝迁都金台（今北京），则跨江河南北而各为一大都会。盖天下财富出于东南，而金陵为其会；戎马盛于西北，而金台为其枢。并建两京，用东南之财赋，会西北之戎马，无敌于天下矣。（123）”

明成祖始封于燕，对于他来说，燕京是“龙潜”之地，自然很为重视。尚书李至刚启奏：

“自昔帝王平定天下，或由外藩入继大统，而于肇迹之地皆有升崇。窃见北平布政司，实皇上承运兴王之地，宜遵太祖高皇帝中都之制，立为京师。（124）”

这一段话，正好说中了朱棣的心事。于是立即答复：“可，其以北平为北京。”这是成祖迁都北京的第一个步骤。

其实，明成祖是个政治野心家。封邸北燕时，他的王府即已过制。这是成祖觊觎皇权的一次暴露。建文元年，燕王上书南京宫廷，说了八件事，其中第七件是“……谓臣僭侈，过于各府，此盖皇考所赐，自臣之国以来二十余年，并不曾一毫增益，其所以不同各王府者，盖《祖训》营缮条云，明言燕因元旧有，非臣敢僭越也”（125）。但《洪武实录》却又有一条记载，燕王府落成，其制皆依定规。如何两说矛盾若是？《洪武实录》本身经过永乐时改纂，实录不实，而建文有关事迹，是万

历时才附入《洪武实录》之中，是比较真实的。燕王府并非新建，而是因元旧内（隆福宫），其他文献也有记载：

“初燕邸因元故宫，今之西苑，开朝门于前”（126）。

可见燕王府因元旧内，规模过制。但朱棣抢得皇位后，唯恐暴露，擅改实录。但他没有想到，二百年后，竟有人拿出他为自己辩护的“上书”，附入实录，成祖所为反而更加弄巧成拙。

成祖迁都北京的第二个步骤，是徙直隶（南京）、苏州等十郡、江浙等地十省富民，充实北京。

至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闰七月，作营建北京宫殿的准备，派人到川、鄂、赣、浙、晋诸省，采办木材。数十万军民人匠等，为筹办建筑材料，忙个不停。而朱棣本人，从永乐七年始，三次“北巡”，只留太子监国，自己一直在北京主持朝政。

这些准备工作都做完之后，朱棣想正式大兴土木了。这时，他又再一次召集群臣集议。当然有人看穿了他的心事。会上疏说：“伏惟北京，圣上龙兴之地，北枕居庸，西峙太行，东连山海，俯视中原，沃野千里，山川形势，足以控制四夷，制天下，诚帝王万世之都也。昔高皇帝消平海宇，以其地分封陛下，诚有待于今日。陛下嗣太祖之位，即位之初，尝升为北京，而宫殿未建……伏乞早赐圣断，所司早日兴工”。新宫正式建成，是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九月。第二年，成祖即正式以北京为京师，不再称“行在”，而将应天府称为南京。并诏告天下：“眷兹北京，实为都会，惟天意之所属，实卜筮之攸同。乃仿古制，徇輿情，立两京，置郊社宗庙，创建官室，上以绍皇考太祖高皇帝之先志，下以治子孙万世之弘规。”（127）”

都城已经迁到他的龙兴之地，成祖本该万事如意了。可是，偏偏天公不作美，迁都仅百日，永乐十九年四月初八，北京新宫奉天、华盖、谨身三殿同时被火烧毁，这对成祖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不得不哀叹，他仿古制，建设两京，却天意不遂。这时，一些原来不赞成迁都的大臣，又出来反对定都北京，主张返都南京。侍读李时勉第一个出来直陈建北京之非。侍讲邹缉，上本说：“当还都南京，奉谒陵庙，告以灾变之故，保养圣躬，休息于无为。”⁽¹²⁸⁾成祖大怒，说：“方迁都时，与大臣密议，久而后定，非轻举也。”⁽¹²⁹⁾斥责这些意见为书生之见，缺乏英雄谋略，遂杀肖仪，囚禁李时勉等，放逐罗通等数人至交趾，这一场还都之风波，方才平息。但成祖毕竟心虚，加之北部边防吃紧，财力亏空，奉天等三殿一直未复建。直到二十多年后，才由英宗重建。

成祖北巡以后，太子长期在南京监国。太子即位，是为仁宗。这时，南京又变成他的兴王之地，加之成祖曾动过废太子之念，仁宗对迁都之举，当然不满。仁宗即位，洪熙元年（公元1425年）二月，即恢复北京行部。四月，命修复南京皇城，并正式定第二年春天返都南京。返都之事正式准备，不料短命的仁宗竟于五月十二日一命呜呼。宣宗嗣位前，当皇太孙时跟随成祖住在北京，他当然不急于去南京，但又不愿违背父皇返都之意，所以一面称北京为行在，一面又长住北京。宣宗当政十年，就这样在“行在”处理政务。

英宗继位后，初期仍在奉天门，以“行在”名义行政。正统四年（公元1439年），开始重建北京宫殿，不及二年，三殿二宫建成，诏告天下，去北京各衙门“行在”二字，南京各衙门增“南京”二字，至此，北京的京师地位才再次正式肯定下

来。这个摇摆了七十余年的建都问题，虽然形式上解决了，但在以后明代二百年左右的时间中，成祖迁燕得失问题，直到明亡，仍一直是个争论问题。北京一有风吹草动，便有南返之议。英宗被俘，群臣议返南京，经兵部尚书于谦制止。崇祯末年，李自成围北京，又欲南迁而未果。后福王在南京建立南明，算是回光返照，不到二年，迅速溃灭。

黄宗羲曾直言燕王都燕之失算。他认为明代都燕二百余年，三帝受悖（英宗被俘，武宗被围于阳和，李自成围京师），晚明京师年年告急戒严，江南人民又竭于输挽，“皆都燕之为害也”。他认为，“东南粟帛，灌输天下；天下之有吴会，犹富室之有仓库匱篋也。今夫千金之子，其仓库匱篋必身亲守之。而门庭则以委之仆妾。舍金陵而勿都，是委仆妾以仓库匱篋；昔日之都燕，则身守夫门庭矣。曾谓治天下而智不（若）千金之子若与！（130）”

当然，迁都北京是有缺陷的。北京缺水缺粮，依赖运河漕挽，运河成为朝廷存亡的生命线。从地理位置上看，有明一代民族政策上有失误，造成长期与蒙古族的对立，北京之外，一墙之隔即为强敌，京师多次被围，充分暴露了北京当时在地理位置上的弱点。

当然，迁都北京，促进了北京周围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天子守边”，有利于抵御外族，巩固明王朝的统治。这是问题的又一面。

〔明南京〕

1366年，朱元璋改元代集庆路为应天府。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在应天府正式即位，称南京（应天府称南京，自洪武元年始。有的文献和专著说永乐十八年改应天府为南京，实

誤)。洪武十一年，废开封府北京称号，应天府改称京师。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复称南京。

明应天府城是在南唐首都江宁府城的基础上扩建的，所以，必须先介绍一下南唐江宁府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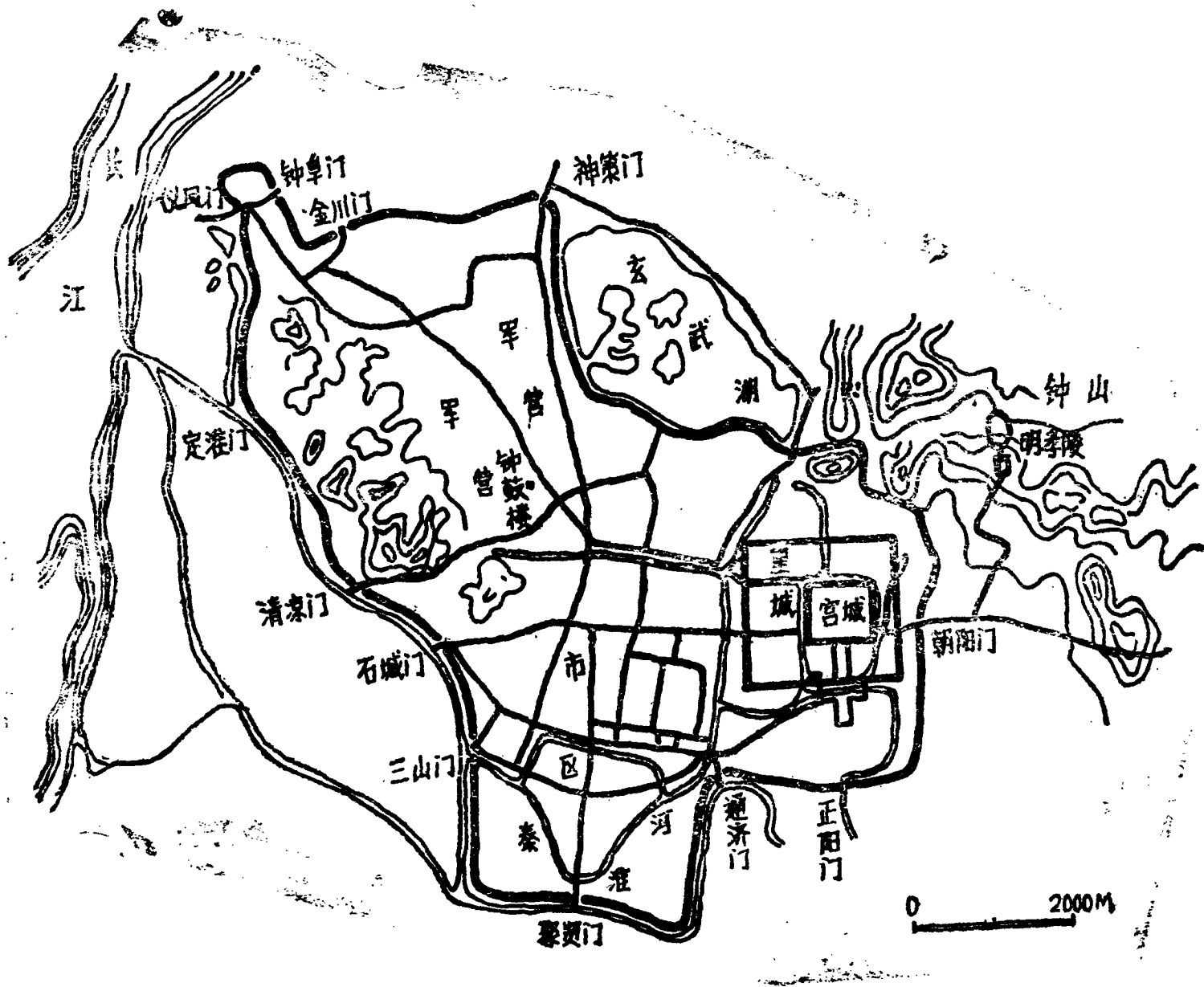
南唐李昇本是杨吴丞相徐温的养子，改名徐知浩。杨吴时，以广陵府为东都，金陵府为西都，修建了金陵府城。杨吴天祚三年（公元937年），徐知浩灭吴，自行称帝，把都城从广陵迁到金陵府，并改名为江宁府。所以南唐江宁府城仍杨吴金陵府城之旧。

金陵府城是李昇（当时仍叫徐知浩）在914年任昇州刺史时开始重建的。从589年隋灭陈，至杨吴金陵府城的建立，时间上已相隔三百余年。920年，新城完工。932年，又一次扩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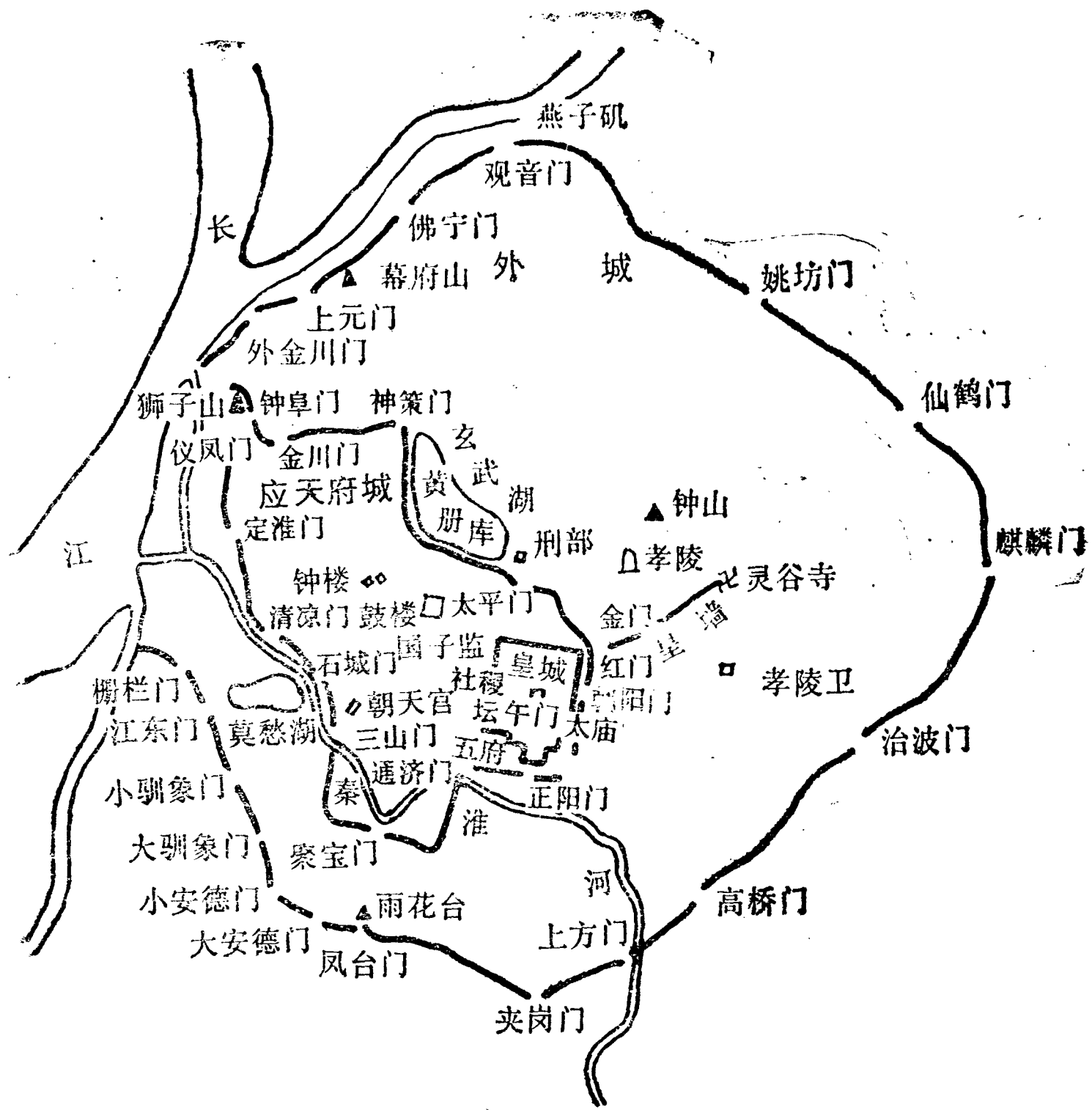
杨吴城跨淮带江，把六朝建康城向南移动很多，将秦淮两岸的商业和居民区包入城内，即今日内秦淮。另在南城外开护城河，即今之外秦淮。该城南至今日外秦淮，北至干河沿，西至汉中门、水西门一带，东到大中桥，周二十五里（一说三十五里）。城墙下阔三丈五尺，上阔二丈五尺，高二丈五尺。城有八门，南曰南门（今中华门），东曰东门、上水门，北曰北门，西曰西门（今汉西门）、栅寨门、龙光门、水西门、下水门。南唐建都，以府治为宫，位于城中，周四里。宫城南、东、西各一门。南门外有虹桥（今内桥），又称天津桥。宫殿有崇德宫、德昌宫、延英殿、升元殿、雍和殿、昭德殿、穆清殿、光政殿等。南唐灭亡以后，宋将建康作为行都，利用南唐宫城作为行宫，长达一百四十余年。

朱元璋于1366年即开始在南唐江宁府城的基础上扩建应天

府城。据文献记载，“京城周九十六里（洪武三年九月始建新城，六年八月成）。洪武二十三年建外城，周一百八十里。”⁽¹³¹⁾今实测内城周 37.14 公里（今存 21.3 公里）。外廓城已经圯毁，各城门名称今仍为当地地名，并形成郊区集镇。扩建后的应天府城，即明都城：“东尽钟山之南岗，北据山控湖，西阻石头，南临聚宝，贯秦淮以内。”⁽¹³²⁾”都城面积约60平方公里，外廓城面积达120平方公里。朱元璋扩建时，是先在江宁府城的东边，加上一个方形的皇城，再用大城把皇城包入城内。然后，又在江宁府城的北边，玄武湖的西侧，加建一个也是基本方形的“后湖城”。



图三十三 明代南京城图



图三十四 明代南京城外廓图

城墙依山傍水，高宽度因地制宜，不完全一致。最高处达60米，一般在14—20米之间。厚度最宽处达25米，一般在7—10米之间，全部为土筑砖包。巨大的砖城据不完全统计，来自长江中下游一百五十二个州县，城砖 $40 \times 20 \times 10$ 厘米，每个重15—20公斤。砌筑时“以石灰、秫米（粘高粱）调其外，故任指一处击之，皆作纯白色。”⁽¹³³⁾晚清甘熙《白下琐言》中认为，可能有一种植物叫蓼草的，放热水中可成粘液，再加石灰等拌合而成。坚韧的粘合剂，加之用花岗岩砌筑的基础，使南京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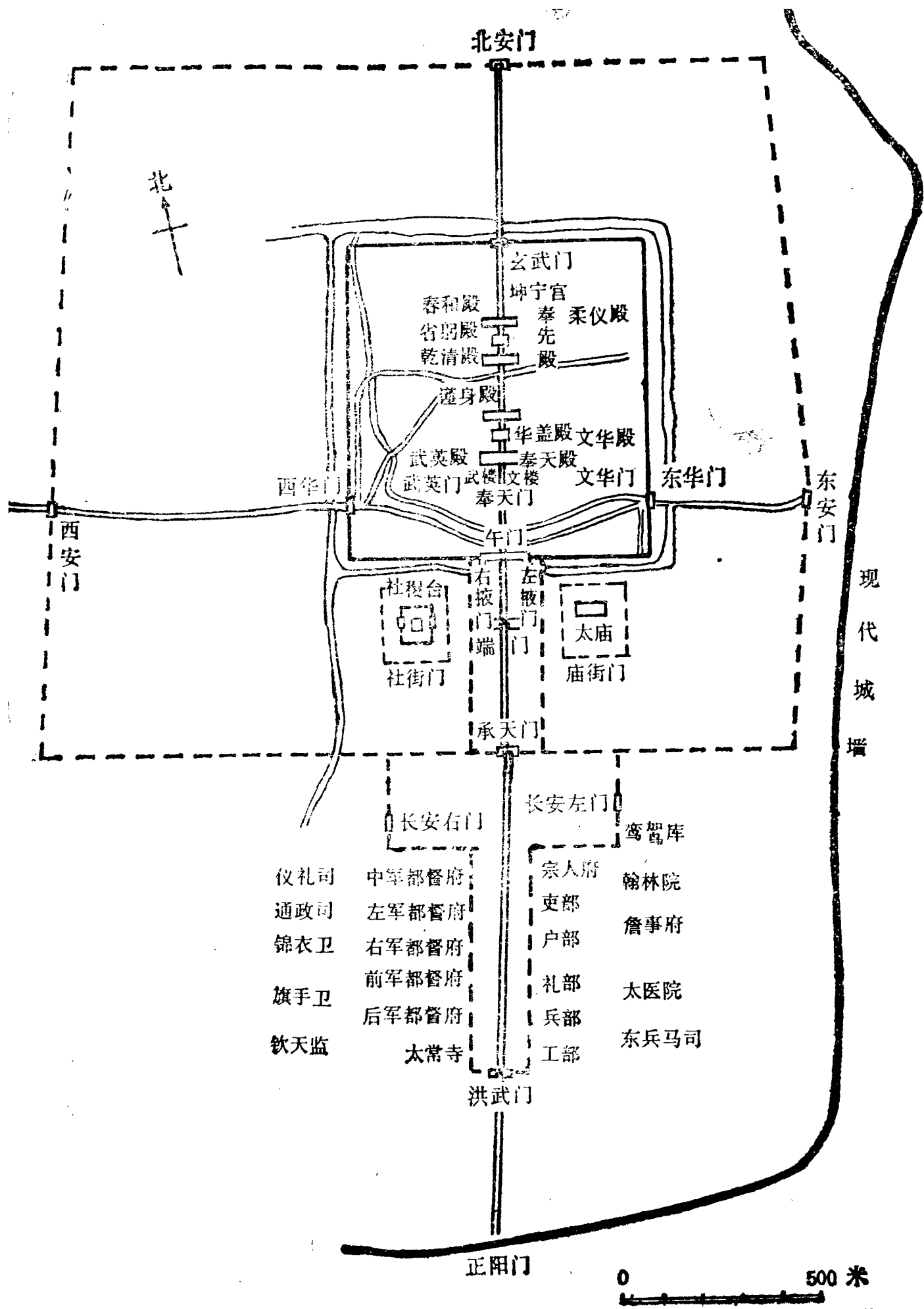
垣历六百年而不衰。

城垣有垛口（雉堞）一万三千六百一十六个，窝棚二百座，城门十三。正南为聚宝门（今中华门）、通济门、正阳门（今光华门）。东为朝阳门（今中山门）。北为太平门、神策门（今和平门）、金川门、钟阜门（今小东门）、仪凤门（今兴中门）。西为定淮门、清凉门、石城门（今汉西门）、三山门（今水西门）。（清代至民国，陆续开武定、汉中、草场、挹江、小北、新民、中央、玄武八门；解放后，开雨花、解放二门，今南京城有二十三通城门）。

其外廓城又有十六座城门。即姚坊（今尧化门）、仙鹤、麒麟、沧波、高桥、双桥、上方、夹岗、凤台、大驯象、大安德、小安德、江宁、佛宁、上元、观音十六门（清代又开栅栏、外金川，今十八门）。外廓城城门等险要处砌以砖石，约有40里。

其中聚宝门是我国规模最大的古城堡。有三道瓮城，成“目”字形。单门洞四重开四门，城门东西128米，南北129米，占地16512米，城高21.45米。最外层瓮城内侧，分上下两层，有27个藏兵洞，最大者占地310平方米。瓮城内有东西两条蹊蹶和一条坡道，可骑马直登城墙之上。外层瓮城上有谯楼，可瞭望敌情。城外有120米宽的外秦淮，城内有28米宽的内秦淮，作为内外堑，真是设计得铜墙铁壁，固若金汤。明初的都城，把六朝建康城、南唐金陵城，以及石头城、西州城等全部包入其中。外廓城把东府城、越城以及钟山、雨花台周围诸山和玄武湖全部包入其中，如此规模，确为世界第一。

南京皇宫，分内外两重城垣。外边是皇城，南北五里，东西四里。内为宫城，见方约二里，即紫禁城，通称大内。皇城



图三十五 明代南京皇城图

呈凸字形，有六门：正南是洪武门，正对都城正阳门，两侧有长

安左、右门。东有东安门，西有西安门，北有北安门。宫城正门为午门，两侧有左、右掖门。东有东华门（对都城朝阳门），西有西华门，北有玄武门。洪武门至午门间，还有承天门和端门。宫城外有护城河，承天门外有外五龙桥，午门内有内五龙桥，东华门至东安门大道两侧有东上南门和东上北门。西华门至西安门大道两侧有西上南门和西上北门。玄武门到北安门大道两侧有北上东门和北上西门。正殿是奉天殿。奉天殿前是奉天门，后是华盖殿和谨身殿，即所谓外朝三殿。奉天殿东路，建有文华殿、文楼、东六宫等，西路建有武英殿、武楼、西六宫等。谨身殿后是乾清门，门内有乾清宫、坤宁宫，建文时加筑省躬殿于二宫之间。午门外御道两侧，东为太庙，西为社稷坛。

承天门前御道两侧排列着中央官府，主要的是五府五部（六部中的刑部在太平门外）。五府是中、左、右、前、后等五军都督府。五部是吏、户、礼、兵、工五部。

另外，在都城之外，还建有一些礼制建筑。正阳门外，钟山之阳有圜丘。太平门外钟山之北有方丘。南郊有先农坛。后圜丘、方丘坛合为天地坛，建大祀殿。天地坛之西又建山川坛。洪武二十一年，又在天地坛内修日月星辰四坛。

南京明故宫在明末清初的战争中遭到严重破坏。其后，清兵改建为驻防城，成为八旗兵的驻地。清咸丰年间，再次遭到战争破坏，毁于兵燹。年长日久，遗迹大部湮灭，面目全非。近代以来，研究和介绍明故宫的文章和专著甚多。但这些文章和专著涉及明故宫的城门名称时，说法诸多混乱。因此，对南京明故宫各门的名称，有必要仔细考辨，辨明正讹，以免以讹传讹。

明代建筑应天府城时，将皇宫置于城的东偏。皇宫有内外两重城垣，外垣一般称皇城，内垣一般称宫城，即紫禁城。明时文献和日常活动中称为大内。紫禁城外绕以护城河，水系今仍基本完整，称为紫禁城河，外五龙桥下东西向的称为御河。连接紫禁城河与御河的称为玉带河。

皇城成凸字形，正门洪武门，正对都城正阳门。皇城南垣正中与洪武门相对的门称为承天门，前为外五龙桥。宫城南垣正中的门为午门，又称五凤楼。门内有内五龙桥。午门与承天门间夹一门称端门。承天门前两侧南北向的城垣上有东西相向的长安左、右门。午门内五龙桥北奉天殿前，有奉天门，实际是奉天殿大门。对于这几座门，各家说法是一致的，我们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

第一，皇城和宫城的东、西、北门叫什么名称。

第二，宫城有几门？东上南门，东上北门（北、西类推）等六门是否在宫城垣上以及它们的具体位置。

第一种说法，同济大学城市规划教研室主编的《中国城市建设史》和朱偁先生解放前所著《金陵古迹图考》认为：皇城东、西门是东华门和西华门，北门是玄武门。宫城的东、西、北三门是东安门、西安门和北安门。

第二种说法是，皇城的东、西门称为东安门和西安门，北门称玄武门。宫城东、西门称东华门和西华门。北门称北安门。朱偁先生五十年代出版的《南京的名胜古迹》一书，采用这种说法。同是朱偁先生，时隔不到二十年，所著两书说法不一。近年出版的《中国古代都城概况》、《南京导游》等书，也采用这种说法。

第三种说法是，皇城东、西、北三门分别称为东安门、西

安门和北安门。旧中央大学出版组印行的葛定华的《金陵明故宫图考》一书，即曾采取这种说法。该书系中央大学自行印行，为数很少，故影响不大。

之所以这样众说纷纭，除了前面所说由于年长日久，故址破坏严重以外，《明史》本身记载的混乱和失误，是一个重要原因。

《明史·地理志》说：

“洪武二年九月始建新城，六年八月成。内为宫城，亦曰紫禁城。门六：正南曰午门，左曰左掖，右曰右掖，东曰东安，西曰西安，北曰北安。宫城之外门六：正南曰洪武，东曰长安左，西曰长安右，东之北曰东华，西之北曰西华，北曰玄武。”

《明史·舆服志》说：

“吴元年作新内，正殿曰奉天殿，后曰华盖殿，又后曰谨身殿……谨身殿之后为宫，前曰乾清，后曰坤宁，六宫以次列。宫殿之外，周以皇城，城之门，南曰午门，东曰东华，西曰西华，北曰玄武。”

“二十五年改建大内，又建端门、承天门楼各五间，及长安东、西二门。”

《明史》中《地理志》与《舆服志》记载的不同，是造成后世诸书混乱的重要原因。一些文章和著作，对《明史》提供的材料，未加仔细审订，或直接用《地理志》的说法，或直接用《舆服志》的说法，有些书籍文章，又陈陈相因，致使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经过多方仔细考证，我们认为，南京明故宫外垣称为皇城，东、西、北三门的名称应是东安门、西安门和北安门。明故宫内垣称为宫城，又称紫禁城，东、西、北三门名称应是东

华门、西华门和玄武门。东上南门、东上北门、西上南门、西上北门、北上东门、北上西门等六门是皇城和宫城之间相向的院落之门。《江苏园林名胜》、《南京导游》（均为江苏科技出版社，1982年版）等书说这六门是宫城之门是错误的。

其理由如下：

经过查对文献，我们发现，《明史·舆服志》的记载同《明实录·太宗实录》是一致的，甚至连文句都无差别。而《明史·地理志》的说法同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是一致的。《明史》的成书是在顾炎武死后五十多年，很可能《地理志》的执笔者是采用了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的材料。再追溯一下，可以发现，《天下郡国利病书》关于明故宫城门的说法是摘自《洪武京城图志》。一般地说，《洪武京城图志》一书成书较早，比较可靠。但同宫内直接撰修的《明实录》比较，《明实录》的材料要更加准确。当然，《舆服志》所据《明实录》记载，也有一处必须注意。即“宫殿之外，周以皇城。”宫殿之外的一重城垣，是紫禁城，一般称为宫城。在《明史》和《明实录》中，关于皇城和宫城名称使用上的混乱，多处可见，加之明初一度将京师宫城称为皇城，这样一来，明代文献关于皇城和宫城的名称使用更加混乱，在使用这些有关的材料时，必须仔细审订。再看北京故宫，北京明代皇宫是仿照南京明皇宫建设的。《明实录·太宗实录》记载：

明永乐十八年建北京，“宫殿、门阙规制，悉如南京，而高敞壮丽过之。”

今北京故宫虽经清代改建，但总的变动不大。清入关以后，陆续更改的旧明皇宫几个主要城门的名称是：改大明门为 大清门（相当于南京明皇宫的洪武门），改承天门为天安门，

改玄武门为神武门，改北安门为地安门。据文献记载和现存情况，明代北京皇城东、西、北三门是东安门、西安门和北安门。今皇城垣虽已拆除，但以这些门命名的地名还在使用（北安门已改为地安门）。宫城的东、西、北三门，明代称东华门、西华门、玄武门。既然北京皇宫建设时“门阙规制，悉如南京”，则两京皇宫城门名称不应不相同。

另外，据《明史·职官志》载：

洪武元年“皇城门官端门等十六门，各设门正，正七品，副，从七品。”

洪武“二十八年重定内宫监、司、库、局诸门官……各门官七：午门、东华门、西华门、玄武门、奉天门、左顺门、右顺门，皆设门正一人，正四品；门副一人，从四品。”

第一条材料中的“皇城”，指的是明皇宫的外垣，说明皇城内有关端门等十六门需设门正、门副。第二条材料，可以看出，所列午门、东、西华门等七门都是皇宫内城即紫禁城垣及其以内的门。

南京明故宫遗址紫禁城北护城河以北，有“后宰门”地名。“后宰门”又写作“厚载门”。这个地名的范围，从紫禁城河以北一直延伸到接近富贵山南麓。明司礼太监刘若愚所著《明宫史》一书说北京皇城北门，“曰北安门即俗称‘厚载门’是也。”南京厚载门地名今既在紫禁城河以北，说明它是皇城的北门，则皇城北门的正式名称应是北安门。否则，厚载门的地名应在紫禁城河以南。皇城北门既为北安门，则宫城北门就是玄武门了。

南京明故宫宫城东门、皇城西门遗迹尚存，且城垣、门洞还比较完整。宫城东门今称东华门，位置正在紫禁城东护城河西岸，其东还有“东安门”地名。皇城西门今称西华门。

宫城东门称东华门是正确的，皇城西门称“西华门”是民间误称，应更正为西安门。这样，就同北京故宫皇城各门的名称一致。

最后，还有东上南门等六门的位置问题。《金陵古迹图考》、《南京的名胜古迹》、《南京导游》、《中国古代都城概况》等书中说，南京明代宫城城垣上还有东上南、北门，西上南、北门，北上东、西门，共有十二门，这是错误的。宫城应只有六门，除上面已讲到四门外，午门两侧有东西相向的左、右掖门。参照明北京皇城和宫城规制，东上南门等六门应是皇城和宫城之间两两相向的院落之门。北京紫禁城玄武门外护城河以北是北上门（今已拆除）。出北上门，是东、西相向的北上东门、北上西门。东上南门在东华门外大道南侧，东上北门在东华门外大道北侧。同样，西上南门在西华门外大道南侧，西上北门在西华门外大道北侧。南京明代宫城这六门应同北京的布局是一致的。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根据《洪武京城图志》的材料说：“大内六门”，是正确的。顾炎武还明确指出，东上南门等六门是在皇城各门之内。如果这六门是在宫城垣上，则可直接说是宫城之门，而不必说是在皇城的××门内。由此可见，说南京宫城有十二门是不正确的。

根据以上考证，虽然我们还不能准确地确定东上南门等六门的具体位置，但是它们的基本方向，以及其它主要城门的位置和名称就明确了。

应天府城内除皇宫外，城南原江宁府城部分主要是商业和居民区，后湖城部分是军营。在城中高坡上，建有钟楼和鼓楼。其中在鼓楼之西的钟楼已毁。钟楼内原有大钟两口，各重四万六千斤，今存其一。鼓楼原有大鼓一面，小鼓二十四面。

鼓楼仍在（经清代重修过）原址。高坡上建有三门洞的城垣，耸立着重檐歇山顶的宫殿式建筑，壮丽非凡。

此外，在南京城内冶城遗址建了朝天宫，为臣下练习朝贺礼节的地方。在鸡笼山南建有国子监，是国立大学。王府亦遍布全城。今日南京常府街（常遇春开平王府）、信府街（信国公汤和东甌王府）、瞻园（徐达的中山王府东花园）、邓府巷（宁河王邓愈王府）、马府街（郑和王府），都是明代王府遗迹。

在钟山之阳，朱元璋为自己修建了巨大的孝陵。孝陵紧靠都城外垣，周有围墙四十五里。南面建一道皇墙，向东直到灵谷寺；北依钟山；西傍都城东垣。皇墙中间开有金门，是孝陵正门。墓道绕梅花山而行，弯曲不直。两旁列石兽12对，华表1对，石人4对。钟山之阴，有常遇春、徐达、李文忠等人的坟墓。将陵墓建于都城之旁、外廓之内的做法，且用弯曲的墓道，也是战国以后所未见的。

明成祖为孝陵准备了巨大的神功圣德碑材。碑材在今东郊阳山，共三块，通称“阳山碑材”。碑座长26.5米，宽16米，厚13米，碑额作椭圆形，长20米，宽10.7米，厚13米；碑身长42米，宽11.8米，厚4米。接起来高达70米左右，重约一万七千余吨，是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一大碑。因太大无法运走，只得舍弃原地。今孝陵碑只有8.7米高，但仍为南京地区第一大碑。

在明初，南京人口在七十万人左右（洪武二十四年，南京有四十七万三千二百人，加上军队约二十万人）。至明代中叶，发展到一百二十万人左右。明初和明中叶，南京一直是全国人口最多的城市。加上南京位处全国最富庶地区的中心，

所以明代南京实际是全国的经济中心，其繁华程度可想而知。明人所绘《南都繁会图卷》，在长3.5米、宽44厘米的画面中，有一百零九种店铺招牌和一千多个人物。这是当时南市街到北市街（今三山街一带）的盛况。明初，还把江浙湖广川粤等地一万四千三百多富户迁入南京。在京城外廓之内，建立了一系列的经济园林，如漆园、桐园、棕园、花果园等。

在城南十八个坊（今日街道仍以这些坊命名）中，住有十余万手工业工人。如有三个织锦坊，还有鞍辔坊、弓匠坊、箭匠坊、铁作坊、银作坊、毡匠坊和三个“杂役坊”。

《儒林外史》一书中，对明代南京的繁华，做了生动的描绘：

“这南京乃是太祖皇帝建都的所在，里城门十三，外城门十八，穿城四十里，沿城一转足有一百二十多里。城里几十条大街，几百条小巷，都是人烟稠集，金粉楼台。城里一道河，水满的时候，画船箫鼓，昼夜不绝。城里城外，琳宫梵宇，碧瓦朱甍。在六朝时，是四百八十寺，到如今何止四千八百寺！大街小巷，和共起来，大小酒楼有六七百座，茶社有一千余处……到晚来，两边酒楼上明角灯笼，每条街道上足有几千盏，照耀如同白日，走路人并不带灯笼。那秦淮到了有月色的时候，越是夜色已深，更有那细吹细唱的船来，凄清委婉，动人心魄。”

又说“这聚宝门，当年说每日进来有百牛千猪万担粮；到这时候，何止一千个牛一万个猪，粮食更无其数。”（134）

当时南京的丝织业特别发达，光同丝织业有关的行业就有二十多个。明代皇室应用的所有丝织品和赠送国外的丝织品，都是南京织造的。南京司礼太监掌管的神帛堂，生产帝、后专用的龙衣和蟒袍。

建筑、造船、印刷业也很兴盛。由于建筑都城、宫室、衙署、寺庙、陵墓等的需要，在今雨花台西面专设烧琉璃的大窑几十座，著名的报恩寺琉璃塔所用构件即是此处烧造的。

三汊河的龙江宝船厂，所造的供郑和下西洋的宝船，最大的长44丈，宽18丈，有12个大帆，可乘千人。解放后，在这儿发现了大舵杆和绞关等实物。迁都北京后，所造运漕船，主要是将集中到南京的漕粮北运北京。

南京还是当时铸造铜钱和印刷纸币的中心。明正式建国前，即已铸有“大中通宝”。建国后，正式设宝源局，开铸“洪武通宝”。洪武七年（公元1374年）。又设“宝钞提举司”，领导“南京宝钞局”大量印刷纸币“大明通行宝钞”，今南京仍留有钞库街地名。

南京的商业活动，大部分是在街道两旁的廊下进行的。当时主要街道两侧都建有廊，这是从北宋开封已经开始出现的，实际是专业街。如糖坊廊、裱画廊、书铺廊、绸缎廊、毡货廊、红纸廊、明瓦（天窗）廊、估衣廊等。有些廊名，至今仍存。城南大报恩寺，同开封相国寺一样，也是商业市场。城内还有大小几十个专业市场。如丝市、绸市、网巾市、花市、珠市、鱼市、菜市、米市、油市、木料市、牛市、羊市、驴子市等等。综合性市场如三山街市、内桥市、新桥市、大中桥市、长安市、北门桥市。城外还有大市、来宾街市、江都市、龙江市等。这些市场，也有一定的分工，如三山街市为时果，新桥市为鱼菜，江都市米麦及附近的“六畜场”等。

明代初期，南京是全国的文化中心。国都北迁以后，还是全国的文化中心之一。

明初，国子监设在鸡笼山前，是国立大学，也是制版印刷

中心，最初创设于洪武十四年。这座学校拥有九千多名中外学生，有“号房”（学生宿舍）一千多间。学生中有朝鲜、日本、琉球、泰国等的留学生，其中还有女留学生。

国子监内集中了宋元以来南方的宋元刻版，大量编辑和出版书籍。永乐年间编成《永乐大典》（原名《文献大成》），共二万二千九百三十七卷，分装一万一千零九十三册，共三亿七千多万字，藏于南京文渊阁。《永乐大典》是我国最大的一部百科全书，后运到北京文渊阁，嘉靖年间抄成副本。原本毁于兵火，副本也仅存三百七十五册。

南京国子监印刷的书籍称“南监本”，印刷精良，水平较高。但明中叶以后，原版已漫漶不清，印出的书质量差，称为“三朝本”，就不再受到重视了。在南京初刻印刷的有《元史》、《元秘史》、《大明律》、《明大诰》及佛经等。《本草纲目》也是首先在南京刻印的。明中期开始，出现了多色套印的“俛版”技术和拱花技术。居南京的徽州人胡正言刻印的《十竹斋画谱》和《十竹斋笺谱》及在其影响下画家王蓍创作的《芥子园画谱》，都是我国木刻的菁华。

在科学技术方面，在鸡笼山和聚宝山（雨花台）分别设有观象台（钦天台）和“回回钦天台”，设备相当完善。钦天台设立于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比英国格林威治天文台（建于1670年）早二百八十五年。“回回钦天台”是吸收阿拉伯人的天文学成就建成的，南京并出版过《回回历法》一书。

南京明代有三座最著名的大佛寺，即大报恩寺、灵谷寺、天界寺。大报恩寺的琉璃塔号称天下奇观，高三十二丈九尺四寸九分，九层八面。始建于永乐十年（公元1412年）。建成于宣德六

年（公元1431年），历时十九年，耗银三百四十八万两以上。寺周九里十三步，有和尚五百多名，十大宗派在其中都有代表。报恩寺是明成祖为纪念其生母硕妃所建。报恩寺雕版印刷的五千多卷的“大藏经”，号称“南藏”。塔的外面用五色琉璃装饰（绿色为主），饰以狮、象、飞羊、飞天和各种佛像。塔的琉璃构件一式三份，一套砌塔，两套编号埋入地下，以备修补。解放后，考古工作者在雨花台附近发现了这些琉璃备件。塔顶为重达两千两的黄金宝顶，下面是九级相轮，由九个铁圈组成，共重三千六百斤。大的圆周达三十六尺，小的十四尺。相轮之下的承盘（俗称金球），是铁盘外镀以一寸厚的黄金，直径十二尺，重四千五百斤。塔中还放有黄金四千两，白银一千两和夜明珠、避火球、宝石等，可能在地宫之内。从塔顶垂下铁索八条，各垂风铃九个，共为七十二个。每层的飞檐下也有风铃，共八十一个，全塔计152个。放置油灯146盏，灯芯直径一寸左右，日耗油64斤之多。可惜这座矗立在南京达四百二十五年的举世无双的琉璃宝塔，在清咸丰年间毁于兵火。

南京还是当时国际交往中心。永乐六年（公元1408年），南洋渤泥（今加里曼丹岛上）国王麻惹加那率王妃、弟妹、子女百余人到南京访问，不幸病歿于南京会同馆。遗命希望葬于中华，明政府以王礼葬于南郊安德门外花村。该墓于1958年被发现，墓前石刻、残碑尚存。

〔明中都〕

朱元璋在明王朝建立之初，曾在其老家凤阳建立了一座中都城。

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将临濠府置为中都，六年九月改中立府，七年八月改凤阳府。洪武八年罢中都役作，当年

继续建完钟鼓楼。

中都城在今安徽凤阳县内，有里外三道城垣。据文献记载，外城周五十里四百四十三步⁽¹³⁵⁾，立门九：正南为洪武门，两侧为南左甲第门、前右甲第门。北垣有北左甲第门、后右甲第门。东垣正中为独山门，南为朝阳门，北为长春门。西垣只有一个涂山门。西南角将凤凰山包入城内，突出一块，称凤凰嘴。外城垣因山土筑，高三丈，包进日精、月华、万岁等山。

皇城位都城内偏南，周九里三十步，高二丈，砖石修砌。南正门为承天门，东为东安门，西为西安门，北为北安门。皇城正中是大内（紫禁城），周6里，高4丈5尺5寸，砖砌，四角有角楼。宫城四门：前午门，后玄武门，东为东华门，西为西华门，各有门楼。玄武门以北是苑囿。午门前左为太庙，右为太社坛。承天门前左为城隍庙，右为功臣庙。再前面是一条横街——云霁街。左端为鼓楼，右端为钟楼。承天门后有端门，前有大明门。大明门至洪武门的洪武街两侧，有左右千步廊、文武官署等。

在皇城里外修建了考究的白玉石大街，建设了下水道。据记载原设街二十八、坊一百零四，由于罢建而没有形成。南城外不远略偏西是皇陵，北城外有十四王妃坟。

明中都是平地规划，不受旧城影响，规制严整，皇、宫城仿南京规制，其整个布局又对北京城的建设起了直接影响。

中都城以后陆续拆迁，明末又遭兵燹，今地面只剩皇城遗迹。

〔明北京〕

明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改北平府为北京顺天府。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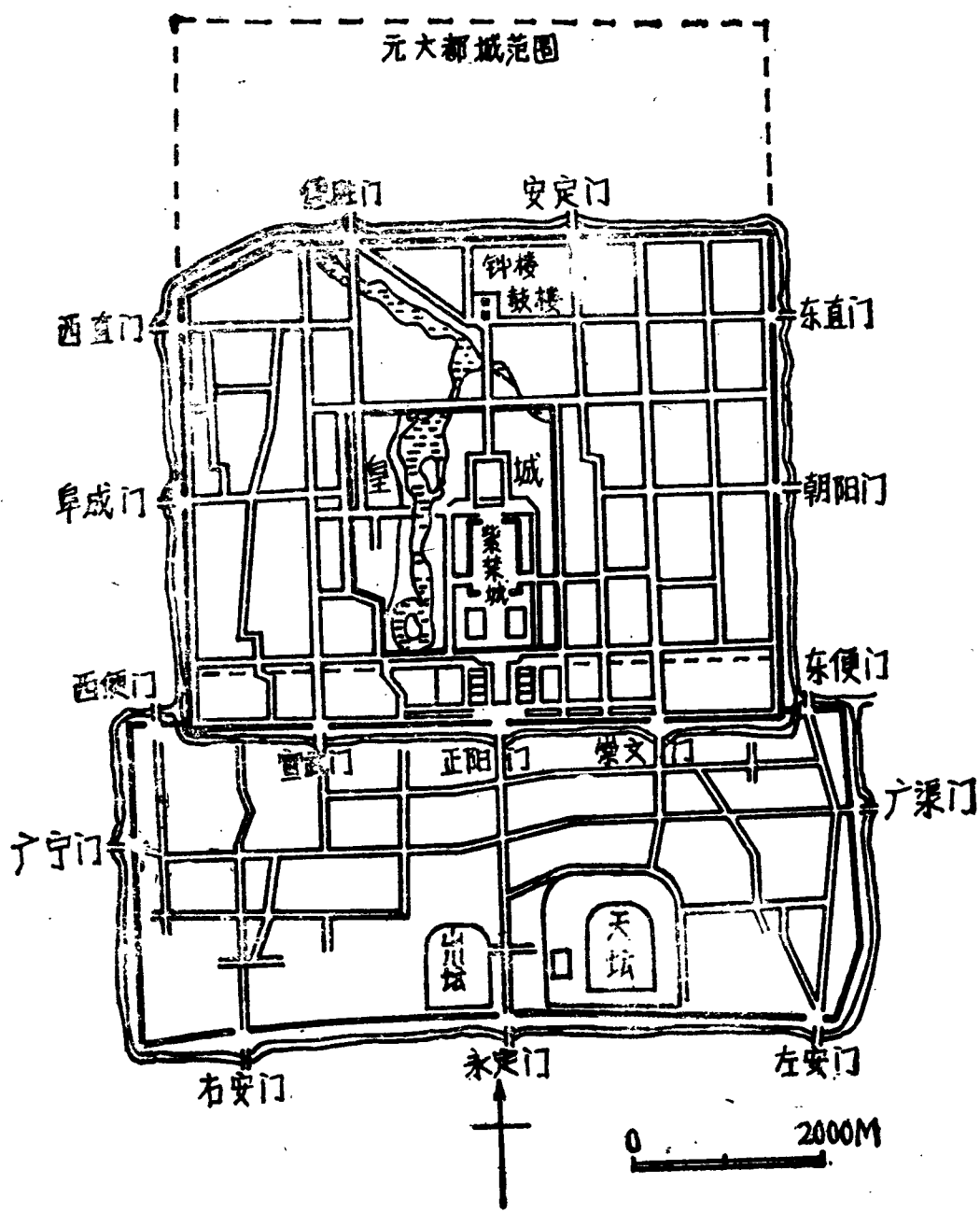
乐十九年，迁都北京，改称京师顺天府。洪熙元年（公元1425年），复改为“行在”。正统六年（公元1441年），才去“行在”二字，正式改为京师。

明初的北平府城是在元大都的基础上改建的。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徐达修复元大都城，将城北五里空旷之处划出城外。永乐十五年，动工修建北京皇、宫城和宫殿。永乐十七年，“拓北京南城计二千七百余丈”（《续通志·都邑略》，此处“丈”应为“尺”之误）。至永乐十八年，全部建成。建设过程中，迁南京工匠二万七千人于北京，动员工匠二、三十万人，役民夫近百万。

嘉靖三十二年，“兵部尚书聂豹等言：相度京城外四面宜筑外城，约七十余里，得旨允行。乙丑，建京师外城兴工，敕谕陈圭、陆炳、许论提督工程。四月，上又虑工费重大，成功不易，以问严嵩等，嵩等乃自诣工所视之。还言宜先筑南面，俟财力裕时再因地计度以成四面之制，于是嵩、会、圭等议复：前此度地画图原为四周之制，所以南面横阔凡二十里，今既止筑一面，第用十二三里便当收结，庶不虚费财力，今拟将见筑正面一面城基东折转北，接城东南角，西折转北，接城西南角，可以剋期完报。报允。”⁽¹³⁶⁾外城工程于嘉靖四十三年（公元1564年）完工，所以北京城成为全国独一无二的“吕”字形城。未全部完工的北京城的本身，就是明王朝没落的标志。

经过这样改建后，北京内城周45里，共有九门：南面正中为丽正门（正统时改正阳门），东为文明门（正统时改崇文门），西为顺城门（正统时改宣武门）。东垣南为齐化门（正统时改朝阳门），北为东直门。西垣南为平则门（正统时改阜成门），北为西直门。北垣东为安定门，西为德胜门。文献

记载外城周二十八里。正南为永定门，其东为左安门，其西为右安门。东向广渠门，西向广宁门（清道光时改广安门）。东、西与内城交接的东西转角有两小门，东为东便门，西为西便门。内城东南和西南角有高聳的角楼。城门有瓮城和城楼、箭楼，内、外城均是砖包城，都有护城河。



图三十六 明代北京城图

今实测内城东西长6650米，南北长5350米；外城东西长7950米，南北长3100米。

皇城位于内城中心偏南，文献记载周十八里。今实测东西长2500米，南北长2750米，基本方形（西南缺一角，原有一

寺)。皇城之内偏东为宫城，即紫禁城，城墙高10米，外有宽52米的筒子河。紫禁城正门为午门，东西向有东华门、西华门，北向玄武门。皇城内、宫城外有东上门、东中门、东上南门、东上北门；西上门、西中门、西上南门、西上北门；北上门、北中门、北上东门、北上西门等十二门。

宫城文献记载周六里一十六步，实测南北960米，东西宽760米。城四角有华丽的角楼，号称九梁十八柱。

午门前两侧皇城内东为太庙，西为社稷坛。承天门前有丁字形广场，两侧有千步廊和府、部等中央衙署等。承天门前天街南端靠正阳门内是棋盘街。

宫城西侧，在元太液池的基础上加开南海，形成今日南、中、北三海的格局。

宫城内正殿是奉天殿（后改皇极殿），奉天殿前是奉天门。奉天殿后是华盖殿（后改中极殿）、谨身殿（后改建极殿），这就是所谓外朝三大殿。其后为乾清门，有内朝后三殿：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后三殿两侧是东、西六宫，奉天殿前两侧有文昭阁（文楼）、武成阁（武楼），再两侧有文华殿、武英殿。

午门内有内金水桥，承天门前有外金水桥，玄武门北边北上门之北有万岁山，正当元大内大明殿的位置。奉天殿在元大内正门崇天门的位置。整个说来，明宫城较元宫城南移了。

明代北京在皇城外东侧集中建立了十个王府，称十王街（今日王府井）。在正阳门、承天门、玄武门、地安门中轴线向北的延长线上，建立了鼓楼和钟楼。正阳门至永定门大街的东侧，是天坛；西侧是山川坛（这两个坛原在城外，嘉靖年间加筑外城后包入城内）。朝阳门外有朝日坛（通称日坛），阜成

门外有夕月坛（通称月坛），安定门外有地坛。明代北京居民区划分为三十七坊，街巷衚衕（也作胡同），基本上仍沿用元代旧制。胡同内一般为三进的四合院相并联。北京人口数目在有明一代总的看来不及南京。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包括所领八县，有“户一十四万三千五百九十七，口七十九万五百一十三。”如除去八县人口，加上驻守军队，总人口约在八十八万人左右。明末，人口达百万左右。

明成祖营建北京，集中了全国许多工匠到北京，许多人留居下来，把全国各地的先进技术带到北京。明朝廷内府、工部都有许多行业的手工业作坊，制造许多精美绝伦的工艺品和消费品，从客观上推动了民族工艺品技术水平的提高。如在北京内府织染局、蓝靛厂工作的匠人，分成三十二种不同的行业。兵仗局也有三十四种不同行业的手工艺人。他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制作的漆器、宣德香炉、景泰炉、官扇、瓷缸等，均是驰名中外的艺术精品。

北京的纸花、绢花、绒花在明代统称为京花，为适应宫廷的需要，技术上精益求精，水平很高。

北京是全国最大的消费中心，商业比较发达。明代的商业区同元大都不同，由鼓楼一带的“后市”逐渐转移到城的南部。如正阳门外、东四牌楼、西四牌楼、皇城四门十字路口、朝阳门、宣武门等处，形成了新的商业中心。宣武门附近，兴修了几千间民房、店房，招民居住，招商居货，谓之“廊房”，收取一定税收，供给商人使用。北京还有外国来的商人，带来国外的商品，进入北京市场。

正阳门内的棋盘街，是东西交通要冲。棋盘街“府部对列街之左右。天下士民工贾各以牒至，云集于斯，肩摩毂击，竟

日喧嚣，此亦见国门丰豫之景。(137)”

明清时代，北京贡院是全国会试场所，也是顺天府乡试场所。国子监是全国最高学府，位于北城安定门内西部。太医院是全国最高医学机构，在正阳门内。

明清时代，北京宫廷编纂和印刷了不少大型丛书、类书。著名的《四库全书》和《古今图书集成》就是在北京编成的。自古以来收字最全的《康熙字典》也是在北京编成的。曹雪芹的名著《红楼梦》也是在北京写成的。明清时代，北京是全国最重要的文化中心。

我国自西周肇建两京，隋唐时两京制度发展到新的高峰。到明代，两京制度进一步发展。明代南北两京都设五府六部（国都北迁后，南京比北京少一个内阁），这是历朝所没有的。

关于南北两京诸司职掌问题，《明史》等文献没有很明确的记载。在永乐正式迁都前，虽成祖大部分时间住在北京。但北京是陪都“行在”，南京是京师，南京各部、府当然执掌主要职权。国都北迁，南京变为留都，只留皇太子监国，当然职权有限。

永乐北巡时，规定：

“凡有要事并四夷来朝俱达行在所……凡进拜表笺表文达行在所。(138)”这儿，一方面说明当时一般政务处理尚在南京，就是《明史·职官志》所说，当时“政本在南也。”但是，重要的文书处理，仍需送“行在”处理。

永乐十五年（公元1417年），又规定：

“内外、文武大小官员俱从行在吏部、兵部奏请、铨选。(139)”这儿，进一步规定人事管理权等重大事务仍需送北京

处理。

自从永乐正式迁都北京后，全国日常事务悉移交北京处理，南京诸司多成为闲职。一些年老体弱的官员，被以“南京事简”打发到南京“视事”，实际上是不视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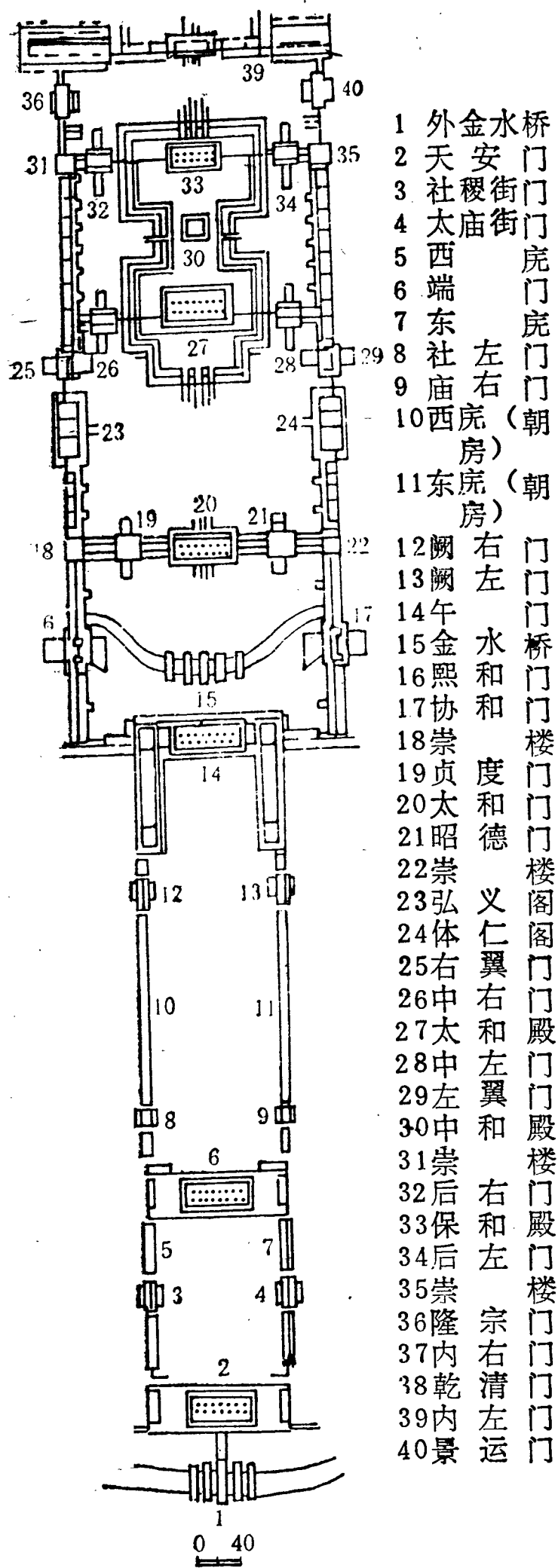
南京诸司虽“事简”，后又规定不得受理在外诉讼，“凡有告讦者，俱送北京。惟京城军民词讼，许其鞫问。”⁽¹⁴⁰⁾

但又规定，南京刑部“分掌南京及公、侯、伯五府、京卫所刑名之事。”⁽¹⁴¹⁾南京吏部的官吏任免等，也不由北京吏部掌管。“凡南京官，六年考察，考功掌之，不由北京吏部。”⁽¹⁴²⁾即南京诸司在主管南京地区事务方面，仍有一定的独立性，军队方面，“南京五军都督府……分掌南京卫所，所达于南京兵部。”⁽¹⁴³⁾

南京与北京同样设国子监，分称“南监”、“北监”，同样招收学生，编纂刻印图书。嘉靖四十三年，又规定：“两京同考用京官进士”⁽¹⁴⁴⁾。

北京举行重大祀典所用的时鲜物品，通常也由南京有关诸司负责供应。《明史·礼乐志》、《南京太常寺志》等文献记载：南京进鲜船本为奉先殿设，挽夫至千人。“进鲜”物品有：二月子鹅，江宁县办解；三月鲜笋，四月梅子，南京园户办；七月鲜梨，宣城县解；八月茭白，南京池户办；九月香橙，南京园户办；十月柑子、桔子，吴县办；十一月甘蔗，钱塘、仁和二县办解。此间所列县名，大多为当时南京属县（南直隶），可见：几乎每月南京都要向北京开出进鲜船，装运北京所无的南京时鲜物产，供北迁的皇室享用。

第七节 清北京的三山五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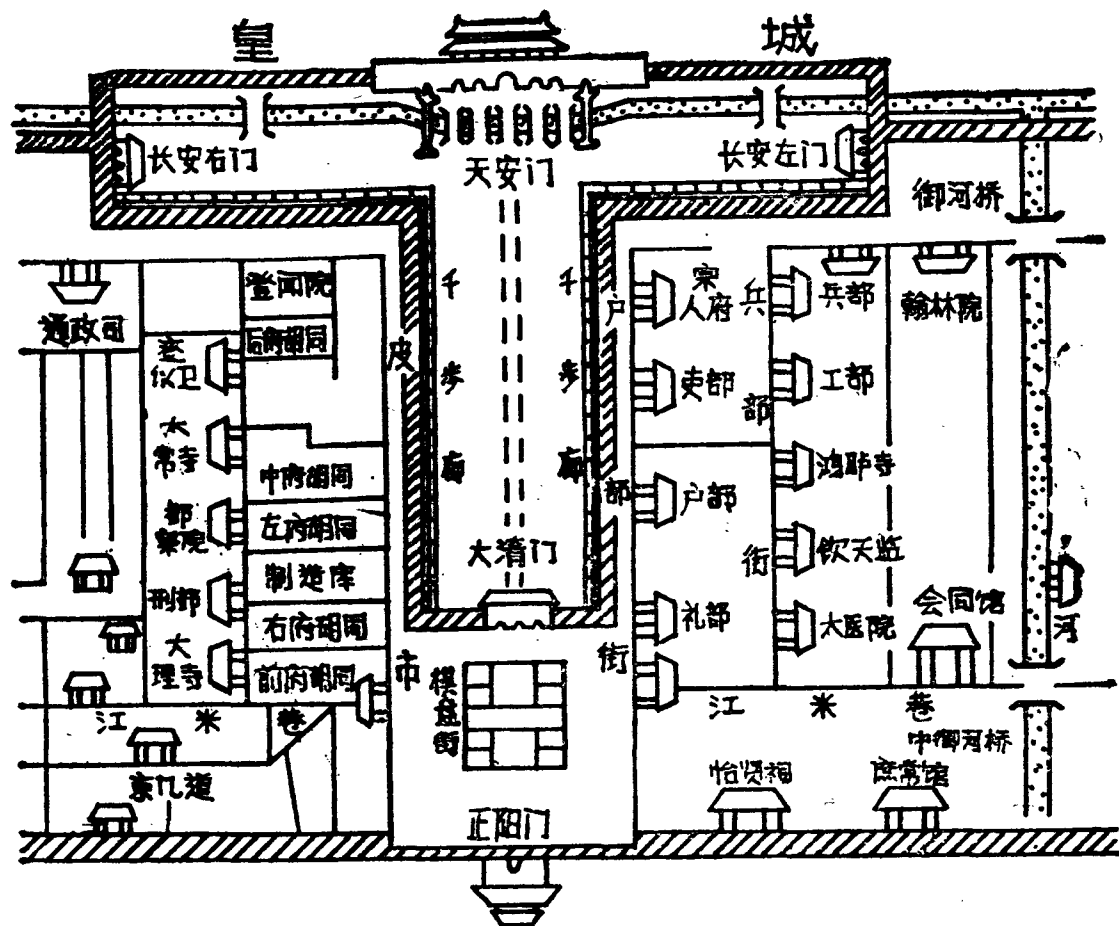
图三十七 明清北京宫殿外三殿总平面图

清世祖于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定鼎北京，称为京师顺天府，至1912年清亡，建都北京共267年。清朝完全袭用明朝的都城宫殿，除了在皇城内重修或增建一些大殿，并改变了一些皇、宫城门名称外，没有其他什么建树。清代的主要力量，用到开辟经营西郊的苑林上了，这就是至清代中叶已形成的三山五园。

清代定都北京后，改皇城前大明门为大清门，承天门为天安门。改皇城北垣北安门为地安门，为避康熙（玄烨）讳，改宫城后门玄武门为神武门。外朝三大殿也改了名称，皇极殿改为太和殿，大门皇极门改为太和门，中极殿改为中和殿，建极殿改为保和殿。明末战乱中，三大殿大多被焚，清的复原重建工作至康熙二十五年（公元1686年）才完成。

承天门重建于顺治八年，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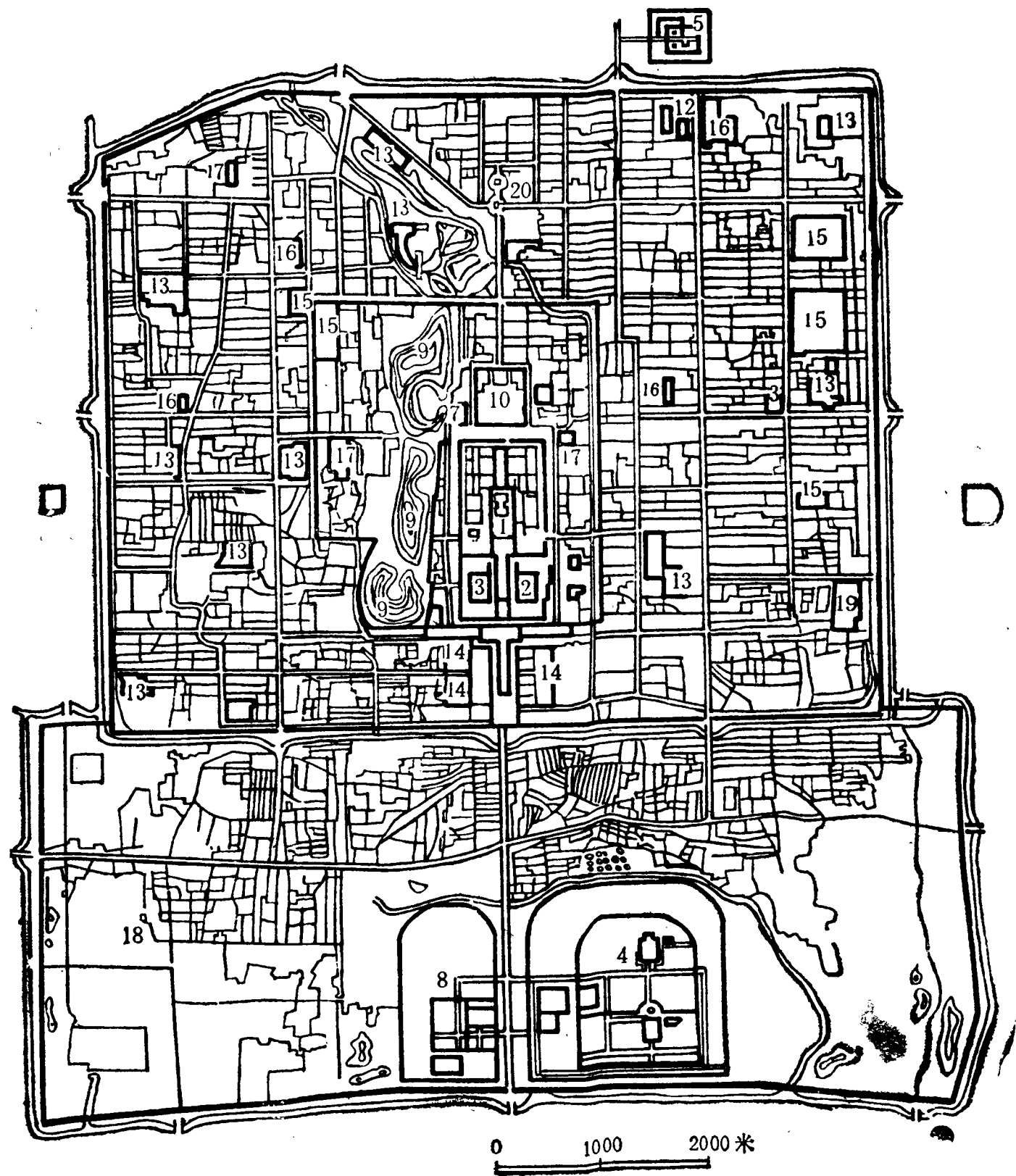
十七年又重修券门。顺治八年重修时即改为天安门。天安门高三十三点七米，西阔九间，进深五间，以九五表示位贵，形制为歇山重檐式。



图三十八 清代天安门图

清“太和殿……基高二丈，殿高十有一丈，广十有一间，纵五间。上为重檐垂脊，正吻二，旁吻四，前后金扉四十，金琐窗十有六，殿正中一间设御座。殿前为丹陛，环以白石阑，陛五出各三成……（145）”

顺治八年北海琼岛上拆除广寒殿，建造形式美观、色彩素雅的喇嘛塔——白塔。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在宫后景山上建五亭（观妙、周赏、万寿、富览、辑芳）。乾隆二十三年，在南海瀛台对岸建宝月楼（今新华门），并外城山川坛为先农坛。其余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图三十九 清代北京平面图

1.宫殿；2.太庙；3.社稷坛；4.天坛；5.地坛；6.日坛；7.月坛；8.先农坛；
9.西苑；10.景山；11.文庙；12.国子监；13.诸王府公主府；14.衙门；15.仓库；
16.佛寺；17.道观；18.伊斯兰寺礼拜寺；19.贡院；20.钟鼓楼

西郊园林风景名胜区在清代中叶即已形成，号称“三山五园”。

三山就是万寿山（今颐和园中）、玉泉山和香山。五园是

畅春园、圆明园、清漪园（颐和园的前身）、静明园（在玉泉山）和静宜园（在香山），东西绵亘二十多里，殿台楼阁遥相接应。规模的宏伟，建筑的富丽多彩，是中外历史上罕见的。在风格上，这些园林一些景区一味模仿江南名胜和私家园林，有些园林景区划分过细或是把一些不协调的建筑，硬插入其中，使整个风格受到影响。

西郊海淀一带，地势低洼，有一些浅湖，自然风光较美，在元代已引人注目。明代，皇亲李伟在海淀附近建了清华园（今北大西垣外），书画家米万钟建了勺园（取海淀一勺意），当时人称“李园壮丽，米园曲折；米园高雅，李园不俗”。

清康熙乾隆三代，前后一百三十多年，相继在这儿营建皇家苑囿。康熙年间，首先在清华园故址修建畅春园。“畅春园在南海淀大河庄之北，缭垣一千六十丈有奇。^{〔146〕}”因位置在圆明园之前，又叫前园。在畅春园之北修了圆明园，又在圆明园东墙外修了长春园，把南面的几处赐园合并起来，称为绮春园，不久改称万春园，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圆明三园，平面象一个“品”字，总面积达五千余亩。又在瓮山（今万寿山）、玉泉山和香山分别新建了清漪园、静明园和静宜园，这就形成了“三山五园”为主体的苑林格局。

“畅春园本前明戚畹武清侯李伟别墅，圣祖（康熙）仁皇帝因故址改建”^{〔147〕}。“畅春园宫门五楹。门外东西朝房各五楹，小河环绕宫门，东西两旁为角门，东西随墙门二，中为九经三事殿。殿后内朝房各五楹，二宫门五楹，中为春晖堂，五楹。^{〔148〕}”其后还有垂花门、左右配殿及后照殿。两角门中为积芳亭，正宇为云涯馆。馆后渡桥，循山而北，有河池，南北立坊二，为玉涧金流。门内为瑞景亭，轩后为林香山翠。延爽楼后有鸢

飞鱼跃亭。云涯馆东南角门外过版桥为剑山。山上有苍然亭，山下有清延亭等。大东门土山北，临河岸西上为渊鉴斋，斋后临河为云容水态。小东门内有清溪书屋，为“皇祖宴寝之所”。二宫门出西穿堂门为买卖街。南垣外有船坞门，船坞内停泊大小御舟，小船额曰月波，大的一叫吉祥舟，一叫载月舫。总之，畅春园内，溪流、湖泊、小山、亭台楼阁、斋馆堂榭、难以尽记。“清华园前后重湖，一望缥渺，在都下为名园第一，若以水论，江淮以北亦当第一也”（149）。

“圆明园在挂甲屯之北，距畅春园里许。”“为世宗（熹正）宪皇帝藩邸赐园，康熙四十八年（公元1709年）所建”，占地约五千亩。“园内为门十八，南曰大宫门”（150）。大宫门前，道东西皆有湖，是为前湖。大宫门“前左右朝房各五楹，其后东为宗人府、内阁、吏部、礼部、兵部、都察院、理藩院、翰林院、詹事府、国子监、銮仪卫、东四旗各街门直房，西为户部、刑部、工部、钦天监、内务府、光禄寺、通政司、大理寺，鸿胪寺、太常寺、太仆寺、御书处、上驷院、武备院、西四旗各直房”（151）。二宫门称出入贤良门，内为正大光明殿，东西配殿。后有寿山殿，东为旧明堂。正大光明殿后有湖，亦称前湖，湖北为圆明园殿，还有奉三元和殿、九州清晏殿、天地一家春、乐安和、清晖阁、露香斋、茹占堂、松云楼、涵德书屋。还有天然图画楼、静知春事佳、苏堤春晓等。福海北有山字形方壶胜境，后湖附近还有龙王殿等。从上可见，圆明园既有行宫建筑，又有风景园林名胜。园林多仿中国南方园林，如有杭州西湖十景等。

圆明园还有长春园、万春园，所以又称圆明三园。长春园在圆明园东，旧名水磨村。长春园是乾隆准备退位养老的地

方，是一座中西合璧的园林。园中有西方巴洛克式的西洋楼，占地一百余亩，费时十余年才完工。园内“大水法”，称“谐奇趣”（喷泉），是中国园林中以前所没有的。狮子林十六景是乾隆十六年（公元1751年）下江南时将苏州狮子林描绘下来而仿建的。

万春园在东南部，原称绮春园，同治时改为万春园，一般为皇太后住处。园内有三十景，风格上既不同于圆明园的富丽堂皇，又不同于长春园的雄伟挺秀，有着放浪自如的风格。

圆明三园共有一百零八景（圆明园四十八景，长春园和万春园各三十景），每一景中又包含许多楼、阁、轩、榭，可见整个园林之丰富多彩。这座号称“万园之园”的圆明三园，于1860年被英法联军焚毁，1900年又遭到八国联军的进一步破坏。劫后的圆明园，变得荒芜不堪，今已成为农田村庄。

清漪园为今颐和园的前身。全园面积五千余亩，水面占四分之三。元明时北部小山原称瓮山，前湖称瓮山泊，也叫西湖或七里泊（周围仅七里）。康熙年间建为行宫，乾隆年间大规模兴建园林，称为清漪园。清漪园大部分建筑在北部山上，并将山改称万寿山。南部湖水根据传统命名为昆明湖，1860年同样被英法联军烧毁。光绪中叶，慈禧太后那拉氏挪用海军经费两千万两修复此园，改名颐和园，并基本保持了清漪园的格局。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又被八国联军破坏了一部分，光绪二十九年修复，但万寿山北部未恢复原状。颐和园分为四景区：昆明湖、前山、后山和东部行宫建筑区。昆明湖模仿西湖格局，用长堤分成南湖、西湖两部分。西湖又用小堤一分为二，其南称养水湖。湖中三小岛是模仿海上三仙山（蓬莱、方丈、瀛洲）所设。万寿山前的清晏舫（石舫），光绪时

加盖了一层洋式楼舱，与全园风格很不协调。万寿山高60米，前山以排云殿、佛香阁为主体。山前有长达728米的彩画长廊，中间连着四座亭子。山东麓谐趣园是仿无锡惠山寄畅园所建的，原名惠山园。东部行宫建筑严谨，具有宫廷气氛，但建筑体量不大，未用琉璃瓦，院中点缀花木，比较活泼，有生活气息。后山有仿苏州水街建的买卖街和曲折自然的后湖，环境幽静。后山等区遭破坏后一直未恢复。颐和园是我国现存最大的皇家园林⁽¹⁵²⁾。由于是作为皇家园林设计的，园内通路局促，虽占地数千亩，但容量不大，今作为公共园林，园内交通等方面都存在很多缺陷。

静明园在玉泉山之南，“园西山势窈深，灵源潜发，奇征趵突，是为玉泉。山麓旧传有金章宗芙蓉殿，址无考。⁽¹⁵³⁾”说明这儿在金代已开始经营。静明园建于康熙年间，有门六，宫门南向，门外有东西朝房。宫门内为廓然大公，为听政之所，表示要“虚明洞彻，境与心会”。廓然大公之北为后湖，湖中有芙蓉晴照、玉泉趵突，旧称玉泉垂虹，也是燕京八景之一。还有竹鲈山房、圣因综绘（行宫名圣因）、绣壁诗态、清凉禅房、玉峰塔影、风篁清听、镜影涵虚、裂帛湖光（山东麓有裂帛湖，谓泉从石根出，溢而为渠者）等。

玉泉山“有石洞，泉自中而出，洞门刻‘玉泉’二字，泉味甘冽。”乾隆认为，玉泉“功德无双水，名称第一泉”⁽¹⁵⁴⁾。山腰山麓还有一些寺院，如上下华严寺、金山寺等。

静宜园在香山，有二十八景。“静宜园前为城关二，由城关入，东西各建枋渠，中架石桥，下为月河，度桥左右朝房各三楹，宫门五楹”⁽¹⁵⁵⁾。《日下旧闻考》引《御制静宜园记》说：“乾隆乙丑秋七月，始廓秀山之郭，薙榛莽，剔瓦砾，即日行

宫之基，葺垣筑室。佛殿琳宫，参错相望，而峰头岭腹凡可以占山川之秀，供揽结之奇者，为亭、为轩、为庐、为广、为舫室、为蜗寮、自数柱以至数楹，添置若干区。越明年丙寅三月而园成。非创也，盖因也。”（156）

行宫宫门内为勤政殿，五楹。南北配殿各五楹。静宜园二十八景皆三字，如勤政殿，也为一景。次如丽瞩楼、绿云坊、虚朗斋、瓔珞岩、翠微亭、青未了（“群峰苍翠满目，陌村林墟，极望无际。”⁽¹⁵⁷⁾）驯鹿坡、蟾蜍峰（巨石如蟾蜍）、栖云楼、知乐濠、香山寺、听法松（秀山寺正殿门外）等。

畅春园、圆明三园、清漪园以水景见长，但园内及园外，均少山峦点缀而缺乏背景层次。静明园和静宜园有山而少水，一泓山泉，一方小池，与山峦迭嶂相比，亦不相称。山水不能有机地结合，是上述诸园的共同缺陷。清廷为了弥补这个缺陷，修了不少人工假山和池沼，但多系仿江南私家园林，是抄袭而不是创新。尽管如此，我们仍不能抹杀上述诸园在中国园林建设史上的重要地位。我国北方皇家园林以北京、西安为代表，气势大而华丽。南方园林以苏州、杭州为代表，自然玲珑。而南京、扬州园林，由于地处南方，历代又受北方南迁之影响，所以既有北方园林之雄伟气势，又兼具南方园林之自然玲珑，属于南北兼容式的园林。

1860年和1900年，外国侵略者在焚毁劫掠圆明三园的同时，其他园林也同样遭到了破坏。

第八节 太平天国的天京

太平军于1853年三月十九日轰塌南京仪凤门，破城而入，三月二十日占领南京。三月二十九日，洪秀全从水西门进入南

京，改南京为天京，定为首都。

太平军进入湖南后，曾一度想取河南，在中州建都，主要代表者为卞三娘和罗大纲。他们的意见被否定了。建都天京是一个正确的决策。一方面由于河南清兵重兵把守，另一方面有一湖南老水手禀告东王，力陈河南不利条件，劝其不要去河南。他说“河南河水小而无粮，敌困不能解救。尔今得江南，又有舟只万千，又何必往河南。南京乃帝王之家，城高池深，民富足余，上(尚)不立都，尔而往河南何也？⁽¹⁵⁸⁾”“河南虽中州之地，足备稳险，其实不如江南，请东王思知(之)。⁽¹⁵⁹⁾”

主张建都南京的主要代表是洪秀全和杨秀清。洪秀全“在广西便欲到南京”⁽¹⁶⁰⁾，杨秀清在湖南时力排众议，认为“专意金陵，据为根本，然后遣将四出，分扰南北，即不成事，黄河以南，我可有已。”⁽¹⁶¹⁾卞三娘、罗大纲等人的反对意见被杨秀清用天父下凡代天父言的办法否定了。接着发动41人撰文《建天京于金陵论》，从不同角度论证了建都于金陵的必要性和正确性。

从地理形势看，金陵“地连三楚，势控两江，群山屏围，长江襟带”，“雄踞东西，俯视西北”，“钟阜有龙蟠之象，石城有虎踞之形”，“出可以战，处可以守”。

从政治上看，金陵是“王气所钟”，“天下名邦”，“雄踞东南，足以壮天威成王业”。

从经济上看，金陵“五方杂处，百货骈致，物产丰盈”。楚尾吴头，民物浩繁”。“财货所聚，户口常充”。“湖北、河南皆有水患，惟金陵地势崇隆，民情富厚，且天下粮食尽出于南方，如江西、安徽等省，顺流而下，运粮亦甚便易”。

从人才上看，金陵乃“士林渊薮”之地。

总的看来，太平天国建都南京，是一个正确的决策，它使内外反动势力十分震惊。太平军攻破江南，“遏绝各省解京粮道。粮道不通，京师震动。”⁽¹⁶²⁾英国香港总督兼使华全权代表訥亨说：金陵“中国故都之地位，从而在历史上之关系，在中国人心中如何重要，姑置勿论，即以地势而言，南京城在扬子江岸，大而且要，属帝国之中央，接近运河，实是阻碍一切交通，切断米粮运往北京之路。”

太平天国建都南京以后，利用明南京旧城，没有建立新的城垣。但是，它没有利用明故宫（可能是位于东偏，易受清军江南大营的袭击），而是在明故宫西侧两江总督衙门旧址建立了新的宫殿区——太阳城。

太阳城的四至，东至今南京黄家坊、利济巷，西至长江西街，南至大行宫长街，北至杨吴城壕。曾国藩占领南京以后，将天王府抢劫一空，遂放火烧毁，故后人已不易考证。据一些劫后余波的记载，天朝宫殿太阳城原来是十分壮丽的，诗云：

“十年壮丽天王府，化作荒庄野鸽飞。”⁽¹⁶³⁾

毛祥麟在《甲子冬闹赴金陵书见》中记载：

“洪王伪府，以前制军署为之，在城北，壮丽胜他处。大门额曰荣光门，二门曰圣天门，皆以真神冠之。两旁有栅，栅内横匾数方，皆伪僚所赞颂。左右有亭，高出墙外，覆以琉璃瓦。二门内伪朝房，东西各数十间。……伪殿前牌坊一座，上下皆雕龙纹，饰以金彩。伪殿尤高广，梁栋俱涂赤金，文以龙凤，光耀射目。四壁彩画龙、虎、狮、象。”⁽¹⁶⁴⁾

吴绍基《四梦笔谈》卷三《游梦倦谈》“伪王宫”条：

“伪宫已毁，存者十不及一，到黄墙一带犹兀然高峙。墙外东西两亭盖琉璃瓦，四柱盘五色龙，昂首曳尾，有攫拏之

势。由亭折而北为正门，门已毁。历甬道数十步，中树木牌坊，上大书曰忠义门。朱地金字，旁雕云、龙、狮、象之属，彩色辉煌。……过坊又数十步为伪殿。殿又毁，四壁画禽鸟花草，设色极工。柱碾且朱漆绘龙。殿后左右两池，池中俱置石船，一首尾尚完好，一已毁折。”

又说后宫花园“有台，有亭，有桥，有池，皆散漫无结构。”

周馥《周恂慎公自著年谱》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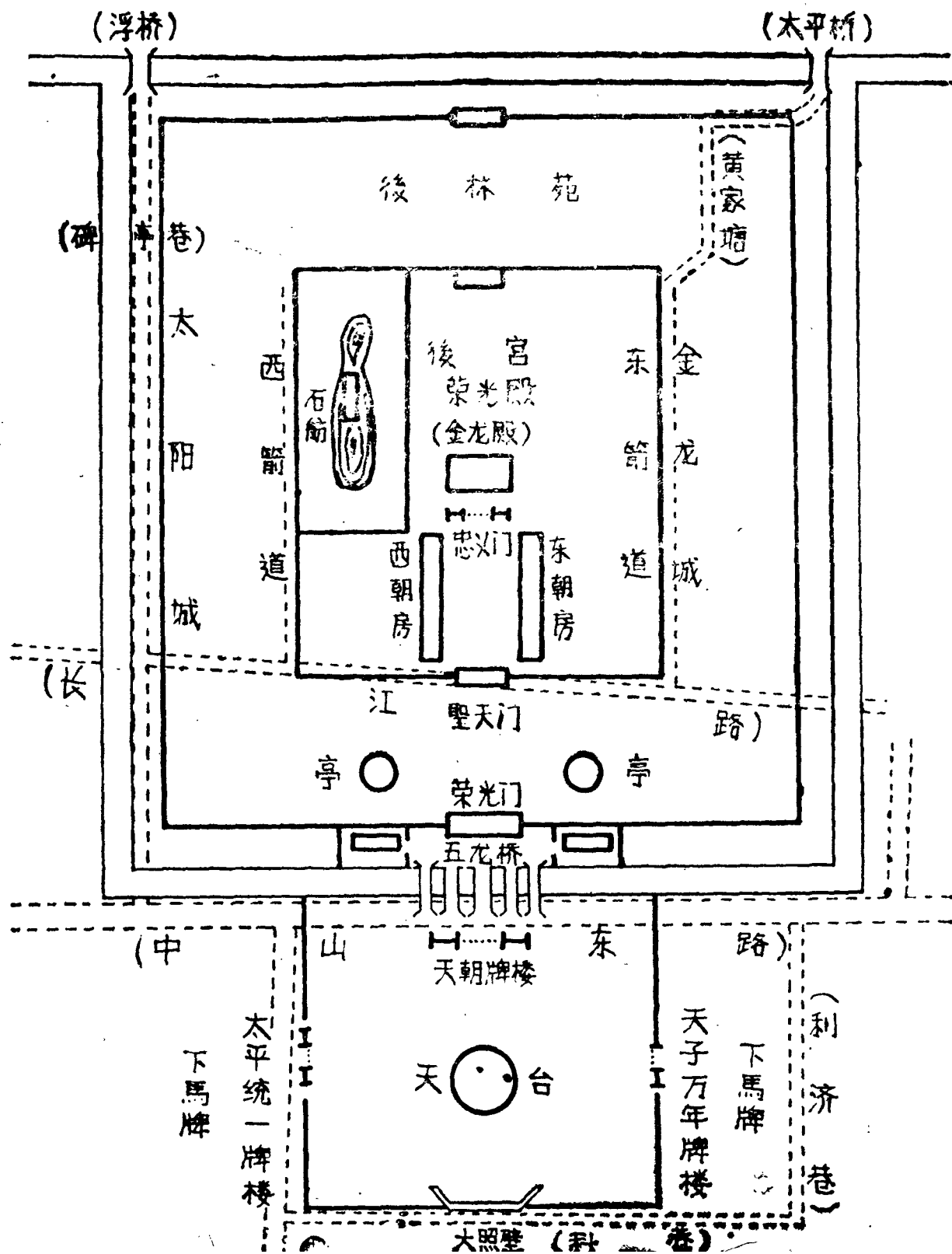
“伪天府四面黄墙高二丈余，盖取旧总督府而扩充之。墙内城砖，闻皆掳妇女挑运。大门前二吹鼓楼犹存，大堂如故，两檐柱朱漆彩画，各雕二木龙缠之。中楹上悬有匾，嵌金字曰真神荣光殿。大堂后穿廊如故，又前立直匾，嵌金字曰真神某某殿。二堂以后，屋全焚，验其残墙，似分左右二区。每区大楼五层，高约八九丈，深数丈。”

从以上见闻，再结合其他一些记载，可知天朝宫城分内外两层，外称太阳城，内称金龙城。城之高度，说法不一。一说高数丈，一说高二丈，一说高四十几尺。太阳城外有护城河。

太阳城的正门是荣光门，又称天朝门、凤门。荣光门上有黄缎裱糊的双龙和双凤，兽头铺首上饰以黄金。荣光门前有东西向御沟，上架五龙桥（一说三桥）。桥面有高台，称天台（一说称说教台）。台石砌圆形，高五丈，有四阶可直上台顶。台上有铜锣36面。台前有一小坛，高宽数尺，为礼拜时焚烧衣服牲品之所。天台南有照壁，照壁上雕双龙双凤。天台东有“天子万年”牌楼，西有“太平一统”牌楼，再西侧有下马牌。

荣光门外有一个长达十余丈的黄绸横幅，用朱笔写着五尺见方的大字：“大小众臣工，到此止行踪；有诏方准进，否则

云中雪。”



图四十 太平天国天京太阳城（天朝宫殿）

金龙城的大门叫圣天门。门外东西是两座用琉璃瓦覆盖的亭——吹鼓楼。楼高出城墙外，门外中间是红黄两色绸绉扎成的“彩棚”，每月更新一次。再往里走，过忠义门就到正殿，名“真神荣光殿”。有的文献作“金龙殿”或“龙凤殿”。殿

前有东西朝房各数十间。荣光殿建筑宏伟，梁柱上有龙凤彩画，雕镂得很工巧。柱上的蟠龙据说是真金做成，四壁也彩绘禽鸟花草。大殿后有穿堂，连着二殿。二殿后是后宫，房屋多至千数百间。再后为后林苑。后宫两侧有东西二池，池中各有石舫两只，即“不系舟”（今存一）。不系舟上有木楼，皆已焚毁。后林苑中有小石山、台、亭、桥等。

天朝宫殿在太平天国之后再度被改建为两江总督衙门。辛亥革命后，被改成民国的总统府。解放后，为江苏省政府及省政协大院。现在，天朝宫殿遗址即天王府遗址已被列为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南京市拟将此处改建为南京近代史博物馆。据悉，遗址内大殿及大殿前东西朝房，大殿后穿堂及暖阁，大殿后东侧内厅三进及西花园，仍基本是太平天国时的建筑。

另外，太平天国前期七王都在天京有王府，基本上是利用旧有建筑改建而成，分散在全城各处。

东王（杨秀清）府曾迁过三次。首在瞻园路清朝江宁布政使衙门里（今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后迁到明故宫清江宁将军署，但该处地近朝阳门（中山门），城外清军炮弹曾打到府内，所以又迁到汉西门黄泥岗。

西王（萧朝贵）府在水西门内。萧朝贵早期战死，由幼西王居之。东、西王府大门上均彩绘一龙一凤，级别仅次于天朝宫殿。

南王（冯云山）府在花露岗（明徐达西花园），也是由幼南王居住。北王（韦昌辉）府在白下路（中正街）。翼王（石达开）府原在东水关，后迁上江考棚（朝天宫东）。北王和翼王都曾担任天京卫戍长官，所以王府前建有五丈高的“望楼”。望楼平顶，四周有红色栏杆。燕王（秦日纲）府在中正

街（今白下路）昇平桥前，豫王（胡以晃）府在清江宁府署（今内桥西南）。这几座王府，大门上只能画一龙一虎，较东西王府又低一级。

英王（陈玉成）府在昇州路西端，忠王（李秀成）府在中山南路明瓦廊。到了后期，封王达二千七百多名，王府林立，也无从考证。1952年，在南京堂子街发现的某王府，留有珍贵的太平天国的壁画。该王府规模很小，至今未考出王府名称。

太平天国在南京的活动，在社会组织、手工业、商业管理方面，都有其独特的做法。

太平天国建都天京后将百姓分别编入“男馆”和“女馆”。男馆又分为“牌面馆”和“牌尾馆”，前者由十六岁——五十岁的男子组成，其中多半参加了太平军；后者是老弱病残者的组织，住在城东和城北，从事一些轻微劳动。妇女废除了缠足，也参加生产劳动，也可参加战斗，参加考试，成为官员，妇女从家庭走向了社会。

天京手工业发达，设有诸匠营和百工衙，统一管理天京的手工业。如南京丝织业发达，百工衙中设立了“典织衙”和“机匠营”，织工达到一万人以上，最兴盛时每天能生产绸缎几千匹。

由于加固天京城池和修筑宫殿等的需要，天京的建筑业很发达，“诸匠营”中设“木营”和“土营”，从事军事和民用建筑工程。

在商业方面，初期一度禁止商业活动，后来一度实行国家经营管理商业的政策，即商人从圣库中领出资本开店，受国家严格管理，称为“天朝某店”，有杂货、玉玩、绸缎、布匹、米油、茶店等。但这种制度很快被废除。在各主要城门之外设立

“买卖场”，实行自由买卖。

为了储备粮食及其它物资，天京设有总圣库，遗址今已发现。还设立了管理贸易的“三关”，即上新河夹江的头关，仪凤门外的中关和七里洲的下关。

为了印刷出版业的需要，天京设有“镌刻衙”、“刷书衙”和“镌刻营”，负责刻书和印书。还设立了“删书衙”，删改旧书中一切不符合太平天国思想的内容。天京刻印的著名书籍、文献有《天朝田亩制度》、《太平礼制》、《天条书》、《天历书》、《建天京于金陵论》等一批重要的政治、军事书籍。近年，还在南京发现了天王核准刻印书籍用的木质“旨准”印章。

太平天国建都天京，这个战略方针是否正确，中外学者都有不同的看法。除了前面所说的主张建都河南的意见外，还有一种意见是应该直捣北京，推翻清朝政权。

外国友人呤喇在《太平天国亲历记》中说：

“天王在南京停留下来，开始防守自己的阵地，实际是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而且是一个使他失去帝国的致命错误。如果他不让敌人有时间喘息，从惊慌失措中恢复过来挽回颓势，而集中兵力直捣北京，那么毫无疑问，他的光辉灿烂的胜利进军将会使他几乎不遇抵抗地占领北京，而清朝的崩溃会使他一举得到整个的帝国了。”

这种意见的出发点，是使太平天国一举北上，攻下京师北京，迅速取得革命的胜利，但是，却不大现实。太平天国必须有自己的根据地，而且选择天京作为根据地，是最佳选择。再则，一举攻下清廷重兵防守的北京，可能性也不大，太平军从湖北东下江宁，虽号称五十万人，但作战士兵却只有十余万

人，其余为随军家属。防守北京的清军达七十五万人左右，兵力上悬殊很大。加之起义军来自南方，匆促之间到达北方，群众基础也是比较缺乏的。再说，当时即使攻下北京，也不等于是革命的胜利，从古到今，不乏其例。西汉末绿林、赤眉和唐末黄巢都曾攻下当时的京师长安，李自成在明末也曾攻下了北京，都没有取得最后胜利。一个政权的最后胜利，主要是在全国的胜利，占领首都只是其中一步，而且并不是决定性的一步。朱元璋就是起自南方以金陵为根据地，陷元兵于大都一隅，然后一举攻下大都，取得全国性胜利的。

太平天国的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建都天京是一个正确的战略决策，决不是失败的因素之一。建都天京后一些政策上的失误，同建都天京是否正确并不是一回事，这是应当分清的。太平天国建都天京后，所制定的设男馆、女馆，拆散了家庭，取消了小手工业者的自由经营，集中到“诸匠营”、“百工衙”中；并一度取消商业，强制人们改变宗教信仰等等一系列极左的政策，使天京居民不断逃亡。领导集团腐化享乐，宫阙巍巍，广置嫔妃，内讧残杀，以及军事指挥策略上的一些错误，应是使太平天国失败的重要原因⁽¹⁶⁵⁾。

(1)《宋史·地理志·京城》卷85。

(2)宋敏求《东京记》。

(3)《东京梦华录》，中华书局版，7页。

(4)同上。

(5)同上。

(6)《汴京遗迹志》，《宋京城》。

(7)楼钥《北行日记》卷上，乾道五年十二月九日录。

- (8) 《宋史·地理志·京城》卷85。
- (9) 《东京梦华录》，中华书局版，9页。
- (10) 《宋会要辑稿·方域一》。
- (11) 《东京梦华录》，中华书局版，9页。
- (12) 《宋会要辑稿·方域一》。
- (13) 同上。
- (14) 同上。
- (15) 张三昊《云谷杂志》寿山艮岳条。
- (16) 《宋史·地理志·京城》卷85。
- (17) 《东京梦华录》，中华书局版，39页。
- (18) 同上，40页。
- (19) 同上，11—12页。
- (20) 《宋史·河渠志·汴河》卷93。
- (21) 《东京梦华录》，中华书局版，8页。
- (22) 同上。
- (23) 同济大学城市规划教研室《中国城市建设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46页。
- (24) 《东京梦华录》，中华书局版，22页。
- (25) 同上，13—14页。
- (26) 同上，15页。
- (27) 同上。
- (28) 《资治通鉴长编》卷85
- (29) 同上，卷12—14。
- (30) 董弁《闲燕常谈》。
- (31) 《东京梦华录》，中华书局版，14页。
- (32) 同上。
- (33) 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5页。
- (34) 《续资治通鉴·宋纪》卷98。

- (35)《中兴小记》卷2。
- (36)《宋史·卫肤敏传》卷378。
- (37)《续资治通鉴·宋纪》卷98。
- (38)《古今图书集成·建都部》卷111。
- (39)朱彭《乾道临安志·城郭考》卷上，《丛书集成》本，1页。
- (40)吴自牧《梦粱录》卷7，中华书局《东京梦华录》本，183页。
- (41、42、43、44)同上，卷8，192页。
- (45)同上，193页。
- (46)同上，卷18，281页。
- (47)同上，卷13，239页。
- (48)同上，卷18，282页。
- (49)晁补之《七述》·《武林掌故丛编》第十八册。
- (50)《梦粱录》卷13，239页。
- (51、52)耐得翁《都城纪胜》，中华书局《东京梦华录》本，91页。
- (53)《梦粱录》卷8，中华书局《东京梦华录》本，193页。
- (54)同上，241页。
- (55)《西湖老人繁胜录》，中华书局《东京梦华录》本，125页。
- (56)《永乐大典》卷7603《杭州·钱塘》。
- (57)《梦粱录》卷13，中华书局《东京梦华录》本，238页。
- (58、59)同上，卷18，281页。
- (60)《唐风集》卷20。
- (61)朱彭《南宋古迹考》，7页。
- (62)《马可·波罗游记》，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76页。
- (63)《宋史·食货志》卷186。
- (64)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海外诸番》，卷120。
- (65、66)《梦粱录》卷15，中华书局《东京梦华录》本，255页。
- (67)《都城纪胜·三教外地》，同上，101页。
- (68)王国维《两浙古本考·序》。

- (69)叶梦得《石林燕语》卷8。
- (70)《都城纪胜·瓦舍众伎》，中华书局《东京梦华录》本，95页。
- (71)《日下旧闻考》引《读书一得》，中华书局版，75页。
- (72)同上，引《杨文敏集》，76—77页。
- (73)张棣《正隆事迹纪》，《三朝北盟会编》卷242。
- (74)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62。
- (75)张棣《金虏图经》，《三朝北盟会编卷》244。
- (76、77、78、79、80)宇文懋昭《大金国志·燕京制度》卷33。
- (81)范成大《揽轡录》。
- (82)《元史·木华黎传附巴图鲁传》卷119。
- (83)《郝文忠公集·便宜新政》卷32。
- (84)《元史·高智耀传》卷125。
- (85)《元史·地理志》卷58。
- (86)《元一统志》卷1《中书省·大都路》。
- (87)《元史·世祖纪》卷8。
- (88)萧洵《元故宫遗录》，丛书集成本。
- (89)《辍耕录·宫阙制度》卷21。
- (90)萧洵《元故宫遗录》，《丛书集成》本。
- (91)柯九思《宫词》，《草堂雅集》卷1。
- (92)《马可·波罗游记》，福建科技出版社，94页。
- (93、94、95)同上，95页。
- (96)萧洵《元故宫遗录·序》，《丛书集成》本。
- (97)张宪《登齐政楼·玉笥集》卷9。
- (98)《元史·祭祀志三》卷74。
- (99)《马可·波罗游记》，福建科技出版社，96页。
- (100)同上，100页。
- (101)叶子奇《草木子》卷3下《杂制篇》。
- (102)《马可·波罗游记》，福建科技出版社，124页。

- (103)程钜夫《姚萇者传》，《雪楼集》卷7。
- (104)《马可·波罗游记》，福建科技出版社，104页。
- (105)同上，111页。
- (106)同上，116—117页。
- (107)《元史·食货志·海运》，卷93。
- (108)张昱《鞞下曲》，《张光弼诗集》卷3。
- (109)宋讷《客北平闻行人语，感而成诗四首》，《西隐文稿》卷2。
- (110)本节撰稿时，参考了陈高华先生的《元大都》（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一书，特此致谢。
- (111)《明史纪事本末》，中华书局版，203页。
- (112)单士元等《明代建筑大事年表》，8页。
- (113)《明史·陶安传》，卷136。
- (114)《明史·叶兑传》，卷135。
- (115)《洪武实录》。
- 116)《洪武实录》，卷21。
- (117)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23《江南一》。
- (118)《洪武实录》卷8。
- (119)《纪录汇编》卷181。
- (120)《明经世文编·建都议》卷71。
- (121)《明史·兴宗孝康皇帝传》卷115。
- (122)蒋一揆《长安客话》，北京古籍出版社，2页。
- (123)《日下旧闻考》，卷5，中华书局版，80页。
- (124)《太宗实录》，卷16。
- (125)《洪武实录》附建文事。
- (126)孙承泽《春明梦余录》。
- (127)《太宗实录》，卷118。
- (128)《明史·邹缉传》卷164。
- (129)《明史·夏原吉传》卷149。

- (130)《明夷待访录·建都》。
- (131)《续通志·都邑略》卷110，3905页。
- (132)陈文述《秣陵集》卷首《明都城图考》。
- (133)民国《南京之地理环境》。
- (134)《儒林外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24回，293页。
- (135)《明史·地理志》。
- (136)《日下旧闻考》卷38，609页。
- (137)蒋一揆《长安客话》，北京古籍出版社，11页。
- (138)《太宗实录》，卷58。
- (139)同上，卷105。
- (140)《宣德实录》，卷33。
- (141)《明史·职官志》卷75。
- (142)同上。
- (143)同上，卷76。
- (144)《明史·选举志》卷70。
- (145)《日下旧闻考·国朝宫室》卷11，148页。
- (146、147)同上，卷76，1268页。
- (148)同上，1274页。
- (149)同上，卷79，1316页。
- (150)同上，卷80，1321页。
- (151)同上，1325页。
- (152)《中国古代建筑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96—301页。
- (153)《日下旧闻考》卷85，1412页。
- (154)同上，1430页。
- (155)同上，卷86，1437页。
- (156)同上，1438页。
- (157)同上，1443页。
- (158)《李秀成自述》。

- (159) 杜文澜《平定粤寇纪略》。
- (160) 《李开芳供词笔录》，转引自《太平天国定都南京述略》
见《南京史志》1984年第1期。
- (161) 张德坚《贼情汇编》。
- (162) 李汝镜《镜山野史》。
- (163) 何绍基《东州草堂诗钞·金陵杂述》卷26。
- (164) 毛祥麟《对山书屋墨余录》卷4。
- (165) 茅家琦《太平天国兴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第五章 关于边疆民族政权的都城

我国边疆的少数民族，除前面已经介绍过的金中都、元大都等以外，在辽阔的边疆也建立了为数不少的都城。这些都城虽然规模不大，也没有全国意义的影响，但它们对于少数民族社会的发展，对边疆地区的开发，都具有重要意义。

这些少数民族的都城，一般位置比较偏僻，甚至在茫茫大漠之上，多数是土城，有些城内居民住的是帐篷，所以建筑遗迹很少。

少数民族建立的都城，除了有他们本民族的特点之外，在城垣形状、布局规制等方面，往往模仿中原汉族地区的城垣，甚至连管理机构名称也同汉族建立的都城一样。

有些少数民族，在其力量强大之后，入主中原，掌握了全国政权。这时，为了表示不忘他们的兴王之地，常把在边疆地区建立的都城定为陪都。

第一节 茫茫大漠寻古都

匈奴和鲜卑族主要活动于我国北部沙漠草原地带，初期游徙不定，没有城池宫殿。后来，随着社会的进步，他们在茫茫大漠的南部边缘，建立了一些都城。

〔匈奴赫连夏国北京统万城〕

匈奴赫连勃勃的夏国建国于公元407年，统万城建于413年。统万城遗址在今陕西省靖边县红墩界乡白城子村的无定河北岸原上。

“凤翔元年（公元413年），以叱干阿利领将作大将，发岭北夷夏十万人，于朔方水北、黑水之南，营起都城，勃勃自言：‘今都城已建，宜立美名，朕方统一天下，君临万邦，宜以统万为名。’”（1）

这里对统万城建设的时间、地点、城名含义，都作了交代。但近年有的学者认为统万城之名是匈奴名字的汉译简称，原名应为“统万突”或“吐万突”。王仲萃先生在《北周地理志》一书夏州条中说：“称统万镇皆称统万突镇或吐万突镇，故知胡名汉译，有所省简矣。”并举出一些文献和墓志说明这个问题。《周书·明帝纪》和元保洛、元举、元湛、元昭墓志铭中，都有“统万突”之名，或作为人名，或作为地名，可见“统万突”或“吐万突”是匈奴语名称。以上两说孰是，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夏国于427年被魏所灭，魏于统万城置统万镇，隋唐因之。公元994年，北宋为防止党项羌首领据城称雄，下令平毁，迁其居民于今陕西横山、米脂等县。从此，有六百年历史的统万城“销声匿迹”在一望无垠的毛乌素沙漠之中。

统万城遗址土名白城子，地势西北略高，分为外廓城、东城和西城，当地群众称为头道城、二道城和三道城。外廓城依无定河北岸原边地势，呈西南——东北走向，然后西折与东城北垣相接，城垣破坏严重，轮廓不太清楚。

东西两城略呈长方形，系由一道隔墙分为东西两部分。东城东垣长737米，西城西垣长721米。两城北垣在同一条直线

上，东城部分长504米。西城部分长557米。中隔墙在西城的部分长692米，东城向南伸一些，共长774米。南垣西城长551米，东城稍南，长550米。各城角不垂直，略大于或小于90度。

西城是内城，城基厚约16米，加上马面达30米（现有十多户人家在墙内凿窑洞居住）。

东城基较薄，约6—12米，城的四角有长方形或方形墩台，且高出城垣。西南墩台高达31.62米，数十里外就能看到，当时其上建有峻伟的城楼。西城四门，南朝宋门、东招魏门、西服凉门、北平朔门。东城北垣无门，东垣一门，南垣情况不明。

城垣四外筑有马面，数目不一，大小不同，西城北垣十座，南垣八座，东城北垣仅七座。西城南垣马面特别高大，其下筑有仓库。西城南部正中有一台基，平面呈长方形，可能为宫殿前楼观遗址。台基北面有丰富的瓦石堆积，可能是主要宫殿遗址。另一宫殿遗址在西城招魏门内，距东垣21米，门南向，有砖砌台阶，土夯围墙长80米，宽64米。遗址内采集到琉璃滴水、琉璃瓦当、陶砖、瓦等。

文献记载，主持筑城的叱干阿利“性尤工巧，然残忍刻薄，乃蒸土筑城。锥入一寸，即杀作者而并筑之。”⁽²⁾

今经化验，城土的主要成分是石英（砂粒）、粘土和碳酸钙（石灰吸收二氧化碳而成），即是优良的三合土。所以，“其城土色白而牢固。有九牒楼，峻险非力可攻。酈道元云：‘统万城蒸土加功，雉牒虽久，崇墉若新。’⁽³⁾”有人认为，蒸土筑城，是烧石灰。或生石灰加水使用，释出大量热气，史家不谙生产，遂讹为蒸筑土城⁽⁴⁾。该城虽多遭人为破坏，并鄂尔多斯高原一千五百年劲风吹蚀，至今巍然矗立，其坚固可想而知。

〔鲜卑拓跋部的盛乐城〕

公元313年，鲜卑拓跋部力微（始祖）子猗卢（穆帝），“城盛乐，以为北都”（以大同为南都）。公元346年，力微重孙什翼健（昭成帝）再一次“移都于云中盛乐宫”，次年，又南迁新盛乐城。当时拓跋部并未改变其游牧经济的特点，东西迁移，居无定所。

盛乐城遗址在内蒙古和林格尔北10公里，宝贝河的北岸。城分廓城、北内城和南内城三部分。廓城东西1550米，南北250米，略作五边形。南内城偏于郭城的东南部，是汉魏遗迹。该城东西长670米，南北宽655米。城内有北魏时期的黑色厚瓦，一些牲畜骨骼和骨器，可能是三、四世纪鲜卑的遗迹。廓城内也有少量北魏黑瓦。有人认为，盛乐廓城修建是在公元五世纪以后。廓城有马面、瓮城。北内城在南内城北错角，为唐以后所建。

〔北魏平城〕

北魏天兴元年（公元398年），拓跋珪称帝，自新盛乐城迁都平城。天赐三年（公元406年），“发八部人自五百里内，修缮都城，魏于是始有邑居之制度。^{（5）}”平城遗址在今山西大同城区及其附近。其地北阻方山，东西背靠如浑水，北魏“截平城西为宫城，四角起楼、女墙，门不施屋，城又无堑。南门外立二土门，内立庙，开四门，各随方色，凡五庙，一世一间，瓦屋。其西立太社。狝狸所居云母等三殿，又立重屋，居其上。^{（6）}”

云母殿西“铠仗库屋四十余间，殿北丝绵布绢库土屋一十余间。伪太子宫在城东，亦开四门，瓦屋，四角起楼。妃妾住皆土屋。^{（7）}”

北魏平城宫中有婢使千余人，从事织绫锦贩卖、酿酒、养猪羊、牧牛马、种菜逐利。有悬食瓦屋数十间，置尚方从事铁、木生产。宫中袍衣由婢女自制。这说明北魏经济正在向定居的农业手工业经济转化，但仍有一定的游牧经济的特点。

平城“其廓城皆绕宫城南，悉筑为坊，坊开巷。坊大者容四五百家，小者六七十家。⁽⁸⁾”还“分置市里，经途洞达。⁽⁹⁾”说明城内有市场，街道宽阔。

今大同火车站北现存一段夯土城墙，或许是宫城北壁的遗迹。大同城北小北城和火车站附近，发现不少北魏灰黑色陶片、布纹大瓦、北魏瓦当。火车站东侧还发现了排列整齐、间距五米的覆盆式础石，据考证亦为北魏遗迹。

第二节 边陲城制仿中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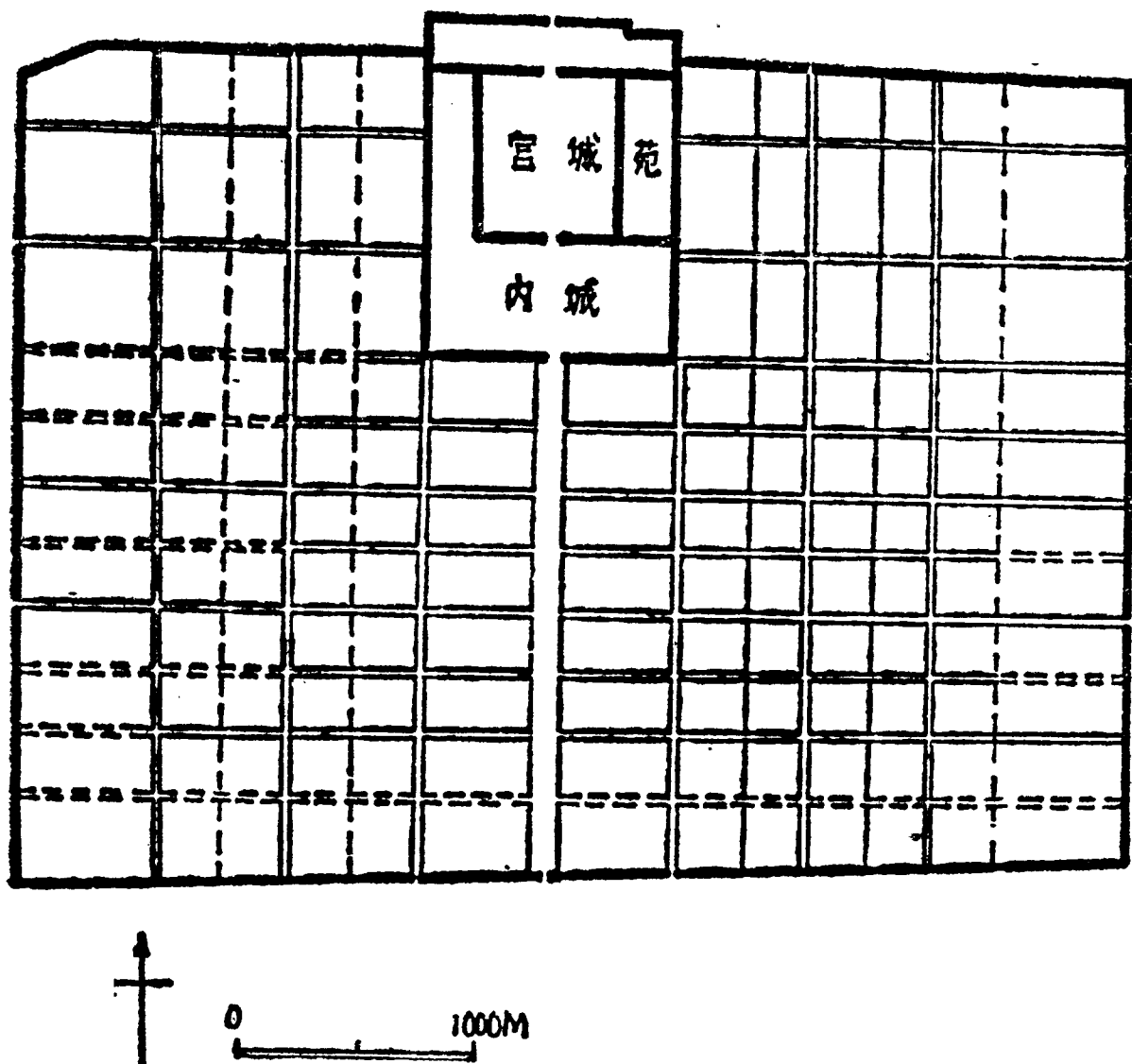
〔渤海上京龙泉府〕

边疆少数民族模仿中原城制建立的都城，以唐代渤海国的上京龙泉府最为典型。城址在黑龙江省宁安县东京城车站西的渤海镇，一般称其遗址为东京城。渤海国是靺鞨人建立的地方政权，于698年立国，称“震国”。唐朝开元元年（公元713年），册封为渤海郡王，称渤海国，至926年亡于契丹。

渤海初都敖东城（吉林省敦化县境），继都显州，称中京显德府。755年，迁上京龙泉府，三十多年后迁东京龙泉府。794—795年间，又迁回上京龙泉府，此后再未迁都。

上京龙泉府城东西略长，南垣5公里，北垣5.5公里，东西垣都是3.5公里。城基用大石，其上夯土版筑墙，基宽7—10米，顶宽2—3米，不少地方残高两米左右。南开三门，东西各二门，

共十门。城内有东西平行大街两条，南北向平行大街三条。正中一条南北大街宽达88米（如唐长安的朱雀大街），直通南垣正门，北通内城南门。主干大道两旁有东、西市。街道两侧是居民区——坊，每坊面积约400×500米左右。



图四十一 唐渤海国上京龙泉府

城中有一石佛和一石灯幢。石佛高丈余，坐于莲花石座上。石灯幢高6米，塔基之上为莲花形石座，石座上圆形石柱支撑着一个仰莲所托的八角形塔室。塔室每面均透雕窗户和窗棂。塔室是焚香烧纸的地方。塔室上覆盖着八角伞形顶盖，雕有檐瓦，顶上是相轮和塔刹。

官城紧贴在北垣正中，皇城（内城）在其南，皇城东西1060米，南北1180米，是官僚衙署和宅第所在。官城东西

620米，南北720米。宫城之东有一禁苑，即御花园，约占地30亩，内有池塘、假山遗迹和琉璃残瓦。宫城内宫殿遗址有五进。第二进殿基东西64米，南北27米，前有宽阔的广场，是主殿（也有认为第三进殿基最大，才是主殿）。

上京龙泉府城的形状，和皇城、宫城的位置，城内大街小巷、里坊市场的排列，完全是模仿当时中央政权的首都——唐长安建设的，可见当时汉文化对少数民族影响之深。

〔辽上京〕

辽国历时二百余年，初称辽国，一度改称大契丹，后又复称辽国。辽设五京：上京临潢府，是首都。中京大定府（在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大明公社），西京大同府（山西大同），东京辽阳府（初称南京，辽宁辽阳），南京析津府（今北京）是陪都。辽实行五京制，说明辽没有形成一个能控制和影响全国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

辽神册三年（公元918年），阿保机于距祖州四十里的苇甸筑城为皇都。天显十三年（公元938年），以皇都为上京，设临潢府。

上京临潢府遗址在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南二里，称南波罗城。城为南北两部，北城是皇城，略呈方形。南北宽2000米，东西长2200米。北城正中偏北有一个500米见方的台地，其上为宫殿区，当时称天赞宫。宫殿区正中有一前为矩形，后为圆形的建筑基址，应是主殿所在。当时三大殿名开皇、安德、五釜，今遗有绿琉璃瓦。宫殿区正南200米处，有矩形基址，尚有石狮一对，应为宫殿正门承天门。“太宗诏蕃部并依汉制，御开皇殿，辟承天门受礼。^{〔10〕}”大内东西还各有一门：东华门和西华门。承天门大街将全城分为东西两部分，东

设临潢县，西设长泰县，亦是仿唐长安设长安、万年二县之制。

《辽史》称南城为汉城，是各族居民集居之区。汉城东西长与北城相近，南北长1400米。皇城有四门，汉城有六门。皇城门有瓮城，东、南、北面城垣外面每隔九十步有一马面，上设敌楼。汉城无马面敌楼。

〔金上京会宁府城〕

金上京是女真族所建的金国前期的首都。至金贞元元年（公元1153年）迁都中都前，这儿一直是女真族活动的中心。金上京城址在黑龙江省阿城市南约两公里。

金建国之初，无城廓，星散而居，称为皇帝寨、国相寨、太子庄，后升皇帝寨为会宁府。金太宗天会年间（公元1123—1135年），开始大规模修建城垣。皇统六年（公元1146年），模仿北宋都城开封再一次进行扩建。“规模曾仿汴京，然十之二、三而已。”^{〔11〕}遗址分南北两城。北城南北长1828米，东西宽1553米。南城紧贴北城，东西长2148米，南北宽1523米。全城长10873米。墙基阔7—10米，残高3—4米，大部是土坯砌筑，城门处砌砖。皇城位于南城偏西处，南北长645米，东西宽500米，皇城城垣基宽6.4米。皇城内有关殿遗址，有灰色砖瓦、黄绿釉琉璃瓦和瓦当。从宫殿基址可以看出主要宫殿呈工字形，亦是受北宋开封影响。上京城北有阿什河可通松花江，是上京最便捷的交通线。沿河两岸有手工业作坊遗址。

〔南诏与大理国的太和城、羊苴咩城〕

太和城和羊苴咩城位于云南省西部点苍山下洱海之滨的大理平原上。

点苍山又名苍山，由南北纵列的十九座山峰组成。主峰马

峰海拔四千一百一十二米。洱海南北长四十余公里，东西宽六至九公里，湖面海拔一千九百多米，最深处二十一米。海西的大理平原，南北狭长，西高东低，呈倾斜之势。

太和城作为南诏的国都，自公元739年至公元779年，共四十年。遗址在今大理市下关与大理古城之间的太和村。由于西为险峻的苍山，东为宽阔的洱海，太和城只筑南北两道城墙。今南北城墙遗迹清晰可辨。南城墙西起五指山北麓，北城墙西起佛顶峰。两城墙蜿蜒而下，直至洱海边。据《蛮书》记载，太和城“巷陌皆垒石为之，高丈余，连延数里不断。”太和城内地势高低不平，唯中部有一方约百余米的平地，可能是当时的宫室所在。公元747年，又在佛顶峰顶上修一小城，称金刚城（因唐僧送金刚经至，故名）。金刚城是皇室的又一重要居址。太和城遗址中部，遗有一块南诏巨碑——南诏德化碑。碑立于唐大历三年（公元776年），高四点零二米，宽二点二七米，厚零点五八米。碑文说明当时南诏叛唐臣于吐蕃为不得已，并表明了与唐友好的愿望。《新唐书·南蛮传》上说，南诏王阁罗凤“揭碑国门，明不得已而叛。尝曰：我上世之奉中国，累封赏，后嗣容归之。若唐使者至，可指碑澡被吾罪也。”今碑年久风化，但仍见有一千余字。

公元779年，阁罗凤之孙异牟寻将国都由大厘城（今喜洲）迁至羊苴咩城。羊苴咩城位太和城之北，在中和峰下。北城墙以梅溪为护城河，为土石混筑，今仍遗存部分东西长约一公里余。

据文献记载，羊苴咩城建成后，名之曰大理城，又叫紫城。城周约十五里，南北城门之间，有一通衢大道相连。城内主要有南诏王宫和高级官吏的住宅。后来，南诏还修建一座接

待西南各部落酋长的宾馆——五华楼，周长五里，高一百多只，可以居住万人。

从当地的地理形势和今日居民的习俗看，由于大理平原西高东低，为顺应地势，太和城和羊苴咩城的主要建筑应该是座西面东的。形成背靠苍山、面向洱海的格局。今日大理平原民居以面东为主，正是继承了古代遗风。

南诏灭亡后，从公元902年直至1253年元世祖灭大理国，其中郑赵杨段四氏割据大理，皆都羊苴咩城。羊苴咩城作为王都，长达四百七十四年之久。明洪武年间，在羊苴咩城内修建周仅三点六公里的大理砖城，羊苴咩城始逐渐荒废。

第三节 兴王之地作陪都

〔元上都〕

元世祖忽必烈于1256年命汉族工匠刘秉忠负责规划、建造上都。经过三年，于1259年建成，称开平府。1264年正式命名上都。遗址在内蒙古多伦东南。

忽必烈曾问刘秉忠定都之地，上都、大都两处何为最佳。刘秉忠答复说：“上都国祚短，民风淳；大都国祚长，民风淫。”⁽¹²⁾所以就决定定都于燕（大都）。

元定都燕京之后，并未忘记其兴王之地。每年夏季，北巡上都。终元一代，上都一直处于陪都地位。

元上都分宫城、内城和外城三部分，是蒙古统治者第一个有计划地建造的都城。宫城在内城正中偏北，东西570米，南北620米，砖砌，四隅有角楼遗址。南开一门，与内城南门相对，宫城内有宫殿遗址，宫殿与衙署没有明确区分，布置也无规律，这与成吉思汗时的和林城的特点是一样的。布局既受汉族

的影响，又符合蒙古族将统治者围于中心的军帐制度。

内城即皇城，1400米见方，外砌石块，占据外城东南部，南北各一门，建筑集中于四隅，大多为寺庙。外城2200米见方，南北两面为夯土版筑墙，外有壕沟。内外城中建筑遗址较少，可能多数为可移动的毡帐、板屋。上都规模大于成吉思汗的和林而小于大都。元至正十一年（公元1358年），上都被红巾军攻克，宫殿被焚毁，此后再未修复。上都城的毁灭比元亡早10年。

〔清初东北三都——兴京、东京、盛京〕

清初在东北曾建立过三个都城。努尔哈赤曾在今辽宁新宾县永陵公社境内修建过南北两个都城。这两个都城南北相距五里。北城即费阿拉城，筑于1587年。1603年，又修南城，通称新城，即赫图阿拉。1605年，建南城外廓。清定鼎北京后，称这里为兴京，意为兴王创业之地。

1622年，努尔哈赤在明辽东都司所在地辽阳东五里，修建东京城。这是从赫图阿拉向北京进军过程中的一个中间站。

1625年，东京城尚未建设完工，努尔哈赤又看中了交通上四通八达的沈阳，命名盛京。盛京的整个建设工程，是在其子皇太极时才完成的。建筑风格既具满蒙特点，又受汉族影响。在有清一代，盛京一直处于陪都的地位，以示不忘创业之地。

据说盛京是由汉族官吏根据《易经》学说规划的。城内外两重，整个布局是按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设计的，平面为方型，周九里三百二十步，街道布局呈“内平外善”的字形。

《易经》说：“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应九宫。”《礼记》上说古天子有九门。城中宫城是太极，东、西华门为两仪，东西南北四塔为四象，八门八关，北垣正中加一

封闭的旧城门，称镇边门，以应“九宫”之说。十六个城门楼为二——三层，总数三十六层，是三十六“天罡”。筑城取土的七十二个土坑，加盖成为渗水井，即七十二地煞。

内“平”：两横一为中街，一为东西华门大街。宫城正门前天街为一竖，钟、鼓楼为两点，恰好组成一个“平”字。

外善：大小北关稍斜，为善字上两点。横街，大十字街，小十字街为三横，钟、鼓楼为两点，大西门至大东门大街为第四横，两关略偏南斜，这一横很形象，天街为一竖，大小南关加上大小十字街为口字，这样恰好是一个“善”字。

镇边门之南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居所——天命汗宫。再南为盛京宫城，即今沈阳故宫。盛京宫城有房屋三百余间，占地近九十亩。整个布局分为三路：中路是大内宫殿，正门是大清门，正殿是崇政殿，为五间九檩硬山式。崇政殿后凤凰楼（内宫正门）以北为内宫，有清宁宫等。东路以大政殿（举行大典的地方）为中心，前有略呈八字式布局的十王亭排列两边。十王亭的建筑形式为蒙古包式，这是左右翼王和八旗大王办公的地方。西路有藏书之所文溯阁等，为清帝东巡盛京时读书、看戏的地方。沈阳故宫保存完整，今为沈阳故宫博物馆。

第四节 关于西北民族政权的城都

〔于阗〕、〔龟兹〕、〔高昌〕、〔伏俟城〕、〔阿力麻里〕

西北诸都城，规模小，建筑简陋，或因袭地方行政中心的旧城，实际只是一个地方行政中心。这些都城，对全国影响不大，但对于研究少数民族历史、文化、风俗等，有一定意义。

于阗国都城之名，《汉书》、《后汉书》作“西城”，《魏书》、《两唐书》作“西山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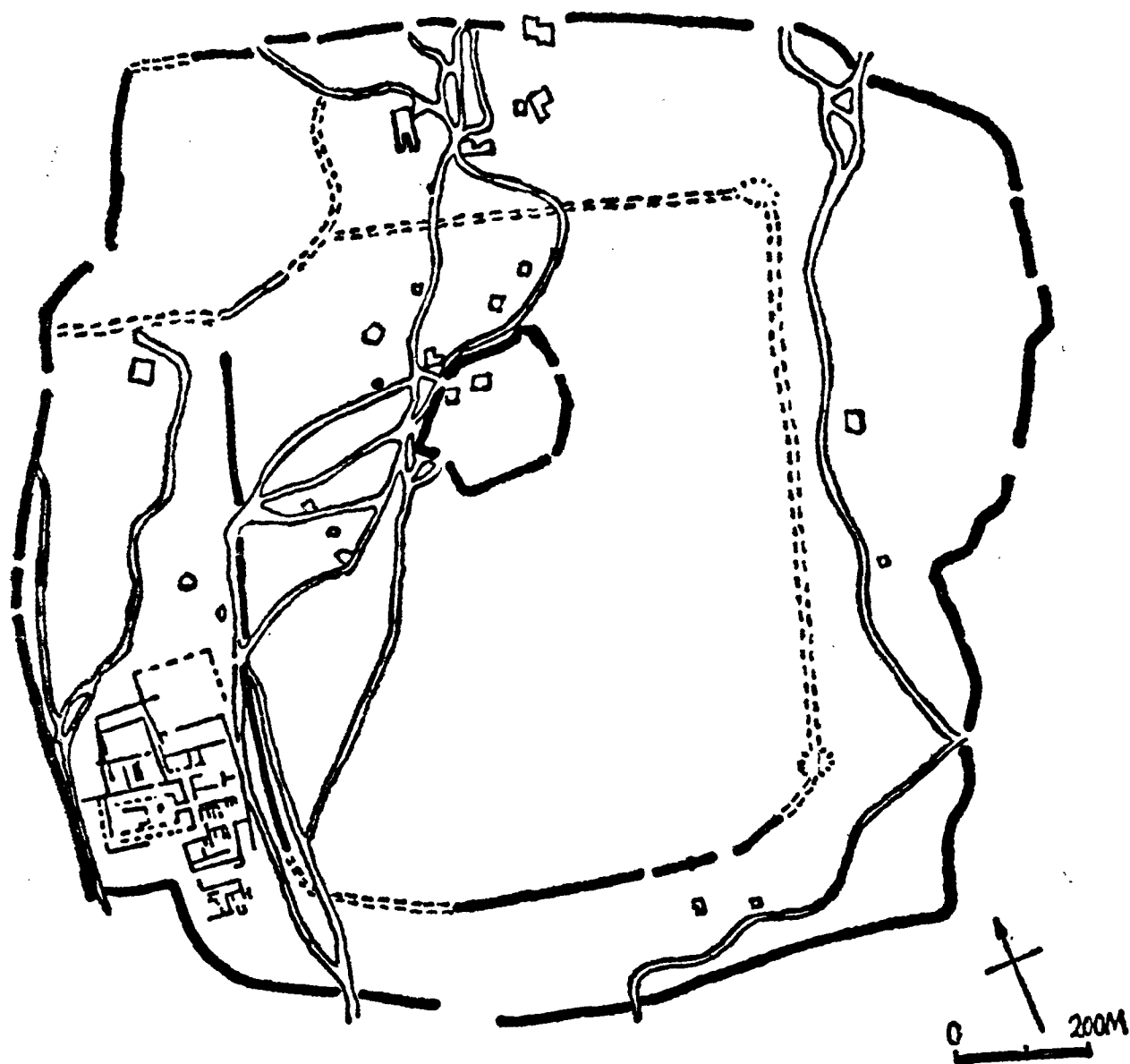
“于阗城东三十里，有首拔河，中出玉石。……城东二十里有大水北流，号树枝水，即黄河也，一名计式水。城西五十五里，亦有大水，名达利水，与树枝水会，俱北流。⁽¹³⁾”黄文弼先生在本世纪二十年代赴于阗考察，认为今于阗县城北四十里元阿克苏比尔古城即古于阗国都西城，或称西山城。

龟兹都城，《汉书·西域传》说：“龟兹王治延城。”《魏书·西域传》说：“王都延城在白山南一百七十里。”北魏酈道元在《水经注》中称为“故延城”，说明当时龟兹已经迁都，则《魏书》所记应是新都。唐代，龟兹又迁都伊罗卢城，都白山之南二百里。黄文弼先生认为，今新疆库车皮朗旧城是汉龟兹国都延城，也是唐之伊罗卢城。皮朗旧城有一大城，周七公里，与《大唐·西域记》说“大城周十七八里”相近。且皮朗旧城发现唐代文化层压在汉代文化层之上。沙雅县北英尔默里北二十里的羊达克沁大城，城三重，方三公里，与《隋书》所说都城方六里相近，可能是北魏时龟兹之都延城。

高昌之名始见于《汉书·西域传》。《北史·西域传》说：“高昌者，车师前王庭之故地……或云昔汉武帝遣兵西讨，师旅顿弊，其中尤困者因住焉，地势高敞，人庶昌盛，因名高昌。亦云其地汉时高昌垒，故以为国号。”从北魏至唐贞观年间，为鞠氏高昌王国时期。高昌王国的故城在吐鲁番市东25公里，属火焰山公社境，城处胜金口以南二堡与三堡之间，从胜金口流出的木头沟水，经过二堡流入城中。

高昌城分外城、内城、宫城三部分。外城略作正方形，长宽约1.5公里，四面城垣略向外鼓，呈弧形。城垣厚12米，残

存部分高11.5米。城为夯土版筑，外筑马面。西垣北端一门有瓮城。外城西南角有一大寺院。寺院东南、东北角各有两“坊”遗址。



图四十二 唐高昌故城

内城居外城正中，现仅留西、南两面城垣。内城西北部有一不规则的圆形小堡垒，其内西北有高台。台上有一高达15米的土坯砌的建筑物。宫城在内城之北，夹在内外城之间，南北墙即内外城之墙。宫城内殿基很多，与内城圆形堡垒在同一直线上。

城内住房有土坯砌拱顶房和窑洞两种形式。整个布局与唐长安相似，宫城在北，内城在南（相当于唐长安的皇城），外

城为一般居民区，有集中的坊市。

伏俟城是慕容鲜卑的吐谷浑部西迁后的都城，在青海湖西岸，即共和县黑马河公社向科先大队的铁卜卡古城。

《魏书·吐谷浑传》说，“伏俟城在青海西十五里”，与铁卜卡古城位置正合（距青海湖7.5公里），其附近也没有另外的古城，所以认为该城即伏俟城，大概建于公元五世纪中叶。

城有内外两重，外廓南垣长1400米，残存城基为河相砾石筑成。北垣已被切吉河冲毁，东西北三垣长度不详。廓城偏东有一南北内墙，把廓城分成东西两部分，西部较大，成方形。

内城在廓城西部正中，边长200米，正方形。城为夯土筑成，基宽6米，顶宽和高均5米，东墙正中有一门。内城紧靠西垣，有一小方城，城基高近两米，边长70米，外缘稍高，状如方台，可能为殿基之类。城内有通衢，与城墙方向一致，相交成方格网状。城内建筑遗址甚少，可能与吐谷浑“虽有城廓而不居，恒居穹庐，随水草畜牧”^{（14）}的游牧习惯有关。估计当时多数居民仍住帐房。

阿力麻里是元代察合台汗国的首都。历来研究者据邱处机《长春真人西游记》和耶律楚材《西游录》有关记载进行推测和勘查，许多人认为它的位置应在新疆赛里木湖南岸、伊宁城以西的一片地区。有的学者认为赛里木湖南克干山南麓的阿尔泰古城就是阿力麻里城^{（15）}。也有的认为霍城县水定镇西的磨河旧城是阿力麻里城。也有的认为阿力麻里城在乌里雅苏台，而说赛里木湖之南诸书所记的阿里马城，并非阿力麻里城等。总之，诸多说法，均无确证，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西夏都城兴庆府〕

西夏初都西平府（今宁夏灵武县），1020年迁都于怀远镇（今银川），改名兴州，后又升为兴庆府。十二世纪上半叶，又改为中兴府。时夏人称兴庆府为东京，西平府为西京，是仿宋朝东、西京之制。甚至兴庆府的管理机构也仿宋京称为开封府。

兴庆府“西北有贺兰山之固，黄河绕其东南，西平为其屏障，形势利便。^{〔16〕}”在交通方面，银川平原北控河朔，南引庆凉，据诸路上游，扼边陲要害。周围地区土壤肥沃，地势平坦，灌溉发达，是富庶的农业区，可以保证都城的军需民食。兴庆府前身怀远镇是宋代“河外五镇”中的首镇，城市有一定基础，有相当的容纳能力。

西夏迁都于兴庆府后，于1020年开始修筑城池，至1055年落成承天寺，经过三十多年的经营，都城基本建成。

据明弘治《宁夏新志》和《嘉靖宁夏新志》等记载，明代宁夏城（今银川旧城）即西夏兴庆府城。明代宁夏城“周回四十八余里，东西倍于南北，相传以为人形。”城六门：南垣两门，南薰、光化；北垣两门，德利、振武；东清和门；西镇远门。城外有护城河。参照发现的其它西夏城，城垣外侧应有瓮城、马面等防御设施。城内由纵横街道划分为十个街坊，宫城居城内中部偏北，有明显的中轴线。西夏统治者发迹于唐朝，建城时模仿唐长安规划，甚至连都城名称也是来源于唐长安兴庆宫。当时城南北有星罗棋布的湖泊，限于地形，城垣形状只好修成一个东西长方形，很象一个人的躯干。南北两关是人的两手，城东垣外高台寺是人的头，贺兰山麓的离宫佛院是人的两足，寓意两足踏山，江山稳固。

1227年,元灭西夏,西夏国主献城投降。蒙古军屠城毁宫,城市遭到很大破坏。元中统年间,为便于防守,缩西城之半,修复了城的东半。到明代,复筑其西半。今银川宁夏博物馆内的承天寺塔,肇建于西夏。中山公园北的一段银川旧城垣,或许有西夏基础。

(1)《晋书·赫连勃勃载记》。

(2)同上,并《嘉靖宁夏新志》。

(3)《元和郡县图志》,中华书局,卷4,100页。

(4)《统万城城址勘测记》,《考古》,1981年3期。

(5)《魏书·天象志》。

(6、7)《南齐书·魏虏传》,中华书局标点本,984页。

(8)同上,985页。

(9)《魏书·太祖纪》。

(10)《辽史·地理志》。

(11)《大金国志》。

(12)蒋一揆《长安客话》,北京古籍出版社,1页。

(13)《魏书·西域传》卷102。

(14)《魏书·吐谷浑传》。

(15)黄文弼《元阿力麻里古城考》,《考古》,1983年10期。

(16)吴广成《西夏书事》卷10。

第六章 辛亥革命以后的都城

辛亥革命发生以后，建都何处的问题，引起了各派政治势力和各地区势力之间的激烈争论。

这个争论，分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东西（沪汉）之争，第二阶段是南北（宁燕）之争。

1911年11月中旬，已有十余省宣布独立，建立中央政权的问题已经提上议事日程。湖北的主要政治势力——民社，利用武昌首义的优先地位，由黎元洪电约各省代表到武昌商议组织临时中央政府，力争定都武昌。浙江上海的政治势力自然不甘落后。他们以共和统一会为核心，由江浙沪三都督程德全等电告各省代表到上海开会，在上海成立了“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由于政治经济力量的强大，他们的地位和作用自然重要得多。武昌集团眼看有受到冷落的威胁，立即拟定临时政府方案，企图控制临时中央政府的组织、人选等。上海集团由张謇在幕后调动指挥，由当时在汉口的江苏籍旧官僚庄蕴宽提出“政府设鄂，议会设沪”的折衷建议，并于11月20日承认湖北军政府为中央军政府。上海集团认为，一方面议会可以控制政府，另一方面，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如张謇等，已与袁世凯暗中在商定“变局”计划，准备把政权奉送袁世凯。

武昌军政府却态度强硬起来，坚决要各省代表莅武汉开会。上海集团不愿过于决裂，于11月24日议决去武汉开会，各省留一人在上海联络。11月30日，议决以武昌为国都。可

是，这时汉阳失陷，黎元洪被炮火吓得逃往葛店。南京攻克，风势迅速转到上海集团方面，各省代表立即议定南京为中央政府所在地，并相约一星期内在南京集合继续开会。12月，孙中山从国外回国，于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正式成立。

争都的第二阶段是南北之争。清廷退位，如何实现统一及建都何处，又提到日程上来。孙中山提出辞职，推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规定了三个条件：定都南京，新总统到南京就职，遵守民国临时约法。孙中山是想把袁世凯从北京封建官僚的巢穴调到革命中心南京，置于革命势力的包围和监视之下。可是，南京参议院讨论建都地点时，大部分议员都强调北京是六百年古都等，致使参议院以20票赞成、8票反对，通过建都北京的议案。会上，另一些代表提出建都广州、天津等。孙中山接到决议，异常气愤，立即要求参议院复议。经过激烈争论，南京参议院终于以19票赞成，重新决定定都南京。袁世凯这时却以北京外交使团“以凯离此为虑”和北方“隐患实繁”为由，不愿到南京就职。

以黎元洪为代表的武昌集团，这时死灰复燃，企图在南北之争中，以武昌为折衷建议。他们催促各省代表到武昌开会，商讨组织中央政府。还散布说，美国认为“中国建都武昌最为相宜，极反对南京”，并一面以地方税作抵押，向美商达拉公司借款三百五十万元，作为武汉市政建设费，大作其“建设新都”的美梦。并宣传武昌“居交通之中枢，为东南之冠冕；西通川藏，北控燕云，除北京旧染之污，亦免蹈建业偏安之习。”不过，武昌集团这时早已不是“争都”的主角，而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配角。

孙中山先生在袁世凯电告不愿南下后，仍尽力争取建都南京，并于2月25日派蔡元培、汪精卫、宋教仁等作为专使，去北京迎袁南下。代表团于二十七日到达北京，袁却于二十九日夜制造了北京兵变，并接连在通州、天津、保定制造骚乱，造成袁不能遽离北京的印象。迎袁代表团在袁的欺骗下也放弃了建都南京的主张，电告南京，主张袁在北京就职，迁都北京。争都专使反变成了让都的说客。孙中山曾经提出一些变通办法，如让黎元洪以副总统名义到南京代理临时大总统等，都未行通。3月10日，袁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南北双方在上海商定唐绍仪为内阁总理。唐于3月29日到南京接受临时政府全部权力。孙中山于4月1日宣布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以黄兴为南京留守使。4月5日，参议院正式议决定都北京。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不到一百天，就被袁世凯所取代。

在东西之争中，黎元洪、程德全都是南方大资产阶级、旧官僚的代表，他们力争把首都建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扩大自己的政治经济势力。

在南北之争中，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势力，希望把国都定在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影响较大的东南地区，以南京为中心，壮大革命势力，争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但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力量有限，他们不能坚持到底。

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封建官僚集团，在北京有雄厚的政治实力基础，自然要千方百计维护旧北京的政治中心地位。由于他们势力强大，加上帝国主义的支持，袁世凯终于在北京建立了代表封建官僚集团利益的反动政权，辛亥革命也就遭到了彻底失败⁽¹⁾。

〔北洋政府时期的北京〕

袁世凯政府在北京建立之后，废顺天府，称京师，设京兆尹，通称北京。袁世凯就中南海改建总统府，改正门宝月楼为新华门，改大清门为中华门（今已拆除），并拆除了千步廊。二十年代，故宫改建为博物院。

皇城位居城中，规模巨大，妨碍交通。北洋政府先后将皇城东、西、北三面城墙拆除，改筑为马路（今东、西皇城根和地安门东西大街）。拆除了东、西长安门，打通了东西长安街。拆除神武门外北上东、西门，打通了东、西城之间的交通。^{〔2〕}

整个北洋政府统治的二十余年中，北京城市没有大的变化。这一时期，北京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伟大的五四运动于1919年在北京爆发，并迅速扩及到全国。

1927年，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中国首都又转移到南京，北京改为北平特别市。

〔国民政府时期的南京〕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改称南京特别市。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往陪都重庆，梁鸿志、汪精卫的伪政府先后占据南京。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立即“还都南京”。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成立，国民政府建都南京二十二年。

国民政府为迎接孙中山先生的灵柩南下安葬，修建了一系列以“中山”命名的工程。如中山码头、中山桥、中山门、中山路（中山码头——鼓楼——新街口——中山门）等。

中山陵于1926年开始建造，1929年完工，平面呈钟形。孙中山先生的灵柩于1929年6月1日正式在这里安葬。中山陵建成后，修建了一系列的附属工程，如音乐台、流徽榭、光化亭等，并在周围大规模植树，形成紧靠城市，面积达三四万亩

森林区，成为我国面积最大的人工公园。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1927年制定了《首都建设计划》，对城市进行了功能分区。计划将城市分为中央政治区（紫金山南）、市行政区（傅厚岗）、工业区（长江两岸）、商业区（主干道两侧和明故宫）、文教区（鼓楼一带）及住宅区（旧城内）等。计划制定了方格网加对角线的林荫大道系统及对外交通如机场、铁路枢纽的位置。

计划制定以后，国民政府曾进行了一些工作。国民政府首都建设委员会于1929年议定首都道路命名办法，规定城南道路以南京的旧称如建康、金陵、白下、升州等命名；城中道路以全国大城市如上海、北平、汉口、广州、青岛等命名；城北道路以全国省、地方的名称如江苏、四川、新疆等命名。与此同时，陆续修建了一些柏油路，栽植了行道树。

为适应国民政府统治的需要，修建了国民大会堂（今南京人民大会堂）、中央美术馆（今江苏省美术馆）、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今南京博物院）等，以及行政院、外交部、交通部、铁道部等五院六部办公楼和总统府子超楼等一批办公大楼。特别是在颐和路一带为国民党高级官僚修建了一千七百套豪华的花园别墅式高级住宅，总面积达68万平方米。

在新街口地区，修建了中央商场、银行大厦和影剧院、舞场、酒楼等，迅速形成了新的商业中心⁽³⁾。

(1) 章开源《民元“争都”试释》，《北方论丛》，1979年1期。

谢本书《略论1912年的建都之争》，《史学月刊》，1982年1期。

- (2) 朱僊《明清两代宫苑建置沿革图考》，商务印书馆版。
- (3) 同济大学城市规划教研室《中国城市建设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 《中国建筑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附录

(一) 中国历代都城一览表

朝代 (国名)		首 都	陪 都
三 皇	伏羲 神农 黄帝	陈(河南淮阳) 鲁(山东曲阜) 有熊(河南新郑)、涿鹿	
五 帝	少昊 颛帝 帝喾 唐尧 虞舜	穷桑(山东曲阜北) 高阳(河南濮阳) 亳(河南偃师) 平阳(山西临汾) 蒲坂(山西蒲州)	
夏 朝		安邑(山西夏县) 阳城(河西登封县告城镇) 阳翟(河南禹县) 斟鄩(河南巩县稍柴村) 帝丘(河南濮阳西南) 原(河南济源县四里原村) 老丘(河南陈留)	

(续表)

朝代 (国名)	首 都	陪 都
春	陈 宛丘 (河南淮阳东南) 前11世纪—前478年	
	许 许 (河南许昌) 叶 (河南叶县西南) } 前11世纪—前475年 城父 (安徽亳县)	
	吴 姑胥 (苏州)? —前473年	
秋 战	蔡 蔡 (河南上蔡县西南) 新蔡 (河南新蔡县) } 前11世纪—前447年 州来 (安徽凤台县)	
	晋 曲沃 (山西闻喜县, 一说襄汾县) 絳 (山西翼城县, 曾改名翼) } 前11世纪—前369年 新田 (山西曲沃县西南)	别都 曲沃
时 期	越 会稽 (绍兴)? —前306年	
	宋 商丘 (河南商丘) 前11世纪—前286年	
	鲁 曲阜 前11世纪—前256年	
	韩 平阳 阳翟 } 前403—前230年 新郑 } (前375年迁新郑)	

(续表)

朝代 (国名)	首 都	陪 都
春秋战国时期	魏 安邑 } 前403—前225年 大梁(开封) (前364年迁大梁)	
	赵 晋阳(太原) } 前403—前222年 邯郸(前368年迁邯郸)	
	楚 丹阳(湖北秭归? 枝江? 河南淅川?) 前1024— 前690年	
	郢(湖北江陵) 前689—前506年	
	(湖北宜城) 前505—前279年	
	陈(河南淮阳) 前278—前242年	
	寿春(安徽寿县) 盱眙(江苏盱眙) } 前241—前223年 郴(湖南郴县)	
燕 上都蓟(北京) 前11世纪—前222年	下都武阳(河北易县)	
齐 营丘(山东益都县西北) 前11世纪—前9世纪		
薄姑(山东博县)		
临淄(山东淄博市临淄区) 前9世纪—前221年		
卫 朝歌		
曹(河南滑县南)		
楚丘(河南滑县东南六十里) } 前11世纪—前 209年		
帝丘(河南濮阳)		

(续表)

朝代 (国名)	首都	陪都
春秋 战国 时期	西垂 } 犬丘 } 陇坻以西 秦	
	汧渭之会 } 平 阳 } 汉右扶风境 (陕西凤 雍 } 翔县) 前677—383年	
	泾阳 (陕西泾阳县境)	雍(前383—前207年)
	栎阳 (陕西临潼县境) 前383—前350年	
	咸阳 (陕西咸阳市东) 前350年	
秦朝	咸阳—前206年	洛阳
西汉	长安 (西安) 前202—公元8年	洛阳
新朝	长安 (西安) 9—24年	
东汉	东京洛阳 25—190年 西京长安 190—195年 许 (河南许昌) 195—220年	西京长安、南都宛 (河南南阳) 东京洛阳、南都宛
汉 西域 诸 国	楼兰 扞泥城	
	精绝 (克里雅尔)	
	皮山 皮山城 (新疆皮山县)	
	莎车 (今叶尔羌、莎东、叶城一带)	
	龟兹 延城 (库车、拜城县)	
乌垒 都护治所 (轮台县策特尔南沙漠中)		

(续表)

朝代名 (国名)	首都	陪都		
汉	尉犁	尉犁城 (阿满沟—紫泥泉子一带)		
	焉耆	渠城 (哈拉沙尔一带)		
	小宛	扞零城 (且末南山中)		
	戒璽	卑品城 (克里雅南山谷中)		
	蒲犁	蒲犁谷 (塔什库尔干)		
	无雷	卢城 (疏勒西南山谷中)		
	难兜			
	西	休循	鸟飞谷	
		尉头	尉头谷	
	城	鸟贪訾离	于娄谷 (昌吉南山谷中)	
单桓		单桓城		
卑陆后		番渠类谷		
蒲类		天山西疏榆谷		
诸		西且弥	天山东于大谷	
	狐胡	车师柳谷		
	车师都尉国	汉置都尉于此 (哈拉和卓地有旧城遗址)		
车师后城长国				
国	尉宾	循鲜城		
	安息	番兜城 (盘杜瓦)		
	康居	卑阆城		

(续表)

朝代名 (国名)	首都	陪都	
汉 西 域 诸 国	且末	末城（车尔城）	
	扞弥	宁弥城（克里雅河旁）	
	疏勒	疏勒城（喀什噶尔、迦师一带）	
	温宿	今温宿、乌什县	
	姑墨	南城（阿克苏至哈尔玉尔滚一带）	
	仑头	（轮台县南）	
	渠犁	（尉犁县境沙漠中）	
	危须	（哈拉沙尔东，曲惠附近）	
	若羌	（青海达布逊淖尔一带）	
	渠勒	鞞都城（策勒县南山谷中）	
	西夜	呼犍谷（叶城南山谷中，奇盘山一带）	
	依耐	（英吉沙南山谷中）	
	乌秣	乌秣城	
	捐毒	衍敦谷	
	桃槐		
	乌孙	赤谷城	
	劫国	（天山东丹渠谷）	
	卑陆	（天山东乾当谷）	
	郁立师	（内咄谷）	
蒲尖后			
东且弥	（天山东兑虚谷）		
车师前	交河城（吐鲁番雅尔湖遗址）		

(续表)

朝代 (国名)	首 都	陪 都
汉 西 域 诸 国	车师后 务涂谷 (吉木萨尔南山中)	
	山 国	
	乌弋嶠	
	大月氏 蓝氏城 (巴尔克地)	
	大 宛 贵山城	
曹	洛阳220—265年	譙 (安徽亳县)
魏		许昌
		长安
		邺 (河北临漳县境)
东 吴	武昌 (湖北鄂城) 220—229年, 265—266年 建业 (南京) 229—280年	行都武昌
蜀 汉	成都221—263年	
西 晋	洛阳265—311年	
	长安313—316年	
东 晋	建康317—420年	
十 六 国	汉 平阳308—319年	
	前 赵 长安319—329年	
	后 赵 襄国 (河北邢台) 319—335年 邺 335—350年	

(续表)

朝代 (国名)	首都	陪都
冉魏	邺 350—352年	
前燕	龙城(辽宁朝阳) 蓟(北京) 邺(河北临漳)	337—370年
前秦	长安 352—394年	
代	北都盛乐 338—376年	南都平城 (山西大同)
大成	成都 306—338年	
成汉	成都 338—347年	
前凉	姑臧(甘肃武威) 317—376年	
后秦	长安 384—417年	
西燕	临晋、闻喜、长子(山西) 385—394年	
南燕	滑台(河南滑县) 广固(山东益都北)	398—410年
北燕	龙城 407—436年	
后燕	中山(河北定县) 龙城	386—407年
西秦	苑川(甘肃榆中县北) 金城(甘肃兰州)	385—431年
夏	统万(陕西靖边县境) 407—431年	
后凉	姑臧 386—403年	

十
六
国
时
期

(续表)

朝代 (国名)	首都	陪都	
十六国时期	南凉	西平(青海西宁)廉川堡(青海乐都) 397—414年	
	北凉	张掖401—439年	
	西凉	敦煌 } 酒泉 } 400—421年	
南北朝	宋	建康 420—479年	
	齐	建康 479—502年	
	梁	建康 502—554年	
	后梁	江陵(湖北江陵) 554—587年	
	陈	建康 557—589年	
南北朝	北魏	平城 398—494年	
		洛京(洛阳) 494—534年	北京(山西大同)
	东魏	邺(河北临漳县) 534—550年	
	西魏	长安(西安) 535—557年	
	北齐	邺(河北临漳县) 550—577年	
南北朝	北周	长安 557—581年	东京洛阳
	隋朝	大兴城(西安) 581—618年	洛阳(东都、东京)
唐代	唐	长安〔京城、西京、中京、上都〕	洛阳(东都、东京)
	唐朝	洛阳〔神都〕 684—705年	中都河中府(山西蒲州) 南京成都 南都江陵

(续表)

朝代 (国名)	首都	陪都
唐朝		北都太原 西京凤翔 西都凤翔
唐 突厥	都斤山(鄂尔浑河上游)	
唐 回纥 (回鹘)	西州(新疆吐鲁蕃)	
唐 吐蕃	逻些(西藏拉萨)	
唐 南诏 大理	} 太和城, 羊苴咩城(云南大理)	拓东城(云南昆明)
五代 震国	上京龙泉府(黑龙江省宁安县)	中京显德府(吉林省和龙县, 今名西古城)
五代 渤海	上京龙泉府	中京显德府 东京龙原府(吉林省琿春县, 今名八连城) 西京鸭绿府 南京南海府
五代 后梁	东都开封 907—923年 西都洛阳 923—936年	西都洛阳 东都开封
五代 后唐	东都洛阳 923—936年	西都长安 北都太原 邺都兴唐府(河北大名县)

(续表)

朝代 (国名)	首都	陪都	
五代	后晋 东京开封 936—947年	西京洛阳 北京太原 邺都兴唐府	
	后汉 东京开封 947—951年	西京洛阳 北京太原 邺都兴唐府	
	后周 东京开封 951—960年	西京洛阳	
十国	吴国 东都广陵府(江苏扬州) 902—937年	西都金陵府	
	南唐 西都江宁府(南京) 937—975年	东都广陵府, 南都南昌府	
	吴越 西府(杭州) 907—978年		
	楚国 潭州(长沙) 907—951年		
	闽国 长乐(福州) 933—945年		
	南汉 兴王府(广州) 917—971年		
	前蜀 成都 907—925年		
	后蜀 成都 934—964年		
	荆南 (南平)	江陵府(湖北江陵) 925—963年	
	北汉 太原 951—979年		
北宋	东京开封府 960—1127年	西京河南府(洛阳) 南京应天府(河南 商丘) 北京大名府(河北 大名县)	

(续表)

朝代 (国名)	首 都	陪 都
南 宋	行在所临安(杭州) 1138—1276年	行都建康(南京)
刘 齐	大名(河北大名县) 1130—1137年	
西 夏	西平府(宁夏灵武县) 1002—1020年 东京兴州(银川) 1020—1033年 东京兴庆府〔中兴府〕 1033—1227年	西京西平府
东 夏	南京(吉林省延吉市城子山) 1215—1233年	
辽 国	上京临潢府(内蒙赤峰市巴林左旗) 1007—1125年	中京大定府 (内蒙古宁城县境) 南京析津府(北京) 东京辽阳府 (辽宁辽阳) 西京大同府 (山西大同)
金 国	上京会宁府(黑龙江省阿城市) 1115—1153年 中都大兴府 1153—1215年 南京开封府 1215—1234年	北京临潢府 东京辽阳府 (初名南京) 西京大同府 中京大定府 东京辽阳府 西京大同府 南京开封府 中京金昌府 北京大定府
元 朝	上都开平府(内蒙多伦西北) 1260—1264年 大都(北京, 初名中都大兴府) 1264—1279年	上都开平府

(续表)

朝代 (国名)	首都	陪都
明朝	南京应天府(南京) 1368—1420年 〔京师〕	北京开封府 1368—1378年 中都凤阳府(安徽凤阳)
清朝	京师顺天府(北京) 1420—1644年	南京应天府 中都凤阳府
清朝	兴京(辽宁新宾县赫图阿拉) 1587—1622年 东京(辽宁辽阳) 1622—1625年 盛京(沈阳) 1625—1644年 京师顺天府(北京) 1644—1911年	
太平天国	天京(南京) 1853—1844年	
中华民国	北京 1912—1927年 南京 1912年、1927—1949年	行都洛阳1932年 重庆1937—1949年

说 明

1.有些都城后面注了今地和年代,不一定准确,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年代是指建都年代,与王朝兴灭年代不尽一致。

2.由于历史的原因,有些地区,如汉西域诸国,有些已在今天的国境之外,但当时他们是汉之属国,所以按历史原貌编列。

(二) 主要参考文献目录

- | | | |
|------------------|-----------------|---------------|
| 历代帝王宅京记 | 顾炎武 | 《槐庐丛书》本、中华书局本 |
| 建都问题论集 | 正中书局 | |
| 中国城市建设史 | 同济大学城市规划教研室编 | |
|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2年版 | |
| 中国古代建筑史 | 刘敦桢主编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
| 中国建筑史 |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
| 通志 | 续通志 | 清通志 |
| | | 万有文库本 |
| | | 商务版 |
| 读史方舆纪要 | 顾祖禹 | 中华书局版 |
| 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 | 文物出版社 | 1984年版 |
| 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 | 文物出版社 | 1979年版 |
| 中国古代都城概况 | 李洁萍 |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
| 戴震集 | | 上海古籍出版社 |
| 考工记 | | 关中丛书本 |
| 关中胜迹图志 | 毕沅 | 关中丛书本 |
| 雍录 | 程大昌 | 关中丛书本 |
| 天下郡国利病书 | 顾炎武 | |
| 日下旧闻考 | | 北京古籍出版社 |
| 东京梦华录 | 孟元老 | 中华书局版 |
| (外四种: 都城纪胜 灌圃耐得翁 | | |
| 西湖老人繁胜录 | | |
| 梦粱录 吴自牧 | | |
| 武林旧事 周密) | | |
| 明代建筑大事年表 | 单士元等 | 京城印书局 |
| 王氏合校水经注 | 四部备要本 | 中华书局 |
| 越绝书 | 四部备要本 | 中华书局 |

关中水道记	孙彤	丛书集成本	商务版
南宋古迹考	朱彭	丛书集成本	商务版
乾道临安志	周淙	丛书集成本	商务版
帝王世纪（外一种 路史）皇甫謐		丛书集成本	商务版
元故宫遗录（外一种 金鳌退食笔记）肖洵		丛书集成本	商务版
汉西域图考	李恢垣		
古本竹书纪年辑证	方诗铭等	上海古籍出版社	
盐铁论译注		冶金工业出版社	
三辅黄图校证	陈直	陕西人民出版社	
元和郡县图志	李吉甫	中华书局	
洛阳伽蓝记校释	周祖謩	中华书局	
马可·波罗游记		福建科技出版社	
长安客话	蒋一揆	北京科技出版社	
六朝事迹编类	张敦颐	丛书集成本	商务版
金陵明故宫图考	葛宝华	中央大学出版组	
明清两代宫苑建置沿革图考	朱僊	商务版	
金陵古迹图考	朱僊	商务版	
南京的名胜古迹	朱僊	江苏人民出版社	
西游录 异域志		中华书局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陈寅恪	商务版	
大唐西域记	玄奘	上海人民出版社	
明纪	陈鹤	四部备要本	中华书局
明书	傅维麟	丛书集成本	商务版
文选	肖统	中华书局	
元丰九域志		丛书集成本	商务版
考工记图	戴震	商务版	
尚书正读	曾运乾	中华书局	

- | | | |
|---------------|------------|---------|
| 北平考 | 佚名 | 北京古籍出版社 |
| 博物志校证 | 张华 | 中华书局 |
| 宸垣识略 | 吴长元 | 北京古籍出版社 |
| 帝京岁时纪胜（外一种） | 燕京岁时记） | 北京出版社 |
| 帝京景物略 | | 北京古籍出版社 |
| 宛署杂记 | | 北京人民出版社 |
| 汉书新证 | 陈直 | 天津人民出版社 |
| 史记新证 | 陈直 | 天津人民出版社 |
| 汉城历代宫院考 | 陈子怡 | 陈西省博物馆 |
| 西湖游览志 | 田汝成 | 上海古籍出版社 |
| 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 | 胡如雷 | 三联书店 |
| 步芳集 | 侯仁之 | 北京出版社 |
| 西北史地丛书 | 黄文弼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 北京史话 | 侯仁之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 南京史话 | 蒋赞初 | 江苏人民出版社 |
| 江苏城市历史地理 | | 江苏科技出版社 |
| 西安历史述略 | 武伯纶 | 陕西人民出版社 |
| 丰镐—长安—西安 | 马正林 | 陕西人民出版社 |
| 殷墟 | 安阳市文化局编 | 文物出版社 |
| 郑州商代城遗址 | 陈显泗 | 中华书局 |
| 古都开封 | | 中州书画社 |
| 郑韩故城 | 马世之 | 中州书画社 |
| 元大都 | 陈高华 | 北京出版社 |
| 西汉长安 | 刘运勇 | 中华书局 |
| 圆明园 | 王威 | 北京出版社 |
| 满蒙古迹考（日） | 烏居龙藏著 陈念本译 | 商务版 |
| 东蒙古辽代旧城探考记（法） | 闵宣化著 | 冯承钧译 |
| | | 中华书局 |

- 日本的宫都 (日)村井康彦 角川书店
- 中国古代都城概说 王仲殊 考古 1982—5
- 唐代长安与洛阳 马得志 考古 1982—6
- 唐代两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 徐苹芳 考古 1982—6
- 夏文化初论 吴汝祚 中国史研究 1979—2
- 关于夏文化及其来源的初步探索 吴汝祚 文物 1978—9
- 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 考古 1959—11
- 夏文化探索 许顺湛 史学月刊 1964—7
- 夏都探索 方酉生 中国史研究 1980—4
- 关于郑州故城址时代问题商榷 荆三林 郑大学学报 1980—3
- 殷都屡迁原因试探 黎虎 北京师范大学报 1982—4
- 郑州商城即汤都亳说 邹衡 文物 1978—2
- 商都汤亳说 郑杰祥 中国史研究 1980—4
- 二里头文化探讨 殷璋璋 考古 1978—1
- 郑亳说商榷 石加 考古 1980—3
- 郑亳说再商榷 石加 考古 1982—2
- 说自契至于成汤八迁 王国维 《观堂集林》
- 传说中周都的实地考察 石璋如 中央研究院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0本下册
- 周都丰镐与金文中的莽京 黄盛璋 历史研究 1956—10
- 论周都镐京的位置 徐锡台 陈西师大学报 1982—3
- 登封王城岗遗址的发掘 文物 1983—3
- 论南亳与西亳 孙飞 文物 1980—8
- 楚都纪南城的勘查与发掘(上、下) 考古学报 1982—3,4
- 楚纪南故城 文物 1980—10
- 燕下都城址调查报告 考古 1962—1
- 河北易县燕下都故城勘查和试掘 考古学报 1965—1
- 山东临淄齐城试掘简报 考古 1961—6

- | | | | |
|--------------------------|------|---------|----------------|
| 金中都 | 阎文儒 | 文物 | 1959—9 |
| 元大都的勘察与发掘 | | 考古 | 1972—1 |
| 历史上的北京城 | 侯仁之 | 中国青年出版社 | |
| 古代的杭州 | 林正秋 | 杭大学学报 | 1978—2 |
| 南宋杭州的城市经济 | 林正秋 | 杭大学学报 | 1978—4 |
| 洛阳汉魏隋唐城址勘查记 | 阎文儒 | 考古学报 | 1955—9 |
| 洛阳古城勘察简报 | 郭宝钧 | 考古通讯 | 1955年创刊号 |
| 统万城城址勘测记 | | 考古 | 1981—3 |
| 秦都雍城遗址勘查 | | 考古 | 1963—8 |
| 秦都咸阳第一号宫殿建筑遗址简报 | | 文物 | 1976—11 |
| 秦都咸阳几个问题的初探 | 刘庆柱 | 文物 | 1976—11 |
| 陕西凤翔南古城村遗址试掘记 | | 考古 | 1962—9 |
| 楚都丹阳地望新探 | 石泉等 | 江汉论坛 | 1982—3 |
| 楚都辨 | 张正明 | 江汉论坛 | 1982—4 |
| 隋唐东都城址的勘查和发掘及续记 | | 考古 | 1961—3, 1978—6 |
| 唐代渤海上海京龙泉府遗址 | 陈显昌 | 文物 | 1980—9 |
| 南宋临安的都市经济 | 倪士毅等 | 浙江师院学报 | 1982—1 |
| 南宋临安文化 | 方如全 | 浙江师院学报 | 1982—3 |
| 南宋都城临安的商业 | 林正秋 | 史学月刊 | 1982—3 |
| 南宋定都临安原因初探 | 林正秋 | 杭州师院学报 | 1982—1 |
| 宋代东京城市经济的发展及其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地位 | 周宝珠 | 中国史研究 | 1981—2 |
| 北宋东京城的营建与布局 | 吴涛 | 郑大学学报 | 1982—3 |
| 北宋时期的东京 | 单远慕 | 史学月刊 | 1980—3 |
| 金上京城的规划及其他 | 景爱 | 北方论丛 | 1979—6 |
| 试论中国古代城市的起源与发展 | 赵玉馨 | 城市问题 | 1983—2 |
| 略论城的起源 | 马世之 | 中州学刊 | 1982—3 |
| 吐谷浑故都——伏侯城发现记 | 黄盛璋等 | 考古 | 1962—8 |

- | | | | |
|--------------|---------------|---------|--------|
| 南京城市的变迁与发展 | 汪永泽等 | 南京师院学报 | 1978—1 |
| 西夏史稿 | 吴天墀 | 四川人民出版社 | |
| 西夏书事 | 吴广成 | 北平文奎堂本 | |
| 明实录 | 江苏国学图书馆转抄本影印本 | | |
| 民元“争都”试释 | 章开源 | 北方论丛 | 1979—1 |
| 略论1912年的建都之争 | 谢本书 | 史学月刊 | 1982—1 |

(三) 古都景名

关中八景

华岳仙掌 骊山晚照 灞柳风雪 曲江流饮 雁塔晨钟
 咸阳古渡 草堂烟雾 太白积雪

洛阳八景

龙门山色 马寺钟声 金谷春晴 邙山晚眺 天津晓月
 洛浦秋风 平泉朝游 铜驼暮雨

开封八景

铁塔行云 金池过雨 州桥明月 大河涛声 繁台春晓
 汴水秋风 隋堤烟柳 相国霜钟

西湖十景

柳浪闻莺 苏堤春晓 断桥残雪 平湖秋月 三潭印月
 曲院风荷 双峰插云 花港观鱼 南屏晚钟 雷峰夕照

燕京八景

居庸迭翠 玉泉垂虹 太液秋风 琼岛春荫 蓟门烟树 西山晴雪
 卢沟晓月 金台夕照

金陵四十八景

石城霁雪 楼怀孙楚 燕矶夕照 长桥选妓 钟阜晴云 台想昭明

狮岭雄观 幕府登高 鹭洲二水 杏村沽酒 化龙丽地 谢公古墩 凤
凰三山 桃渡临流 来燕名堂 三宿名岩 龙江夜雨 祖堂振锡 报恩
寺塔 神乐仙都 虎洞明曦 天界招提 永济江流 灵谷深松 东山秋
月 清凉问佛 莫愁烟雨 献花清兴 北湖烟柳 嘉善闻经 珍珠浪涌
木末风高 秦淮渔唱 鸡笼云树 长干故里 凭虚远眺 天印樵歌 牛
首烟岚 甘露佳亭 冶城西峙 青溪九曲 栖霞胜景 雨花说法 商榷
别馆 赤石片矶 达摩古洞 星岗落石 祈泽池深

后 记

本书初稿写成以后，曾由兰州大学历史系作为《中国都城发展史》课程的教材油印两次。油印本印出后，曾向国内外专家学者和有关同志广泛征求意见。特别是杭州大学教授陈桥驿先生、北京大学教授张广达先生、中国古都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阎崇年先生、美国密西根大学教授兼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主任张春树先生，都对本书的内容结构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其后，根据各方面的意见，结合实地考察材料，进行了修改。尽管如此，由于作者才疏学浅，错误疏漏之处一定不少，恳请指正，不胜感激。

本书写作过程中，利用了大量已经公开出版的书刊上的材料；也利用了一些尚未出版、发表的书稿和论文，如南京大学、北京大学、西北大学的考古教材和中国古都学会的学术年会论文。除借此机会表示谢意外，特在书末列出《主要参考文献目录》。廿六史为必用参考书，故不再详列书名。

附录中的六大古都景名，不一定是该城建都时期的，仅供读者参考。

兰大油印本印行时，曾用电子扫描法印了两本参考资料：

一、中国都城历史地图集

二、中国都城历史资料选辑

其一中的历史地图，已插入本书各有关部分。其二是从《主要参考文献目录》中遴选的重要论文。

兰州大学历史系有关领导及资料室工作同志，对本书的写作给予很大支持和方便，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叶 晓 军

1985年8月于兰州大学

封面 封面 版式 插	题 面 式 式	设计 设计 设计 图	陈 曹 田 马	桥 慧 永	驿 刚 君 平
---------------------	------------------	---------------------	------------------	-------------	------------------

ISBN7—224—00252—6/K·42
定价：3.30 元